

鸡鸣读书文丛

江南读书记

王振羽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丛书策划 王政红
责任编辑 王欲祥
装帧设计 书衣坊



ISBN 978-7-81101-643-7



定价：29.00元

王振羽 著

江南读书记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读书记/王振羽著．—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鸡鸣读书文丛）

ISBN 978-7-81101-643-7/G·1129

Ⅰ.江... Ⅱ.王... Ⅲ.读书笔记 Ⅳ.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713 号

丛 书 名	鸡鸣读书文丛
丛书主编	雷　雨
书　　名	江南读书记
作　　者	王振羽
责任编辑	王欲祥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press.njnu.edu.cn
E－mail	nspzbb@njnu.edu.cn
照　　排	江苏兰斯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83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1-643-7/G·1129
定　　价	29.00 元

出 版 人　闻玉银

江南读书
——代序

江南读书，似乎给人一种很安定的感觉，可能还有一种偏安一隅的味道。京华过于喧嚣，哪能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不仅有政治上的诱惑，更有生活上的压力，左右上下的挤压。西北或者北方可能太过于贫瘠，连生存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又怎能心安理得地采菊东篱悠然读书？烟花三月的江南，细雨濛濛的江南，到处充满温情和平和的江南，晓风残月，和风骀荡，炊烟缕缕，垂柳依依，似乎总是四季如春的样子。虽然也有新的工业化的喧嚣，虽然也有商业大潮的猛烈冲洗，但是毕竟还有古城小巷，毕竟还有西湖太湖，毕竟还有绵绵不绝的读书种子，在这样的富有诗意的氛围中，读读闲书是再好不过了。

江南读书，来不得正襟危坐，面目庄严。躲在一个角落，听着苏州评弹，喝着清香可口的碧螺春，手中捧着线装书，哪怕是华宝斋新近出版的丰子恺的漫画或者是弘一大师的书法。不需要高谈阔论的评头论足，不需要声嘶力竭的激烈争辩，只是细细地品味，默默地领会，他们在当年的江南，怎会创造出这样的宝贝？他们在经历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铅华洗尽，坦荡磊落。在那样的岁月里，以一个读书人的立场和承担，成就自己的事业，虽然没有震天动地，虽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但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分量。

江南读书，似乎不应该是急吼吼的急功近利。读书是一种慢功夫，虽然有不少人还是难以抵挡诱惑地去拿什么学位，也不管这样的学位究竟有多少斤两。但是这样的热衷于学位的人，似乎也没有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磊落，只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羞羞答答的不太敢向人夸耀。发表文章，接触媒体，出版书籍，在其他地方也许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可要小心谨慎了。你的说法，你的见解，你的话语方式，都要考虑到分寸，考虑到适度，不能够为了耸人听闻而一惊一乍忘乎所以，不能够为了显摆自己而不管不顾否定一切。如果一味的张狂，一味的自以为是，口若悬河，目空一切，那么，在这样的精心读书、训练学问的氛围中，你将成为一种另类，不入流的另类，被认作是一种二百五。在这样的冷遇中，你会渐渐地感到自己的底气不足，自己的轻狂幼稚，自己虽然读了几本书，但毕竟还是没有真正领会读书的妙谛和真义。

江南读书，需要的是含蓄沉静，点到为止。在一起谈论读书心得，可以热烈，可以慷慨激昂，可以金刚怒目，但这样的怒发冲冠最好是偶尔为之，千万不能一以贯之。如果你总是这样义愤填膺，不依不饶，如果你总是这样眉头紧锁，忧国忧民，他们会觉得你太天真，不成熟。风雅深沉，懂得生活，在夫子庙依红偎翠，去西子湖畔笑傲江湖，富春江边看看钓台的春愁，想像严子陵当年拒绝刘秀的潇洒，还有郁达夫当年的放浪形骸，诗酒风流，要不在绵绵春雨的午夜独自欣赏《两当轩》的苦涩，为黄仲则的悲苦一掬热泪。这些人好像都不会吹胡子瞪眼睛和你脸红脖子粗地争辩，不会和你锱铢必较进行无原则的争论。他们喜欢静，喜欢在静静的相持中取得主动。

江南读书，并不是无聊乱翻书，并不是仅仅为了风雅和风流才读书。东林书院的琅琅书声，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而不仅仅是读书人的体面。声声入耳，事事关心，这需要多大的气魄，多大的心胸？复社的一帮人平时温文尔雅不动声色，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的刚烈和决绝，他们的抗争和坚持，真是天地为之变色，鬼神为之动容。如今身在江南的读书人也许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血性和胆气，但是他们还是很喜欢谈论晚明旧事，所谓桃花扇底送南朝。谈论往往带有缅怀和神往的样子，秦淮烟月，似乎被永远定格在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山河破碎的感叹和伤怀之中。常熟的翁氏父子，并没有显赫的门第，并没有多大的背景，但是一旦身处庙堂，他们毫不畏惧，决不轻言放弃，尽心尽责地履行

着自己的使命。即使亡命江湖,远在天涯,还是耿耿忠心,赤诚不改。

江南读书,读书江南,也许是自认为幸运的一种解嘲,也许是一种狭隘的故作姿态。但是在读书人的心灵版图上,读书江南似乎更多了一份自豪和责任,但是不读书的阿炳在江南创作了千古绝唱《二泉映月》,这样的悲愤和绝望,这样的忧伤和悲凉,怎会在诗意的江南存在?难道说诗意和风雅只不过是读书人的一种自欺欺人的臆想?只不过是一种过于浪漫的期待和神往的海市蜃楼?不管怎样,在江南读书,还是要珍惜这样的一种机缘,至少历史上的江南读书是一种真实存在吧。

目录

辑一 眺望

辑二　观潮

辑三　眉批

辑四　散墨

辑五　忆往

辑六　偶记

辑七 会心

辑八 情怀

辑九　行走

领略兰登书屋

知道兰登书屋，也仅仅是知道而已。至于这个美国最大的出版集团出版了什么有影响的图书，其资产规模究竟有多大，其盈利模式是什么，在美国社会有多大的能量，现在的境况如何，实在是不甚了了。多年前，在书店里买过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小册子《我与兰登书屋》，随便翻翻，也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如今，人将中年，咬咬牙跺跺脚义无反顾投身出版业，在唐人书店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我与兰登书屋》，便又买了一本，认真阅读起来。

书是贝内特・瑟夫这位兰登书屋的创始人写的，当然具有权威性和可信度。这位精力充沛、充满活力、机智风趣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在很偶然的机会，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购买了一家文库，创办了兰登书屋。不知道转让图书文库的人，后来是怎样地懊丧和失落，但是在这个人离开人世的时候，贝内特・瑟夫风格独特文字老道的怀念文章，却折射出其不同凡响的卓越见识和人情练达的别样风采。这个人就是贺拉斯，与贝内特有着很深的恩怨纠结。寂寂无名的作家德莱塞被其出版商贺拉斯成功地推销到好莱坞，原来说好要给予贺拉斯一定的分成比例，但是取得成功的德莱塞马上翻脸不认账，竟然把咖啡泼在贺拉斯的脸上。当时贝内特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幕，颇有君子风

度的贺拉斯尽量保持镇定地对贝内特说，每个作者都是狗娘养的！此话实在太尖刻，但倒也道出了至少是部分实情。出版商与作者或者供稿商总是一对唇齿相依的矛盾关系，默默无闻时，恨不得自掏腰包，祈求巴结出版商；一旦渐有声名，成了气候，一阔脸就变了。但是贝内特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极端例子而丧失对出版业的勃勃雄心，相反，在书中他津津乐道的几乎都是他与一些大作家的深入交往，如乔伊斯、辛克莱、福克纳、劳伦斯、普鲁斯特、欧文·肖、肖伯纳等。贝内特与他们的交往不是泛泛之交，而是凭依自己的眼光、见识和魄力赢得这些大作家的信赖与支持，而兰登书屋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也正是这位贺拉斯，在他去世的时候，贝内特撰写的悼念文章，坦率真实，感情真挚，没有为尊者讳的矫情和虚饰，批评虽然尖刻却不乏温情，怀念发自肺腑，凸现出贝内特这个犹太人的冷静、清醒、犀利和悲悯情怀。

作为出版家的贝内特，当然有机会了解所谓名人大家的种种侧面。劳伦斯与道格拉斯这样的大人物，在见面的时候，亲热拥抱，泪光盈盈，让我们赞叹大人物之间的真挚友谊和他们的高贵教养。但是一旦背过脸去，他们就开始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诋毁和攻击，用语之恶毒，言辞之激烈，令人侧目。这也许就是人性的复杂?！好在贝内特在这些人之间，长袖善舞，游刃有余，都能轻松自如地巧与周旋。能够妥当处理这样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一个出版家所应该具备的必要素质吧。得知福克纳去世的消息后，贝内特几乎是第一时间赶到福克纳的家乡，参与一切吊唁活动。而福克纳的遗嘱和其夫人的主张发生冲突时，贝内特没有丧失自己的出版原则，迁就福克纳的遗孀。这样的操守在今天的国内出版界看来，也许太不“市场化”了吧？国内的许多读者抱怨一些所谓名家的东西名实不副，这样的烦恼也困扰过贝内特。他无奈地说，辛克莱·刘易斯的晚年作品糟糕透了，本不具备出版的价值，“但你如何才能让一位曾经成功的作家在他仍然愿意写的时候停止写作？在这些情况下评论家总是怪罪于出版者，说我们没有拒绝某个作家的这部或那部作品，反而害了他。但每个熟悉文学世界的人都应该知道，即便我们退了某个名气很大的作家的书稿，总有别家出版社出版它，而我们也将因此破坏了我们与作家可能已经很密切的长期合作关系”。

贝内特说：“在人们公平公正时，每个人做事都很顺利。这是我一生遵循的信条。如果你赚了钱，要让别人赚钱。如果你能把事情办得

人人都得到好处，这才是理想的生意经。”俱乐部选中某本书，要承诺付费，他们每卖掉一本书，出版社和作者就平分相应的版税。有一家俱乐部到兰登书屋选书后付了保证金，可能是市场销售比较理想，这家俱乐部要增加定金，但是贝内特没有见利忘义，而是如数奉还，如是者三，折射出兰登书屋诚信第一的君子风度。

贝内特机智风趣，鬼点子多，愚弄舆论、炒作新书都是驾轻就熟。为了引进《尤利西斯》到美国本土，自导双簧，引人入彀，真是让人佩服。兰登书屋的老板也很会与体制打交道。贝内特很热心地张罗罗斯福总统文集的出版事宜，但贝内特毕竟没有多少行政资源可以指望，希望能够尽量压低印数，降低成本。但是自我感觉良好的罗斯福认为自己的书一定会很畅销。贝内特万般无奈提醒罗斯福：任何人的文件和演讲集对美国公众都没有吸引力！胡佛的文集只不过卖了 2000 套，但是罗斯福却认为胡佛能卖这么多，自己起码可以销售 100 万套。实际上罗斯福的文集销售不过 7000 套，让贝内特伤透了脑筋，但是罗斯福却迁怒于兰登书屋推销不力，几乎要与之绝交，真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

现在国内出版业似乎弥漫着一种很不切合实际的虚骄之气和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当，张口战略，闭口一流，口气之大恨不得把太平洋的水吹干。似乎编辑的素养高低只是技术性问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出版家贝内特却说：“和其他出版社一样，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找到合适的编辑，他们对书稿的品味和判断力都要值得我们信任。优秀的编辑就像优秀的作家一样，必须天生就有某些不可或缺的才能，譬如良好的记忆力和想象力。”

贝内特对编辑的透彻理解还表现在他对这一职业的深刻体悟。他认为，编辑应当拥有广泛的兴趣，流畅的语言运用能力，还要对综合知识有一定的储备——越多越好——这样他才能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编辑要广泛阅读，才能在看到书稿时鉴别、欣赏写作的好坏。但他也必须有一定的市场感觉，知道大众可能买什么书，因为即使书写得再好，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无法生存。编辑的最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努力维护作者和出版社之间利益的平衡。编辑的另一个重要职责是为出版社增添新的作者，做案头的编辑与经常外出四处物色书稿，与作家、经纪人吃饭喝酒的编辑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有些编辑两方面都能胜任。不断冒出新点子的编辑通常更受人瞩目，最终可能赚

大钱，而埋头处理书稿、干着出版中最脏最苦工作的编辑则要逊色许多：他就像握着铲子往轮船锅炉里添煤的可怜家伙，而船长正坐在顶板追求船上最漂亮的姑娘。话虽然难听，可能也是大实话。

书中精彩的记述，中肯的评说，坦率的见解，俯拾皆是。但是这本书的翻译者指责老版本的不完整，似乎有失厚道。实际上，恰恰是传主的大学以前生活的拉杂琐碎干扰了读者的胃口，很有可能让这本书的价值给遮蔽了。书中许多不应该的错字、别字，每每勾起我对三联老版本《我与兰登书屋》的怀念。但是书房庞杂，实在找不到这本小书的藏身之处了。

为老出版人画像

记得在一个新书座谈会上，看到一本新书，装帧设计很是精致漂亮，但是书的封底却很扎眼地印着一些迎合市场需要的广告语言。当然这些话都是出自所谓的权威之口，有一个人并没有自称为小说家或者著名评论家然后还有某著名大学的教授博导之类的头衔，而是自称为出版家。这样的称谓当时引起一些人的窃窃私语：我们当下有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家吗？时隔不久，看到王建辉先生的《老出版人肖像》一书，不禁喜出望外。谦称为出版人而不是什么“家”，显得亲切而不失庄重，就像许多真正有学问的人自称学人，而一些混迹于媒体的学界混混经常沾沾自喜地说自己是著名教授。

有人说中国的传媒业太年轻了，年轻得在所谓全球化的传媒巨头面前显得是那样的寒酸落魄，微不足道。我们有许多关于外国传媒巨头的资讯，诸如默多克的传记甚至关于贝塔斯曼的发展史我们也有详备的介绍，但是对于我们本土的传媒发展的探讨则显得惊人的清冷；而对于中国传媒发展史上的一些关键人物的研究就更加寂寞了，即使有《张元济传》、《张元济日记》的出版，但往往也是几个圈内人的孤芳自赏。《老出版人肖像》的作者虽然有着繁重的行政事务，但是好像并没有把自己的业余生活完全交给这样那样的应酬和奔走，而是利用业余

时间沉潜在纷繁复杂的大量史料之中搜求爬梳，把大量的被我们所遗忘的在中国传媒史上尤其是出版史上有着独特贡献的人物一一凸显出来。在这样的梳理和解读中，生动有趣的曾经为中国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向我们走来。透过作者灵动飞扬的文字，我们了解了王韬的晚年心境，我们明白了《点石斋画报》的巨大意义，我们也知道了曾经被人误解的吴友如的远见卓识，还有汪康年的进退，高梦旦的人格，杜亚泉名字的来历，更有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贡献，这样的贡献岂止是一条小溪？即使我们所熟悉的鲁迅、陈独秀等人也有热心出版为出版呕心沥血的细节。夏丏尊、叶楚伧、邵力子、李公朴、胡风、孙伏园、吴宓、邵洵美、黎烈文、靳以等人，这些人物我们知之不多，觉得他们和出版业关系不大，但是读了这本书，我们才明白他们在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过程中都有过不俗的表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闪光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了，扪心自问，在那样的时代能够涌现出这样杰出的出版俊彦，现在我们为什么总是寻找客观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进行开脱？

中国的出版业现在似乎是非常的繁荣了，我们的一些身居要津者经常会胸有成竹地报出一串串数字来加以佐证。一些颇具规模的文化产业集团纷纷挂牌，比较像样的传媒集团在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之下也先后浮出水面，这方面的标志性举措之一就是中国出版集团在多次酝酿之后的终于亮相。这个中国出版集团的注册资金究竟是多少好像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难题，我们讲究的是体制内语言的艺术技巧。这个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老字号出版社的庞大集团到底能否引领中国出版业走向新的辉煌，积极应对海外传媒的大力渗透，为受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满足受众的广泛需求，我们当然还要拭目以待。在我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市场化进程和庞大的海外传媒集团的时候，我们可否稍微留意一下自己本土的传媒业的先行者曾经走过的路缴过的学费？《老出版人肖像》不是什么鸿篇巨制，但也并不是刻板的简单的人物生平介绍，娓娓道来，议论风生，以随笔来写人物，情趣盎然，形神兼备。可惜全书虽然涉及了五十多个人，但是却没有张元济、邹韬奋、赵家璧、陈原等人物，应该算是不小的缺憾。

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清醒地了解中国往昔传媒发展的不易和辛酸。而在当前我们叠床架屋喋喋不休地论证文化产业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何曾想过中国传媒变迁的坎坷曲折风雨兼程？我们何曾

记得在这样并不太长的沧桑历程中那些先行者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为中国出版业曾经付出过的艰辛和血泪？在这些也许并不丰厚殷实但却浸透着挫折和教训的遗产面前，我们是否有过应有的尊重和敬畏？面对这些中国传媒发展过程中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先辈，我们什么时间可以说我们已经超过了王云五、张元济、邹韬奋、陆费逵？我们什么时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他们薪火相传的真正的中国出版家？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不说崩溃话警醒

早就听说《出版大崩溃》这本书，但是真正认真阅读这本书却是在2005年的春天。作者是我们的邻居日本的小林一博先生。新闻出版总署的柳斌杰署长为这本书作了一篇很长的序言。柳斌杰署长向以敢言能言引人注目，他根据这个日本人对日本出版界所存在危机的深刻认识，当然很自然地结合本土的出版业所潜伏的种种弊端或者称危机，诸如如何走出去、体制性障碍、IT革命对出版业的影响等很宏观的带有战略性的大课题，提出了一些看法。虽然让人觉得有点过于宏观，但作为一个行政官员，不是靠秘书或者写作班子滴水不漏地讲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而是根据自己所居的独特位置，所掌握的大量信息，结合本土出版业的实际状况，对整个出版业的发展战略、产业方向、大致走向作出一种大胆的预测和分析，这种思考问题、直面问题的勇气本身，就颇为令人景仰。

这本书的名字很是吓人，这也多少说明日本人的一个特点，即喜欢一惊一乍，故作惊人之语。我们看日本的影视，他们的男人大多很深沉，有时候还有点阴暗和变态，而女人则显得忍辱负重甚至是很富有牺牲精神。但是面对陌生人面对外人，日本人都很客气，他们的弯腰鞠躬的形象让我们印象深刻，客气得让我们中国人觉得有点不够真诚甚至

是虚伪。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怎样,我们很难说得清楚,比如说日本梦寐以求想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是他们对历史问题却采取非常愚蠢的态度,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搞得一团糟。但是作为生活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大和民族,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却是他们的忧患意识。他们对潜伏的危机往往有更为敏感的感受,比如说出版业,在作者看来已经是四面楚歌危机四伏,他们揭示自身问题的时候,措辞之严厉往往给人大厦将倾大祸临头的感觉,诸如《出版动乱》、《是谁扼杀了图书》等,大有鲁迅先生所谓猛击一掌以求引起疗救者注意的味道。但在我们本土的所谓从事出版业的专家看来,这样的作派可能会感到有点不够沉稳不够成熟,甚至有点小题大做,耸人听闻。

小林一博先生是从"日本出版业充满总破产的恐惧"、"经济恐慌必然导致流通崩溃"、"从胡麻书房看'出版大崩溃'"、"IT革命是否动摇了出版的根基"、"为什么自己不能改革"、"出版文化之火会不会熄灭"等六个方面来分析出版业的所谓崩溃的。我们虽然与日本仅仅是咫尺之隔,但是应该承认,我们除了知道他们的小学馆、讲谈社之外,充其量还知道他们的岩波书店。这些称谓,也大多限于仅仅知道而已。至于他们的出版规模、运作方式、历史沿革、利弊得失等等,我们虽然不断有人到日本四岛去观光学习,但是似乎看不到我们对日本出版业很仔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贝塔斯曼来了,亚马逊书店来了,对我们的本土出版业乃至发行业,也仅仅是热闹了一阵所谓的狼来了,从此沉寂无声。日本不是这样,他们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他们不仅仅是手足无措,惶恐不安,面对西方的强势文明,他们在紧张之余更多的是积极应对。不是说科技落后吗?现在的日本已经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六七个诺贝尔奖,文学方面他们也要成为亚洲的代表,现在已经有两个作家无可争议地获得了此项荣誉。不是一味的怨天尤人,而是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来改变现在的困境。出版社的破产、书店的关门、杂志社的倒闭、广告收入的减少、图书退货率的上升、网络的兴起、编辑素质的下降、出版社与发行商之间的微妙关系,凡此种种,看似非常琐碎的形而下的事情,我们通过作者细致入微的描述,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个行业的熟悉程度和了解程度,作者的议论绝对不是空疏不当的泛泛之论。作者在听说一些出版社自甘堕落,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的时候,这样说道:"还听说那些更加鲁莽的出版社,把著者交来的软磁盘原封不动地转给印刷公司,即自己不搞编辑作业,也不委托事务所代理。而印刷公司就像害怕失去活源一样,来者不拒,居然代理编辑业务,制作起

图书来。这种出版过程本身,就是出版崩溃的现象之一。"这种现象,难道在我们本土还少吗?小林一博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出版社的社长或管理人员,应当全部阅读自家出版社的图书,不能细读,至少也要走马观花。出版社的经营者如能以这样的'心态'、'动机'出版新书,就能止住新书出版的滔天洪水。相反,无视或轻视这种基本的姿态,泡沫还会继续产生。"我猛一听这样的话,还有点费解,社长怎么会不读自己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去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一位汉语说得很棒的德国人希望翻译国内一家出版社很走俏的一本书,这个负责人居然不知道自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我坐在边上如果不是亲耳所闻,无论如何不敢相信竟有这样的事情!

《出版大崩溃》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作者也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对自己本土文化的热爱,他对自己本土出版业所面临危机的忧患意识非常值得我们尊重。我们说,自己的图书出版业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每年的图书品种已经达到了近 20 万种,2003 年的数字是 19 万多种,是 1978 年的 12 倍以上,图书的销售量达到了近 68 亿册。但是,透过这些庞大的数字,我们也发现,我们的图书平均销售册数在下降,平均利润率在下降,人均购买图书的量在下降或者说近 20 年来变化不大。与此同时,图书的总定价在不断飙升,图书的出版成本在年年上涨,整个出版业的利润率在下降。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图书发行的折扣率越来越大,图书的退货率也越来越高,我们不了解图书货款结算的状况,我们不了解图书库存的情况。虽然书店在不断地开,但同时关门的书店也不少。这些现象,难道都是正常的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令人不太满意的状况?是新的媒体新的信息渠道的风起云涌抢了我们的饭碗?是盗版图书的大量存在影响了我们的效益?是教材改革教育系统的觉醒让我们的日子难过?是民资外资的进入让我们的发行体制出现了危机?这些可能都是原因,但似乎又很难说服我们。我们成立了不少所谓的出版集团,我们的初衷是做大做强成为航空母舰,来应对全球化和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但是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所谓新体制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敷衍应付,更为要命的是面对所谓改制的恐慌和应对无策,导致整个行业弥漫着一种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气氛。与此同时,买卖书号更加大行其道,对教辅教材的过度依赖,对垄断体制的过度迷恋,对放开发行形成统一的开放的大市场的恐惧,多年形成的近亲繁殖的编辑、发行、印刷队伍……凡此种种,不要说积极创新,过日子都会很艰难!

书商的精神自传

看到《愤怒书尘》这个书名，很有点疑惑：这样奇怪的书名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编辑的解释是"把我的愤怒写入书架的灰尘中"，这样的说法还是让人不知所云。商务印书馆为什么要出版这样的书？彼德·魏德哈斯这个自命为文化经纪人的德国人的青年时代究竟有什么愤怒？书的封面上有一个裸着肩膀横坐在自行车上的很是英俊的德国青年，一副行走四海闯荡天涯的模样，这个有点明星气质的小伙子难道就是彼德·魏德哈斯？

自从文化产业这个词汇被主流意识形态确认之后，特别是在经过我们这个东方古老大国二十多年的坚忍不拔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终于明白：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文化的影响力不亚于原子弹。邓小平集一生之经验讲了一句听起来振聋发聩的大白话：中国离不开世界。钱其琛的儿子钱宁当然比一般人更能了解开放的意义。在1989年之后，我们的留学生政策受到了非常激烈的批评也承受着沉重的压力，而钱宁在这个时候出版了《留学美国》，理性分析了中国的留学生政策，结论当然是毫不含糊：任何试图关闭大门的做法都是徒劳无益。在现在的语境之下，谈论开拓国际市场，弘扬我们的东方文化到西方世界，当然不像二十年前那样羞羞答答了，当然也不会再把海灯法师的"中华武功"

当作国粹去周游列国了。虽然缓慢，虽然交了不少学费，虽然我们轰轰烈烈的中法文化年更多的还是一种象征意义，但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毕竟已经是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了。来自理性的判断是，在至少一百年内，仅就文化而言，西强我弱的格局不会改变。但是在这样的小小地球村之上，面对我们的民众被日益激发起来的分享世界共同文明成果的极大热情，我们的文化交流活动究竟得到了怎样的开展？官方的往来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在看过《愤怒书尘》之后，让人觉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的文化产业亟需要大批的像彼德·魏德哈斯这样的所谓“文化经纪人”。

彼德·魏德哈斯这样的人，在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看来，纯粹是文化特务，是不遗余力地推销西方价值观的马前卒，是风流成性的好色之徒。彼德·魏德哈斯作为战后在德国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对自己的父辈充满了鄙夷和不屑，甚至是愤怒和痛苦：怎么会在希特勒的驱使之下如此灭绝人性地屠杀犹太人？德国这个有意思的喜欢较真的民族，似乎要反复地忏悔反省寻求答案。彼德·魏德哈斯在这样的困惑当中行走天下，欧洲和远东，土耳其和以色列，在这样的近乎没有目的地的游走中，这个浪漫的德国青年既收获了丰富的浪漫爱情，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增长了不少才干。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到文化交流的意义，坚定了做书商的信念。

彼德·魏德哈斯一旦选定这一目标，就开始了自己踏踏实实的努力，经过多年奋斗，他终于成为法兰克福书展中心的一个关键人物。在这样的职业生涯中，彼德在拉美四处奔波，左右联系，上下打点，官员的沟通，媒体的联系，场地的布置，图书陈列的选择，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彼德都要事必躬亲，亲自落实。看得出来，彼德在拉美的经历还是比较愉快的，也是极为成功的。在这里，他有了一个共同生活十年的拉美妻子。但是，在苏联，在亚洲，彼德遇到的挑战可能就严重得多。我们从彼德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对俄罗斯人、日本人，包括东南亚人毫不客气的直率言辞。对这些批评，我们当然不能一概归之于恶毒攻击。彼德没有到中国来开拓自己的事业。

我们现在的成功人士更热衷的是当CEO，总裁，董事，是资本运作，是巧立名目的股份制改造，是跃跃欲试的年薪制，是没有任何游戏规则的暗箱操作，是做世界上大的文化产业集团的代理人，也就是所谓的陈旧观念中的“买办”、“假洋鬼子”。但是，我们就是缺乏像彼德·魏德哈

斯这样既有浪漫情怀又有踏实功夫的文化经纪人，或者说书商也未尝不可。现在，我们应该算是图书生产大国了，但是，我们的图书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影响力？我们的文化产品究竟有多少可以拿到国门外边向世人展示？说点更具体的，我们组织了这么多人到海外观光学习，考察旅游，但是，我们纵横世界的文化经纪人又在哪里？

彼德的文字富有感性。彼德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谈到自己所读到的书，还有他和如今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君特·格拉斯的交往，我觉得这不是卖弄，而是作为一个成功书商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彼德的故事很真实，他和女孩子的艳遇说得坦率，不让人觉得恶心。但是，在书的结尾，作者明显显得没有耐心了，有点草草收场的感觉。

知识分子的鸦片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的一部享有盛名的学术著作。虽然写作于半个世纪以前，但是今天读来仍不能不感叹作者穿越时空的深邃思想和远见卓识。

全书分为三编，分别以"政治的神话"、"历史的偶像崇拜"、"知识分子的异化"为题，作者在自己所身处的语境当中，以宏观的视野，深刻的思辨，辛辣的语言探讨左派、革命、无产阶级的所谓"神话"。在《历史的偶像崇拜》这一部分，作者关于圣职人员与信徒、关于历史的意义、甚至关于必然性的幻觉等，条分缕析，卓见迭出，细细读来可能都有警人心魄的力量。尤其是该书的第三部分，论述知识分子和祖国、意识形态的关系，最后探讨知识分子和宗教的内在关联，虽然语言不无晦涩难懂，但在只言片语当中能够让人体会到卓越思想穿越一切阻隔的神秘魅力。

作者在每一部分的论述之后，都有自己概括性的认真总结，如"论政治乐观主义"、"论历史的控制"、"知识分子的命运"等，让读者更能清晰地体会到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和立场。

但是这样的一部书，从西方传播到东方，的确涉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东欧和东方诸多国家的具体实践。我们当然不能完全认

同作者诸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归纳、判断和批判，但是考虑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考虑到中国当下的现代化建设所处的纷纭激荡的高度开放环境，考虑到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荡，毕竟现在是全球化的大背景，对西方著名的文本如果一味采取漠视或者掩耳盗铃的态度是一种极端落后的思维方法。如果对一些刺耳的言词或者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进行大量的删削，一叶障目，难见泰山，似乎很难让我们完整准确地了解作者的本意。考虑到作者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学者，他的言词又不是毫无节制的谩骂和肆意攻击，对这样的图书，似应采取审慎宽容的态度。

实际上，我们已经出版了哈耶克的著作、福柯的著作，甚至奥维尔的小说，至少从现在看来，也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洪水猛兽，也并没有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不可估量的冲击。何况，这样的图书，其读者也仅仅限于很有限的范围之内。基于此，此类图书，除个别不妥当的言词外，不宜作太大的删改，也算是一种声音的存在，总比万马齐喑或者是一种声音的喧嚣，来得明智而且真实。

遥望曾经的国土库页岛

知道《萨哈林岛》这本书，是在多年前看《契诃夫传》的时候。这本传记是法国人莫洛亚所著，写得传神、动人、耐读。这也充分说明欧洲文明的同源同根，相互之间根本没有什么隔膜和生疏。这种现象在我们看来也许不可思议。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如何去写一个外国人的传记。据说南京大学有个教授曾经写过《雪莱传》，没有看过，不知道写成什么样子。中国社科院的一个研究员也曾经写过《川端康成传》，想来我们离日本不太远，了解日本文化比较便利，这样的传记写来会比较轻松一些？

有意思的是，倒是许多外国人，很有勇气地写有关中国人尤其是政治人物的传记。这些传记由于他们较少我们国内的种种限制和清规戒律，他们写来较少束缚和顾忌，虽然有许多贻笑大方的地方，但客观地讲，还真的有一些独到的眼光和我们会很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进入他们的视野。斯诺的《西行漫记》，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史景迁和魏菲特等人的著作，都算这方面比较成功的作品。实际上，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这样狭隘的理解也是很没有道理的，只要写得好，又何必在意国别国籍这样的身份呢？

还来说《萨哈林岛》。虽然在《契诃夫传》中知道这是契诃夫的一本

很别致也很重要的书，但是我们大陆究竟翻译出版过此书没有，我一片茫然。后来听止水先生说，可能地处北国边陲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这本书，但是书名叫《萨哈林旅行记》。今年国庆前夕，我有机会到了俄罗斯的远东走马观花了几天。导游是一个金发披肩的俄罗斯女孩，还正在大学读书，人很腼腆友好，她的汉语名字叫莲娜。闲暇时她讲自己的父母现在是莫斯科市的卫生局长，原来在比罗比詹工作，比罗比詹曾经归属哈巴罗夫斯克，是在前几年才分出来的。莲娜说自己的父母还在萨哈林岛工作过，她当时还小，但是萨哈林岛很美丽。我问莲娜是不是知道契诃夫曾经写过《库页岛》这本书，莲娜对契诃夫这个名字好像很陌生，拼命地摇头。莲娜似乎只知道普希金。我说，这个岛屿我们称之为库页岛，莲娜微笑着，对我的话也不分辩。因为这个缘故，在返回哈尔滨后，我又到处急切地寻找《萨哈林岛》。但是跑遍了哈尔滨中央大街的几个书店，都一无所获。那种也许再也见不到《萨哈林岛》的遗憾和惆怅，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

回到南京之后，我还是不死心，仍然锲而不舍地跑了不少书店。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竟然在城南的一个旧书店寻到了这本书，果然是止水先生说过的书名《萨哈林旅行记》，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

《萨哈林旅行记》像是一个严谨的调查报告。写惯了小说和剧本的契诃夫不愧是医生出身，他在这个当时满是流放犯的岛屿上生活了三个多月，经过相当深入细致的考察，不仅全面深入科学地考察了这个相当于两个希腊的岛屿上的山脉和河流、地理概况和地形地貌，而且相当精确地把这个岛上的行政管理情况和村屯的分布情况都一一列举。更为重要的是，契诃夫居然把每个村子有多少人口，男女的比例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记录和描述，对这些人的生存状况也作了客观反映。看得出来，契诃夫为这本书下了将近四年的功夫，他把有关萨哈林岛的几乎所有文献都找了出来，并且进行了认真的引用和自认为客观公正的注解和说明。千万不要认为《萨哈林旅行记》都是沉闷繁琐的调查报告，我仅举书中关于红河屯的一段描述，来说明契诃夫是怎样描述这座岛屿的绮丽风光的："沿路凡是挺拔的建筑用树，几乎都已砍伐殆尽。但是森林仍然十分优美，令人心旷神怡，白桦、山杨、白杨、柳树、水曲柳、接骨木、稠李、绣线菊、山里红等等树木中间，生长着高可没人的蒿草。高大的蕨菜和叶子直径可达一俄尺多的牛蒡，同乔木和灌木混杂在一

起，形成了茂密的无法通行的树丛，给黑熊、紫貂和鹿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场所。峡谷两侧，群山绵亘，山上长满冷杉、枞树和落叶松等针叶林，像是两道绿色的墙壁。再往上又是阔叶林，顶峰是童山，间或覆盖着灌木林。"这样的自然风光，我在从哈巴罗夫斯克返回比罗比詹的路上，亲眼所见，历历在目。当时在明亮的月光之下，远东的森林和草地似乎呈现出一种神奇莫测的色彩，当时脑海中浮现出唐人的诗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些当年我们的祖先曾经生息过的土地哟！

神秘民族的小说文本

也许是受老师的影响，也许是出于一种逃避和好奇，我在看过几本人类社会学的书之后，曾经很幼稚地想，如果沉潜下来对一些很独特的民族或者一些河流流域内的原住民进行详细的社会学方面的考察，一定会很有意思。

西方的学者对美洲、非洲乃至太平洋岛屿的土著居民很是关注，经常会有很振聋发聩的发现。但对于爱斯基摩人，似乎很少看到他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只能在一些大而化之的文字介绍中简略地知道，爱斯基摩人的体质特征和亚洲的黄种人非常接近，头发乌黑而不卷曲，身材矮小，手脚也很小，他们聚群而居，生活在北极圈周围，还处在非常原始的社会状态。他们有自己的头人，相信鬼神，重男轻女，性生活随便，实行一夫多妻制或者一妻多夫制。他们爱吃生肉，穿兽皮制作的衣服和皮靴，漫长的冬季里住在自己构筑的雪屋里，夏天则住棚屋，外出远行驾驭狗拉的雪橇行驰数千里。据称，爱斯基摩人自豪而又保守，排外思想相当严重，自称因纽特人或者因努克。中学地理课本上还曾经郑重其事地把爱斯基摩人改称为因纽特人，也许是表示对这个民族的尊重？但是爱斯基摩人的生活细节我们的确不甚了了，他们的情感世界究竟怎样我们也不明不白。也许这个神秘的民族生活的环境太恶劣

了？也许这个民族过于封闭太难接触？否则社会学家怎会对这样独特的带有化石味道的民族视而不见？

正是初春时节，在姑苏城内的古旧书店里，看到了《爱斯基摩人》，心里不禁一阵高兴。这个独特的民族在北极圈内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那样严酷寒冷的环境之下快乐幸福吗？他们的内部矛盾是怎样协调的？面对外部世界的日益渗透和干扰，他们采取了怎样的态度？他们的风俗习惯、婚姻制度、财产分配、重大事项的决定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呢？这本《爱斯基摩人》虽然是一本小说，不像社会学著作那样条分缕析，但小说家的观察一定会更加富有感情色彩，一定会有比较生动的故事，也一定会透露出我想知道的种种信息。

这样的阅读期待会不会让人失望？很认真地读过之后，应该承认，这本书有许多让我不满足的地方。但这的确是一本很不错的小说，它基本上向世人比较准确地展示了这个独特民族的生存状况，也许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的真实图景，实际上这样古老的生命力顽强的民族，他们的嬗变应该说是缓慢的，即使到了今天，恐怕也不会有多少改变吧？

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名叫阿加居克的爱斯基摩人，一个头人的儿子，不满于现实的生活，带着自己的妻子伊丽奥克离群索居，单独生活在空旷的渺无人烟的苔原之上。暴风雪，冻土带，矮矮的灌木丛，形形色色的地衣，各种各样的野兽，狂风呼啸的飓风，潺潺流淌的小溪，夫妻二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顽强地生存下来。他们去打猎，把获取的猎皮以及海象、海豹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拿去和白人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繁衍生息。强悍野蛮甚至是头脑简单的阿加居克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愤怒呐喊，狂躁不安地殴打自己的妻子。他像不懂事的孩子，有时候会突然产生无法抑制的欲望。阿加居克夫妇茹毛饮血，享受着孤寂落寞但充满单纯和洁净的生活。但是他们也在慢慢地改变自己。在有了孩子之后，阿加居克开始感到自己妻子的不平凡之处，他允许自己的妻子有了讲话的权力。在和外界的交往中，他发现自己的妻子也许更聪明机智。更为重要的是，阿加居克摆脱了自己部落的陋习，不愿意把自己的妻子与别人共享。当自己的妻子执意要留下他们的第二个女孩子的时候，阿加居克表示了勉强的同意。小说还有一个叙述线索是讲述阿加居克谋杀一个白种商人之后在爱斯基摩人之间所产生的动荡和影响，高明的小说作者让阿加居克的面部被野狼大面积地毁伤之

后，得以逃脱白人法律的制裁。从他们的儿子泰雅乌特身上，我们可能应该给予更多的希望和期待，他也许会生活得更文明更有质量？据说这反映了小说作者回归大自然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爱斯基摩人》这部小说不像许多西方的小说那样晦涩难懂，而是一种简洁明了的叙述方式。文字精练，朴素自然，在缓缓的叙事当中逐步展示爱斯基摩人丰富的生活画卷。奇异的苔原风光，荒凉的雪原风情，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民族幽深隐秘的精神世界，在作者从容的有张有弛的娓娓道来中，得以生动具体的表现出来。这个小说的作者伊夫·泰利奥是加拿大的法语作家，据介绍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活阅历。反映爱斯基摩人的小说他写了三部，分别发表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这本《爱斯基摩人》本来叫《阿加居克》，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也为作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本书进入中国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翻译者郑永慧觉得译做《爱斯基摩人》也许更为贴切。这本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的责任编辑刘硕良先生曾经是《出版广角》的总编辑，也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出版人。

我在美丽的日本

诺贝尔文学奖年年花开花落，但是中国的本土作家似乎总是无缘。这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文坛的一种隐痛，一个情结，总觉得很没有面子，脸上挂不住。我们总是莫名其妙地认为日本文化似乎是中国文化的延续，但是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据说已经有六人，文学奖也已经有两个了，这就是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亚洲的印度因为泰戈尔也早已填补了空白，我们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虽然有一个华裔作家高行健获得了这个奖项，但是由于高行健的复杂背景和他已经加入他国国籍的现实，我们在为之兴奋之余还是有一种深深的难以释怀的不自然和遗憾。

前一阶段，看到媒体上很热闹地介绍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一个作家的对话和交往，心里感到特别别扭，总觉得有仰仗洋人自高身价的嫌疑。也许人家的抬举是出于真诚，但是日本人语言的夸张和客套，我们难道领教得还少吗？不管怎么说，我们总要了解自己的邻居是怎样取得这样的成就，他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上，可以感受到浓烈的俄罗斯风情，不仅仅是将近百年的索非亚大教堂，不仅仅是透着巴罗克风格的建筑群，不仅仅是随处可见的身材曼妙金发披肩的俄罗斯女郎，还有就是日本人在历史上的东北大地的顽

强存在。有一条很革命的大街据说也已经被改作果戈里大街了，我们的对外开放真是显得真诚而又可爱。多少具备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在历史上俄国人和日本人对中国的东三省怀有怎样的想法。上大学时时时洋溢着北方女孩的爽朗和热情的同学，很有耐心地陪着我在中央书店里翻翻捡捡，当然是满载而归，其中就有一本《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

说实在话，对于中国人写外国人的传记，我基本上从来不看，总觉得这些从材料上剪剪贴贴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纯粹是浪费时间，更何况你本人对人家的文化背景生存氛围的了解极为有限，怎么可能完整全面地来表现人家的心灵世界？也许随着外语的普及，全球化的推进，这样的状况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但是，《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似乎是一个例外，作者是研究川端康成真正意义上的专家，翻译过川端的大部分作品，这样的作者当然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东拉西扯。也许受川端的影响，作者在描述川端坎坷多难的一生的时候，笔调显得非常沉郁和伤感，一如川端的《雪国》和《伊豆的舞女》，忧郁，孤独，有一种凄凉之美。

川端的《古都》简直就像是多情诗人的散文诗，苍凉旷远，惊人的清醒，别致的视角，这样的情怀和立场奠定了川端在文坛的位置。据说现在中国的一些作家，自己的作品已经几千万字了，很是高产，大有以量取胜的味道。但是，听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评委们提到的川端的作品也就是《雪国》、《伊豆的舞女》和《古都》，他们认为《伊豆的舞女》犹如一首凄怆的民谣。“川端先生的有些文章，令人想起日本画”，“川端先生以毫无夸张的感伤，令人感动的手法，敏锐而精心的笔触，表现出日本的种种风情，作品中渗透着浓郁的诗情”。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在谈论川端的时候，提到了俄罗斯的屠格涅夫，“因为屠格涅夫也是一位感受性极其丰富的作家，在新旧世界交替的节骨眼上，他发挥其伟大的才能，带着厌世主义的倾向，详尽地描写了社会”。川端的早年生活悲苦而惆怅，和爷爷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养成了他多愁善感的心智，东京生活的疏离和艰辛催生了他丰富的感受和横溢的才华。

传记写得比较零乱，资料的引用有堆砌之嫌，虽然资料比较完备，总觉得没有完全表现出川端的丰采神韵。“冷艳文士”？这样的评价显得过于轻佻和迂腐，似乎对川端也不够尊重。川端曾经是一个同性恋

者，忧郁和多愁使川端选择了自己主动终止生命。有人说，三岛由纪夫的死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川端不仅仅会写小说，他的散文和报告文学还有评论都很精彩。权威的评论说，川端康成以其卓越的感受性，一定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有这样的评价，川端应该知足了。川端康成死于1972年，这个时候的中国大陆，“文革”已呈强弩之末之势了。据说，川端康成曾经来过中国的东北，并且写过《哈尔滨记》，不知道这样的大师对当年还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哈尔滨会倾诉怎样的情怀？听说，川端1968年在瑞典领奖时的演讲《我在美丽的日本》成了展示东方之美的最佳散文名篇之一，是这样吗？

斯特林堡的『毁家诗纪』

看过斯特林堡《地狱婚姻》的小说样稿之后，心中不禁有点犹豫：一位北欧作家如此自曝隐私的小说在如今还会有读者吗？更何况斯特林堡的名气和影响在大陆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推广。这样彻底坦荡的把自己的婚姻生活一览无余地公之于众会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斯特林堡的隐私哪有本土的一些艺人绯闻来得刺激八卦？

说实在话，还是在石琴娥女士编著的《北欧文学史》中知道斯特林堡的大名的。据说斯特林堡这位瑞典文学史上的巨擘，是世界文坛奇才，开20世纪欧洲现代戏剧之先河的主要剧作家，代表作品有小说《红房子》、《女仆的儿子》以及剧本《父亲》、《去大马士革》、《朱丽小姐》、《梦的戏剧》、《鬼魂奏鸣曲》等，而《地狱婚姻》被认为是斯特林堡比较重要的作品之一。

据该书的中文翻译者金弢先生介绍，《地狱婚姻》的法文手稿似乎还颇费周折，有着一段故事。斯特林堡不允许书稿在其生前公开发表，但是囿于生存的压力，斯特林堡最终妥协可以在瑞典以外的国家公开出版。有一位法国作家不自量力地把斯特林堡的《地狱婚姻》手稿大肆删改后在德国出版，但是小说风格与斯特林堡的原作已经大异其趣。苍天有眼，原稿在1973年的奥斯陆大学被发现，据说是一位画家为帮

助斯特里林堡摆脱困境而购买了手稿，此书稿经手迹专家鉴定为斯特林堡的真迹后，德国翻译家把其翻译为德文，今天我们读到的中文版《地狱婚姻》就是根据德文翻译的。

如此颇费周折的小说，到底是在讲述怎样的故事？这部被称作是斯特林堡的自传体小说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阅读体验？已经在上个世纪之初就告别人世的大师的作品在今天还会引起我们心底强烈的震颤和共鸣吗？我们随着斯特林堡充满激情和弥漫着华丽色彩的叙述很快明白，小说实际上就是作者第一次失败婚姻的真实完整的备忘录。作者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缺点或者称之为心理上的不健全，诸如自卑、多疑、敏感、猜忌、嫉妒等。在我们东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婚姻模式中，小说的主人公与男爵的夫人在一起纠缠拉扯，而男爵也是当事人之一，这也许就是西方或者是欧美上流社会所盛行的所谓情人现象？在这样的眉来眼去爱恨情仇中，"我"与"男爵夫人"逐渐难舍难分，最终走到了一起，结成了夫妻。毕竟是大师，斯特林堡没有把这样的风流韵事写成风花雪月的暧昧纠葛，而是一波三折精雕细刻他们的情感冲突。没有刻意的褒贬，没有先入为主的判断，而是把诸多复杂的情感惟妙惟肖地展示出来，让人体会到真正爱情的艰难和无望。经历了如此坎坷的折磨，终成眷属的一对人似乎在感受爱的甜蜜的同时也开始饱尝苦涩和痛苦。不安分的女人渴望出人头地一举成名，而竭尽全力的男人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难免力不从心，身心疲惫，于是相互猜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成为家常便饭。女人的出轨甚至同性恋倾向的不可遏止，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和谐，诸如是否豢养宠物的争执，爱慕虚荣讲究排场喜欢交际的女主人与敏感多疑的丈夫冲突不断，在这样矛盾升级的彼此伤害中，最终男主人的精神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样难以自拔的苦苦挣扎中，男主人把自己的遭遇和盘托出。西方人的坦率决定了他们没有遮遮掩掩，文过饰非，也没有一股脑儿把过错全部推给对方，而是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描述，把一个活生生的样本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为剧作家的斯特林堡在小说写作中，很自然地借鉴了自己写剧本的经验。小说的情节冲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虽然琐屑但不拖沓。而《地狱婚姻》行文之优美，譬喻之形象尖刻，给人以强烈的视觉享受；富有想象力的妙语如珠让我们惊叹斯特林堡驾驭语言的高超和技巧的娴熟，如火车是"滚动着的监狱，它的摇撼将毁坏人的骨髓"，讲到自己的婚姻状况时，作者说："我只有借助她得以生存，而我作为母体，根基

依仗植入地下的那部分生长着，滋养着靠近太阳并绽放出绚丽奇葩的枝茎，我为这样的娇艳而欢欣，因为她就是奇葩。然而我却没想到，嫁接的枝条离开被吮干的树干的那一天终将来临。那时，枝条会拿自己接木移花得到的、可以引为自豪的繁茂炫耀于世。”作者也是竭尽全力试图挽回失败的婚姻：“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到来之前，要鼓足风帆到达那能够挽救一切的港口。”诸如此类的句子，在小说中几乎比比皆是。而作者对女性的看法，虽然不无偏激、尖刻，倒也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如果我们不是故作政治上正确的言不由衷的全盘否定的话，去掉作者加之于全体的情绪化冲动和愤慨，还是有他的一定道理在。

斯特林堡的小说《地狱婚姻》，很容易让人想起中国作家郁达夫先生的《毁家诗纪》来。郁达夫先生凄惨地死在南洋，他的侄女郁风也在最近去世了。但是郁达夫、王映霞的情感纠葛聚讼纷纭，至今似乎还莫衷一是。据说，汪静之先生回忆，其夫人曾经陪着王映霞堕胎。如果此事确实，那么郁达夫先生的怀疑并不是冤枉王映霞了。据郁风回忆，王任叔在郁达夫死后的种种表现，很让人遗憾，根本没有尽到一个朋友的责任。

人世间又有多少真朋友呢？

仰望法兰西的星空

徘徊在巴黎街头，乘船夜航在塞纳河上，仰望着两岸的五光十色，心中一片迷茫：这就是产生过卢梭、雨果和萨特的城市吗？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巴黎公社墙，还有凯旋门，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总会在东方的读书人中间掀起难以遏制的感情波澜。我们对法兰西文化似乎有着天然的亲近和认同，也是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左右，中国的一批先行者来到了法兰西，不好说他们在法国的经历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法国知识分子们的独特精神、人格魅力一定在他们青春年轻、激情满怀的心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中国人囿于种种原因，很难客观冷静地梳理法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丰富经历，而法国人自己的打量和关照也许更有近水楼台的天时地利之便。在这样的期待中，我们看到了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看到《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原以为这样的书一定艰涩难读，沉闷枯燥。但是细细读来，却是那样的引人入胜，不忍释手。巴雷斯、纪德、萨特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究竟有着怎样丰满的人文内涵？他们的人生轨迹究竟充满着怎样的坎坷曲折？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整个文明社会，他们有着怎样的承受和担当？德雷福斯事件，看似不很复杂的司法

案件，怎会搅动得周天寒彻，风雨满城？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纷纷介入，争相表明立场？他们怎么这样不知道韬光养晦，明哲保身？两次世界大战，祖国的沦亡，苏俄的崛起和沉沦，雅尔塔体制后冷战的来临，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巴雷斯、左拉、安德烈·纪德、加缪、萨特、福柯这些带有标志性的大知识分子没有做鸵鸟式的沉默和袖手旁观，他们以法兰西人特有的风格和操守为这个世界奉献着自己的睿智、思想，还有惊世骇俗的行动。纪德到苏联访问，对斯大林的盛情款待并没有陶醉得忘乎所以，丧失知识分子的批判锋芒。他的《访苏归来》，至今读来，仍然让我们叹服作者穿越时空的预见能力。我们本土的多少知识分子、文化商人面对诺贝尔奖金垂涎三尺，甚至还扭捏作态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状，但是萨特毅然拒绝那样丰厚的奖金。这不是行为艺术，实际上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

法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有那么奇特的想象力，深邃的思想深度，令人惊讶的充沛精力，难以遏制的诉说激情？他们汪洋恣肆的才情，放浪形骸的举止，斑驳陆离、色彩缤纷的人生，无所不及的没有疆界的思维能力，对世界命题的强烈关注，简直匪夷所思，无法索解。面对《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作为一个遥远的东方读者，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本土知识分子的委琐和相形见绌，我们能够列出代表一个世纪的人物吗？是郭沫若、茅盾，还是胡乔木、周扬、陈伯达？

百年沧桑，风风雨雨。人生的丰满，思想的沉重，让我们感受到作为一个法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自豪。好在作者米歇尔·维诺克是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看得出来，他对自己本土的知识分子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理解和认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顶礼膜拜，而是烂熟于心的深刻体认和感悟。可贵的是，作者的语言富有激情和想象力，让我们读起来轻松自如。仰望法兰西的星空，我们在自惭形秽的同时，还是鼓足勇气，企盼新的世纪能够有大师的涌现吧。

书信中的学者肖像

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从江德兴和鲁品越先生的口中听到马克斯·韦伯的名字，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又称《儒教与道教》）这些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在我们心中充满了神秘和幽深，韦伯所创立的一些范畴和概念如“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观察性理解”和“解释性理解”等似乎已经成为我们解读诸多复杂问题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记得是在母校那座古老的图书馆的二楼阅览室里，在一个秋日的午后，有非常耐心的阳光透过斑驳的树阴洒在书桌上，在这样的情境中，我在阅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看到了他对中国历史学的评论。韦伯这样的在上个世纪初叶就离开这个世界的德国人曾经对中国的历史学怎会有这样一针见血的见解——在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过修昔底德的方法？当时我正迷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被黄仁宇大气磅礴的史学方法、富有张力的史学语言所折服，更加痛恨中国史学研究的一潭死水，面目可憎。马克斯·韦伯的评价更让我感到中国史学只不过是史料的堆积和随心所欲的六经注我。但韦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研究兴趣是从哪里来的？他有怎样的学养背景？他怎么会把自己的研究视野投放在遥远的东方古老的中国？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去心如止水地翻阅研

读那么多艰深枯燥的中国文献？曾经道听途说的留下过这样的印象：韦伯这个一脸严肃的德国人曾经是一个德国士兵。这真是奇怪，写出《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就曾经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历史小说写得非常出色的高阳也曾是国民党的一个下级军官，军旅生涯在这方面真的有什么奥秘可言？

马克斯·韦伯的夫人以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抱着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写出了洋洋洒洒达几十万字的《韦伯传》。妻子为自己的丈夫做传能否做到客观公允？会不会由于这样那样的顾虑回避许多读者感兴趣的问题？更何况虽然是生活中的伴侣、婚姻上的夫妻，但是其学识和学养能否解读韦伯如此艰深晦涩的理论？能否进入韦伯自成体系的学术王国？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的复杂使得我们很难完全进入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韦伯夫妇是相得益彰的神仙眷侣还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名义夫妻？我们听说了也见识了太多在西方夫妻之间的剑拔弩张，不仅仅是演艺明星的朝秦暮楚，学者夫妻有的也是让人雾里看花，诸如萨特夫妇的奇特婚姻关系。韦伯夫妇究竟怎样呢？如果说蒋碧薇关于徐悲鸿的回忆录让我们能够多侧面地了解艺术大师丰富情感生活的话，韦伯夫人花费如此心血所撰就的《韦伯传》则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耐心向世人展示出自己丈夫是怎样拥有这样宏富的思想敏锐的感悟奇特的思辨和渊深的体系。马克斯·韦伯的家族荣耀，马克斯·韦伯的母亲对自己儿子的深刻影响，这个家族上下所弥漫的求知氛围，更重要的是马克斯·韦伯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根据自己的志趣爱好非常自由地尽心钻研。尽管生活中也有挫折，尽管面临重大的社会动荡——马克斯·韦伯也要投身军营为当时的国家机器服务，尽管马克斯·韦伯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医生，但就像契诃夫的医术并没有影响他的文学成就一样，马克斯·韦伯研究领域的广泛并不影响他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超常思辨能力。也许马克斯·韦伯的妻子眼中的丈夫过于高大，也许身为妻子无意识的会为自己的丈夫进行有意无意的遮遮掩掩，《韦伯传》前言中关于这个女人还有她和自己丈夫有时候的微妙关系有比较含蓄的描述，也许为我们更真切地了解这对夫妻的真实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韦伯传》这本书中最为精彩也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马克斯·韦伯大量的书信。书信也许更能反映人的真性情。鲁迅说过：书信是自己简洁的注释。写信固然比较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

不免带些惯性，别人认为他这回是赤条条地上场了吧，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这一回究竟较接近于真实。书信只是写给某一个人看的，其内容一般只与双方有关，而不愿意让第三者知道，应该不会有做秀的嫌疑，书信一般发自肺腑，吐露衷情，从中更易见写信人的思想性格，音容笑貌。马克斯·韦伯的这些书信跨度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从这些书信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马克斯·韦伯敏感的生活感受丰富的情感生活，修正我们以为研究学术的人都是不苟言笑一本正经的成见，更能理解这些在书信中俯拾皆是的清词丽句、奇思妙想正是马克斯·韦伯构建其学术大厦的重要基石。从这些书信语言的鲜活，趣味的隽永，挥洒的自如，对大自然富有情趣的礼赞，可以窥见马克斯·韦伯从事学术研究开放的胸襟自如的心态广博的情趣坦荡的气度，还有马克斯·韦伯交往圈子所构成的特有生态是怎样的令人羡慕。掌握马克斯·韦伯这些书信并且进行详尽的解读，马克斯·韦伯夫人当然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认真地收集搜求也反映出这位德国女性的足够耐心和超常毅力。

大江健三郎的目光

《空翻》是大江健三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实在是很长，充满很多心理描写，但是作者并没有卖弄和炫耀。大江健三郎认为，不是作家在选择主题，而是主题在选择作家，这样的认识很有一点东方的色彩。

众所周知，邪教组织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一全球性的现象？这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组织究竟有着怎样的神秘内核？大江不仅仅从作家的角度，而是大量地深入研究西方哲学，试图从中寻求答案。不好简单地说，大江是在为邪教组织进行辩护，就如同周而复去靖国神社我们不好简单地认定这个八路军老战士是在参拜日本的甲级战犯一样。大江想让我们明白，宗教只不过是想给灵魂构筑一个场所罢了。小说的情节不很复杂，但是处处充满思辨和智慧。“师傅”和“向导”无疑是宗教的精神领袖，但在事情的演化过程中，他们逐渐觉得如此下去，后果不可收场了，于是采取了与自己决裂的态度宣布自己信奉的东西完全是一场闹剧。闹剧已经按照自己的惯性在运转，难以刹车，最后不得不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来进行干预，这就是所谓的“空翻”。但是，他们并没有死心，他们还想寻找新的信仰的归宿。是信仰，就要有风险。狄、育雄、木津、舞女、津夫人这些年轻单纯的不乏宗教热

情的人们，又汇聚在“领袖们”周围。他们近乎疯狂，但是又表现得很有理性和教养，甚至不乏悲壮色彩，但是最终的结局还是一场徒劳的挣扎。

小说的时间跨度虽然不长，涉及人物也不是很多。但，整个小说显得非常的厚重和晦涩。可以看出，作者有着相当的素养，不仅仅是空有一番热情和责任感。木津和育雄是一对同性恋，但是作者没有丝毫的菲薄和蔑视，而是宽容地接近他们。大江小说中涉及到大量西方的经典著作，如《十三人的故事》，还有英国的托马斯等。对这些文明成果，大江非常熟悉，运用自如。这样的学识和修养恐怕国内的许多作家都难以具备。应该说，小说所反映的内容，如果让中国的作家来操作，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这样的土地上，是不是只能出现周梅森这样的作家？面对法轮功这一邪教组织，我们的批判还是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并没有从根本上肃清其影响。实际上，这样大的事件，完全可以成为小说家构思的对象。但是，我们要么是急就章式的简单图解，要么是空洞的吼几句口号就万事大吉，似乎没有人愿意沉下心来像大江那样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责任感需要勇气，更需要洞察力和敏锐的感受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的文学不仅落后于欧美的西方，也落后于我们邻居的“东方”。

大江这个作家有着非常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自省认识，他对日本的国民性的负面作用也有着很难得的清醒认识。在瑞典领奖的时候，大江的演讲词是《我的暧昧的日本》，而川端康成的演讲词是《我的美丽的日本》。川端把东方的文明以日本人的视角告诉了西方，大江的文学世界可能更欧化一些，思维的深度更高一些，也许川端更传统，更唯美。实际上，自从大江健三郎提出“空翻”这个命题之后，很快成为一个流行语，被赋予了多重的意义。作家在这方面的敏感，实在令人佩服，就像当年贾平凹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浮躁而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命名为《浮躁》一样。我们在咀嚼作家何以这样诉说的同时，一种复杂的情绪也许会让我们久久难以释怀。

一个法兰西家族的传奇

东方人喜欢把一些知名的家族归纳为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如三曹、三苏、三袁等，即使知名度不是很高的冯梦龙，据说也有三冯的说法，而以《容斋随笔》为人所知的洪迈，听说他的父亲也是个外交官，虽然在南宋办外交不可能像李肇星那样有写新诗的闲雅与从容，但也有三洪的称谓。而近代以来，浙江绍兴的周家兄弟，尤其是老大和老二，对中国现代文坛影响之大，恐怕无出其右。还有江阴的三刘，更有什么宋氏三姊妹的称谓，挖空心思的书商们不知道怎样也弄出来一个贺家三姊妹的说法来。至于这样的称谓有多大的根据，可能没有人去关心。推而广之，还有以一个地域来把一些人物相提并论的，如什么益阳三周之类。但是，我不明白，这样的归纳究竟会起多大的作用？与我们这样热衷于搞一些新名词相比，西方人，父子相袭，共同在一个领域内各领风骚的似乎不是很多，而为我们所熟知的三仲马似乎是一个例外。

我们知道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三剑客》、《基督山伯爵》、《红星骑士》，大仲马的作品在东方尤其在中国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法国，大仲马据说一直被认为是通俗作家而被拒绝进入法国的先贤祠。好像是在今年，法国总统希拉克终于顺从大家的意见，才把大仲马请进了先贤祠，虽然这样的荣誉似乎来得太迟了，对大

仲马本人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但毕竟是一件很值得欣慰的事。小仲马，我们所知道的也许就是他的《茶花女》了，至于老仲马，可能知道的人就更少了。但是这祖父三代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遭遇？他们身上究竟有怎样的性格特点？大仲马和小仲马怎么会在文学创作上有这样充沛的精力、横溢的才华？法国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莫洛亚倾注了大量精力，占用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仲马家族的大量信札，甚至包括大仲马和小仲马众多情妇手中的信札，在这样的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之上，莫洛亚通过认真地研读和求索两个仲马的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最终给我们展现出丰满可信的充满种种戏剧性和真实性的一个大家族的整体风貌来。

老仲马是一个将军，曾经在拿破仑手下叱咤风云，威风八面。但是由于他的坦率直言，敢作敢当，最终在政治的游戏中铩羽而归。不过这个将军的冒险精神、勇敢气质、浪漫情怀作为一种血性却传递给了自己的儿孙。不知道《基督山伯爵》中有没有自己父亲的影子？大仲马没有什么高深的学历，更不要说什么博士头衔了，但是他凭借自己的奋斗终于在巴黎这个大舞台以写剧本站稳了脚跟。在这样新的奋斗平台上，像公牛一样的大仲马把自己的才情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让常人难以想象的大量的剧本、小说、散文不断涌现到世人面前。

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似乎没有直接得到自己父亲的什么辅导或者熏陶。作为一个私生子，小仲马内心的屈辱可能永远无法抹平。这样的身份，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挣扎应该说充满艰辛，还有内在的创伤。还算幸运，小仲马总算在巴黎这样物欲横流也充满机会的地方崭露头角。《茶花女》的成功使小仲马一举成名天下知。在这样的成功中，我们好像看不出来大仲马打了什么招呼让自己的儿子去获个什么奖之类的小动作。大仲马充满感情地夸自己的儿子是他最好的作品，但这样心满意足的称许后面可有一丝一毫的愧疚和不安？大仲马和小仲马，尤其是大仲马，才情当然没有什么值得质疑，但是他们对于女人，简直是一种天生本能地充满激情和想象力。我估计他们父子可能很难说清楚自己一生究竟经历了多少女人。不可遏止的激情，面对女人那种天然的兴奋，在女人刺激之下更加郁郁勃发的创作欲望，这些也许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像空气一样？小仲马为了俄罗斯的公爵夫人，痴情得简直令人感动。他们这样的近乎放荡的情感生活，在当年的巴黎似乎是一种时尚。他们每一次都很认真但是每一次似乎都

不长久。可即使这样的有众多女人在身边环绕，他们的作品却没有因此而减产，反而更加激情洋溢，文思泉涌。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现象。

《三仲马》这本书翻译得很典雅，虽然有接近五十万字的篇幅，但是读来让人舒服酣畅。出版者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在1981年，那个时候我还在河南的一个小镇上读书吧，哪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好书？

想望林肯的忧郁背影

回老家过年，真是四门不出，耳根清静。陪着父母在乡间田野上转悠，晚上和父亲在灯下看闲书，漫无边际地闲聊。这样的氛围，让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当年自己在镇上读小学的那段时光，那真是令人难忘的一段岁月。在这样的情境中，来读戴尔·卡耐基的《你所不知道的林肯》，更有一种让人难以言说的感慨。

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对美国的总统，最有好感的可能就是华盛顿、林肯和罗斯福了。虽然，尼克松的知名度很高，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尼克松和他们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三位总统，之所以屡屡为世人所提及，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的重要关头都做出了超乎常人的卓绝贡献。华盛顿作为开国总统，宣告了美国的独立，当然具有其他总统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罗斯福在二战期间，带领盟国终于使法西斯的狂潮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与邱吉尔、斯大林建立了总体上看来还算稳定的雅尔塔体系。新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应该算是比较权威的版本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那样有个性的人，在莫斯科受尽了冷淡和屈辱，什么同志加兄弟，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宣传罢了。

现在看来，罗斯福对中国人的友好可能比斯大林来得真诚，至少他没有斯大林那样不把中国人当回事。但是我们对华盛顿、罗斯福和林

肯的了解，毕竟有限，他们所处的政治生态，他们得以脱颖而出的人文环境，他们的从政经历，和远在东方的中国相比，真是天差地别呀。卡耐基向我们所讲述的林肯，可能与许多传记作家所提供的林肯辉煌荣耀的一生不同，他没有追求宏大的叙事，没有纠缠于许多琐屑的细节，没有津津乐道于林肯当上总统之后怎样的威风八面，指挥若定，更没有表现林肯怎样的剪除异己，玩弄权术。也许，林肯根本就没有这些可让我们发挥联想的作为。他是那样的朴实直率，他又是那样的慈悲为怀；面对纷乱的时局，他是那样的鞠躬尽瘁，又是那样的幽默风趣，举重若轻；他的忧郁好像要从身上流淌下来，但是对于合众国的前途他却从来没有丧失信心。林肯好像没有什么像样的学历，更不是来自于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博士头衔了。在小镇上，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这些丰富的底层百姓的经历让林肯真切地感受到民众的愿望。林肯的那些演讲语言让人叹息：靠秘书和写作班子能够起草出他在葛底斯堡这样的演讲词吗？

林肯担任总统，在卡耐基看来，可能有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偶然。中国人常常说乱世出英雄。在这样的乱世，如果是在中国，林肯也许会是宋襄公一样的人物，他是这样的懦弱和优柔寡断，面对独立势力的甚嚣尘上，面对自己手下将军们的敷衍推诿，林肯能够玩得转吗？白宫周围经常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三教九流，自己的妻子又是那样的蛮横粗俗，心怀野心的反对势力在伺机反扑，民众对战争的遥遥无期似乎也失去了耐心。但是，林肯依靠着自己的耐心和顽强，更重要的是他的不为常人所认识的大智大勇拯救了美利坚合众国。我禁不住想，如果在中国这样的土地上，林肯这样的处世方式，林肯这样的慈悲为怀，也许早就成为政坛上的笑柄或者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了。我们也许觉得，卡耐基把林肯写得过于琐碎过于窝囊了，但正是这样的看似不起眼的点点滴滴却使林肯的英明千秋万代地流传下来。

林肯的婚姻很不幸，他的妻子简直像一个泼妇。卡耐基这样的描述是不是完全准确？有没有女人都是红颜祸水的偏见？林肯说，婚姻给我带来的忧伤，如果分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那么世界上就没有笑脸了。这样的不无自嘲的惨痛的话，让我们感受到了伟人的无奈和内心的痛苦。据说，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也是存在许多问题的。但是，毛泽东完全可以做到和江青分居，对江青避而不见。林肯哪有毛泽东这样的智慧和从容？林肯的妻子在脾气发作的时候把热咖啡当着众人的面

泼在林肯的脸上，林肯选择了沉默，他默默地走开。这个时候，南北战争的许多焦心的事情还正在等待着这位总统去处理。我们这位提出了政府应该民有民治民享这一理念的伟大总统，在这一时刻，他那伟岸的背影是否显得特别孤独和无助？

城市天空下的农家女

看到《都市里的农家女》这个书名，是在去华西的路上。随便翻阅，有一种清新生动引人入胜的魔力，使你不忍释手。华西名义上还是农村，实际上是农村中的都市，或者是农村所包围的一块飞地。住在华西村最为高档的宾馆里，里边的服务员几乎都是从苏北或者中西部来的打工女，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按道理说，中国这个沉睡千年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地覆天翻的深刻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汹涌澎湃的民工潮，在这样的涌往城市涌往珠三角、长三角的滚滚洪流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群体就是农家女。

但是这样庞大的人群，她们在异乡有着怎样的生活？她们的心灵世界是怎样的？她们是如何处理环境改变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应？她们对当下的现实社会有着怎样的认识和渴望？她们的婚姻幸福吗？她们的焦虑怎样缓解？她们的尊严如何维护？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蹩脚的三流作家根据道听途说、只言片语杜撰编排一些文字垃圾来招摇过市，误导公众。实际上，现在在城市里有着大量的凭借诚实劳动来赢得微薄干净的薪水维持自己的家庭生存的农家女。但毋庸置疑的是，也的确有大量的女性在城市的角角落落从事着灰色的危险的职业，有人称之为妓女职业的沉渣泛起，有人说是“小姐”“三陪女”，也有人说应该叫性

工作者。但是从理性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她们都是生存在城市的“农家”。面对这样的经常晃动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人群，一个澳大利亚的女学者利用自己在北京的机会，沉潜数年，根据自己的学术训练，完全舍弃了本土学者的“八股”习气，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深入访谈、问卷调查。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女学者的访谈、调查并不带有任何让我们难以忍受的固有模式，而是在我们的所谓大学教授、社科院的研究员们不屑一顾的重大主题上，向我们奉献出了令人眼红的学术成果。

习焉不察的东西，在外来的学者眼中都显得新鲜而有意义。在大量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西方人驾轻就熟的研究方法，从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等方面来研究中国当下的活跃在城市中的农家女，不仅新意迭出，而且这些平时我们可能熟视无睹的姐妹却有着如此丰富的情感，如此强烈的自尊，如此不满足于现实的渴望。外国女学者把自己的研究分为主体、地方、人、时间等四个部分，在农村的愚昧与城市的现代性之间，打工妹有着怎样的主体结构？她们来到了城市这样的向往之地，她们是怎样处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怎样认同自己所生活的土地？惭愧的是，我们往往从体制的角度居高临下地看待她们甚至是施舍和怜悯她们。最为令人难堪的是，我们仅仅惯常于在什么节日来临的时候做出某种姿态来显示我们的慷慨和大度。我们是否想过这样的模式，几十年一贯制陈陈相因，是反映我们的冷漠僵化，还是我们的夜郎自大，不知道世界的大势所趋？

这位异国学者肯定有着超强的沟通能力。她接触了那么多的人，查阅了那么多的资料，研究的视野又是那样的开阔。我自认为还是看过不少报章杂志，但是却很少阅读《打工妹》这样的读物，也许这样的杂志给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还有线索。

生动的旧中国文本

在乡下读书的时候知道毛姆，也曾经很潦草地读过毛姆的小说，如《人性的枷锁》、《刀锋》之类。在冯亦代等老先生的笔下，大致知道毛姆这个英国作家的不太顺畅的人生经历。他的父母早亡，毛姆曾经是个医生，他的姐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等等。但是，说实在话，我真的不知道这样一个大作家、剧作家居然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来到过中国，并且还写出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在中国屏风上》。

毛姆当时所看到的中国，按我们的主观理解应该是满目疮痍，一片凋敝。我们从不断传播的当时的历史画面中也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强烈印象。从中国本土作家的笔下我们感受到的也往往是启蒙、救亡、革命、暴力、留洋、动荡、饥饿、各种思潮的传播，等等等等，这样的词汇塞满了我们的大脑。不好说，中国作家的描述就是主观的、片面的，但是听听另外角度的描述，听听毫无利益纠缠的局外人士的解说，对于后来者来说，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一种参照和启发。甲午海战中，我们自己的记述一直把刘步蟾当作方伯谦一样的人物进行挞伐，但是从美国教习的文字中，我们才知道我们冤枉了这个敢于承担的民族英雄。我们知道李德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和麻烦，但是我们还是出版了李德的著作，也让他有发言的机会。苏联的塔斯

社"记者"孙平对中国革命一直抱有很深的偏见,他在延安时期根据自己的观察记述了大量日记,我们本着为历史负责的态度出版了他的《延安日记》。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观察,让我们更加明晰地走进当年陕北窑洞在十年间的深刻变化。毛姆不是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人物,他虽然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过,而从他的这些简洁生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更是一个冷峻的高超的素描大师,一个对异域充满好奇和理解的弥漫着人性色彩的短篇小说大师。

穿越历史的时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代变迁,再来看毛姆笔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他对山川风物、人文景观的刻画,冷峻犀利,直观简练,长城、长江、山城重庆、牌坊群、庙宇、农家、客栈、塔群,这些风物景观,在毛姆笔下,如同一幅幅风情画,又像是极具驾驭能力的大画家的随意泼墨,寥寥数笔,境界全出。

但毛姆写得更为生动更为珍贵的是对一些人物的展现。这些文字极像是一幅剪影,更像是一首散文诗、小小说。毛姆知道自己不懂中文,对中国的苦力、官员、鸦片烟馆里的瘾君子,虽然不无误读和隔靴搔痒的成分,但是他的观察还是相当敏锐的,如对一个部长级官员入木三分的揭露就相当辛辣。毛姆熟悉的能够深入沟通交流的毕竟还是那些生活在当时中国的外国人,主要是来自欧美的买办、水手、船长、领事、烟草公司的经理以及他们的家人。这些文字不仅生动好读,像一幕幕短剧,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生存状况、精神世界都是一种很好的借鉴和参照。有意思的是,毛姆写到了一个外国女人嫁给中国人后在异乡生活的遭遇。这种涉外婚姻的麻烦,毛姆把它表现出来,应该算是一种很有眼光的社会学研究的资料了。

毛姆三十一年前在英国去世,美国的耶鲁大学有关于他的纪念室。奥维尔和奈保尔这些大作家都公开宣称深受他的影响。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的随笔一样的文字,大多很难让我们具体地知道这位大作家的行踪,他自己也讲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即使在那样的岁月,她的山河依旧壮丽多姿,她的子民仍是那样的纯朴善良。而毛姆到北京大学对辜鸿铭这样的文化怪杰的访问,我们不应该完全看作是小说笔法,辜鸿铭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自信和坚持,让这个很有文化优越感的毛姆深受震撼,也让他多少体会到这个古老国度的神秘和博大。

《在中国屏风上》,中国屏风,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的中国情调,毛

姆用这样的词汇，不无自谦之意：我所告诉欧洲读者的只是在中国屏风上的一些点点滴滴，不是对深宅大院的全景展现。既然是屏风上的东西，自然就显得清浅随意了。但是我们不必苛求，这样的文字和当今的余秋雨"大师"的"人在欧洲"那样的故作深沉相比，可能会让我们更感到亲切、自然，没有雕琢。

『魔女』是怎样炼成的

看《白领魔女》是在2006年的春天。在我这个从未到过美国的读者眼中，在过去的教科书中接受了不少关于美国社会节奏如何快速竞争如何激烈而社会问题又如何积重难返之类的疲劳宣传，虽然也不无疑惑，但也暗自庆幸还是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来得温良恭俭让一些，现如今更是提出来要构建和谐社会，哪像西方社会那样剑拔弩张，每个人都像是高速运转的陀螺一样？在这样极度紧张的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氛围中，人与人之间丧失了最为起码的人之常情。当年，有限的几个美国作家如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大作家的小说给我们充分展示了美国社会的残酷、冷漠、自私。

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随着国门的缓慢而不可逆转地打开，交往的频繁，全球化的日益迫近，我们却发现现实中的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生活得并不水深火热，而是从容安闲，富足自豪，甚至还有点狂傲与跋扈了。去年去云南，在丽江飞机场，看一残疾的美国人背着行囊不需任何人陪伴行走异国天涯，上去热心帮助他的人还招致了他的不满。这样充满自信的独立自强，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才确确实实是在真正品味生命的价值，亲近大自然的壮美，感受生活的绚丽多姿。

而小说《白领魔女》揭示的所谓职场女性，尤其是小说主人公那种

做派倒真是有点让人不寒而栗吃不消了。这个在时尚类杂志的行当呼风唤雨的女人，不仅拥有令人瞠目结舌的期刊帝国，而且在整个传媒业也是一言九鼎，举足轻重。应该说，居于这样高位的女强人当然有自己成功的终南捷径，当然有自己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当然有自己异于常人的不懈努力，否则在美国这样强调个人奋斗的国度里，很难打拼出自己的一份天地。但是这样的女人在成功之后，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不近人情，如此乖戾凶悍，如此不顾及自己手下人的感受？为了自己孩子的一点点要求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颐指气使，把手下人呼来唤去，自己可以轻松自如地飞来飞去带着新婚的丈夫到非洲的小岛上去优哉游哉？但在这样的度假期间，对自己的助理、下属也是丝毫不会放过，苛刻到令人窒息的地步，不停地安排繁琐的事务。那种君临一切目中无人的嚣张气焰简直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女皇！

小说的叙述者是刚刚走出校门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她的期望值是能够成为《纽约客》杂志的独立撰稿人，这样的人生设计促使她走进所谓的《天桥》杂志社，渴望能够得到一点点锻炼，取得一定的实践经验。但在局外人看来很不错的杂志社老板的助理身份，却让这个女大学生经受了令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历练：要经受超负荷的工作强度，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煎熬，要具备超常的心细如发的审慎和当机立断的果敢，更为重要的是要牺牲大量的时间全身心地投身于毫无价值的为女老板服务的“宏图大业”之中。亲人之间的关照，恋人之间的亲密，朋友之间的问候，都成为可有可无的陪衬。就是在这样的高度紧张的如同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奔跑一样的疲于奔命当中，人似乎逐步地被异化为冷冰冰的怪兽。这哪里还有一点点自由民主博爱宽容的气息？纯粹是一个冷血动物赚钱机器而已。

安德里亚最终选择了金刚怒目，选择了明智脱身。她在巴黎对自己的女老板，这个她恨之入骨的“白领魔女”发出了怒吼，斩钉截铁地说不！毕竟是在美国，安德里亚离开之后并不会成为被社会所遗弃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她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饭碗，在这个社会上体面地生存下去。但是在我们身在的东方大陆，虽然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轻人的选择面大大拓宽了，可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社会还是不太能容忍这样的叛逆和反抗，还是会让这样的所谓不成熟的年轻人慢慢地消磨成暮气沉沉的逆来顺受者，甚至是奴才和帮凶。很可惜，囿于作者的年轻和阅历的单薄，对于这样的白领魔女究竟是怎样

养成的，她的性格养成与行事风格有着怎样的深层次的原因，作品并没有更多深刻的揭示，难怪作者曾经工作过的单位对作者如此过于写实的描画恼羞成怒，不惜动用社会力量在《纽约时报》连续刊发书评，贬低小说的价值。虽然这样的行为给人以沉不住气的感觉。

吸引我如此兴趣盎然地拜读《白领魔女》，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的期刊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在小说家笔下是怎样刻画被遥远的东方经常鼓噪的所谓文化产业的？虽然看过《纸老虎》，还看过在清华大学里自我感觉良好的李希光先生的《妖魔化背后的中国》等，但毕竟是一个生活在美国本土的美国人，而且是一个 1977 年出生的“新新人类”的长篇小说，美国的女作家会像大陆的一些女作家那样肤浅和张狂吗？另外的原因是这部小说的翻译者是我的中学同学。在我们那所地处中原腹地的英语教学简直不堪回首的农家学校摇篮里走出来的女教授，究竟有着怎样的翻译水准？能够达到信达雅吗？

应该说，小说是很好读的，细节的描画是很有个性的。虽然《纽约时报》的书评攻击这部小说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些读过这部小说的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女作家，会增添一些自知之明甚至会改行。这是我的看法，信不信由你！

呼唤送信的人

我对一些图书过甚其词的广告语言非常厌恶，这样的情绪当然会影响自己对一些书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被评为"有史以来全球最畅销图书第六名"的《致加西亚的信》——这本由北方的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望文生义，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关于情感方面的图书。这样的读物，骗骗女中学生的眼泪是可以的，但要我们这些年龄也许不大但是好像也经历过不少沧桑的人看来，毕竟太青涩幼稚了。据说，排在这本书前面的其他五本书是《圣经》、《毛主席语录》、《麦加菲读本》、《英语与法原理》、《吉尼斯纪录大全》。这样的排行榜究竟有多大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我们很难了然，好像是美国的一家传媒《出版商周刊》操作的，但是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的"语录"能够高居全球畅销书的榜眼，是不是也算中国人的一种荣耀？

谁在给加西亚写信？加西亚是何许人？按照我们的常规思维，肯定会这样思索。但是这本书的意图和主旨似乎不在这里，这些都不是该书作者关注的主要对象，而被作者高度肯定和赞赏有加的是我们很可能忽略的不起眼的小人物：送信的人！

原来，在中国经历过《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之后，率先觉醒的中国人正在艰难地试图自强维新的时候；当我们的戊戌六君子断头菜市口

的时候;当我们的古老帝国还在一个老女人的淫威之下苦苦挣扎的时候;当我们大清的士兵拖着长长的辫子在日本人面前不堪一击的时候,美国这个新生的帝国正在和西班牙争夺古巴这个虽然很小但是却很有个性的国家。加西亚则是古巴的抗击西班牙的民族英雄,美国总统认为应该和加西亚取得联系,来共同对付西班牙。这多少有点像当年汉武帝为了共同对付匈奴的入侵,派张骞出使西域寻求合作力量一样。民国的时候,为了打垮北洋军阀,孙中山不也是和张作霖合作,来夹击吴佩孚,所谓远交近攻吗?只是这样的事情,做得但是似乎说不得。当年中原大战的时候,机灵诡诈的蒋介石靠着张学良的鼎力相助,最终使冯玉祥、阎锡山一败涂地,冯玉祥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从此一蹶不振,偃旗息鼓。美国总统可能也有这样的战略头脑,但是再高明的决策也需要有人去落实去贯彻。这个时候,具体办事的人就显得至为关键。在当时的情势之下,美国并不清楚加西亚在什么地方,而这样异常急迫的任务能否完成,任何人都没有把握。这个时候,年轻的美军中尉罗文没有任何推诿和畏难情绪,非常干脆地接受了这个重任。经过种种曲折和坎坷,罗文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我是在媒体上看到关于这本书的近乎夸张的介绍,现任的美国总统布什甚至煽情地说:“这本书太可怕了,它把一切都说了。”据说还有一些地方官员把这本书很隆重地推荐给自己的下属。这样的反响倒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当时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把陆文夫的《围墙》推荐给党政官员们看。政治家们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要下属能够理解体会自己的良苦用心。《致加西亚的信》的风行一时也许契合了当下中国社会大家普遍感受到的敬业精神的严重匮乏、落实精神的难能可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自诩为“励志经典”“一本关于敬业忠诚勤奋的管理书”的《致加西亚的信》不太算是一本很像样的常规意义上的图书,书的内容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本书也就五万多字的样子,全书的构成不过是几篇文章的合集,居然有将近二十元人民币的定价,总给人一种漫天要价物非所值的感觉。在这本书中,《中文版序》、《原出版者手记》、《1913 年版作者序言》和好像是书评的文字《一本可怕的书》、《上天为你做了些什么》占了不小的篇幅,而《致加西亚的信》却仅有十个页码,书中主人公的自述《如何把信送给加西亚》也不是很长的文字。也许真理往往是朴素的,简洁的,并不需要什么鸿篇巨制,洋洋洒洒。

库普林的《火坑》

想到把《火坑》这本书找出来，完全是因为看到了一本研究上海娼妓的由外国人所写的社会学著作《危险的愉悦》。这本书是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一本长篇小说，据说作者写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心中还有很多顾虑。作者不无自我辩解地说："我知道，许多人会认为这部小说是色情的和伤风败俗的，然而我还是诚心诚意地把它献给母亲们和青年们。"但是，认真看库普林的小说，哪里有什么色情和伤风败俗？作者的写作技巧，我们姑且不论，但就翻译的文字来看，作者对这一特定群体的了解，并不是像我们国内一些下流的三流作家向壁虚构而成。毕竟是上个世纪初期的作品，毕竟是在前苏联十月革命前夕的创作，没有投机心理在作祟，没有瞻前顾后的畏首畏尾，虽然有许多也许是很多余的空泛的议论。小说情节的展开也显得过于拖沓，但是文字是那样的明净，批判和同情都是发乎至诚。应该承认作者对妓女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社会现象的思考深度和表现力度。

库普林在自己的小说中提到了莫泊桑的小说《第二十九号病床》，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羊脂球》，好像也是一个妓女把自己的梅毒传给占领自己国土的普鲁士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发作》好像也是写一个大学生第一次去逛妓院的经历。也许是一种批评，库普林提到了莱蒙

托夫、巴尔科夫等人的色情作品《第一夜》、《樱桃》、《鞍桥》、《女枪骑兵》、《神父》等。库普林在小说中的一些场景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是非常传神，如“从清晨起，像尘雾似的蒙蒙细雨就一直令人烦闷的落个不停”，恰如其分地衬托出小说中人物的灰暗心境。大学生利霍宁把妓女柳布卡从妓院带走以后，清晨，“树木依然一片葱绿，但是在空气、树叶和青草的气息里，已经能够隐隐感觉到仿佛从远处飘来的渐渐临近的秋天那柔和的凄凉的同时又是迷人的气息。这大学生惊异的望着一颗颗绿树，它们是那么清新、纯洁和文静，仿佛上帝为了人们悄悄地在夜间把它们栽在这里似的，而那些绿树则惊奇地环顾着周围沼泽里、水沟里以及横跨小河的木桥底下那仿佛尚未睡醒的平静而湛蓝的水面，环顾着犹如重新洗过的高空，它刚刚在黎明中苏醒，迷离恍惚，带着玫瑰色的、懒洋洋的、幸福的微笑，迎接喷薄升起的太阳”。这样心旷神怡的令人陶醉的早晨，当然和这个大学生自认为崇高的行为有关。也是在国庆节前的金秋时节，在俄罗斯的远东城市比罗比詹，我向俄罗斯导游小姐莲娜提到库普林的这部小说，她大概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对库普林这个作家似乎很陌生。库普林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应该有一席之地，他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而《火坑》并不是他的代表作。十月革命之后，他悄然出走，侨居巴黎，也许是乡情的牵挂，也许是政治上原因，也许是觉得自己来日无多，库普林在 1937 年回到自己的祖国，第二年，就死去了。

我有时候甚至很偏激地想，为什么外国人在谈到妓女谈到卖淫这些问题的时候，好像都是那样的坦诚和磊落，自然大方，无拘无束，没有什么阴暗暧昧虚伪的味道。现在，我们的出版物中，充斥着大量的谈论性谈论一夜情谈论妓女的内容，诸如《天亮就分手》、《天不亮就分手》、《绝对隐私》等，如果是很严肃地探讨很负责任地揭示，还算情有可原。问题是，这些在道貌岸然幌子之下的印刷品大多在看似义正词严的背后，难以掩饰商业动机和低级趣味。在这样的格调影响之下，好像很严肃的作品也难以按捺住寂寞，而紧跟着随波逐流起来，不说以前的《丰乳肥臀》，现在的《女人床》、《不行上床》，还有《拯救乳房》、《四十一炮》等等作品，总让人觉得有点不太光明正大。

我手上的这本《火坑》是漓江出版社大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版的。翻译者是一位女性，她还特别提到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的时候汝龙先生曾经根据英文版本转译过这本书，当时的书名叫《亚玛》，而《火

坑》是根据前苏联 1981 年的《库普林选集》翻译的，可能更接近原著？这个翻译者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居然很大胆地断言，随着“沙皇专制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卖淫作为一种社会通病“早已消灭了”。是这样吗？也许是为了发行的考虑，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俄国妓女辛酸史》。

夜宿大庆读《石油》

见到《沉浮》这本书，还真算是一种意外。也是偶然的机会，我在今年的国庆前夕，去了中国东北角的黑龙江。到了黑龙江，承蒙东道主的美意，使我有机会去了大庆。而在大庆已显寒意的十字街头，居然捡到了由美国人乔纳森·布莱科写的长篇小说《沉浮》。这个小说另外的名字唤作《石油》。在中国的石油城，遇到美国人写的关于石油的小说，不管怎样说，算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大庆作为曾经颇为辉煌的一面旗帜，我没有资格评说她在共和国多灾多难的历史变迁中的功过荣辱。但是在铁人王进喜的纪念馆内，面对种种沧桑的照片，面对着这位在四十多岁就匆匆别离人间的工人英雄，我还是忍不住热泪盈眶。

还是在乡间读小学的时候，村子里难得放了一场电影《创业》。令人扫兴的是，电影屏幕上刚刚出现一队在沙漠上缓缓而行的骆驼，就停电了。漫长的等待，还是没有来电的希望。母亲让我回去睡觉，说如果来电就叫我起来，但是最终这场电影也没有看成。后来又有机会看这个电影，而当初望眼欲穿的感觉已经没有了。忍耐质朴简单的铁人不可能有美国石油大亨那样的韬略和精明，我们的石油的开采冶炼运输供应等等环节还都是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一种机制。但面对社会的剧烈变革，大庆也在进行着剧烈的嬗变。夜半时分，站在大庆的电视塔

上俯视这座大得惊人的石油城，在这样的仅仅从外观来看溢光流彩华灯璀璨的笼罩之下，我们没有机会接触这座城市更为丰富的内容。

没有办法，只好呆在宾馆内看《沉浮》。小说写得相当乏味和直白，作者好像是从江青等人办的培训班里毕业的学员一样，坏蛋当然是一味的坏，穷凶极恶，凶相毕露，而所谓的正面人物则潇洒坦荡，光明磊落。在不同的石油公司之间，进行着尔虞我诈的激烈残酷的竞争。这些争斗在西方社会可能稀松平常，但是在中国似乎就没有这样的激烈和尖锐，真是这样吗？可能温和的得过且过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们不是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了吗？经济不是要一体化了吗？《沉浮》中的主人公算是大财阀中开明的对中国友好的人士，小说也是从他率先与中国打交道开始，其对手当然要破坏他与中国的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者并不高明地展开了实际上是美国的石油发展史。这个名字叫诺斯卡特的大老板先是在美国跻身石油行业，站稳脚跟之后，又到中东很可能是卡塔尔构建起石油帝国的庞大体系。竞争对手之间有倾轧争斗，甚至是暗杀破坏，但是最终诺斯卡特取得了胜利，正义似乎终于战胜了邪恶。我怀疑，小说显得这样简单，是因为作者的水平不高还是我们的编辑自作主张的删减所致？但是，考虑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我们的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这样的小说，我们似乎没有求全责备的理由。当初，美国的哈默对我们表示了友好，我们是怎样的激动和天真啊。

国门刚刚打开，一切幼稚天真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

娼妓的眼下处境

娼妓这个词汇，似乎是1949年以前的专有名词，我们一直回避这个字眼，更重要的是我们以掩耳盗铃的心态来掩饰或者避免承认当下大量娼妓存在的严峻现实，总是寄希望于一两次的集中行动来荡平、解决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并且还总是羞羞答答地说这些丑恶现象在中国早已绝迹，现在只不过是死灰复燃而已。好一个死灰复燃！这样的定性和认知水平所造成的是人人心照不宣的麻木和这一现象肆无忌惮的更加泛滥，所谓的打击这些现象的机构只不过是搪塞舆论的一种摆设罢了。

面对今天的局势，许多人心知肚明，只不过没有一个天真的少年点破这件皇帝的新衣。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学术界的麻木和冷漠，他们也许一心在做着大学问，对这样的研究课题不屑为之。每年都有汗牛充栋的社科项目，但是我们如果稍有良知，可否扪心自问：我们的研究课题的选择有多少是出于对民族前途的考量？对天下苍生的悲悯？对自己学术研究的自觉？我不知道贺萧这样的女性是不是假洋鬼子？这样的带有嫉妒心理的不健康的想法当然很复杂，我疑心她如果不是中国人或者东方人，怎么会对中国的文献资料如此烂熟于心？怎么会对八十年代以后的大陆本土对于娼妓这一问题的心态把握得如此准确？

《危险的愉悦》这样的书名看上去似乎和严肃的学术类著作有相当的距离,好在它还有一个副标题——《20 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娼妓问题居然能够以现代性的视角来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思路和理念好像本土的学者很难涉足。而令人觉得有点气短的是,仍然是我们大陆的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提供了相当翔实的研究资料,真应了韦伯对东方相当刻薄的一句话:东方只有史料而无史学。这本书的编写体例虽然是严格的学术著作的路子,但是好像并没有摆出高头讲章的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你看它每个章节的题目便可了然,"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愉悦","危险","干预","当代的对话"。不要以为是中国三流作家的报告文学,在这些相当感性的题目下边是非常扎实的研究,几乎把所有关于中国娼妓的文献尽收笔底,然后是相当仔细地剔抉爬梳。大家耳熟能详的赛金花,作者基本上不再浪费笔墨,不像我们的有些学者,我们知道的他拼命说,我们不知道的他就是不说。聪明的贺萧女士不愧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也许不会像中国当下的在职博士生那样日理万机没有查阅文献的闲暇,贺萧的《危险的愉悦》近六十万字,而她所做的索引和注释就占了相当的分量,足足有一百七十多个页码。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贺萧搜集文献占有资料的广泛。江苏一个作家庞瑞垠写了不少作品,如《秦淮世家》、《早年周恩来》等,最近还写了一个长篇报告文学《光明行》,但是这位高产作家一部很不受人注意的写几个卖淫女的报告文学却进入了贺萧的视野,她从这位作家的笔下寻找自己作为一个学者所需要的资料和论据。据说贺萧引用庞瑞垠的作品是香港出版的文本,对于根据苏童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红粉》,贺萧也有认真的很有见地的解读。通过这样的简单举例,我们可以放心贺萧对文献引用的认真和负责,她绝不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取舍的那种"学者"。

刘项原来不读书

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前校长似乎说过，质疑教育的重要性就好比批判祖国和家庭，言下之意，教育的重要性神圣而不容怀疑。我们是向称有五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自古至今，对教育的重视无论怎样评价似乎都不过分。但是物极必反，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教育无用论甚嚣尘上，流风所及，几使国家陷入崩溃的边缘。高考制度的恢复，大学教育的逐步正常，中小学教育的普及，使这个古老的国家焕发了活力。但是，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教育这一牵涉千家万户的重大社会命题日益演化出诸多问题来，甚至异化为令人痛心又无奈的种种悖论，教育成为多少人心中隐隐的痛。在大家对教育感到郁闷又无可奈何的时候，一个美国人的《教育为何是无用的》一书，无疑会引起我们莫名的兴趣。

刚听说这个书名，不觉大吃一惊：在重视教育几乎成为一种宗教的当下，怎会有如此大胆的反潮流的声音？怎会有如此毋庸置疑斩钉截铁的断语？我们知道我们的教育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存在着极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理直气壮的怀疑？充其量不过是觉得当今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诸如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教育从业者的素质不高，教育系统的风气不正，大学的教育精神沦丧等等。但是要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教育，恐怕除了当年的红卫兵们高呼“知识越多越反动”外，没有人或

者说很少有人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教育是无用的。

在现在这样多元的社会，出现任何奇谈怪论都是正常的。提出一种石破天惊的论点固然不易，但是，能够把观点说清楚道明白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丹尼尔·科顿姆不仅仅说教育是无用的，而主要是说教育为何是无用的。他不无偏执地这样批判教育的"罪恶"：教育打破我们的常识，教育让我们脱离实用性，教育让我们脱离理想，教育让我们丧失人性以外的东西，教育让我们的心变得麻木，教育让我们意志消沉，教育使我们的身体变得虚弱，教育让我们自命不凡，得意得昏了头，教育让我们的个性变得沉闷，教育让我们沦为奴仆，教育让我们变得叛逆，教育使我们陷入贫穷，教育让我们变得骄纵，教育使我们成为乐观主义者，教育使我们成为悲观主义者，教育导致教条主义，教育导致怀疑，教育让我们置身于现实生活之外，教育让我们陷入现实生活的困境中，教育使我们成为骗子，教育让我们成为书呆子，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如此罗列教育的诸多罪状，尽管这些"罪状"显得有些自相矛盾，耸人听闻，但是作者还是很认真地从人性、爱、美、身份、生存、功用等六个方面认真翔实地论证教育的无用至少是危害。这些论证可能有不少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成分，但是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观点的新异、论证的周密、引用资料的广博。

丹尼尔·科顿姆这个美国人在书中也提到了秦始皇、毛泽东。作者对耶鲁大学毕业的小布什对教育的轻蔑也进行了解读，甚至还有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本土以外的学者谈论这些事情的视角可能让我们啼笑皆非，但却让我们产生许多丰富的联想。我们可能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甚至是所有观点，但是这样的似乎非常偏执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论辩却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冲击我们的想当然，至少是提醒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这也许就是这本书的独特价值所在。

难造的房子永远的痛

奈保尔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不同于大江健三郎的《空翻》，奈保尔的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写于其获奖之前，大概是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吧？《空翻》是大江在获了大奖，声誉鹊起之后，出于创作的冲动和强烈的责任感而撰就的一部力作。奈保尔有着印度血统，身为移民的后裔，他在一个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小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随即被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送往英国读书。奈保尔的父亲也是一个有点文化的人，但是作为移民的后代，漂泊异乡的乡愁，寄人篱下的悲凉，祖上在南亚次大陆的荣光，力争出人头地的挣扎，这些想法，虽然自己难以实现，但是他把这些愿望都寄托在了儿子身上。奈保尔深切地体会到了父亲的苦心孤诣。多年以后，奈保尔以自己父亲一生的命运为依据，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

毕司沃斯先生一生苦苦奋斗，就是希望能够出人头地，拥有自己的一幢房子，而不是依附在别人的身上浑浑噩噩，了此一生。奈保尔在叙述自己父亲的经历时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激情，没有想象，只有记忆。毕司沃斯先生的童年充满了种种带有拉美魔幻色彩的印记，他的喷嚏，他的多余手指，都是一种不很吉利的象征。毕斯沃斯先生在放牧的时候，自己的牛走失落水而死，毕司沃斯先生惊恐万状，不敢回家。他的

父亲以为自己的儿子也溺水了，就下到池塘去营救，结果再也没有生还。父亲就这样死去，毕司沃斯先生的母亲只有带着自己的儿子投亲靠友，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拿中国的话来讲，就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毕斯沃司先生到了亲戚家里，由于自己的不当举止，又被逐出门外，四处流浪。毕斯沃司先生后来娶了妻子，但是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是倒插门女婿。在丈母娘家的大家庭内，毕斯沃司先生显得很多余，也很不起眼，他只不过是大家族中的一个雇工而已。在这样的毫无独立和自由空间的氛围中，毕斯沃司先生非常渴望有自己的房子，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但是这种强烈愿望的实现实在是太渺茫了。毕斯沃司先生在这样杂乱拥挤猥琐的大家族中，做过酒保，开过小店铺，还当过种植园的小头目。随着境遇的不断变化，这个经常有着牢骚和冥想的毕斯沃司先生总是想逃脱这样的氛围，想拥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命运无情，第一次造房子，结果被人纵火烧毁，第二次的房子又被烧荒的大火毁于一旦。毕斯沃司先生在奈保尔笔下经常受到揶揄和嘲弄，当然更多的是深深的同情和理解，还有清醒的批判。毕斯沃司先生最后选择了逃脱，跑到了一个港口"西班牙港"做一个小报记者，开始了自己全新的生活，在最后的十五年的生命旅途中，毕斯沃司先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小说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但是岁月的流逝，丝毫没有影响小说的魅力。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我们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有多少现在还能够阅读，还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呢？这些东西唯一的价值就是可以作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研究那一段苍白历史的一种参考资料。但是这样的参考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因为伪造的现实虚假的激情也有可能会成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障碍。如果我们依据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来作为参照解读当时的社会现状的话，岂不是南辕北辙？

文革结束后，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和《李顺大造屋》还算是不错的小说，但是短篇小说怎能和长篇巨制比肩而立？奈保尔这部小说的细节描写，很见功夫，对小镇街道等环境，对大家族的纷乱，对人的种种不良习惯，作者冷静而又严苛地进行揭示，这一点和苏童的小说有点类似。潮湿，凌乱，嘈杂，烦躁，破烂，总而言之，现状是那样的令人沮丧和头疼，没有一点点亮色和曙光。但就是在这样的氛围营造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的奋斗与抗争，感受到了一种默默的永不懈怠的力量。

剥下大唐华美的伪装

看《大唐帝国》纯粹是一种偶然。见媒体很热闹的喧嚣，又要在黄金时段播放《贞观长歌》了，而一些电影也在隐隐约约地把时代背景放在了残唐五代，这多少让我回忆起小时候看《说唐》的兴奋来。即使是当年香港拍的关于武则天的种种连续剧，实际上也像郭沫若一样，很有为武则天鸣不平的意味。后来的《大明宫词》等电视连续剧也都把目光投向了大唐，唐朝似乎承载了许多国人期待复兴的浪漫愿望。

不说这些，来看《大唐帝国》。

《大唐帝国》的作者陈舜臣是台湾人，出生在日本，据说著作等身，在日本很有影响。《大唐帝国》的叙事风格刚开始似乎有点让人摸不清头绪。语言的随意散漫，蹩脚的细节描写，拖沓罗嗦的心理活动，根本不是严肃的史家路数，但又不全是演义乱扯。慢慢细读却发现，作者是以讲评书的方式娓娓道来来叙述唐朝历史的。看不出作者对唐朝有什么新的心得体会，倒是把如今芸芸众生中关于对唐朝的美好印象剥落得体无完肤，丑态百出。作者在后来平实舒缓的讲述中，很少没来由的礼赞美化，而是尽可能地平视这些历史人物。没有莫名其妙的煽情，也没有义愤填膺的抨击，倒是一些当下的时髦词汇，提醒我们，叙述者是现代人。众所周知的一代明君英主李世民和李隆基也不是没有阴谋手

段，心狠手辣的武则天也不是没有英明之举。在历史嬗变的沧桑变幻中，我们体会不到意气风发的自豪和大唐气象的美妙，陈舜臣先生向我们揭示的仍旧是没有休止的暴力血腥、彼此倾轧。看了这样的大唐王朝，我们没有重温大唐气象的扬眉吐气，没有体验李白狂放不羁、杜甫沉郁顿挫的悲歌苍凉，没有领略李商隐幽伤多情、刘禹锡达观淡泊的傲岸挺拔，这些都不过是大唐王朝乱象纷纷的一种花瓶点缀，在阴森可怖的宫苑深深的高墙上涂抹的一层遮人眼目的油彩而已。作者热衷于津津乐道的无不是勾心斗角、血腥暴力、宫廷争斗、手足相残、父子乱伦、暗藏杀机，夫妻、兄弟、母女之间都是算计和陷阱。好一个“脏唐”，似乎个个都是政治动物、冷血杀手?！宫廷政治是唐朝的全部吗？我们怎样解释唐朝文化的辉煌灿烂、疆域辽阔、物阜民丰？我们怎样解释李白的疏狂、杜甫的苍凉、韩愈柳宗元的双峰并峙？我们怎样解释长安、洛阳的福乐安康、万国云集？难道这些所谓的盛唐气象都是一种欺世盗名的宣传？是陈舜臣的眼光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审美取向有了偏差？

将近三百年的大唐王朝，在经历了开国艰危到鼎盛繁华终至衰落湮灭，沦落得让人不堪回首。唐朝究竟有什么教训可以让我们吸取？父亲说，一个封建王朝，时间太长了，不是人力所能挽回，哪有不灭亡的政权？话虽然这么说，但后人总要寻找一些答案，来证明自己的聪明。是女祸乱唐还是藩镇割据葬送了李家天下？是外戚干政大权旁落还是宦官猖獗播弄是非？但武则天这个女人管理天下，非但没有什么大错误小心眼而是颇有建树威加四海，远比李治高明。宦官胡来，但是高力士却忠心耿耿、人情练达，没有什么败德之举。即使后来的宦官猖狂，那还不是主子们或昏庸无能或纵容娇惯的结果？让我们经常莫名其妙引以为自豪的时代，实际上也是充满了阴谋诡计、血海滔天，并不是歌舞升平的桃源美景。黄巢的部下无赖朱温说，要想取得政权，必须成为体制内的人。这样的见解，真让人哑然失笑。

也许是作者的环境使然，对唐朝与邻国的关系，尤其是与东部邻邦的关系，着墨较多。对玄奘取经、鉴真东渡也给予高度评价。遗憾的是，翻译者的水平有待提高，许多生造的词汇让人莫名其妙。如“战意”等，让人不知所云。青梅竹马本是形容男女之间的感情，怎么也成为男人之间形容友谊的用语？该书的广告说，《大唐帝国》是根据宋朝人曾先之的历史著作《十八史略》而来。也难怪，宋朝人说前朝，可能是距离太近，也可能是意识形态因素使然，对唐朝过于贬抑了吧？

爱是贫贱的一种标志

飞机晚点，在大连机场非常的百无聊赖，就到书吧里闲逛，看到南京作家的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书吧里有叶兆言的《别人的爱情》、范小青的《女同志》，还有韩东的《我和你》。因为喜欢韩东的《扎根》，心想《我和你》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致呢？便买来细看，居然忍不住一直读下去，掩卷品味，真是一部令人称奇的洗去许多杂质的好小说。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徐晨的男人，算是有点文化的社会边缘人，与一个和自己有着一定年龄差异和观念差异的女大学生苗苗的爱情故事。苗苗是一个艺术院校弹奏古琴的教授的女儿，从小在单亲家庭中生活，性格也是比较独特的一种。这样的两个人冲破种种阻力开始了爱情冒险，而苗苗最终还是离开了徐晨，重新投入了原来男友的怀抱。具有小说家身份的徐晨在回到现实中来以后，开始严肃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爱情故事，检讨其间的前因后果，这样的总结紧紧围绕这两个人物展开，小说被命名为《我和你》。

关于爱情的小说，实在是汗牛充栋，举不胜举。这些小说，写爱情故事，往往是冷静的旁观者，最为成功的也不过是现身说法谈及自身的伤痛或者家族的传奇，如《无字》等。这样的作品看得多了，总有腻歪的

感觉。韩东的这一部究竟有什么独特的地方？这样不厌其烦反复咀嚼自己的爱情经历到底有什么价值？是百无聊赖的私人消遣还是江郎才尽的无话找话？叙述同样的故事为什么会在不同的阅读者眼中产生“好得很”或者“糟得很”的如此强烈的反差？

也许每个阅读者都难以摆脱自身视野的局限和环境的局限。在我们这样的已经不知道羞涩和含蓄为何物的时代，在盛行速配和交易的不谈爱情的滚滚红尘当中，流行的是欲望的张扬，没有廉耻的朝秦暮楚，谈论爱情似乎成为一种奢侈。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已经不算很年轻的韩东静下心来，似乎不合时宜地回顾总结自己的爱情经历，认真审视自己在这样轰轰烈烈的从爱情的产生到毁灭的全过程。这样的回顾不是情绪化的宣泄或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神经质，不是陷入自我设定的狭隘天井内的骂骂咧咧，愤世嫉俗。超然的回忆，真诚的诉说，客观的描述，没有令人生厌的自恋或者被女权主义者强烈谴责的所谓男性霸权，把曾经沧海的一个男人在这样的时代如何又投身一场爱情的细枝末节娓娓道来。这样的回望没有夸张和炫耀，没有遮遮掩掩，吞吞吐吐，一切是那样的质朴和自然，坦荡和真诚，从而把个人的体验上升为文本的经营，成为一个时代的一部分人群曾经的典型文本。在这样的叙述中，人际之间交往的虚无、性的表达、爱的伤害与背叛、人性的迷茫与渴望，对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爱情元素，让人在细细的体会中感受到一种诚实和隐隐的痛楚，而扑朔迷离的爱情曲折，在流畅的语言叙述，精细入微的反复质疑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这些展示是那样的从容理智，伤痛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焦灼和激情付出后的两手空空，并没有使叙述者丧失一个小说家所应该具备的心胸和气概。这也许就是这本小说所特有的文本价值。

葵花与天空

不知道《浑噩的天空》是何顿的第几部长篇小说，但是这部小说很可能是何顿比较失败的一部小说。对于何顿小说的印象来源于他在《收获》上的短篇和中篇，而《我们像葵花》这样的长篇立即让人觉得一个身手不凡带有别样的生活背景的小说家向我们迎面走来。

后来才知道，何顿也有下乡插队的经历，但是毕竟还算是幸运儿，文革结束之后又上了大学，有过短暂的教书生涯，后来还有过简单的商海沉浮，经历也算丰富。这样的阅历当然更重要的还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使何顿的小说显得有个性起来。写“文革”的作家当然很多，但是每个作家可能都有自己的观察视角和有别于其他人的生活体验，何顿关注的当然是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何顿相当准确到位地捕捉到了自己的同龄人在当年荒唐岁月的种种生活细节，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他们在突如其来的新的社会变革到来之后的茫然和惶恐，当然还有挣扎。生活是残酷的，生活不相信眼泪。这些大好时光被政治运动彻底荒废的人们，在新的社会变革面前，很少有先见之明地去苦读外语去像陈景润那样醉心自己的数学世界而基本上不太参与世俗的纷争。大多数人还是像葵花一样集体无意识地随波逐流，糊里糊涂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太阳来支配。这样虔诚的没有任何怀疑的紧跟和追随，使人沦为像植

物一样的命运，人完全丧失了自主的能力。这样的结果当然不会随着某一个人物政治生命的结束而立即终止，整整一代人的噩梦可能要影响几代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欣赏何顿这个小说的命名，他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一代人的命运悲剧。这样高度清醒的相当聪明和睿智的观察，透露出小说家不同凡响的见识水平。

何顿靠着《就这么回事》和《我们像葵花》开始受到大家的注意。据说他还有《喜马拉雅山》和《荒芜之旅》等长篇，我没有看过，无从置喙。但是读过何顿的《浑噩的天空》之后，有一种深深的失望弥漫心头。应该承认，小说写得还是很认真的。小说主要是通过自述的方式，讲述一个小镇上普普通通的女人王梅经历过的几次婚姻。王梅是独生女，自己的父亲是倒插门的女婿，外公外婆开了一个专门作死人生意的花圈店，这样的家庭氛围可能时常让人感受到一种死亡的气息。王梅为了生存，作为一个女人，别无选择，只能靠出卖自己来度过生活道路上的种种难关，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指责王梅的所谓轻浮和放浪。面对像赌博一样的失败婚姻，王梅当然有追求新生活的权利，虽然这样的追求最终以令人震惊的结局而草草收场。小官僚的无耻卑鄙，小镇上流氓混混的粗野蛮横，暴发户的贪婪和心计，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王梅寻找美好安定生活的追求一次次落空。小说毕竟是小说，但在苍白而现实的生活当中，王梅也许会和黄小山这样的流氓生活一辈子。何顿也许不忍心王梅的天空这样浑噩，在王梅就要绝望的时候，残疾人黄五一出现了。这个有点异秉的残疾人让王梅终于感受到了生活的清静和温馨，但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何顿美好的愿望而已。

小说中有很多似乎很辩证很有哲理很愤世嫉俗的议论，如："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活着而不趋炎附势，但很多人都是以人云亦云趋炎附势的姿态出现。所以，你的周围没有真理，你的周围都是一些平庸者和像一群鸭子一样跟着舆论跑的人，而舆论又大多是一些以公正自居的伪君子制造的。"何顿还很哲学地说："人都有伪装性，天生的伪装性，没有人不会伪装，因为人有好坏观念，有是非之分，而大家都想做好人，而做好人是需要伪装的。如果一个人不伪装，这个人就变得有点可怕。因为他会做出各种贪婪相，这是按人的本性进行推理，人是什么都想拥有：金钱、荣誉、才学、智慧、身体等等。只要这个世界上有的，又可以获取的，人人都想要。这就是人。"何顿甚至借小说中女主人公之口很权威地说："这个世界说的实在一点，就是偷鸡摸狗的世界，男人偷鸡，女

人摸狗。就是这么回事。"大段的议论似乎可以增加小说的思想内涵，但是过多的议论好像使小说显得有点不堪重负。小说的语言表现力好像也显得有点强弩之末的味道，也许是电脑写作的缘故，许多成语的运用给人以生硬和堆砌之感。

不管怎么说，《浑噩的天空》还算是不错的小说。说他失败，是觉得何顿这样的作家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和突破，千万不要因为功利的原因而丧失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立场。如果那样的话，就太可惜了。

陆天明的政治小说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在中山东路的新华书店门口，陆天明为其《苍天在上》签名售书。场面非常清冷，我很少凑这样的热闹，但是那天碰巧路过，看陆天明那样孤单地在那里站着，我和爱人忍不住走上前去和他攀谈起来。我询问《桑拿高地的太阳》中人物的命运，谈论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中人物的处理，还有《泥日》中众多人物的恩怨纠葛。我问陆天明，那样诱人的神秘的边地风情到底在地理意义上是否存在？许多情节的设计包括一些乱伦的情节是否有现实中的影子？这样艺术的小说世界的虚构耗费了他多少精力还有时间？我提到了他的《木凸》，这个小说中的账房先生很让人感到吃惊，但是小说后半部中对吴语方言的运用让我感到了阅读上的困难。陆天明很是吃惊，问我对他的小说怎会这样熟悉，我笑笑。

我提到了《苍天在上》的种种破绽，陆天明也是笑笑，也许是不以为然不屑回答吧。不知怎么回事，言谈中提到了当时关于张承志等人对于王朔等人的叫板。陆天明这样认为，他说，王朔的存在王朔的姿态都不应该是知识分子进行大加挞伐的对象，他们不是当下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对许多关乎社稷民生的大事情置若罔闻而对王朔却如此穷追猛打呢？陆天明这样的认识让人觉得他的厚道和宽容，

从他的话音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关注现实的创作取向。后来，陆天明的《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纷纷亮相，陆天明和周梅森、张平等人也被一些人归之为写政治小说的“风云人物”。

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很是热销。这样的热销和电视剧的推动有关。现在的图书出版借助于影视剧的影响，已经成为一种惯用的操作技巧。但是，众所周知的眼下作家的边缘化，使他们在描写官场的时候总让人有隔靴搔痒、雾里看花之感。这也是身为官场中人的王跃文为什么会引起轰动的原因。王跃文的感受和描写让人觉得真实可信，像那么回事。陆天明这样直接的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省委书记，固然表现了他的创作勇气，但也未尝不是一次冒险。我们知道，作为省委书记，他的官场话语，他的政治韬略，他的儿女私情，他的个人爱好，没有近距离的观察，没有长时间的接触，没有相当清醒的独立人格，很难观察透彻。成克杰、刘方仁、胡长青、李嘉廷他们为什么会无一例外地与在局外人看来很不上档次的女人打得火热不能自拔？是这些官员的审美水平很差？是这些官员的精神世界极端空虚？是这些官员在官场争斗中压力太大希望有放纵自己的港湾？

陆天明笔下的省委书记还是比较光明磊落，方正岸然。实际上这本书写了三个省委书记，但是现实中的矛盾，这些省委书记的作为，还是让人感到小说的无力和浮浅。不过小说中的有些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如省委书记的秘书面临自己政治生命的紧要关头在电梯内向省委书记下跪这一情节就相当惊心动魄。这样的戏剧性表演和贡开宸如此依赖自己的前任秘书总让人感到我们体制改革的艰难和漫长。老省委书记对自己后任秘书的失败颇为同情。在这个时候，对秘书生涯，陆天明有这样的感慨：能被允许在政治生活的高层走动，的确享有普通境地所不可能享有的种种难以用数字来标识的待遇和心理的自如，它也的确广为众人艳羡甚至猜忌，但是，高处不胜寒的凛冽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重负，一般人又何尝能体会其中一二呢？在这样的人生操作状态下，将始终面对由社会各种矛盾构筑起的全部网络的过滤，稍有不慎，又何止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不知道有多少官员会认真地阅读这本书？陆天明在小说中推销自己这样的见解：一个主事者，不管有多大能耐，他直接能管住并对其进行有效操控的人数，不会超过六个至九个。部门越多，越容易失控。某些特大型国有企业始终搞不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机构设得太多，俨

然一个小政府。结果企业的经营者必须化太多的时间去协调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最终失去对整个局势的控制。这样的错误，犯在政府官员身上充其量为这个世界多制作了一个平庸的官员，但是犯在企业家身上，则肯定是毁灭性的：企业就会因失去及时性的应对活力而被挤出市场。但是我们现在的体制是怎样的状况？

不管怎样，《省委书记》为陆天明赢得了很大的声誉，这个书稿据说令诸多出版社眼红，但是最终还是落到了春风文艺出版社手中，这个当年创造出布老虎品牌的出版社据说现在的日子相当艰难。作为回报，春风文艺出版社为陆天明出版了文集。

澄明平淡地回望历史

面对当年似乎以很激烈的充满激情和决绝，也许不无情绪化地偏激地树起“断裂”大旗的韩东的这本看上去很质朴的《扎根》，我觉得很难给这样的小说归类。她不是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更不是什么曾经热闹过一阵子的寻根文学。虽然小说所反映的大背景与当年轰轰烈烈的下放、插队、上山下乡甚至不无矫情的所谓“蹲牛棚”有关，但是整个小说中所酝酿的氛围，所反映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状态，所思所想，既不同于梁晓声的文字，也不同于王安忆相关的小说，不管是王安忆早期的《小鲍庄》、《岗上的世纪》，还是带有传奇色彩的《米尼》，所谓的《隐居时代》可能又显得过于浪漫和温情了。韩东的表现视角和他们都大大的不同，在现在这样的书写背景如此复杂的情势之下，能够避免雷同的思维模式，能够拒绝宏大叙事的影响，做拥有自己思考空间的小说家已经相当的不容易了。在《扎根》中，我们感受到了韩东的与众不同。

也许是经历了岁月的淘洗，也许是不想拾人牙慧重复别人已经表现得差不多的生活，韩东自称《扎根》纯粹是小说，甚至还说自己全家人下放的时候是六个人而不是小说中的五个人。有人说，小说家的自白是最不可相信的，这样的遮眼法实际上很可能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效果。我倒觉得，《扎根》之所以让人眼睛一亮不同凡响，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扎根》带有更多的亲历性和自传性，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扎根》的文学价值。正是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还有自己步入文坛之后的特立独行，让韩东写《扎根》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不仅仅是才气横溢就能够达到《扎根》这样的境界。

韩东在这部小说中就像自己因为在西安几年然后有了《西安故事》一样，以惊人的平和和冷静来审视这段涉及了中国许多人命运的相当大的社会变迁。怎样表现这样的社会嬗变？韩东没有像一些雄心勃勃的作家那样写大场面的壮观写高层斗争的激烈写权利的倾轧写人性的疯狂和丑陋还有欲望的泛滥和迷狂。他选择了简单明晰的切入方式，这样的进入是那样自然轻松又是那样的明晰畅快。没有了哭天抹泪的控诉，没有了义愤填膺的激越。当然，一切都是那样舒缓平静地流淌，老陶和苏群，陶文江和自己的老伴，当然还有小陶的目光。随着小陶的目光，当年农村的种种情状像一幅幅风情画展现出来，文字是那样的干净，澄明。当年的生活得到了充分的没有夸张和变形的恰如其分的表达。虽然这样的表达可能是肤浅的和简单的，但是所谓的复杂的文本有没有集体无意识的自我臆断和人云亦云？即使控诉和揭露也是这样的和风细雨，让人想到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唤》。但是在韩东笔下，没有了那样的激愤和入木三分的嘲弄，平和冲淡，弥漫着悠然见南山的从容。

读着《扎根》，我还是很自然的想到了韩少功的《马桥字典》。我觉得韩东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得这样好，除了自己多年来锲而不舍地坚持在艺术上的追求外，借鉴他人的长处也是一个因素吧。《扎根》的责任编辑很为这个难得的好小说而激动，他们把《扎根》、《长恨歌》和《尘埃落定》相比较，虽然有点做广告的嫌疑，但是，不管怎样说，《扎根》的确是一部很不错的小说，也许是自称"断裂"的作家们当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小说？

糟糕蹩脚的《宣传处长》

听说市面上有《宣传处长》这样的书之后，首先是感到好奇。也许是职业的缘故，我很想知道，在这个作家的笔下，当下的宣传处长究竟是怎样的人模狗样？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官场作派他们的处世风格他们的精神背景，诸如此类的东西，也有一些小说家试图进行表现，但是除了王跃文的《国画》还算比较深刻之外，大多数所谓的小说似乎都是隔靴搔痒，抓不住要害。在许多情况之下，旁观者的小说家也未必清楚官场的种种玄机和复杂。这个标榜为"长篇纪实小说"并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到底是怎样表现他眼中的宣传处长的呢？

看过小说之后，忙不迭地后悔。这个名叫百理行的宣传处长，虽然是省级宣传部门的一个人物，但是小说似乎没有兴趣反映他在宣传处长位置上的种种挣扎和梦想，甚至是一些简单的在意识形态部门的官场微妙都根本没有涉及。这样的还算春风得意的宣传处长被借调出来搞所谓的"两树"活动，这样的活动，拿民间流传的话说，"两树初期有点怕，两树之中也没啥，两树之后胆更大"。作者实际上是指现实中的什么活动，大家一看就会了然。小说基本上是借助于这次活动的开展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表演的。百理行的身份在这样的工作组当中，应该不算是什么很重要的位置，作者试图借助这个人物，来表现官

场的黑暗复杂，还有所谓大人物的狡猾和反复无常。但是这些表现手法包括一些语言风格，都显得相当的幼稚和肤浅，好像是蹩脚的三流导演鼓捣出来的苍白的电视剧，没有波澜，没有高潮，从头到尾，读过之后，觉得非常乏味和无趣。难道现实就是这样苍白平淡吗？也许仅仅是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作为一种调味品，《宣传处长》也是少不了婚外孽情的。但是，作为一个宣传处长，能有这样大的魔力和神通，使一个电视台的女“记者”如此死心塌地俯首帖耳？让人感到离谱得不可思议。作为小说的点缀，作者有一些在饭桌上的“段子”的妙用，这也许是一种很时髦的创作手法。从作者的行文中，我们感到作者写小说的基本历练还是比较欠缺，说白了，小说的文学性基本上无从谈起。

从书的介绍上我们知道，小说的作者有一个很不错的家庭环境，自己也有大学本科文凭，毕业于一所大学的中文系，也是一个宣传干部。他生活的环境很可能就在郑州、西安、宝鸡之间。按常理讲，在这样的土地上生活，有那样的文化氛围，最起码，有许多颇具分量的前辈作家们的影响，小说的出手应该比较慎重才是。称之为速于成书，躁于成名，也许过于尖刻了。但是，如果想在小说创作上有点名堂，是非得有一番苦功夫不可的。也许应景性的宣传材料或者公文写得太多了，这种非审美的文体如果自己不进行很坚决的抵制，在自己进行小说创作时做出自觉的调整，小说就很难脱离公文八股的窠臼。

小说前面有作者的妈妈做的序言。作为母亲，当然对自己的儿子很是疼爱，自豪于儿子已经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她所讲的话，很家常，也很得体。整个书的装帧设计很是一般，简直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顺便说一句，《宣传处长》这本书是在首都机场买来的。

回味苦涩后的甘甜

反映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种种遭遇的小说已经汗牛充栋了，虽然很少见到能够经得住时间淘洗的作品。这样的尴尬一方面反映出作家视野的局限，笔力的疲软，另一方面也许还说明，机遇还不成熟，条件还不具备，我们还需耐心地等待。德国的顾彬有这样的耐心，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但岁月催人老，时间是不等人的，文学不会怜悯时代的平庸和苍白，而生活在当下现实中的一些勤勉的作家，虽然没有奢望写出什么惊天动地大气磅礴的传世之作来，但是在不经意的惨淡经营无心插柳的间隙，往往会有柳暗花明的收获。这样的感慨来自于阅读《青铜葵花》的体验。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比较偏僻闭塞的广袤农村，姑且算是苏北或者淮北吧，一群知识分子来到这里战天斗地，接受思想改造和思想炼狱，作者曹文轩毕竟是聪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不去直接触及这些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不去拷问他们从城市来到荒寒原野的意识形态原因，这样的直接交锋显得太愚鲁方直不够练达，也太容易惹麻烦冒风险了。曹文轩选取了自己习惯的童年视角，让一个唤作葵花的女孩子进入了我们的故事。

一个瘦弱、文静、初涉人世的女孩，随着自己的雕塑家父亲来到了

这个陌生的迥异于城市的莽莽荒原之上。孤独、寂寞、思念伴随着小女孩，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的突然死亡让这个小女孩陡然间陷入绝境之中。好在还有好心人在张罗着如何安排这个小女孩，于是贫寒的也是在生存的边缘挣扎的青铜一家人接纳了葵花，实际上，葵花和青铜在命运的阴差阳错间成了异姓兄妹。在那样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情境之下，一家人相濡以沫，共度艰危，在一次又一次的困顿和挫折中，青铜和葵花这对青梅竹马的少年男女也逐步成长起来。苦难没有让他们的心灵荒芜，反而使他们以更加丰富的情感和心智来面对人生，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曲折和坎坷。在乡间小学的两小无猜，在乡野生活中的磨砺锤炼，青铜对葵花那种纯洁透明的兄长情怀，葵花对青铜那种天然的依恋和信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彼此体贴和关爱，让我们明白，即使在政治空间被演变到荒唐绝顶境地的时候，还是难以遮蔽人性花朵的迎风摇曳，还是难以窒息深藏在人心深处的真善美！

小说如果到此为止，也许就显得似乎没有什么波澜和起伏了。但时代变了，偶然的机会，城市里的人们因葵花父亲的贡献而想起了还在农村的葵花，于是关于把葵花重新召回城市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这样温情的处理虽然遮蔽了许多现实的丑陋，远没有梁晓声的《雪城》来得粗犷和厚重，但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青铜一家人经过痛苦的彷徨、犹豫和迷茫之后，最终还是以中国农民特有的善良和质朴，让葵花回归城市的天空，回归城市的繁华。而一直有语言障碍的青铜在经历这样的情感折磨之后，终于开口说话了，虽然葵花再也听不到他深情的呼唤了。

我们难以设想葵花回到城市后的生活，也许葵花读了大学后远游海外，对自己的童年经历早已经淡漠了。有多少在城市里忙忙碌碌的农家儿郎还牵挂着自己的故乡？更何况仅仅是一段儿童生活经历的葵花？媒体上不是有关于日本遗孤被中国母亲养到四十几岁但回到日本后杳无音信的报道吗？也许葵花在城市里平淡地过着小市民的生活，就如同池莉当年的《烦恼人生》那样，黯淡灰暗，没有希望，青铜来到城里打工谋生，偶尔的联系，不多的话语，在互相的搀扶和琐屑的体贴中过着干净恬淡的日子。也许此去经年，再无消息，彼此会在心头想起，但是无奈的现实让他们无力去帮助对方，在彼此深埋心底的牵挂中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为一阵遥远的风铃。

怪诞看史小说家言

正是暮春时节，送女儿上英语辅导班。空闲时间，颇感无聊，便来到就近的古籍书店。杨公井的这家书店已经久违了。左右盘桓，见到岳麓书社出版的台湾作家南宫博的历史小说丛书，计有《汉光武》、《太平天国》、《扬州梦》等。《汉光武》自然是写刘秀的，与我的家乡叶县有关，而《太平天国》则是与我现在生活的南京密不可分，洪秀全一帮人在这里主政十年，在这座城市里留下了若隐若现的历史痕迹，而扬州也算是我比较熟悉的城市。徘徊再三，还是购买了《汉光武》和《太平天国》。

浏览了《太平天国》后，感到很失望。南宫博的写法，与高阳相比，实在是差距太大，不在一个层面上，甚言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粗疏潦草，自以为是，煽情乱写，无所禁忌。但仔细读来，慢慢品味，还是能够感受到他所营造的一种小说氛围和审美取向的。太平天国完全是底层民众中一批不甘寂寞的流氓无产者和失意文人纠合在一起，借助于宗教神权发动的一场狂飙运动。小说是以洪宣娇——这个虚构的洪秀全的妹妹为主要线索来展开的。洪宣娇本无此人，但小说把她描画成几乎就是人皆可夫，类似武则天但是在城府和谋略上又粗鄙不堪的人物。南宫博让这个女人不断地与太平天国的上层人物发生性关系，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蒙得恩甚至还有李秀成，就只剩下冯云山和石达

开没有与洪宣娇上过床了。作者试图借助这样的性政治的泛滥和毫无节制,来展示、分析、总结太平天国运动从兴起到覆灭的十三年历程的深刻教训。虽然是侧面切入,倒也惊心动魄,不无可取之处。但是对于太平天国究竟如何评价,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倒真成了大问题。随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日益得到正面的积极的评价,随着唐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等小说大江南北的风行,随着二月河对清朝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的膜拜,随着央视这一超级媒体的《走向共和》的热播,使大家慢慢明白,我们对农民运动的高度礼赞似乎出现了问题,拿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话讲,这些都属于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暴力美学的泛滥成灾。是这样吗?戴逸先生最近还撰文指出,不能把太平天国简单地说成是邪教,一场大的运动,难免会毁坏花花草草、坛坛罐罐,算是对复旦大学已经过世的潘旭澜教授《太平杂览》的一种回应?这样的回应似乎也太迟缓了一点吧?潘教授怎么可能在九泉之下和白发苍苍的戴逸教授对簿公堂打笔墨官司?戴教授的看法,不仅在广泛的知识界没有市场,即使在草根民间,也不被认同,中学生摇头晃脑记忆的只不过是写在教科书上的干巴巴的几句套话,权作升学的敲门砖而已。而央视当年热播电视剧《太平天国》之际,适逢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大张旗鼓讨伐"邪教"之时,更是让受众产生翩翩的联想。不是历史专业的潘旭澜的小册子则一再加印,其影响力和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一起,要远远超过罗尔纲、茅家琦等先生的高头讲章。但天京事变的内幕、杨秀清与韦昌辉的内讧、石达开的负气出走、傅善祥的有无、洪家兄弟的腐败,到最后政权的灰飞烟灭,这些主流的看法,到底是建立在翔实资料基础之上的一种严肃研究,还是后人根据一些切身体验先入为主的一种盖棺论定?当年毛泽东调查武训旧事,不是让江青亲自带队,把握调查报告的政治导向吗?

岳麓书社算是老牌出版社了,出版了不少好书,在读书界素有口碑,但该书的编校质量实在不敢恭维。书中一个叫龚鹏程的序也颇有意思,提及有人问高阳对南宫博的小说如何评价,高阳不愿正面置评,恰也说明他对南宫博的不以为然。马季究竟是否在文革期间动手打过侯宝林,马季在侯宝林在世时绝口不提,但在侯宝林故去后却矢口否认。好在侯宝林当年说过,徒弟打师傅,很正常。有侯宝林这样的说法在,还用得着一些人枉费心机吗?岳麓书社以南宫博先生的性爱描写为卖点的做法,早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君不见成人的音像制品早已经在

中国的大街小巷蓬蓬勃勃如火如荼乎？这本书的市场销量，恐怕不容乐观吧？

（注：此篇小文，受到历史学者陆仰渊先生的指教。陆先生除了对文字进行认真删改外，还就太平天国的一些问题不吝赐教：太平天国热始于孙中山、毛泽东的重视。而近来有学者提出“告别革命”的论点，先在台湾流行，大陆学者也有呼应。否定太平天国，并不是始于潘旭澜，北大的冯友兰先生，广东的李时岳先生，山东的孙祚民先生都持此说。潘旭澜引用材料比较浅近，多过头之语。文艺创作与历史研究是两回事，洪宣娇、傅善祥都属虚构人物。）

令人心悸的『花房』

好几年前了,好像是南大靠近广州路的一个什么地方,一群人在一起议论叶兆言的长篇小说《1937 年的爱情》。当时在座的许多人很热烈发言,因为是写三十年代的南京所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纷纷发表着自己的见解。王干说《1937 年的爱情》写得很散文化,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王干的看法引起不知是鲁羊还是邵建的反驳,似乎气氛很热闹。叶兆言有很简短的发言,他的大概意思是所有的思考都在小说里了,自己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说的越多就会语无伦次,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叶兆言的坦白引起大家很善意的哄笑。有一次,好像是作协组织的作家看苏南活动中,在昆山,当地的媒体想采访这个叶圣陶的孙子大名鼎鼎的著名作家,叶兆言说,报纸可以,电视不行。叶兆言这样的选择很让一些人费解。现在的人不都喜欢上电视在荧屏上露面吗?

但事过境迁,今非昔比。不久前,在一次很正规的场合,大家座谈抗击非典的有关事情,有发言资格的基本上都是很有身份的人,作为社会名流之一的叶兆言先生也在其中。在这样的场合,叶兆言的健谈和锋芒却让我大感意外。叶兆言说,每一次危机实际上是政治家最好的

表现机会，他的驾驭复杂问题的能力，他的全局观念，他的从政风格都会受到民众的高度关注。叶兆言还在自己的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人的发言是陈词滥调，这样的宣传话语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叶兆言还对媒体的表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总体肯定的同时，也对媒体一些几乎是下意识的宣布方式进行了大胆质疑。叶兆言在发言中提到了北京的代市长王岐山和曾经发生在南京的汤山中毒事件。叶兆言对所谓的举报制度也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话语干脆利落，掷地有声，意思明明白白，绝不含糊，没有察言观色，没有遮遮掩掩，堂堂正正，磊落坦荡，和一些所谓博导名流的表现相比，凸显出读书人的本色和立场。当时我向他提到上海的媒体在议论他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他问我可曾收到他从昆山回来后寄给我的《杂花生树》，我说没有。

《没有玻璃的花房》是关于文革的青春记忆。我们不知道其中有多少叶兆言的影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书中的那群孩子都是叶兆言所熟悉的人物。叶兆言这样的出身，决定了他对这段岁月的回顾绝对没有丝毫的自我粉饰或者温情脉脉。似乎有一些作家把那段岁月刻画得像隐居一样的浪漫和好玩，面对那样的政治迷狂，我们不排除在一些角落会有温情的存留，会有诗意的浪漫，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但是在叶兆言眼中的青春经历远没有这样的幸运和温馨。最需要呵护和管束的孩子，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就像没有玻璃的花房中的野草一样，疯狂野性肆无忌惮地疯长。不是有人感叹今不如昔人心不古吗？不是有人还在为文革招魂有意无意地觉得文革仍旧有许多合理成份吗？

在叶兆言的笔下，我们得以窥见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们在接受着怎样的现实教育。极度压抑中的变态的情爱，小孩子眼中的生活的丑陋和迷狂，没有阳光或者阳光过于灿烂的焦灼和饥渴，人与人之间不正常的生活状态，血腥，背叛，赤裸裸的交换，没有任何自尊的苟延残喘。小说中诸多人物真实的生存状态让我们感受到政治运动灭绝人性的摧毁性力量。小说中独生子很少，几乎都有姐妹，除了李道始的儿子木木以外，这当然也是时代的原因。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之下，我们的希望和出路在哪里？叶兆言自谦地说，这是一部不成功的作品，但是我觉得这部小说不同于叶兆言早年的秦淮系列，也不同于其他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有叶兆言带有自传性质的青春经历和记忆，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得到人到中年以后对青春往事的更具历史感的自觉的审视和批判。听说，叶兆言又在东北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个长篇小说，叶兆言也许到了又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大胆地写吧，叶兆言再也不会有他父亲想得多但是写得少的遗憾了。

蛇也要飞翔

如今的时代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各领风骚没几天。苏童的小说，似乎已经英雄迟暮。想当年苏童的小说真是风靡得令人眼红，《井中男孩》、《刺青时代》，还有《米》、《我的帝王生涯》，这些小说伴随着《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样的电影红极一时，苏童似乎一举成名天下知了。经过《妻妾成群》的大红大紫之后，苏童有了红颜高手的名声，媒体记者可能更关心苏童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于是关于苏童的新闻真真假假地不断见诸于传媒，苏童的夫人如何如何，苏童的女儿怎样怎样，甚至苏童穿什么鞋子，苏童的双胞胎侄女考上大学等等也成为好事者热衷谈论的话题。更离谱的是，有一家晚报在副刊上刊登了一篇《我爱苏童》的“散文”，女作者把自己对苏童的思恋描画得惟妙惟肖。苏童简直成了港台明星了，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呀。

有人说，苏童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借着张艺谋的电影而暴得大名，但是苏童对旧社会究竟有多大的发言权？关于深宅大院的争风吃醋，旧社会黑社会的种种做派，甚至包括妓女的改造等等，仅仅依靠从资料上得来的有限信息经过自己的想象真的能够写出传世之作吗？这样的断语也许过于匆忙了，但是还有更为致命的评价：苏童为什么不能写关于现实生活的小说？言下之意是说，过去的事情可以瞎编，纷繁复杂的现

实生活是需要真本事的，小聪明可能不行了。也是的，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写得再好，但是为其赢得盛名的还是《红高粱》，而《红高粱》所涉及的也是抗战时期的旧事，其《丰乳肥臀》这样的长篇小说，应该说是很见功力的，但一进入建国之后，味道就变了，非常的别扭，不爽。

成长在南方的苏童，面对这样那样的议论没有像北京的一些人那样采取极为强烈的反击，他给人的印象只是沉默。但是《三盏灯》的出现，令人对苏童写小说的天赋不敢再随便妄言了。还有什么《红案师傅白案师傅》、《训酒师》之类，这样的短篇小说，出自苏童的笔下，已经使许多正在小说园地里耕耘的作家们感受到了一种危机和沉重的压力。有这样的诸多短篇小说做基础，《城北地带》、《菩萨蛮》这样的长篇小说的出现应该不算突然。《蛇为什么会飞》是苏童关于火车站周围在今天一些"贵族们"看来属于下九流者生存的环境，我们在媒体上尤其是南方的报纸上看到了太多的关于火车站的黑暗内幕，这样的充满肮脏污秽甚至是血腥和暴力的地带，苏童写起来是那样的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没有泾渭分明的价值判断，没有心存轻蔑的嘲弄讥讽，生命的种种形态在这样的环境中按照生活的逻辑潮涨潮落，作为十二生肖的"蛇"在这样的世纪之年"世纪钟"的奏鸣声中，所谓的飞翔也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这苦难的卑微的人生！

《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小说，对于目前都市男女的阅读惯性也许是一种颠覆和重组。应该说，苏童早已不是在南京艺术学院当辅导员时那样的落魄了，他完全有摆出一副贵族派头的资格，也有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中游刃有余，优雅闲适。但是我们在苏童的文字中，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深深关切。这样的感同身受细致入微，经过极有个性的看似散乱的但却充满张力和活力的语言表现，舒缓而真切地让人们感到支撑底层命众顽强生存的坚强毅力。传递这样的温情，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不是口是心非的廉价同情，不是偏激的宗教式决绝，像初春时节，在料峭的寒风里，盼望故人的归来，遥看草色近却无，而希望却漫溢在心田。这样的况味在苏童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让我们能够细细地体会，慢慢地回味，韵味悠长。

历史是挂小说的钉子

收到丁捷《如花如玉》的小说集，感到很吃惊。丁捷写诗歌也写报告文学，但是什么时候写起小说来了？因为大家都在大院内工作，但是好像并不满足于日常的案牍劳形，便在业余时间写些自己喜欢的文字，把自己的想法和感慨倾诉挥洒，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宣泄和释放。这样的兴趣或者爱好在别人眼中可能显得有点另类和不入流，但是作为真实的人如果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别人的议论之中，这样的异化总有把人逼疯的一天。以前经常会听到丁捷非常个性化的语言，也算是在程式化语言重压之下的片刻休憩，以避免被窒息的尴尬和苦闷。这种语言上的酣畅淋漓思想上的火花迸发就这样白白流失了也实在可惜，有心人的丁捷还是不想放弃。有想法当然不容易，把想法付诸于行动，更不容易，但是丁捷却能够忙里偷闲写出这样不算很短的处处灵气闪现的以历史为背景的小说来，不容易，以我自己肤浅的经验来判断。

熟悉的朋友在讲述怎样的故事？这样的阅读期待让我一口气把《如花如玉》细细品味。如花如玉是一对亲姊妹，生活在民国三四十年代，姊妹两个和一个唤做尹紫风的家道中落的父子俩人之间的故事。如花是妹妹，如玉是姐姐。尹紫风有着大学教育的根基，但是在威严的父亲眼中永远是一个不成熟的角色，有过一些抗争，但是这些挣扎都显

得很徒劳和无奈，也有在首都读书期间的短暂浪漫，但还是听从家族的旨意娶了如花为妻。可原先本来是和姐姐如玉成婚的，若明若暗的原因，如玉好像要逃避将来漫长的婚姻生活中自己面对尹紫风父子的尴尬和折磨，如玉对自己的公公在此前的接触中似乎有了难以言说的情感？好像少不更事的如花顶替姐姐成了尹紫风的新娘，但是这样的婚姻没有平静的日子。尹紫风的父亲算是一方很有声望的名士，耿介刚直的老先生不愿意自毁名节为人利用。尹紫风被做为人质锒铛入狱，但老先生最终还是没有屈服。如玉觉得妹妹婚姻的不幸自己有着难以推托的责任，便挺身而出成全自己的妹妹和“妹夫”而自我毁灭。经过这样的悲欢离合之后，尹紫风还是没有什么出息，如花在历尽屈辱之后总算有了比较光明的归宿。丁捷编织这样的不乏哀怨和批判的小说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歌颂女性的无私和敢于承担？鞭笞男人的懦弱和虚骄？尹紫风父亲的气节操守、儒雅风流很难让人不感叹一代不如一代，但这样的老爷子形象是想诉说传统的顽固和复杂还是另有什么微言大意？

历史到底是什么？小说家们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兴趣总是拿历史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据说胡适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年在乡间读书的时候，心目中的胡适还是完全被妖魔化以后的形象，我们觉得胡适的论调真是岂有此理。张艺谋的《英雄》虽然获得了巨大的商业上的成功，但是许多人指责张艺谋对历史的误读和曲解。据说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的编剧曾经说过要把历史学家气得吐血这样的话，经过媒体的广泛传播，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后来到江南读书，在向称六朝金粉之地流连盘桓，虽然已经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了，但毕竟是民国时期的首府，这座经历了太多沧桑和云烟的城市，还是处处现显出民国时代秦淮烟水的余韵。也许在这样的氛围中，在古色古香的校园内存留着无限梦想的丁捷在痴迷诗歌和报告文学的同时，家乡父祖们相传的久远故事、大学校园内弥漫的怀旧情调在他心中不时地引起阵阵波澜，能不能把这些自己烂熟于心的传奇也写成小说？小说《如花如玉》中如花如玉这样冰清玉洁的姊妹也许已经有了模糊的影子？历史在小说家眼中的景象当然不同于历史学家们所认真考证的样子，那样的考证没有了细节的鲜活和生动，有的只是冰冷的资料和串串数字。丁捷也未必对历史感兴趣，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道具和布景，有意思的是在这样的布景之下，完全没有生活经验的丁捷居然活灵活现地再现了他所熟悉

的现在家乡在民国时期的种种细节，特别是老一代乡间士绅的种种作派和代代相传的一些乡间风俗，在丁捷的小说中没有显得隔膜，信手写来，舒缓有致，这些也许需要的是一种细心的感悟和心灵的体验。苏童没有经历过深宅大院内争风吃醋的妻妾争斗，也没有参加过改造妓女的工作，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妻妾成群》和《红粉》来。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再久远的历史都需要当代人的观照，否则就是故纸一堆。历史是挂小说的钉子，中国的历史是这样的漫长而奥妙无穷。面对这样的漫漫长河，我们如果没有小说家们的结构和重新解读，历史不就显得过于寂寞和清冷？

意绪纷乱说《玉米》

不断地听人说起毕飞宇的《玉米》，言下之意，大有《玉米》是目前毕飞宇最好的小说或者说是代表作的味道。当时的南京，继苏童、叶兆言之后，引人瞩目的作家一个是祁智，一个就是毕飞宇。他们都供职于新闻媒体。毕飞宇所在的媒体，那是写会议新闻和领导人活动的地方，毕飞宇的专长似乎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媒体虽然也有副刊之类，但是目前的副刊基本上也都商业化了，有承包任务的压力，这样的副刊首先考虑的是自己承包指数的顺利完成，有了这样的动机或者说压力，副刊还怎么办？谈文学简直是自找没趣，让人觉得神经不太正常。更何况，一些媒体的副刊往往成为一些“老文学青年”的自留地，一些毛头小伙子如果蠢蠢欲动想去做什么副刊编辑，就像挖他们的祖坟似的，似乎这些老文学青年掌握着怎样的话语权一样。这样的斗心眼能有什么意思？

据说毕飞宇所在的单位领导还算开明，在毕飞宇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之后，也就是挣够工分之后，让他尽可能地写自己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毕飞宇渐有文名，而张艺谋大导演请毕飞宇来做《摇到外婆桥》的编剧，使得毕飞宇走红起来，虽然这个电影并没有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深刻独到，虽然从此之后张艺谋与巩俐分道扬镳，但是这个电

影可以肯定的是增添了毕飞宇的自信和勇气。此后不久，这个经常剃光头的年轻作家调进了省作协主办的《雨花》杂志社当编辑。毕飞宇离文学的距离似乎更近了。不知道毕飞宇是否承认这一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毕飞宇的创作时间更多了，环境更加宽松了，虽然他产量不高，不像有些作家，写小说就像自己家里的水龙头，哗哗地流个不停。但是毕飞宇没有了在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压力和浮躁则是可以肯定的，不知道如今的毕飞宇是不是还在江东门的一个从事特殊教育的学校里居住，这样的很边缘化的学校环境也许让他对智力方面有障碍的人更多了一分理解和同情，一份释然和珍惜，更重要的是尊重。

记得毕飞宇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过一个中篇小说，名字记不得了，很长的篇幅，但是小说里相当写实地再现南京某大学物理楼的性爱场景引起了一个老作家的注意。他说，这样的写法太大胆了，太有"意思"了。《哺乳期的女人》、《人与动物》，还有《青衣》，作品不多，但是写一篇是一篇，好像每篇都能引起人们一定的关注和好奇的目光。虽然说现在的文学不景气，每年还是有大量的小说涌现出来，尽管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小说却很少。为了吸引眼球，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一些所谓的作家实在是难以忍受被人冷落不被承认的寂寞和清冷，于是乎各种各样的表演就多了起来。有的故作惊人之语地叫骂文坛老前辈，鲁迅是茅坑里的石头，巴金根本没有什么文学成就可言，茅盾的小说是废纸一堆，金庸不过是混迹文坛的商人，是一个文化骗子。还有更耸人听闻的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居然说冰心也不过是徒有虚名，云云。有的拼命地炒作自己的小说是怎样的充满这样那样的诱惑和突破，自己在小说中是怎样的大胆和暴露，一时间美女作家几乎充斥了所有媒体的文化娱乐版面，就连这些美女作家换衣服的时候是否带着乳罩也成为媒体炒作的新闻，这样那样的"宝贝"催生出一些早熟的小作家更是狂妄得令人莫名其妙。在这样的狂潮之下，一些似乎很严肃的作家也开始不安分起来，《丰乳肥臀》之后是《有了快感你就喊》，紧接着又是《拯救乳房》，它们伴随着汤加丽的人体画册相当招摇地横陈在书报摊上。当然也有更加圆滑世故聪明透顶的作家，他们善于揣摩有关方面的意图，善于结合市场化的滚滚大潮，善于迎合已经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受众们的口味，于是他们的小说和影视剧比翼齐飞，蔚为壮观，成为当今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至于如此热闹的背后存在怎样的危机，这些东西究竟有怎样的价值，这些问题当然只有留待后人来评说

了。在这样热闹的狂潮之中，毕飞宇似乎显得比较落寞，显得比较孤傲和自负，有点冷眼旁观的味道，依旧是不惊不咋的样子，很有底气地写着自己的小说，经营着自己的纸上苍生笔墨天地。《玉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

我是在《钟山》上先看到《玉秀》的。我曾经问过毕飞宇，在那个年代的乡村，姊妹之间的关系真的这样紧张充满算计和勾心斗角吗？毕飞宇笑笑，很自信的样子，未置可否。最近看到完整的《玉米》、《玉秀》、《玉秧》，也把毕飞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算是创作谈的后记认真看过。反复把玩着毕飞宇的“三玉”，满脑子的思绪仿佛回到了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充满沧桑和苦难的土地，搜索着自己曾经体验过的农村经历，对照着毕飞宇小说中的人物，复杂的况味弥漫心头。玉米、玉秀、玉秧都是一个乡村支部书记的女儿，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当年的农村算是非常显赫的家族。但是这三个女人的命运从小说中来看都是那样让人感到惊讶和遗憾。玉米是在县城的小旅馆内把自己交给了可以做自己父亲的小官僚的，这个小官僚能够非常娴熟地运用毛主席语录。玉秀和自己的妹妹遭到别人的轮奸，这样的遭遇让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内寻觅所谓的爱情简直是天方夜谭，缘木求鱼。无辜的聪明的也是心有不甘的玉秀当然要指望自己的已经做了小官僚太太的大姐玉米。但是在大姐家里，我们的玉秀是怎样的费尽心机委曲求全机关算尽使尽小心眼啊！但是再怎样的挣扎似乎都是徒劳。谁能想到这样的灵秀女子最终却成了小官僚儿子始乱终弃的玩偶？而自己过去屈辱历史的被揭穿却是自己的大姐玉米？玉秀的孩子当然是没有什么名分的私生子，这样的孩子玉秀不可能拥有抚育他的权力，玉秀还能继续做她的司镑员吗？玉秧总算读了师范，算是读书人了，但是鬼使神差，玉秧的生活氛围好像是纳粹统治下的白色恐怖一般，在这样的校园中，几乎变态的玉秧成了别人手中的可怕工具。在这样的不自觉的一步步迈向深渊的过程中，玉秧也成了一个性无能者肆意蹂躏的对象。她们宿命一样的毫无美好可言的生活状态是怎样造成的，难道仅仅是对他们流氓父亲的一种惩罚？是过于政治化的时代所造成的？使她们自己的遗传基因中有这样的性格悲剧因素？

毕飞宇在《玉米》、《玉秀》、《玉秧》中分别写到了一些男人。这些男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玉米的爸爸在村子里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土皇帝，虽然也口口声声党的方针政策什么的，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一

个小流氓。这样的流氓有着党支部书记这样的身份,在村民们面前就显得很有身份很有权威的样子,好像他就是王家庄党的化身一样。就是这个王连方,有着奇异的性能力,生了七个女儿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儿子,算是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身体力行者。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王连方的孩子们享受着权力的庇护,在谨小慎微的村民们面前当然是趾高气扬,优越感很强的样子。在众多的子女当中,王连方的大女儿玉米是最为出色也最有出息的一个,她几乎就是王连方的另一个版本。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后来王连方的东窗事发,玉米很可能是王连方在王家庄的政治接班人。很有政治头脑的王连方还是很注重门当户对的,他的未来女婿不是很光荣的空军飞行员吗?这一切如意算盘都由于王连方过于放肆的性放荡而结束了。王连方因为破坏军婚不仅被免掉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而且还被开除了党籍,这样的处理让王连方一家迅速地败落了。屋漏偏逢连阴雨,就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玉米的未婚夫也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而更为让王连方一家感到屈辱的是,玉米的两个妹妹被粗暴地轮奸了。王连方第一次放肆地解别人女人裤子的时候,还有点紧张,毕飞宇还让他拿了一份《红旗》杂志来掩盖自己的慌张。王连方就是在自己权力象征的大队部开始自己要睡遍全村女人的漫漫长征。王连方和女人乱来的时候,还念念有词地领会着最高指示,"他们不懂得斗争的深入性和持久性,不懂得所有的斗争都必须进行到底"。王连方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是"派头还在,威严还在,一举一动还是支书的模样,脸上的表情也还在党内"。

面对这样的一系列变故,玉米采取了相当理智和清醒的态度,她觉得王家卷土重来重新在王家庄抬起头来的唯一机会就是自己婚姻的选择。为此,玉米不再天真地指望什么爱情的神秘和幸福,只要对方拥有权力就行。这样的选择标准使玉米成了公社武装部副部长的妻子,这个唤作郭家兴的男人成了玉米的丈夫。这样的结合很难说有什么幸福可言,但就是在这样的婚姻之下,玉米觉得自己的娘家保住了体面和尊严,王连方一家毕竟还有靠山,更重要的是上边有人。至于自己的尊严和体面,自己的爱情和幸福那都是过于奢侈的东西。我们这样的土壤不时兴这个,在家里再屈辱,但是名誉听上去好听就行。玉米这样的选择似乎又使自己的家庭风光起来,虽然自己的婚姻简直就是旧社会的类似做填房继室一样,但是玉米很知足很满意和庆幸自己明智果断的抉择。郭家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经常很有耐心的阅读两报一刊,煞

有介事地研究着高层领导人的动向。对于玉秀的故意装疯卖傻，郭家兴模仿着领袖人物的腔调装摸做样地说“这个小同志很有意思的嘛”；对于玉秀在他家里的停留，郭家兴也是人摸狗样地说，“为人民服务吧”。这些极具时代特色的语言放置在当今的阅读语境之内所产生的反讽效果，简直让人拍案叫绝。

混迹在学校的魏向东就更加猥琐下流了。毕飞宇对魏向东充满了蔑视和嘲弄，“一九七九年的夏季之前，魏向东在床上一直不错。那张床绝对是魏向东的一言堂。动不动就要在床上搞运动，妻子的脸被他的运动搞得相当的苦”。“魏向东不理那一套，上床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上床是暴动。是一个人推翻并压倒另一个人的暴动”。魏向东这样老奸巨猾的人物，对被他调戏的女老师的丈夫当然会显得不动声色，成竹在胸，他把这个“废物”用《人民日报》包着的菜刀当作是一种“礼物”，居然能够凭借自己长期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三寸不烂之舌化险为夷。魏向东在猥亵玉秧的时候，“魏老师的手遵循的是科学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玉秧对自己有把握，什么也不怕”。魏向东在事后还故作镇定状，玉秧几乎感动得要哭了，“还有什么比组织上的信任更令人欣慰的呢？”还有一个班主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他和自己的女学生正在幽会的时候，捉奸的人破门而入。魏向东当然是重要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这个班主任在众目睽睽之下，“哪里还像一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的人民教师，绝对是一只落汤鸡，要不就是一条落水狗。人形都没了。一根骨头都找不到”。

毕飞宇在后记中提到了小说的叙述问题。他觉得王蒙和莫言的叙述速度太快，而控制得恰到好处稍嫌舒缓和慢条斯理的是王安忆和苏童。毕飞宇认为自己的叙述是二者的折衷，比较悠闲的那种。但是我觉得毕飞宇这样的叙述角度好像很难让人看到或者感受到王家庄的全面境况。毕飞宇关注的只是“三玉”的命运和走向，当然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起伏也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来，但总让人觉得器具不够宏阔，揭示不够深邃。毕飞宇过于调侃甚至是嘲弄的近乎油滑的一些语言可能也会损伤小说的穿透力。真正经典的小说，根本用不着这样直白地把已故领袖的语录移植到男女关系上来表现。毕飞宇这样的语言风格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会慢慢改变吧？

冷静凝眸故土苍茫

虽然目前我国每年都有近千部的长篇小说面世，虽然江苏有不少作家也在创作出版长篇小说，虽然江苏曾经出现过高晓声、陆文夫等名作家，目前的苏童、叶兆言、范小青、黄蓓佳等作家还存在着相当的创作潜力，但是江苏文坛的长篇小说创作却一直被国内同行认为是一个弱项或者是短腿。到目前为止，江苏无一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就是一个例证。也许江苏文艺出版社今年九月份作为凤凰丛书出版的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可以多少弥补这一缺憾。

《平原》主要反映的是作家毕飞宇眼中的中国农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所经历的历史变迁、人性挣扎。小说以相当冷静从容的姿态，给当下的文坛提供了诸多栩栩如生颇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高中毕业生端方、出身不好的女孩三丫、乡村教师顾先生、赤脚医生王兴隆、来自南京的女知青村支部书记吴曼玲、也是知青的“混世魔王”、自杀的“老鱼叉”、养猪的“老骆驼”，凡此种种生活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王家庄”的这些大小人物，他们的卑微或者崇高、痛苦或者欢乐、迷茫或者追求、对爱的神往和绝望、承担或者逃避、近乎流氓式的不择手段的抗争、带有江湖习气的生存方式、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浓烈氛围中的生存状况，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让人不忍释手。

小说中的一些女性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很具色彩，如端方的母亲、三丫的母亲，这些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村妇女，生活环境的险恶并没有完全摧毁她们生活的自尊和高贵。面对屈辱和无奈，她们的言谈举止还是那样的落落大方。女支书吴曼玲在高度政治化的人格与自己作为正常人的激烈交锋中，伤痕累累，最终走向精神崩溃的结局，令人在对这一政治殉葬品不无遗憾之余，不能不深长思之。

《平原》不仅塑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小说人物，而且以相当娴熟的极具个性的语言俯瞰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的整体社会变迁。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地震的沸沸扬扬、毛泽东的去世、上山下乡知青的返城等等，无不信笔写来，一反以往同类文学作品的激越或者过多的主观判断，带有明显的反思和辨析。小说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也很有特色，很得汪曾祺小说的神韵，这在眼下的小说中已经很难看到了。中国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留下来的也许只有鲁迅、沈从文、陈忠实、高晓声、汪曾祺等人的东西，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有了《平原》，至少是反映了一个小说家对这一苍茫历史的艺术的回望和观照。

作者毕飞宇是极具创作实力的作家。他的《青衣》、《玉米》享誉文坛，《平原》的出版可以说是他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突破。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更清晰地认识到这部小说的分量。

蔡老四的风流谁来买单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是叶兆言新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书名？据说关于这个话题在媒体上还有一番似乎很热闹的讨论。我一向认为，书名并不重要，关键要看内容，不是说内容为王吗？虽然叶兆言在把书送给一个朋友的时候，很谦虚地说“新书无新意，黔驴技穷尔”，但是认真看来，叶兆言的这部小说，与他的其他小说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叶兆言在小说的后记中说，这部小说是写给自己的兄长们的。在叶兆言自己的内心深处，对兄长们似乎总有一份敬畏和割舍不掉的牵挂。这样的情结，促使叶兆言要为他们写一部小说。在自己的女儿参加高考的紧张氛围当中，叶兆言的写作速度非常之快，也许是他写作生涯中最快的一次，写作的酣畅淋漓一挥而就也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小说家心态的自然平和，还有自信。经过这么多年的语言训练，小说的语言应该说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境界。

我一直惊讶，叶兆言是一个非常不擅言谈甚至有点腼腆或者害羞的作家。但是，在《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中，叶兆言是那样的富有倾诉的欲望和激情，简直是口若悬河，不可遏制。在很有文化的人看来，叶兆

言所倾尽心力为之尽心打扮的蔡老四不过是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不过是风流成性的小流氓，虽然也经历过不少的曲折和苦难，但他的爱情算是爱情吗？阿研和蔡老四也算是共过患难的一对城市“知青”了，实际上，“知青”这一称谓只不过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罢了，实际上又有什么“知识”可以示人呀？蔡老四虽然和阿研在谈恋爱，但是在阿研首先回城之后，蔡老四就开始和别的女人厮混起来。如果说这只是一种空虚无聊之后的偶尔偷欢，那么，蔡老四在回城不久开始自己的所谓小老板的春风得意之后，性生活的混乱和肆无忌惮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也许是当时在严苛的社会管束突然被解除之后，也许是当时乱纷纷所谓的成功人士知识阶层还没有大量投身商业领域的缘故，在那样的生活层面当中，在蔡老四的生活半径里，除了性，似乎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支撑他的精神世界了。我想，蔡老四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他那一代人真实的生活状况内心世界？精神空间的苍白和匮乏，身处底层的无奈和不平，虽然有点小钱但是面对青春的虚度梦想的破灭也只能这样放浪形骸及时行乐了，不这样浑浑噩噩自我放纵又能怎样？也许没有孩子的拖累，让蔡老四减少了不少生活的烦恼和困顿？但是阿研似乎也是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模样，他们所受到的正统教育也许不少，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这一切高谈阔论大话套话不都成了自欺欺人的空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蔡老四如今已经步入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了，但是回首自己的一生，到底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什么是不堪回首的？难道说自己最为辉煌最有成就感的勋业就是多玩了几个女人？如此的性乱，似乎并没有泯灭蔡老四身上的人性。我们不好说蔡老四的人性多么丑恶，虽然他有这样让人厌恶的近乎动物本能的性需求，但这些人的本能欲望在没有理性约束和更高的人生取向的感召之下，我们有什么具有说服力的东西让蔡老四们变得高贵起来绅士起来？

毕竟岁月催人老，蔡老四最后可能有点渴望改邪归正的味道。蔡老四在小说的结尾似乎很是风光了一下，但就是这样的看似卑微的充满坎坷和曲折的人物背后，还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在蔡老四他们那一代人当中，蔡老四算是幸运儿还是倒霉蛋？这个所谓艳遇不断的小人物有这样的结局应该算是不错的吧？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毕竟还

有抱养的“孙子”，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孙子”在蔡老四眼中可否引起一种歉意和不安？蔡老四和“孙子”的母亲也就是自己名义上的“儿媳妇”不是也不清不白吗？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的封底上有莫言、余华、苏童、孟繁华等人热情洋溢的评论，这样的带有为朋友捧场性质的做法似乎也成了一种时尚。

解读蓝衣社的神秘

蓝衣社这个名字，除了专门研究的人之外，也许现在的人们对它已经感到很陌生了。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大陆，这三个字往往使人谈虎色变，不寒而栗。还是在偏僻的小乡村读小学的时候，村子里有一个很斯文的我应该喊爷爷的老人，经常低眉顺眼，对任何人都陪着小心。当年，村子里识字的人不多，据说，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曾经在开封进过学堂，还懂一些医学，当然是中医。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他会一改从前的意气风发，变成这样的谨小慎微？除了他的出身是富农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听说，他在开封上学的时候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组织，究竟是什么组织，没有多少人能够说清楚。更有人说，在他家里搜出过蒋介石的头像，在那个年代这还了得？简直是十恶不赦。他的妻子和他分居，子女们也全都和他划清了界限。他参加的是不是蓝衣社，我没有机会问他，但有人说可能是三青团之类的组织。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一辈子就这样因为曾经参加过也许自己都不太清楚的一个组织，在新的社会里却被压抑委屈了终生。即使后来有了统战的需要，在那样的乡间环境，他至死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最为基层的政协委员的待遇。在《蓝衣社碎片》这本书中，我才知道，叶县的复兴社组织成立和瓦解都是那样的充满戏剧性和荒诞色彩。但是，就是这样

的一场近乎闹剧一样的行为，让许多无辜的人付出了终其一生的惨重代价。

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在北京的三联书店里看到《蓝衣社碎片》这本书，觉得很奇怪。会不会又是什么人剪剪贴贴弄出不伦不类的东西来欺世盗名？这样的人现在实在是太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这本书写下了这样的广告式语言："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怎么会让我们热泪盈眶？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为什么让我们荡气回肠？"他们甚至认为："诚实的《蓝衣社碎片》能否再造纪实类文学的诚信？初出茅庐的毛头作家，能否重振报告文学的旗鼓？"这样的期许和褒奖让我忍不住想了解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是怎样穿越历史的烟云，打量和观照蓝衣社的碎片的。当年在南京四牌楼读书的时候，躲在南京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民国的史料，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甚至还有樊钟秀，对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奇怪主张，对他们的朝秦暮楚，有时候觉得很清楚，有时候又觉得很糊涂，这样的历史烟雨前尘旧事，毕竟难以驾驭和把握我们已经相当隔膜的种种历史细节。比如，蓝衣社、复兴社这些神秘的甚至是血腥的保密组织，在当年的民国政治格局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国民党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派系？蒋介石怎么会容忍这样的情况长期存在？实在是很难弄明白。

应该承认，我们虽然对民国的历史还算比较熟悉，但是通过蓝衣社这个复杂的组织作为一种视角来梳理民国期间的诸多重大事件，还算比较新颖。面对当年的民族危机政党斗争，这样一批并非天生就是政客的热血青年怀抱着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壮烈情怀，试图通过志同道合者的努力来扭转乾坤，拯救天下。这样的动机这样的青春热情抛开种种世俗的偏见，我们理应对其表示尊重和敬意。蓝衣社的历史沿革，蓝衣社几代领导人的载沉载浮，刘健群、滕杰等人的抱负，贺衷寒的心机和勃勃雄心，戴笠的深沉和精明，胡宗南的沉稳和自负，还有邓文仪的大喜大悲，康泽的命运传奇，这些人通过蓝衣社所动员起来的巨大和骇人的社会力量，在民国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或壮烈或凄惨或黑白莫辨的悲喜剧。在那样的民族危亡关头，道路的选择，信仰的取舍，实在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的小学算术。南京的朝天宫，如今早已面目全非了。作者反复提到的明瓦廊，还有鸡鹅巷 53 号，如今究竟是怎样的情景，当然也不难让人想象。

我想说的是，如此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近乎疯狂的一种运动，为

什么在事过境迁之后会这样的沉寂和了无声息？文革有十年漫长的岁月，但是我们究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恐怕负责任的学人都不敢夸口吧。作者毕竟年轻，许多历史事件的梳理显得匆忙和草率，比如关于西安事变的叙述，总让人觉得过于依靠一种史料来源了。有些人物的描述，可能感情的成分超过了理性的反省，让人觉得稚嫩和轻率。随着连战、宋楚瑜等政治人物跨越浅浅的海峡打破近半个多世纪的阻隔，来到南京，来到北京，国民党还有民国这些似乎已经很久远的历史名词似乎又如此近距离地走近了我们。随着他们的来到，我们可能会觉得许多历史问题很有重新审视和解读的必要，虽然凤凰卫视的窦文涛和许子东等人挖苦西安的后宰门小学的小学生称呼连战为“爷爷”是一种被政治操弄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嘲笑却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大陆朴实的民众还是希望两岸能够实现和平，能够早日统一。毕竟历史隔膜太久，怎样让彼此熟悉起来，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之下共同抗击外敌取得胜利六十年之后，我们阅读这样一本小书，也许会明白：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他们的血都是热的。

林非眼中的散文家

在买废报纸的小贩处，看到林非先生的《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觉得挺有意思，就留下来了。以前只是觉得林非是一个散文研究方面的专家，并没有太在意这个人在文坛上的影响。江苏教育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林非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大系》，好像也看不出他编选眼光的高明之处，但也很难说他的编选有什么毛病。南京的孔庆茂热心钱钟书的事情，曾经写出了《钱钟书传》，颇为畅销。但是这本书，似乎很让一些人不满意，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女士就是一个。宗璞认为所谓钱钟书在美国讲学的时候，究竟骂没骂过自己的父亲冯友兰，希望杨绛能有一个公开的解释，并且还致信出版《钱钟书传》的出版单位，表示了抗议。出版社为了息事宁人，当然马上同意该书再版的时候，一定把有关内容全部删去。还有不满意的人可能就是林非先生。但是《钱钟书传》只是含含糊糊的提到一些，并没有过多地涉及。

谁知道，一向刚直有点眼里容不下沙子的杨绛女士，竟然撰写长文细述当年自己一家与林非家的恩恩怨怨。这样的爆炸性的长篇文章刊登在在知识分子当中颇有市场的《南方周末》上，一时间议论纷纷，成为热门话题。杨绛先生毕竟是大家风范，又是小说高手，写起这样的文章来当然是滴水不漏，针针见血。而林非也不是等闲之辈，据说也有一批

弟子追随左右，甚或还有身居要津者。但是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看一看杨绛刚刚出版的《我们仨》就能感受到，他们所能整合的人力资源。胡乔木经常是钱家的座上客，这样的人物对钱钟书夫妇礼遇有加，在其他文人当中会产生怎样的震荡是可想而知的。在当年，胡乔木在这条战线上那是何等炙手可热的人物啊！后来，胡乔木虽然不在了，但余威犹存。他们争斗起来，当然是分量很重的刺刀见红，用语之尖刻，贬损之到家，当然是很见功力了。这方讲林非夫妇何等野蛮，在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种种不堪之处，甚至拳脚相向之时的凶险惊魂；那方讲钱氏夫妇尖酸刻薄没有容人的雅量，自己的女婿最终怎样云云。钱钟书夫妇对于女婿之死也许是最为伤心的一件事情，但是人到了这样的地步几乎没有理智可言了，当然是更加天昏地暗的相互伤害。有人说，实际上，问题的症结就是当年非常不人道地毫无道理地把这两家人硬凑在一起居住。这样的让知识分子之间互相厮咬的策略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创造。后来，钱钟书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再后来，在胡乔木的提议之下，钱钟书又作了社科院的副院长，《围城》的走红，《洗澡》的被推许，钱杨二人简直成了学术界的神仙眷侣了。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林非夫妇可能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这当然是一种妄猜。

《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写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期，是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定价不到七毛钱。当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有意思的是，林非先生不愧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即使在内容提要里也不忘把鲁迅抬出来说事，这种明显的带有政治色彩的时代烙印，也算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林非眼中的六十个散文家既有鲁迅冰心郭沫若朱自清茅盾郁达夫夏衍，庐隐沈从文丰子恺梁遇春柯灵唐弢师陀也都为林非所注意，秦牧杨朔郭风何为当然也是林非的研究对象了。在评价这些林非自己眼中的散文家的时候，林非当然不会忘记很辩证地批判一番，特别是对郁达夫沈从文等人。不过在那个时候还能提及这些很边缘的散文大家，也算是很难得的了，毕竟我们都无法超越时代，顾准这样的人毕竟是异数。那个时候，林非先生可能还不知道余秋雨是何许人的吧？

为本土文化守灵

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华夏，产生了多少文化典籍鸿篇巨制，即使屡经磨难江山变幻，兴亡更迭折腾不息，坚韧顽强的中华子民还是薪火相传存留下了不少遗产，虽然这样的遗产还有待当今日益浮躁的人们去耐心整理。可怕的是，随着西方强势文明的汹涌而至，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本土文化失去信心，面对西方科学的昌明和理性精神的神奇，觉得自己祖宗的东西简直是废纸一堆。当年五四时期的文化斗士们不大多都是这样激烈的情绪？后来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的重新转向似乎也难以扭转这样的局面，吴宓、杜亚泉这些保守主义者的声音显得是那样的脆弱和微不足道。

到了新世纪，虽然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像出土文物一样被人们重新缅怀，但在当下这样的语境中，谈论传统的回归探讨秦汉的古朴魏晋的风骨唐诗宋词的风流还有元曲的博大精深，都显得有点借题发挥，言不由衷。可仍然有一批人，还是迷醉于中国传统，坚信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仍然有他独有的价值，不为评什么博导头衔，也不会有什么可观的课题经费，凭借自己单薄的努力苦寒的守望，好像为自己的文化先祖守灵一样虔诚地穿行在森林一样繁杂大海一样浩瀚的中华文化的漫长旅途上。

南京据说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但是文化底蕴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却是见仁见智。有一段时间，南京的媒体很起劲的炒作一个“新闻”，找一个最能代表一座城市的文化人。这样的创意好像还是中央电视台的得意之作。在这样的创意之下，上海的王安忆西安的贾平凹被选择出来，北京是刘心武在那里夸夸其谈，东北居然是迟子建这样的年轻女作家来讲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南京应该让谁出来说话？许多人想到了比较走红的小说家，但是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好像浮现出这样的身影：在城南的小巷匆匆而行，在众多的小书店流连忘返，在朝天宫的万仞宫墙之下与来自天南海北的旧书贩子们讨价还价，偶尔也许会出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潘家园，当然不会像当年康生、陈伯达、田家英他们那样出手阔绰，豪气干云，他不过是一个没有什么学历的普通文人，这个人就是止水先生。

在苏州听一位朋友聊天，谈到中国图书的源流版本，他显得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图书关键是要为我所用，津津乐道什么版本秘籍，宋本元本，家刻坊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我原来也是这样的看法，觉得过于计较版本耗费精力，徒劳无益，不是还有人因为汇校本弄出了一场官司？据说有好事之徒根据什么人的“风雨天一阁”还创作了一个剧本，剧本的名称真是一针见血：《藏》。这些守财奴客观上也许为中国的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的主观愿望却往往是拒绝文化的传播和普及，这样的人很难用偏狭和自私来一言以蔽之，而多年的殚精竭虑最终不是毁于社会的动荡，就是葬送在不肖子孙的手中。社会板荡是社会个体难以抵挡的。想想一些所谓的著名藏书楼的命运，即使是皇家天子的秘藏诸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他们的结局又会好到哪里去？

止水先生不会考虑这样遥远的事情，他还有充沛的精力和时间为自己所爱好的志业孜孜以求。我有时候想，止水先生这样风雨无阻地在大小书摊上守望寻觅究竟有多大的收获？这样做学问的方式哪有现在大学教授的潇洒？看到止水先生作为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之一的《插图本》，我的心中感到难以抑制的兴奋。在这本二十多万字的也许有着开创意义的装帧雅致的图书中，不仅像书的名字一样充满了古色古香的各种我们的先人们留下的古书书影和书中的千姿百态的插图，更重要的是，止水先生把这样边缘冷僻不为人们所关注的领域做成了很有气象的学问，从帛书到纸书，从版画的产生到版刻插图的嬗变，不是教科书式的编编抄抄，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冰冰的耳提面命，在这样的处处锋芒闪现

的文字中，我们知道了官刻、家刻、坊刻的区别和背景，我们更知道了版刻插图黄金时代的洋洋大观，建安派的朴拙自然，苏州派的精巧灵秀，登峰造极的新安派，旁枝逸出的杭州派，更有让我们感到亲切亲近的金陵派的兼容并蓄。

止水先生像一个多情的诗人，以落漠淡淡的情怀叙述版刻插图的衰落新式印刷的崛起。得意而没有忘形的止水先生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或者亲眼见到的自认为弥足珍贵的插图本择其要者和大家分享，这样的大约近四十种在过去也许脏乱不堪让我们不忍卒读的旧书，经过止水先生的梳理和评介，处处洋溢着让人亲近的可爱，如《五洲图考》、《青楼韵语》、《救荒本草》、《坐隐弈谱》等，而《金瓶梅》、《水浒传》、《天工开物》、《全相评话五种》这些我们见惯了的新印刷品，在它们面前似乎显得是那样的年轻和千篇一律。

沧桑往事从容看

早就知道吴泰昌先生的大名，知道他毕业于北大，知道他供职在文艺报社，更知道他是某某的乘龙快婿。但是现实中的吴泰昌先生究竟是怎样的风采，却根本无从知道。喜欢看书话一类的小册子，而让人喜欢的孙犁先生的《书林秋草》就是吴泰昌先生亲自牵线搭桥担任责任编辑而得以出版的。当年吴泰昌先生在沪上的一家报纸开设专栏《艺文轶话》，因为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样的随笔札记非常让人喜欢。我当时想，写这样文章的人一定是相貌高古的书斋教授吧。

有一年，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末期，因为公务，我住在安贞桥附近的一家旅舍。吴泰昌先生在城市饭店请人吃饭。我算是叨陪末座滥竽充数，得以结识吴泰昌先生。吴先生议论风生，讲政坛的波谲云诡，论自己北大同学的人生变迁，更多的是文坛上的种种变幻沧桑。吴先生见解的独到，喝酒的豪爽，声音的洪亮，极富感染力的爽朗笑声，让人很容易产生亲近感。也是一次公务，为了《百日阳光》，还有《草房子》的推介，我们在京华上上下下地忙碌，而吴泰昌先生也特别热心，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惊人的记忆力。在城市饭店只不过匆匆一面，他居然在几年之后还能一下子认出来。多年之后，在夏坚勇先生的《旷世风华》研讨会上，我又见到了吴泰昌先生。吴先生仍旧是那样的从容自

信，潇洒爽朗，头依旧昂得很高。简短地闲聊，随意地乱扯，无不显现出繁华落尽后的洒脱和磊落。不久后，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庞瑞垠先生的《光明行》座谈会上，得知吴先生出版了一本《梦里沧桑》散文自选集，便向吴先生讨要。不久，王臻中先生赴京开会碰到吴泰昌先生，吴先生托王臻中先生给我带来了签名的《梦里沧桑》。

诚如吴泰昌先生所言，《梦里沧桑》大体上反映了他二十多年来散文创作的面貌。这本书分为“记忆镂痕”、“艺文轶话”、“说长道短”、“泥泞行走”四个部分。在“记忆镂痕”中，我们可以发现吴泰昌当年所交往的老师朋友。关于阿英，在平实的追忆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深埋心田的思念和遗憾。自己北大的知遇恩师杨晦先生，点点滴滴的深情回忆，透露出对老师的殷殷爱戴和感念。和郭小川的交往，特别是在秦皇岛的会面，还有在巴金家中亲眼目睹巴金得知茅盾逝世消息时的第一反应，都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细节。叶圣陶先生的谦和认真，朱光潜先生做学问的沉潜不苟，他如和李一氓的交往，与赵朴初的接触，同钱钟书夫妇的交道，更多的是在冰心先生跟前的心境澄明无拘无束，这样与众多一流人物的相知相交，毫无疑问会对吴泰昌先生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个人偏好，我更喜欢“艺文轶话”这样的文章，文字的从容老道，所谈问题的举重若轻，对重大问题的巧妙切入，都显露出作者的胸襟气度。吴泰昌先生可能对自己这样的文字也很自负，他不无辩解地说：“奇怪的是，叶圣陶的序跋、阿英的日记、孙犁的笔记札记，柯灵、唐弢、黄裳的杂论、书话，被当作散文集出版，今天有些人竟感到新异。”“说长道短”的文章足以看出吴泰昌先生作为职业编辑人的眼光，也可以看出他的热心和追求。关于孙犁先生的访谈，所问所答，都很有分量，平实中凸显吴先生的眼光独到。“泥泞行走”中的篇什，多是抒情散文，而《月光会照亮路的》这一篇，特别让人感到难以忘怀，我没有问过吴先生，这究竟是小说还是散文，究竟有几分虚构又有几分现实的哀痛和伤怀？

《梦里沧桑》的结尾是《我的北大同学》，足以看出吴泰昌先生对自己母校的爱重和感念，对自己青春岁月的缅怀和牵挂。而我却想着，有没有可能向吴泰昌先生开口，要他一本《艺文轶话》和《书山偶拾》？不知道这样爱书的愿望可否得到满足？

废纸堆中捡来的书

任何一座城市，似乎都有很值得夸耀的地方。虽然客居江南已有十几载，但是对于江南城市的了解远不能说已经很透彻，虽然这些城市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镇江也是在历史上曾经很辉煌过的一座古城，但是在当代似乎显得有些落寞和清冷，听当地人谈起自己所在的城市，好像没有苏州人或者无锡人那样的满脸自豪。但是你也许不会想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赛珍珠和镇江曾有过很深的渊源。当年全国仅有的七部《四库全书》，镇江却很荣幸地拥有其中的一部，藏于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宗阁。梁武帝萧衍的儿子萧统编辑《文选》的所在地就是在镇江；《梦溪笔谈》、《玉台新咏》、《古诗源》、《康熙字典》甚至《马氏文通》这些经典性的文本都与这个城市有着不解之缘。写《老残游记》的刘鹗我们知道他是淮阴人，但是他的《铁云藏龟》却是在镇江写成。大家都把郑板桥和扬州相提并论，而郑板桥在焦山隐居读书却鲜为人知。镇江与扬州这两个在运河边上曾经辉煌过的城市，在今天随着两座城市之间跨江大桥的建成，长江这个黄金水岸的日益繁华，也许这两个城市会使长江成为他们的内河？那样的话，身居镇江的易君左再写什么《闲话扬州》，想来不会让扬州人感到无比愤慨了吧？

《镇江书话》这本书把镇江有名的读书处、建国前的图书馆都搜集

起来,更见功夫的是把建国前出版的与镇江有关的图书和镇江籍的名人所写的书以及曾经在镇江生活过的人所写的书都尽量罗列起来。这样的工作在别人眼中也许没有什么创造性,但是做这样的有心人应该说还是很不容易的。

《镇江书话》提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葛洪的《抱朴子》、丁传靖的《沧桑艳传奇》、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还有岳飞的孙子岳珂的《金陀粹编》等都多多少少与镇江有点关联。辛弃疾这样的生逢乱世的大词人以其《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和《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两首气势豪迈雄视千古的词章而屡屡为后人所提及,据说辛弃疾的词《南乡子》不仅毛泽东喜爱,江青也很喜爱。尼克松访华时,江青让乔冠华向尼克松讲解这首词。只可惜在如今特别注意宣传自己的时代,好像并没有很特别地把辛弃疾的这两首词和镇江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不屑为之的漠然还是一种不知如何下手的茫然?原来,吕凤子也是镇江人,《中国画法研究》是一本理论书籍,吕凤子是梅庵老人李瑞清的学生。他的大哥吕澂著有《西洋美术史》,这个吕澂在佛教方面也很有影响,据说与欧阳竟无有很深的交往。著有《中国文法要略》和《文言虚字》的吕叔湘和吕凤子是堂兄弟,他们都是东南大学毕业的学生,算起来是我的前辈学长。

很偶然的机会,在一个装旧报纸的袋子里见到《镇江书话》这样的小册子,装帧设计虽然很一般,很粗劣,但是好像还有十几万的文字。我当时想,书中会不会介绍匡亚明这样的人物?会不会涉及吕叔湘、茅以升这些名人?结果当然是令人满意的。这本书告诉我们,茅以升的爷爷茅谦也曾是很有造诣的水利专家。受爷爷的影响,茅以升成为桥梁专家。后来听说,这本书很可能是一位处长丢弃的,也难怪,他最近要升为副厅级了,这些闲书放在身边也是一种累赘。《镇江书话》这本书出版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有意思的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这本书竟然把镇江一些企业的图书馆也都搜罗在书中,还写上这些图书馆负责人的名字,这样的不伦不类也许是为了推销这本书?扩大它的发行量?当时担任镇江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朱正伦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序,这个人后来到几个高校合并后的江苏大学担任党委书记了,很喜欢写毛笔字,这本书的书名就是他的题字,算是对当地文化人的一种鼓励和褒奖。他的一个下属去一个高校读比较美学方面的博士,朱正伦开玩笑说,你现在怎么研究起"比学"来了?

《镇江书话》的责任编辑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时惠荣先生。时惠荣曾经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据说退休以后，还在发挥余热，仍旧活跃在图书出版领域。还有一个责任编辑范然是镇江的一个官员，听说范用也是镇江人，两人之间不知是否有点关联？秋禾先生也曾在南大出版社供职，如果让他来编这本书，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鲁迅的『书香』胡适的『人和』

老编辑的风范往往让人心生敬意。曾经看到过一个从事新闻出版管理的官员所写的一本书《老出版人肖像》，看过之后，我大加感慨甚至很偏激地想问：在当下，能够心安理得地自称出版家而又为大家所折服所公认的能有几人？一些腰缠万贯趾高气扬的所谓出版家，除了有一些靠教材教辅、靠垄断拥有一些纸币之外还有什么？呼唤出版家过于遥远，能够涌现有思想有追求敬业勤恳的编辑人也是好的。但是举目全国这么庞大的队伍，我们呼唤名编辑也已经有不少时日，但是结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在这样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多年的老编辑写自己编辑生涯的文字，起初有点漫不经心甚至觉得这些人过于自轻自贱让人感到有点可怜，但是渐渐地觉得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他们观察事物的视角他们所了解的人物乃至事件的过程，很可能在未来的日子会成为一种珍贵史料。以前看袁鹰的文字，才知道他除了散文写得出色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编辑，长沙的钟叔和，还有江苏策划编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周文彬，都是编辑中的翘楚。现在我又看到了张昌华先生的《书香人和》。

和张昌华先生并不是很熟悉，偶尔在沪上的报刊上看到他写与一些名人交往的文字，起初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谦和？谦恭得简直有点

过分。毕竟时代不同了，即使在文化泰斗面前我们也不应该丧失了自尊。但是时间久了，才觉得自己认识的幼稚和浮浅。在当下大家都在忙于生存忙于效益的时候，有这样的老编辑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忙于编辑《许广平文集》，热心策划《霜叶丛书》，把萧乾、文洁若、凌叔华、陈源、赵元任、杨步伟这些被岁月的烟尘几乎湮没的人物重新梳理出来奉献在世人面前，让大家了解这些人在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样的努力实在值得得到读者的尊重。记得为《百日阳光》作品研讨会的事情，和他在北京的宾馆里同居一室。作为晚辈，听他讲自己的教师生涯，讲自己当年和贺景文先生一起怀揣着当小说家的梦想共同写小说冲击文坛的陈年旧事，讲自己最终选择了做编辑这一自己最为满意的职业。张昌华先生这样的谦和和诚恳实际上成就了他成为成功编辑的重要因素。在季羡林、萧乾面前他是那样的心细如发，不厌其烦，在与吴作人及吴作人遗孀的交往中，他关注到了每一个细节，最终促成了季羡林先生写出追怀吴作人先生的文章。对柯灵的拜访，和冯骥才的交往，对著名女诗人舒婷的介绍，更有和一度很知名后来又很寂寞的浩然的一段故事，这些经历真是人生的一种愉快回忆。我觉得在《书香人和》中最为生动的是写叶兆言，毕竟是曾经的同事，毕竟有深入的了解，把叶兆言写得非常逼真细腻，活灵活现。关于王映霞的文字，王映霞这个不简单的女人的晚年生活，虽然点点滴滴，但是凸显出她的不同凡响。我想张昌华先生提供的文字可能是研究郁达夫的人所不能不读的重要资料。梅志的伴囚坐牢，戈宝权的金陵晚景，当年靠着《风雪夜归人》一举成名的吴祖光和他的妻子新凤霞，所有的记述都在一种娓娓道来中显示出一个老编辑的有心和不易。

毕竟是编辑出身。作为张昌华先生的第一本书，为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还是很费了一番脑筋，封面和封底是凌叔华当年所画的兰花，素雅清淡，温馨可人。有意思的是，“书香人和”这几个字也颇具匠心，“书香”是集鲁迅先生的字，而“人和”则是胡适先生的墨宝，这样地把两个文化巨人的字放在一起竟然也是如此自然大方，也许所谓的纠葛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剧烈吧。把他们放在一起至少反映了张昌华先生的一种美好愿望：对自己民族所孕育的文化巨人的敬仰和充分尊重。

柴室小品卢冀野

我们知道郑逸梅先生的短文章，也知道钱伯城、金性尧、唐振常、周劭等先生给人启迪婉约有致的随笔小品，甚至还有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等笔记小品。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南京曾经活跃过的一个大学教授，江南才子，如今知道的人实在是很少了，这个人就是卢前先生，也称之为卢冀野。不知道什么原因，民国时期的许多文人近来都像出土文物一样被发掘出来，从事此项劳作最为卖力也最有成就的当数沪上的陈子善先生了。

丙戌年六月三日上午，星期六。匆匆忙忙从木樨地附近打车去琉璃厂，时间紧迫，在中国书店的邃古斋买了几本闲书，其中就有中华书局在四月份刚刚出版的《卢前笔记杂钞》。卢前，字冀野，毕业于东南大学，是吴梅的弟子，民国期间活跃于学界和报业，在词曲等方面卓有成就。这位疏狂不羁的江南才子，子女很多，晚年命运似乎也比较坎坷，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六岁，算是英年早逝了。所谓笔记杂钞，自然是很短小的文章了，杂钞分"柴室小品"、"丁巳间四记"、"冶城话旧"、"东山琐缀"等四编。认真看这位早逝的大学长的文字，心中弥漫的是一种相见恨晚的亲近，还有莫可名说的淡淡的怅惘。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先生，而今安在哉？

卢前先生生逢乱世，但是天赋、性情还有师承让他写这些随笔小品驾轻就熟，信手拈来。卢前谈论饮食，自然妥帖，娓娓道来，八宝粥、十样菜、春韭、木鱼、扬花萝卜等家常小菜在卢前笔下，轻灵生动，沁人心脾。但我最为感兴趣的还是卢前谈自己与同道们的交往应酬，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所谓的报业三张，还有叶遐寿、陈三立、沈尹默、戴望舒、李审言等诸多民国文人，或是一件小事，或是一个片断，在简约得当的文字中，让人感受到老一代文人的绰约风姿。至于谈到一些历史旧事，卢前似乎很不愿意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总能说出一点新意来。受纪晓岚的影响，世人基本上都认为窦尔顿仅仅是一个江洋大盗，而卢前却说窦尔顿还是一个学者。受政治等因素的左右，大家经常津津乐道末代状元张謇的实业救国，主要是张謇的实业救国也的确取得了一定的物质成果，就是当下所谓的政绩吧。而卢前却想到了另一位南京籍的状元黄思永，此人也是倾心实业救国，空有满腹经纶，但是无人赏识，处处碰壁，如今湮没无闻，卢前很为此公不平。明朝的正德皇帝一直是一个丑角混蛋皇帝，但是卢前却发现了这位皇帝还算了解民情的一面。何应钦先生，大陆以前总把他当作亲日派，甚至还说在西安事变的时候，此人还有取蒋而代之的狼子野心。现在看来，都是我们的一种自说自话。卢前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与此人有过接触，认为何有大将风度，如轻裘缓带的羊祜，不亚于宋代的大将曹彬。出人意外的是，卢前和董必武还有交往，我们知道了董必武的画室叫做“味谏轩”。董必武到南京来，当时的柯庆施请董吃饭，卢前曾经作陪。不过柯庆施毕竟不是陶铸，而卢前也不会有陈寅恪那样的幸运了。

很有意思，卢前在抗战期间也就是一九四零年和梁实秋等还曾路过我的家乡叶县，字数不多，容我抄录下来，也算是一种很有意味的缅怀吧：“一直赶到宝丰，在宝丰城外，各人吃面一碗，窝了三枚鸡子。沿街卖酒的甚多，还有卤鸡一块块的在卖。实在是太不洁净了，没有一尝的勇气。过了宝丰，我们的这辆车一路多灾多难，走到天黑，还是在走。天黑了很久，才抵叶县，红纸糊的风灯在道旁摇摆着。县府老早得了消息，有人在等候我们。好容易经我们的力辞，谢绝他们的招待，在新生旅社下榻，我与子逸翁同室而居。老人家诗兴大发，县府又送来一部《叶县志》，在煤油灯下，一人喝了四两，你吟我哦，一口气写了不少作品，可是睡眠受到了影响。九日，仍然是七时出发，到方城才八点钟。唐诗人温飞卿曾任方城尉。想来就是此处了。”卢前此行，名为“关洛劳

军”，虽然战火纷飞，受到的款待还是很有规格的，因为许多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如卫立煌、冯钦哉等都出面接待而且还请他们看陈素贞的豫剧。卢前在河南大学曾经任教三年，有不少中原弟子。顺便说一句，卢前对河南人没有什么偏见，并不像如今的一些人肆意侮辱河南人。他对豫剧的认识也很自谦，但是他说，陈素贞小名叫狗娃。

但卢前生活的主要地点还是南京。从他笔下的大钟楼、半山寺、报恩寺等南京旧迹，我们可以体悟到卢前对这座城市的热爱，虽然郭沫若说南京是“粗杂的草稿”。卢前的《南京杂忆》一文，可算是声声泪字字血。南京沦陷后，卢前逃亡到安徽无为，对南京的牵挂故园的思念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而最让他揪心的是龙蟠里国学图书馆的命运，还有南京一些知名藏书家珍藏的下落，国破山河碎，真是情何以堪！“那堂皇富丽的中山陵，前面流徽榭月下听水；谭墓访梅，灵谷的玉簪，明孝陵的吊古，还有夕阳中玄武泛舟，浆声灯影的秦淮，和秦淮北岸的歌楼，那夜夜的歌声。又荷花开满了的莫愁，白鹭垂钓，台城闲步。只要你去过南京，没有不晓得的。南京，可爱的南京，我想最近的将来，我们必有重聚的一日。听说，南京也下了雪，白头钟山，想必正在等待着我们。”虽然时局那样艰危，卢前，作为一位知识分子，还是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信心。卢前主持过《中央日报》的副刊，在不少报刊上刊发过自己的文章。《中央日报》这张存在了七十八年的国民党的机关报在今年的五月底正式停刊了。据说，连战表示了惋惜，而现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说出于无奈，惟有关门。

《卢前笔记杂钞》是“冀野文钞”的一种，另外三种是《卢前曲学四种》、《卢前文史论稿》、《卢前诗词曲选》。《卢前笔记杂钞》有杨宪益先生多年前的序，还有张充和先生的文字，附录中还有卢前去世后一些朋友的追忆文字，因《闲话扬州》而声名大噪的易君左先生居然给卢前先生写过很简短的传记。

翻译过哈代《还乡》的王实味

王实味这样的悲剧性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作为一种因文字贾祸的象征性标志性人物似乎更加受到关注。当我得知王实味也是河南人，并且年仅四十一岁就被人为地终止了生命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客居台湾的柏杨，还有现在在上海闲居的白桦，这三个人身上似乎有某种河南人的一种宿命性的东西存在。柏杨轰动海峡两岸的书除了他自己翻译的《资治通鉴》之外，就是引起轩然大波的《丑陋的中国人》；白桦的《苦恋》在一段时间内当然是一种禁忌。王实味远没有他们幸运，他被康生和李克农下令处决了，王实味生命的终止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他的《野百合花》。这个篇幅并不很长的文章据说是向他当时身处的体制进行猖狂的进攻。有意思的是，与他一同被批判的人，虽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如丁玲等人，但是搭上性命的，似乎只有王实味。

知道王实味的名字是在乡间求学的时候，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好像是河南大学编辑的什么现当代的文学资料上收集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当然是供批判用的。读着这样的文章，也许是由于自己认识水平太低，也许是年代久隔的缘故，并不喜欢这样的文章，而这样的文章居然能够招来杀身之祸，却让我感到奇怪和费解。似乎是很流行的说法，毛泽东觉得当年王实味如果在王震手下，也许就不会被杀了。毛泽东这种不

无惋惜的似乎有某种难言之隐的话引起了人们的一番猜测。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讲话？好像是何新的一本什么书中，讲到王实味的时候，似乎很有把握斩钉截铁地认为，王实味是被贺龙杀害的。真是这样吗？

有一天晚上，是夏夜，闷热难当，陪中央党校的李书磊教授在清凉山下的一个很狭小但是却有不少旧书的小房间内淘书。李书磊教授夫妇不顾南京七月份的高温，大汗淋漓地翻检寻觅着自己需要的旧书。受他们的感染，我也捡了几本，其中有一本《再批判》的书，听他们讲也是当年很有名的书，就买了下来。这本由文艺报编辑部编辑的小册子是于一九五八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根据版权页上的数字，第一次印刷就有 17000 册。这本书分为两辑，第一辑全是批判文章，第一篇就是林默涵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为附录，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赫然在目。林默涵的文章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看似真理在胸，但是认真读来，除了用大帽子压人以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是林默涵口口声声说王实味是托派分子，托派分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一牵连上托派分子就会丧失话语权甚至生存权？

到了这个世纪的第一年，王实味的家乡出版了一本《王实味传》。在这本书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王实味的一生，基本上弄清楚了王实味被处死的前前后后。对于王实味奔赴延安之前的生活经历，也进行了认真的考证。通过作者的扎实研究，我们终于明白，王实味并不是像有些向他身上泼脏水的人所贬低的那样一无是处。王实味之所以能够在延安做研究员，还是有相当的资历做基础的。当年在延安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王实味默默无闻地翻译了大量的马列经典著作。而王实味这个从北大校门走出来的学生在当年的文坛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他不仅翻译了不少长篇小说，如哈代的《还乡》，还写了一些小说，与胡适、徐志摩都有一定的交往。

性格即命运。王实味最大的弱点就是不能和人和谐相处。王实味讲张天翼不配有像他的小孩那样聪明的后代，这样伤人的话最终导致了两个人之间多年友谊彻底结束。王实味这样的脾气还能有好日子过吗？王实味的婚姻也带有时代的痕迹，与他的命运紧密相关的两个女人在历尽沧桑之后，对王实味还是充满了深深的缅怀，虽然她们因为王实味这个名字而遭受了不少的屈辱与磨难。《王实味传》的作者黄昌勇也是河南璜川人，王实味的同乡。这本书有两篇序，分别是朱正先生和钱理群先生所写。朱正是湖南人，钱理群是南京人，北大的教授。

留意姚家父子

浙江温州人就是聪明，会经营，肯吃苦。叶永烈是温州人，据说以前是学自然科学的，曾经写过不少科普方面的文字。我曾经看过根据叶永烈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但就是这个从北京大学走出来的叶永烈，后来醉心于敏感的当代人物的写作，特别是关于四人帮的传记，先后出版了《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陈伯达传》，甚至还有《陈云之路》等。这个人的《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当年曾经准备在南京的《东方文化周刊》上连载，后来因故被停止。聪明的叶永烈当然不会浪费自己下了一定功夫才到手的许多资料。运用这样的资料，在写传记之余，叶永烈还出版了《叶永烈采访手记》等。这几个人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有很大的重合，这当然也给叶永烈提供了便利。在叶永烈的诸多人物传记当中，《姚文元传》似乎显得尤为特别。

我所看到的《姚文元传》是叶永烈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重新修订而成的。按照常理，修订后的作品当然会比从前的更加成熟，但是这样反复修订无疑会加重读者的负担。当然，作者的稿费会一次次地拿。这也许又是温州人的聪明和心机？

《姚文元传》这个书名更为确切的名称应该叫做《姚氏父子》。因为书中相当大的篇幅是在讲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叶县读书的时候，

夏夜乘凉，经常听父亲的老师杜大记先生谈“山海经”。有一次听他谈到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个作家，会写诗，和鲁迅、丁玲、老舍等作家都有交往，还翻译过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后来看到过丁玲和沈从文闹得不可开交的有关丁玲在南京的生活种种，丁玲和冯达在一起，也和姚蓬子在一起。但是，姚蓬子和丁玲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当然不会像四人帮那样因为血统的原因就说姚氏父子怎样怎样，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在那样的历史烟云中风云际会得以生存的？既然姚蓬子曾经叛变过，为何姚文元能够扶摇直上，在38岁的时候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在1976年垮台的时候也才仅仅45岁，应该算是很年轻的高级干部吧？姚文元坐了20年牢，出狱的时候是65岁。姚文元好像没有什么很过硬的学历，更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也许受他父亲的影响，也许是自己的天赋，写作能力还是不错的。

姚蓬子不仅会写诗译书，更重要的是这个浙江人脑子活，会来事，善交际，自己创办的作家书屋有点当下文化工作室的味道，不仅仅卖书，还经营出版业务。借助于种种关系，姚蓬子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姚文元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耳濡目染，当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姚文元作为中学生就加入了共产党也是事实。他的从政生涯是在卢湾区做一个很基层的干部，由于张春桥的提携和赏识，姚文元逐步崭露头角。在那样的政治氛围当中，柯庆施的青睐，张春桥的厚爱，使姚文元青云直上，春风得意。但是使姚文元释放出更大能量的是江青，当然也和毛泽东的褒奖密不可分。据说，毛泽东提到王蒙、李希凡、姚文元，但是最为赏识器重的还是姚文元。众所周知的是姚文元在评《海瑞罢官》中的“精彩表演”。实际上，姚文元秉承张春桥的吹风所写的《录以备考》也应该算是“大手笔”，因为这篇文章，毛泽东对姚文元开始器重起来。有了这样的背景，姚文元的文章厉害起来，横扫千军如卷席，笔锋所向，酣畅淋漓，使多少人身陷囹圄，命归黄泉。姚文元对自己被抓起来前夕的心情感受，交待得还算坦率。姚文元从新华社的渠道了解到纪登奎的儿子对当时时局的分析，令姚文元心惊肉跳，也感到自己政治生命的岌岌可危。

《姚文元传》一书有不少内部档案的披露，更为有价值的是和姚氏父子有过交往的人所提供的东西。随着岁月流逝，这些人的只言片语都显得弥足珍贵。姚文元喜欢记日记，从15岁开始就记，相信完整的

保存原貌的“姚文元日记”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但是这样的日记出版是否又要出口转内销？不管怎样，这样的日记对我们客观公正深入全面地研究文革有着极端重要的不可取代的分量。

《姚文元传》是作为叶永烈纪实文集的一种重新出版的，从版权页上看，接近四十万字，由远在天山脚下的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会不会又是书商“运作”的结果？

不堪回首话当年

《谁主沉浮》是一位已经九十八岁高龄老人的回忆录。现在的回忆录很多，简直汗牛充栋，满坑满谷。但是能够让人心悦诚服的回忆录却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有的回忆录，借机突出自己，贬低别人；有的回忆录，罔顾事实，随意编造；更有甚者，无中生有，天马行空，把本来很清楚的史实弄得一团乱麻，清水变成了浑水。但是，历史是极其复杂的，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也不可能只有一种解读。如果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把自己亲历、亲闻、亲见的事情记录下来，供世人研究参考，则是应该肯定的大好事。

《谁主沉浮》一书，是名叫陆立之的一位老先生兢兢业业写出来的非常平实的文字，记述了自己在建国之前所经历的风雨坎坷。据陆立之自己回忆，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和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张太雷、恽代英等人都有很深的交往，尤其是瞿秋白弟兄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更是见证了共产国际与我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诸多事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脱党，在国民政府中服务于全民抗战，对西安事变、韩复榘被杀、复兴社、马占山的抗日活动、冯玉祥的察绥同盟军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和了解。毕竟是身处历史现场的人，对当时大的历史情境有一定的体察和感受，即使不是参与者、操作者，但通过各种渠道也

会成为知情者。陆立之对抗战期间的长沙大火、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新疆盛世才的投机、蒋经国的早年经历、郝鹏举的野心勃勃反复无常、戴笠和王映霞的勾勾搭搭、汤恩伯的卖主求荣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披露。尤其是韩复榘这样的行伍人物,在陆立之看来,并不是相声演员口中那样的不堪和粗野,也是很有谋略和心计的风云人物,乱世魔王。

书中最有价值的还是关于党史上的诸多问题的披露。如在七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更具体的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一些苏联代表的关系,所谓王明路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否存在,是一个怎样的形成过程,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具体细节如何,瞿秋白之死有多少党内斗争的因素,又有多少当时的形势发展使然,瞿秋白《多余的话》究竟应该怎样解读,如何重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功过尤其在党的五大之前的具体表现,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曾几何时为什么会这样炙手可热,在他主持长江局的时候,是如何与周恩来、博古合作共事的。不是说,汪东兴在西柏坡的时候曾经开过党小组会批评过王明吗?这样的事情究竟透露出怎样的信息?汪东兴怎么会如此有恃无恐?我们传统的党史学界,对七大之前的历史只是大而化之。如果我们不说,那就只能听凭别人说了,甚至是胡说、乱说。

陆立之兄弟两人。他的大哥在上海安度晚年,陆立之被上海公安局静安区分局逮捕之后,历经七年关押,最终把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公民弃置在安徽的一个小火车站扬长而去。陆立之从此在安徽滁州小城艰难度日,据说,住的是筒子楼,房间里还是水泥地,家徒四壁,只有一个书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担任了当地的政协委员的他还是奋力追记所经历的事情,不断在《炎黄春秋》、《百年潮》、《纵横》等刊物上发表自己的史料文章,这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谁主沉浮》一书,是陆老先生自己掏了15000元人民币找书商出版的,用纸很是不堪,错字触目皆是,简直还不如水平高的盗版书。

自绝师门——《沧海》

夜深人静，我反复端详着这部洋洋洒洒达一百三十多万字厚厚的三卷本的《沧海》，反复在想：是什么力量推动作者这样厚颜无耻毫无遮拦地把自己老师的种种鲜为人知的隐秘公布于众？这样的延续将近二十多年的掘墓人心态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这样时代迅猛变迁人事不断更迭社会反复整合的大潮中为什么对老师的仇恨这样持久，没有丝毫的消减和宽恕？难道仅仅一句冠冕堂皇的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样的漂亮话就能把自己狭隘变态的反扑一笔勾销吗？

早就听说有关于刘海粟的什么爆炸性的书正在酝酿之中。因为在此前，我曾经多少知道一些关于刘海粟的纠葛，也就是《沧海》作者在第三部中非常详尽地描述南师大一位教授在《江苏画刊》上发表的关于刘海粟在当年的《新华日报》上被列入名单的文章。实际上，当时南京的《周末》报也参与了这样的讨论。当然，这样的带有情绪化的议论很快就"风平浪静"了，天晓得这只不过是局外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一种错觉罢了。谁能想到在刘海粟身边就有这样的更加富有战略眼光的韬光养晦的背叛者在寻找时机。

《沧海》的作者简繁原来的名字叫简德才，这样的名字大概寄予了父母的一种期望，希望他日后德才兼备，难怪简繁不太愿意用自己原来

的名字了，这样的名字对照着他的种种作为不是一种讽刺和嘲弄吗？在这样对自己的老师以少有的勇气进行揭露和鞭挞的鸿篇巨制的每本书的封底勒口内，简繁先生都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简历告诉大家，这样的设计我估计不是图书装帧编辑的意思而可以肯定是所谓刘海粟唯一研究生的自鸣得意的创意，这不是一次很好的宣传自己的活广告吗？已经五十多岁的简繁面对自己已经作古的整整活了一百岁的老师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悔意？面对自己当年追随刘海粟的种种时刻可曾有过物是人非的感慨？南京艺术学院就在我所居住的小区的对面，学校边上是很清幽也很平民化的古林公园。刘海粟先生当年曾经画过常熟的言子墓，但是不知这位中国二十世纪画坛上的风云人物可曾在古林公园有过片刻的停留。复出之后的刘海粟太忙碌了，仍旧豪气干云的刘海粟关心的是自己的青史留名，是自己在画坛地位的巩固。为此，刘海粟当然不会在意古林公园这样的小丘，他需要的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浩大场面。刘海粟的目光投向了黄山，接近百岁的老人十上黄山还能泼墨作画，这是怎样的千古佳话！

刘海粟先生在中国二十世纪画坛上的地位会不会因为自己学生的反戈一击而随之一落千丈？刘海粟先生大起大落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会随着《沧海》这样的图书在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而迅速暗淡下去？更重要的是刘海粟的作品是会很快贬值成为废纸一堆还是更加倍受关注奇货可居？即使简繁先生再怎样挖空心思利用刘海粟的谈话纪录来反复论证刘海粟的虚荣猥琐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我们还是觉得即使刘海粟过于自夸和自我膨胀，但他毕竟是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的世纪老人，在艺术教育上离经叛道之举，在当年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能够让自己的生存空间游刃有余，能够在这样的大浪淘沙中屡挫屡奋不轻言放弃，仅靠花拳绣腿是肯定玩不转的。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还能够这样的充满青春活力，还能够为了自己的世俗功名四处奔走，这样进取的心态和敢于打破常规的种种举动也不完全是江湖把式一样的卖弄，不然的话，那么多的人不全都成了瞎子？刘海粟大器晚成的时候，刘海粟老当益壮几上黄山的时候，刘海粟借助安徽的一位女作家的《张玉良传》屡屡见诸南京一些新闻媒体的时候，还有后来由巩俐主演的以张玉良为原型拍摄的电影《画魂》曾经在我的母校选取镜头的时候，我们当时心目中刘海粟的形象是怎样的完美和高大啊！我们怎会知道种种饱含深情的回忆历历在目的往事和许多名人的交往都是一种

刻意的包装随意的放大甚至是各取所需的断章取义！我们怎会知道徐悲鸿对刘海粟这样的决绝！傅雷对刘海粟的批评那样的入木三分！刘海粟和郁达夫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三流作家的文学想象！毕竟是刚刚进入新的时代，在那样的岁月，省委书记的评价已经让刘海粟这样饱经沧桑的老人涕泪交流了。

刘海粟的学生对自己老师的私生活特别感兴趣。我们无从了解刘海粟是否真的像书中所写的那样，年轻时候的刘海粟就是风流成性没有什么责任感可言，即使到了八十多岁的高龄还仍然需要年轻女孩子在身边晃来晃去。什么扬州文化局长在省文化厅副厅长的陪同之下给刘海粟推荐年轻的女按摩师，刘海粟在人民医院住院的时候乱摸女护士的胸脯，还有刘海粟年轻时种种荒唐甚至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寻欢作乐。凡此种种，都让人将信将疑，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刘海粟担任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职务，应该说对于一个学校的发展是一个大好事。但是围绕在刘海粟周围人物的表演——当然是简繁眼中的表演——让我们看到名利场上的虚伪，人与人之间的险恶，他人在我眼中就是地狱的勾心斗角。这样的围绕艺术所异化出来的东西怎会这样的丑陋和肮脏？石楠、柯文辉、董欣宾、李小山，甚至为刘海粟写过介绍文章的原江苏省文联的主席李进，江苏省作协原主席艾煊都在简繁的书中有一定的描述。简繁真是一个有心人，只是这样的留心让人感到脊背发凉。

有意思的是，简繁先生在书中也相当坦率地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经过的女人。不知道他的结发妻子如今在南京还是在北京？简繁在书中对自己的妻子进行了相当的贬低和丑化，好像自己很无辜的样子。自己不在家的时候，怀疑自己的妻子和别人鬼混，一不小心自己的学生却成了妻子的新情人。面对这一切，简繁还自我吹嘘地表现出一种所谓绅士风度，但是怀疑自己的妻子所生的孩子，可曾做过科学的鉴定？不然这样的随便怀疑对孩子来讲是否公平？简繁利用自己是刘海粟唯一研究生的招牌，到处招摇，在西北和一个纯情女子情意绵绵，去深圳和女记者天昏地暗，南航的女学生为了简繁的花言巧语而死心塌地追随左右，在北京和两个女孩子胡天胡地的放浪群居，在江苏人民医院和女护士的眉来眼去。更加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书中简繁对夏伊乔的赞美，简繁甚至把自己在梦中和夏伊乔怎样怎样的情节也写进了书中。所有这一切，是一种自我满足的变态虚构还是真有其事的惊人坦白？

简繁说自己所写的不是传记，也不是纪实性的小说，简繁甚至这样信誓旦旦地说："书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乃至于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真实的。"

《沧海》更多的是一种资料的堆砌，这也算是一种非简实繁的叙述风格。过于琐碎的求证，对资料缺乏宏观的把握，还有沉溺于情绪化的狭隘，使得这样的书阅读起来相当吃力。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具有立此存照的味道。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就是南京艺术学院，在这样浓阴匝地一片清幽的学府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五味杂陈的『友好条约』

中苏关系似乎成了历史名词，但是关于中苏关系的话题似乎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它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现实政治走向，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影响着亚洲地缘政治的大格局。如今中俄关系应该说进入了比较正常和理性的阶段，站在现在的历史交叉点上再来回顾当年的中苏关系，真是五味杂陈，心绪复杂。自清王朝的对俄国关系的演变，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相对平等到道光以后的逐步被欺，领土被割，利益受损，乃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实在是惨痛得让人泣血。几年前，我去过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在俄国的博物馆里，看他们对外兴安岭地区的陈述，看契诃夫的《萨哈林岛游记》，心中的压抑和难堪就像西伯利亚的寒风一样。我们不是指责，而是客观地重温历史，从中寻求教训和继续前行的力量。五四运动之后，中俄关系到后来的中苏关系主要是在政党层面上展开，其间风风雨雨艰辛备尝，到了 1945 年党的七大，我们才真正摆脱了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的种种教条主义的牵制。而内战结束，百废待举，鉴于当时的世界格局，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就新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与之进行会商。

透过唐灏先生《毛泽东中苏结盟之行》的文字，我们知道毛泽东从离开北京到回到首都共计 89 天，其中在莫斯科就待了 58 天，这不能不

说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马拉松式的访问。过去的文章对毛泽东赴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并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都是一片颂扬声。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开始传出一些对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微词，但大多还是遮遮掩掩、欲说还休。随着“文革”的结束，世界格局的变化，尤其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中苏关系见闻录》等权威回忆文章的“知情者说”，我们才知道，原来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人在莫斯科与我们的这个邻居还是进行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的，虽然没有撕破脸皮，但也似乎为以后的决裂埋下了不小的伏笔。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如此一波三折，实在是复杂微妙，匪夷所思。根据唐灏先生的研究，有几件小事值得一提，也多少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政治氛围。斯大林居然很长时间不称毛泽东为同志，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可能是称谓上的差异，但在当时却是对毛泽东的一种质疑和不信任。周恩来反感苏联小说《旅顺口》，陈伯达在观看《红罂粟》时的当场发难，都说明苏俄人对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轻蔑和漠然。陈伯达在斯大林对自己高度评价后的飘飘然是一种书生的虚荣还是不谙毛泽东心理的真情流露？毛泽东和斯大林当然有斗争，也有妥协，最后还是弄出来一个大家都相对比较满意的互助条约来。

可能是由于种种原因，书中回避了比较敏感的领土遗留问题，尤其是民国政府期间的一些历史问题。虽然闪烁其词，多少透露出迫于当时种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难言苦衷，但是这个苦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不是抚慰，而是永远成为中国人心中的隐痛。遗憾的是，书中没有注明一些说法的来源，没有把一些引用的资料出处附在书后，表明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严肃性和文献来源的可靠，而不是一些不负责任的小说家们的信口雌黄。书中有些段落对斯大林的溢美之词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惯性使然，历史已经无可逆转地走到今天，实际上已经没有必要说这些违心的话了。

边城萝北读承志

在深秋季节，黑龙江边上的一座小城，萝北的一家小书店里，居然发现张承志的一本今年初出版的新书《谁为胜者》。张承志的书虽然有一定的重复，但基本上还是一旦发现有新近出版的，就毫不犹豫买下来。好在，张承志的书并不是多得铺天盖地，让人无法承受。《绿风土》、《荒芜英雄路》都是上大学的时候买到的，《清洁的精神》、《牧人笔记》、《鞍与笔》、《以笔为旗》则是工作以后陆陆续续购得的，《一册山河》好像没有看到。在北国已经颇有寒意的秋风里，看到张承志的《谁为胜者》，还是觉得一种天然的亲近和欣喜。

张承志的文字，好像都是用自己的心灵在呼唤，用自己的赤诚在倾诉。《谁曾经宣言》，我好像在什么杂志上也看到过，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话题，有几分危险，也有几分沉重，但是面对一衣带水的近邻的追问，我想尴尬的并不仅仅是张承志。这的确让我们感到难堪，手足无措，我们领袖人物的代表作或者说宣言书，最为权威的版本在哪里？邓小平我们可以说是南方谈话，那么毛泽东我们讲《为人民服务》？《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实践论》、《矛盾论》？都有道理，好像都不全面。《幻视的橄榄树》写得是那样的形散神聚，富有深情，对自己钟情的大西北，并不仅仅是心灵的栖息地，还要实实在在为当地百姓的生存和发展

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不是矫情的蜻蜓点水的敷衍，而是实实在在的用心。张承志并不是一些人所讲的迷醉于宗教狂热，漠视着现实的苦痛，不负责任地拒绝着现实文明渗透的狂热分子。

《谁为胜者》一书中有两篇文字特别让人感到酣畅淋漓。《东铺无人踪》和《鲁迅路口》，前者是写徐锡麟的，他在徐锡麟故居的门口看到了根据徐锡麟的意思命名的热诚小学。“有热心人，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一向给人以冷峻和不好接近的张承志感慨地说道：“暗自算过自己的同窗共学，虽好人众多，数不胜数；只是坦白地说的话，大都缺的正是这些热与诚。”关于处决徐锡麟的侩子手，居然成了徐锡麟的知音，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怎能想象？关于鲁迅的解读，当然是汗牛充栋，但是张承志的文字就是这样的与众不同。《鲁迅路口》，多好的名字，其间蕴含着怎样丰富的内涵？鲁迅与秋瑾是邻居，我们当然熟悉《药》中的夏瑜，但是张承志这样的解读，并且举出《范爱农》来作为自己的佐证。这样的见解，可能让许多鲁迅研究专家们会感到很不自然。《泉州女》写得也很有意思，这样的把惠安女、泉州女的装束和已经很早的阿拉伯人相联系，好像并不全是张承志作为穆斯林的一种牵强附会的偏爱吧？

我一直带有几分怀疑还有羡慕钦敬的心情来看待张承志在大西北民众中的影响。张承志不管怎样说，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已经远离了当年充满激情的知青岁月。现在这样喧嚣的背景，这样功利的大潮，而张承志却能够在最为基层的自己视为手足的人群中得到这样的尊重和信任，是自己故意营造的虚假的深情大义吗？是自己自欺欺人的文学虚构吗？好像都不是。《盐官会》、《尺幅为伴》、《桃花面片》、《吊瓶子》这样的文字似乎不是职业写作者能够体验到的情感，也不是职业写作者能够表达的内容。这样的充满温情没有虚伪严守道义的交往，难道说只能在信教的民众中才能存在？

《谁为胜者》一书中，还收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散文，诸如《文明的入门》、《寺里的学术》等。这些文字恰也说明张承志在这方面的造诣之深，已经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在那里发言了。

一夜虽然无眠，但是心中一片澄明，真是一本让人感到过瘾的书。

不是范小青的《城市表情》

范小青有一部长篇小说叫《城市表情》，引来好评如潮。但这里谈到的《城市表情》是一部关于摄影师小传的书，与范小青无关。《城市表情》，看上去是一部很新潮时尚的书，甚至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一本关于不同城市的描述。选取不同的城市进行讲述也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不是有许多所谓的策划高手为了显示自己创意的高妙，经常会东西南北生拉硬扯地选取几个城市，来显现自己的所谓代表性和广泛性，然后自命非凡地以该座城市的权威人士文化象征自居，装腔做势地发一通怪论写几篇小文，就以为可以青史留名了吗？看到别人议论这座城市，便一百个不舒服，一千个不痛快，极其阴暗、狭隘地谩骂起来，愤愤不平起来，真以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了。在这样的时髦中，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当然是宠儿，也许还会选取莫斯科、马德里、里约热内卢来作为点缀，中国的城市，上海也许有份，而北京和广州可能就只是一种陪衬了。实际上，《城市表情》主要是讲述那些活跃在纽约、巴黎的摄影大师们的人生故事。这样的视角本身也许就有一种主观的选择，当然也很可能是现实使然。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大都市，才有诞生大师的可能？

纽约如同一个暴发户一样莫名其妙地繁华，巴黎虽然是雍容华贵

的老贵族但仍然难以掩盖她那无处不再的新潮妩媚，隔着一道海峡总是担心被人遗忘自己当年是如何尊贵的伦敦的落寞，其他还有诸如东京的嘈杂，莫斯科的狂热，战争状态之下武汉满目疮痍的废墟，在新世纪被称为东方的什么什么的上海的急切。她们的历史虽然千差万别，经历的沧桑也各有千秋，但是她们似乎成了文明的一种象征。在这些光怪陆离的大都市里，云集着形形色色的人，怀揣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在都市里漂流打拼载沉载浮。她们当中有政客、商人，也有乞丐、妓女，有媒体的记者，也有算命的先生，更有职业身份含糊不清的种种骗子、掮客。就是在这样的人潮汹涌之中，有一批人像大都市的旁观者一样，游走在都市的角角落落，用自己的摄像机捕捉着城市的种种细微的变化，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和行为纪录城市的变迁。《城市表情》实际上就是为这样的人们所做的一个小传。

这些人物，说句实在话，很难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摄影作品却让我们许多人不能不驻足流连，反复打量。打酒归来的小男孩的神气活现，周围小朋友羡慕的目光，这样的作品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温馨。有一幅日本军人空袭武汉后的作品，半跪在废墟旁掩面而泣的一位中国人，我们看不到这个人无助的眼神，但是我们感受得到他的心中所弥漫着的绝望情绪，也许还是一种愤怒的火焰。这位外国摄影家居然根据自己的角度拍摄了一个中国少年的照片。头戴钢盔的中国少年，透着一种无所畏惧的气概，让人们明白想要灭亡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西方的摄影师毕竟是另外一种文化背景和价值理念所支持。在他们的眼中，一些另类的边缘人物他们可能更感兴趣。车站地铁内的吸毒者，各种娱乐场所的性工作者，同性恋们的生活细节，特定人群的隐秘放荡的生活，挣扎在生存边缘的最底层民众的生活百态。不仅仅是偷窥和猎奇，不仅仅是一种居高临下地廉价同情。他们是时代的秘书，是生活历程中的清醒记录者。

可能并不是作者或者编辑者的一种偏见，在这样的为如此众多的摄影大师们树碑立传的文字描述中，我们会很自然地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和纽约、巴黎或者伦敦有关，而且能够称之为摄影大师的基本上也都是与这三座城市有关的人物。只有两个以东京为拍摄对象的日本人在这里露面，中国就显得更加可怜了，只有一个上海摄影师孤零零地混迹其间，叨陪末座。这当然说明这些城市不同凡响的魅力，摄影家们的作品所透露的种种信息，所体现出来的立场，胸襟和视野，也让人折服，同

时也让我们感到东方尤其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与西方相比不仅仅是速度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当然是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物质条件也大大地改善了，但是许多醉心摄影的人可能仅仅是出于陶冶情操的考虑。他们的作品，如果可以称之为作品的话，更多的是花鸟虫鱼小情小调。听说在北京有一个赵铁林，专门追踪当下三陪女的生活状态，我看过他在《光与影》杂志上发表的系列作品《白天不懂夜的黑》，可惜这个杂志不久就关门大吉了。我们这样剧烈的社会变迁本该产生多少令人震撼的大作品，本该产生多少可以和西方摄影大师比肩而立的真正的摄影家啊！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听赵恺讲书的故事

赵恺是著名诗人，虽僻居苏北淮安，但其诗名却远播大江南北。以前，读其诗歌，往往为其充沛的激情、铿锵的言词所感染，虽然接触不多，但他那爽朗的笑声，声如洪钟的嗓音，每每让人如坐春风，感受到诗情的浓烈如酒，醇厚悠长。

今年深秋时节，赵恺应邀赴波兰华沙参加在此地举办的诗歌节。全世界的诗人云集华沙这座饱经忧患与沧桑的城市，体验诗歌的尊严与厚重，探讨诗歌发展的走向和未来。来自遥远东方的诗人赵恺，行色匆匆中来不及放下自己的行囊，就要去叩问和拜访这座城市的灵魂所在，那是贝多芬的故居，居里夫人的故居，还有就是闻名世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因为今年是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更为重要的是，赵恺曾经牵挂的城市南京也有一座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这个城市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末期也曾经是血雨腥风赛过人间地狱。

赵恺这次来华沙还有一个特殊任务，一个和一本书有关的“重大使命”。

听说赵恺要到欧洲参加诗歌节，在赵恺生活的那座城市，那是个曾经诞生过韩信，也是曾经担任过二十六年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的故乡，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在忙于自己的生计之余，不能割舍的爱好就

是挚爱诗歌。这个生活在诞生过李白和杜甫的国度的年轻人，不是很富足，也不是很有这样那样的所谓影响力和知名度，但是却喜欢波兰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的诗歌。虽然现在中国人出国不算太稀奇，也往往是新马泰或者美国、加拿大居多，但是到东欧波兰却不是太容易，而去参加诗歌节，能够见到这位年事已高的在一九九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就更不容易了。小伙子心想何不让赵恺带一本女诗人的诗集去给自己签名留念？但身边找不到这本书，跑遍了淮安的大小书店，也是一无所获。

小伙子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他知道漓江出版社几年前出版过这个女诗人的诗集《呼唤雪人》，但是淮安没有，能到哪里去找这本书？而且赵恺的行程已经确定，小伙子想到了网络。他在网上开始了艰苦的寻找，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赵恺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呼唤雪人》还是千呼万唤没有丝毫踪影。小伙子很不甘心，简直是疯狂地在茫茫的网络世界里继续苦苦寻觅，最终山东泰安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网吧里的一位网友说，自己的小书店里有这本书。是真是假？会不会是一个玩笑？但是出于一个来自东方的年轻人对诗歌的不懈热爱和痴情，这个抱着一线希望的小伙子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连夜赶赴山东。

为了一本异国诗人的诗集，小伙子在苍茫夜色中从已经是深秋的苏北平原长途跋涉赶赴山东泰安。当书店的小老板把这本书交到小伙子手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小伙子来不及说过多感谢的话，也不顾饥肠辘辘，就又匆匆忙忙往北京赶去。赵恺这个时候还在北京等待着《呼唤雪人》的到来。小伙子气喘吁吁来到首都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赵恺已经起床准备着到机场赶乘国际航班。面对小伙子捧着异国诗人的诗集这样仆仆风尘而来，赵恺紧紧地抱着这位小伙子，仿佛捧着一个滚烫的心。

诗歌节上紧张而又忙碌。这样那样的论坛交流，还有别具一格的参观访问，但是赵恺时时刻刻惦记着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小伙子的重托，他让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把自己带来这本书的意图翻译给世界诗歌界的同行们。诗人们为中国小伙子的执著和热情所深深打动，他们纷纷在这本书上签名，甚至即兴写下美丽的诗行，就这样，波兰女诗人的这本书上有了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不同国度的诗人们用不同文字留下的语言。赵恺小心翼翼地带着这本书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

到了他生活的城市苏北的淮安。有人说，这本书已经具有了很高的收藏价值。也有人说，中国现代文学馆准备收藏这本书。但赵恺说，小伙子是这本书的主人。

请我们记住这本书的名字：《呼唤雪人》，还有她和一个中国小伙子的美丽故事。

印象周梅森

周梅森应该算是名气很大的作家了。名气大是因为他的政治小说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我们到外地去，聊起江苏的作家，基本没有人不知道周梅森的。周梅森名气大得有时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怎么对现实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和激情？他怎么会有如此充沛的精力来描画眼下的纷纭繁杂？他怎么会对现在的体制运作官场生态社会变革历史变迁如此敏感和执著？周梅森的长篇小说气势恢宏，尤其是对省市一级政治生态的表现入木三分，鞭挞一针见血，愤慨而不失理性，批判而留有余地，揭露但不一团漆黑。也许这些文本的存在会成为今后人们研究历史尤其是政治史的一种借鉴与参照？

如果说《人间正道》还算是牛刀小试的话，随之而来的《天下财富》、《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利》、《国家公诉》简直是汹涌澎湃难以遏制。刚刚看过周梅森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我主沉浮》，这部小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有两个：钱惠人和赵安邦。小说关于钱惠人私生女走失后被收容的议论，让人感到周梅森是非常关注现实的作家。他在小说结尾的议论，其水平似乎不低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导教授的水平。有人说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小说，它有别于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有人说这是新时代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在本质上

并没有摆脱昙花一现的历史宿命;有人说这是一种适应新的生态有别于传统意义的畅销书;更有人说,周梅森和张平、陆天明或许还有何申、关仁山、谈歌等人是把小说的技巧和主流的期待结合得比较巧妙实现了新的转型的一类作家。不管怎样说,周梅森已经成为这类作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备受瞩目,备受争议。

受到瞩目和争议当然是好事。有人说,作家需要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有人说作家需要炒作,酒香也怕巷子深。任何人,如果具备起码的清醒认识的话,都不否认现在是信息泛滥也是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在承认作家的才气、天赋、勤奋的同时,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作家的写作背景和他们的精神版图?更为重要的是作家们生存状况的彻底改变?仅就媒体来说,媒体的过度发达使一切都成为可能。由于网络,木子美的《遗情书》一举成名天下知。《中国农民调查》在艺术上是粗糙的,但是由于网络的传播,一直到目前这本书的盗版版本还很畅销。周梅森的小说借助媒体特别是超级媒体央视的传播使他名闻天下。这样的传播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会激发小说家的创作热情与旺盛想像力。

周梅森的走红也不是一蹴而就一鸣惊人。周梅森的小说世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板块:矿山系列,民国系列,现实政治小说系列。这三大系列,也许构成了周梅森丰富繁杂的小说世界。从矿山中的煤炭工人到似乎只有遥远记忆的民国军人,然后是八九年之后的大红大紫的政治小说,这样的大致脉络和写作走向究竟折射出小说家内心深处怎样的探索路径?这样的看似突兀的变化和调整究竟怎样来理解?周梅森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众所周知,周梅森来自于深受汉文化熏陶的徐州。徐州的水土和草木,徐州的矿山和矿工,对周梅森的影响是显易而见的。我们读他的《小镇》、《军歌》、《黑坟》,还有《沉沦的土地》、《崛起的矿山》,可以感受到他对矿山生活的熟悉,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理解的冷峻和深邃。在这些小说中,总有历史的背景来增添小说的神韵和幽深,有了历史的背景,似乎所有的事情就像老照片一样透出沧桑、沉郁和爽朗。

继矿工这一类小说之后是对民国军人的挖掘和拷问。《事变》中的人物是以我家乡的一个历史怪人别廷芳为原型的。因为这个人物,我也曾经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别廷芳是流氓?是无赖?是封建余孽?是书生掌兵一展抱负?仿佛记得"别司令"是被流弹打死的,但是这个人物的复杂可能超出了小说本身。周梅森的民国小说写到最高境界的

可能是《孤乘》，据说后来还有什么《落红》之类的，我不知道《天下大势》是不是原来的《英雄辈出》，但《孤乘》写得婉约而不失阳刚，舒缓而又激越，更为可贵的是人物充满了张力和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那样的合乎逻辑。

这样的两个小说板块的双峰并峙，大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结束。有人说那个时候周梅森的小说艺术性高，探索性强，但是那个时候的小说创作氛围决定了当时一些中篇小说的水准和高度，这一势头的终结也有历史的必然。据说，在经过《阙里人家》这个电影的小插曲之后，周梅森还拍过什么电影，是《绝境》？然后是商海沉浮，与现实的亲密接触，在这样的近距离的而非冷眼旁观的与现实的碰撞之后，短暂的苦闷、彷徨转为对时代大变迁的更加理性的观察和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之后，有了《人间正道》。我当时看到的是这部小说的打印稿，最大的感受是周梅森毕竟是周梅森！这样的大题材，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一定的语言训练，一定的胸怀和韬略是难以驾驭的。在这个时候，与周梅森实现成功转型的还有一个作家陆天明。我们知道陆天明的《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但是真正给他带来盛名的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实现了这样的转型之后，周梅森简直是如虎添翼，简直像变戏法一样以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震惊文坛。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小说几乎部部走红，构成了中国当下小说长廊中的一道奇异风景。

周梅森的这些政治小说，究竟有怎样的特点？可不可以说他的小说是直面现实的？近距离的表现现实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慧眼。有一部小说《华都》，自称写了九年，也是很现实的题材，但是整部小说，实在乏善可陈。作者似乎很有勇气，也想有所突破，可惜才力不逮，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只有很放肆的没有任何审美的写性。周梅森曾经有一个小说《此夜漫长》，是一部很有探索性也很有技巧的一部小说，全是现实中小人物家庭的悲欢，很有平民性。他的现实性吸引了众多眼球。周梅森的小说是气势壮观的。他的小说富有气势和阳刚之美，场面宏大，矛盾尖锐，冲突激烈，不是表面化，人云亦云。大小官员，社会各界，重大事件，繁杂人物，无不信手拈来。周梅森的小说是内涵丰富的。你很难说他简单地歌颂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周梅森就像一个时代的秘书，他冷静客观地记述，有所节制地议论。周梅森认为自己创造了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没有什么学历，但是却创作了这么多的长篇

小说；没有什么背景，但是在小说、影视等方面都能呼风唤雨，自己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人生传奇。也许周梅森的小说特点还能举出很多，但是在翠屏山宾馆召开的周梅森作品研讨会上，周梅森面对诸多评论家，表现得少有的谦和和温顺。我觉得一个姓岳的评论家的发言很值得注意。他说，周梅森是一个名作家，但还不是一个大作家，希望周梅森继续努力！

很偶尔能见到周梅森。他与我住在一个小区里。关于他的传言也很是不少，说什么的都有，不管怎样，周梅森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当年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住在兰园，谈论起来，慷慨激扬，指点江山，也许今天再也没有那样的情怀了。去年底的作代会上，六七年才开一次，周梅森虽然当选为作协副主席，但是在会上似乎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他也许真的很忙？

依旧当年赵本夫

媒体上已经在沸沸扬扬地宣传根据赵本夫的短篇小说《天下无贼》改编的电影。电影的导演是被徐帆认为天底下最好的男人大名鼎鼎的冯小刚，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也颇为强大和抢眼，葛优、刘德华、刘若英等人的名字本身似乎就蕴含着市场号召力和无限商机。回想起来，这部电影也真是好事多磨，嚷嚷了几年，总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了了之。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 2004 年的岁末，这部电影终于在全国各地可以公映了。

没有办法，在纯文学已经被远远边缘化的今天，纯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拿时髦的话讲叫吸引眼球，还真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帮衬。如果没有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高度商业化的市场运作，我们很难设想苏童的小说会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虽然他的小说在圈子里素有口碑。朱苏进的小说大家也一致叫好，但真正让朱苏进走向民间走出军旅的不是他的小说，诸如《醉太平》、《孤独的炮群》之类，而是他的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大家在可惜甚至担心朱苏进还能不能静下心来写小说哪怕是写出那些阳刚的瘦硬的散文，但是谁又能够保证写小说的朱苏进能够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像梵高那样穷愁潦倒？像莫扎特那样在维也纳的瑟瑟寒风中一文不名？在物质主义四处泛滥的

今天，还有人做这样的抉择吗？赵本夫，这个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凭借一篇《卖驴》而震动文坛的北方汉子，虽然一直在文坛顽强地思考着，认真地写作着，此后以《绝唱》、《涸辙》、《走出蓝水河》、《刀客与女人》、《寨堡》等作品在证明着自己的思考能力、表现能力和想象能力，但是从北方的徐州走向秦淮河畔的六朝古都，他如今在南京过得可好？在江苏省作协担任着一定行政职务的赵本夫还真的能够像已经去世的汪曾祺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依旧当年赵本夫”吗？几年前，不是有人在担心赵本夫“卖驴”之后还能卖什么吗？

带着这样那样的疑问，在深冬时节，也就是省六次作代会刚刚闭幕不久，我们来到玄武湖畔紫金山脚下，在一个静幽雅致的居所拜访了这位省作协副主席，同时又是省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赵本夫。

赵本夫家里的人们都有事出去了，暖暖的冬阳懒懒地透过落地窗照射进来，把赵本夫的书房烘托得阳光灿烂，洞明澄亮。窗台上的鸟笼里乖巧的小鸟很欢快地鸣叫着，绿得发亮的很茂盛的植物洋溢着勃勃生机，使人恍若置身明媚的春日。窗外是蓊郁苍翠的紫金山，这个充满沧桑的并不挺拔的属于江南丘陵的小山，在赵本夫深夜写作或者倚窗沉思的时候，不知道曾经提供了怎样的灵感？那个在小说《绝唱》中所出现的“一园翠竹，约半亩许”的旷远和超然还会出现吗？负有盛名的赵本夫依旧那样的自信而不失谦和，敦厚而又敏锐中透出阅尽岁月沧桑的平静和落寞，是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大气和宁静。话题很散漫地展开，也很自然地从《卖驴》谈起。有人说，《卖驴》这个小说当中关于那个北方老农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清脆悦耳的几声鞭响，简直就是一种千载难遇的神来妙笔，这种对农村生活的深如骨髓的了解和把握，这种让人精神昂扬一吐郁闷的果断的呐喊，完全可以和写《创业史》的柳青、写《红旗谱》的梁斌比肩而立。赵本夫对自己当年的这篇小说虽然很自豪，但是不愿多说，也许真的是好汉不提当年勇？

赵本夫到了南京后，成为作家协会的专职副主席。按照体制内的说法，也算是一个高级干部了，换了他人，赵本夫也许早就封笔了。繁重的行政事务，一切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更重要的还有迅速变迁的社会现实，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不到三十年的岁月变迁，出现了多少喧嚣一时的主义、主张？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曲曲折折？文坛上有多少曾经魅力四射的人物如今却悄无声息。当年和赵本夫一同走向文坛的名噪一时的作家们，还有几个能够坚持写作不断奉献作品？且不说这些作

品水平的高低，能够有勇气坚守可能都显得很悲壮了。但是赵本夫没有退却，没有放弃，到了南京十五载，寒来暑往，城头变幻，赵本夫在恪尽职守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文人情怀，从来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也许在局外人看来，作为作家，不放弃写作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吗？怎么会有这么艰难？但是稍具写作常识的人，就会明白，在这样的位置上，并不是闲云野鹤的你好我好哥俩好，并不是一团和气各扫门前雪的事不关己，他必须面对，他必须做出抉择，这也是许多很有才华的真正的作家面对这一困境手足无措最终放弃文学理想唯有随波逐流的原因所在。据说，胡乔木去看望季羡林，面对季羡林的成就，胡乔木显得很失落。季羡林看出了老同学的心病，就安慰他说，你做的是大事情，我的东西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胡乔木伤感地对老同学说，两码事，两码事，那不过是过眼云烟。赵本夫能够避免这样的遗憾吗？他能够做到游刃有余至少能够使自己的创作水准不至于过早地下滑吗？赵本夫的文学生命还能够走多远？

曾经读过赵本夫怀念汪曾祺还有艾煊的文字，文字虽然简短，但是字字珠玑，真情四溢，也能从中感受到赵本夫深埋心底的苍凉和寂寞，也许还有钢牙咬碎只能往自己肚里吞的承担？赵本夫很坦然地叙述着自己的日常生活节奏，对于文学思维和文学语言的坚持，对于公众话语的不是人云亦云的独立思考，让我们对这位从丰沛大地的摇篮中走出来的小说家更多了一份敬意和尊崇。说到赵本夫小说风格的变化，赵本夫说自己前几年写了两个长篇小说，《黑蚂蚁蓝眼睛》和《天地月亮地》，是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积累和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反复提炼，在自己诸多自认为非常扎实的中篇小说的基础之上，反复酝酿，呕心沥血，精心创作的恢宏长篇。这个系列涉及到人与土地、人与自然，当然还有人类的欲望，历史的洪荒，从近代到眼下，估计要写三到四部，曾经想过用《逝水》或者《地母》来涵盖这样宏大复杂的长篇系列，现在正在撰写第三部。赵本夫声称自己的写作还是很传统，仍旧坚持手写，但他并不排斥别的作家使用电脑写作，只是自己的喜欢而已。这样的面对稿纸，让自己有一种亲近感和写作的庄严肃穆，不是在码字，拿文学开涮，那种认为文学是妓女的时髦主张，那种主张下半身写作的喧嚣，只不过是一种浮躁和浅薄，没有必要如临大敌，也没有不要一惊一咋，都不过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泡沫而已，不变的是生活，不变的是最为本质的东西。

据说，现在的中国文坛，每天都会产生三四部长篇小说，而且这些

小说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自费出版。这样的数字真是蔚为壮观，而令人遗憾的是可以让人阅读的却凤毛麟角。对于其他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一些长篇小说的粗制滥造，赵本夫更多的是宽容和理解。赵本夫说，所有的作品究竟是不是精品力作，是不是传世之作，都不是自封的，都需要读者的认可和时间的检验。大仲马的东西那么好，影响力那么大，但在当时的法兰西，却很吃不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下里巴人。也就是在希拉克当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大仲马才被允许进入法国的先贤祠，算是被确认为法国文学的经典。如果我们耐不住寂寞，随随便便地像商人一样期望利用自己的小说来达到这样那样功利性很强的目的，那是对文学的亵渎。我们多少很有才华的作家，由于迫于这样那样的压力，去迎合一些政治口号，完全放弃自己的思考去进行所谓的紧跟，结果时过境迁，就这短短的几十年，都成了废纸一堆。这样的惨痛教训，我们难道见到的还少吗？当然，那种自命清高，脱离生活，孤芳自赏地玩一些小技巧，弄些小情小调的东西偶一为之，无可厚非，但也绝对不是文学的主流。主流的东西还应该是现实主义的东西，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赵本夫觉得，作家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作品当然未必是越多越好，首先要保持一个作家清醒的头脑来观照这个大时代的沧桑巨变。赵本夫觉得自己的长篇系列不会急急忙忙地出手，慢工才能出细活，从从容容，不必为了什么奖项，也不必去急着申请什么资助。这样的写作，纯粹，简单，虽然辛苦，但是没有额外的心理负担，这种状态，很好。

在惨淡经营自己长篇小说的同时，我们注意到，赵本夫的中短篇小说越来越炉火纯青，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天下无贼》这样的小说题目就足以让我们反复玩味。那样简单的情节，那样简单的结构，但是我们面对傻根这样善良得有点迂腐，纯真得近乎让人难以理喻的人物形象，无法去调侃这样纯朴得像泥土一样的兄弟。赵本夫觉得文学要给人以希望，还有力量。在他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坏人，任何人都有存在的理由，看待任何一个生命的存在，都不能简单化，更不能脸谱化。赵本夫总是愿意从善良的角度去发掘人性的光辉，但这样善意的表达绝对不是廉价生硬的光明的尾巴。记得在夏坚勇的《旷世风华》作品研讨会上，赵本夫曾经说过，现在是一个多变的迅速转型的时代，许多事情的发生令人无法用过去现成的理论来解释。作为一个有出息的作家，面对这些潮起潮涌，更要有自己的悲悯情怀，哪怕是简单的一个社

会新闻诸如有的女孩子为了给父母治病而在媒体上刊发广告出卖自己，我们作为作家究竟从中看出了怎样的人间冷暖和隐藏其间的悲剧意味？理解了赵本夫这样的思考，我们就不难解读他的小说《市长与鞋匠》，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切入点，但是却蕴含着非常宏大的主题，两个人物的人生沉浮，世态炎凉，让人扼腕叹息，而最终的归宿和结局又是那样的令人遐想。我曾经很好奇地问赵本夫，为什么会想到要在小说中起一个“四眼井”这样的地名？是不是我们这样焦渴的时代太需要清澈的井水来滋润？在熙熙攘攘的滚滚红尘中，有多少人走破了自己的鞋子？有多少人丢失了鞋匠的本色？这样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名称却承载了怎样丰富的意象，寄托着作家多少对淳朴敦厚的流逝岁月的留恋和缅怀？

也许是构思小说之余的一种消遣，也许是在创作长篇小说漫漫苦旅中的一种小憩，赵本夫偶尔会有一些小散文给喜欢他小说的读者带来惊喜。这些小散文，一改时下诸多小散文的无病呻吟，花花草草，也不是故作高深的所谓大散文、文化散文，来卖弄一些典故，兜售一些知识界的常识，还觉得是自己多么了不起的一种发现，最后再令人肉麻地来几句感慨。赵本夫的散文贵在有情，这些情感不是很直白地展现，而是透过纯朴的近乎白描的语言娓娓道来，会让人感受到文字背后所传递出的力量。

赵本夫爱下棋，他对足球有很专业的见解，这是圈内人都知道的。在雅典奥运会期间，赵本夫有一篇小散文刊发在《解放日报》的“朝花”副刊上，这篇散文唤作《母亲的奥运》。不到一千字，写母亲对奥运的关心，写母亲朴实无华地对奥运冠军的赞扬，写母亲在奥运期间对全家人的照顾。读着读着，我的眼睛潮湿了。读这样的散文能够掉眼泪，能够让我们在乏味枯燥甚至是无聊的现实纷扰当中体会到一种最为本真的情感，最为无私的圣洁的慈爱。这样的文字，如今是越来越稀少了。已经是深冬时节，转眼就是旧历新年了，赵本夫曾经写过一个小文《过年的滋味》，写过去的岁月里，身为一家之长的自己排队大半夜才买回来一大块猪头肉，面对嘴馋的孩子自己的矛盾和辛酸。没有莺歌燕舞，没有毫无节制的煽情。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怀旧，这样的留恋，也许会让人更真实也更认真地对待自己未来的日子吧？

赵本夫目前还挂着大型文学刊物《钟山》杂志的主编。赵本夫虽然不过问具体的编辑业务，但是他却以自己的敏锐目光和文学理想为这个

文学重镇尽着自己的心力，自己的本份。面对喧嚣浮躁的文坛，五花八门的这样那样的主张，有形无形的急功近利的算计，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赵本夫为杂志提出了"原创、拒绝、远行"的主张，虽然只有看似简单的六个字，但是仔细掂量，每个词组都可以写出洋洋洒洒的文学论文，每个词组后边都渗透着一种守护文学精神的坚韧和孤绝。赵本夫坦言，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文学理想的期许，更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也许永远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访谈将要结束的时候，赵本夫很有兴致地让我们看他从敦煌带回来的一对马镫子。马镫子上的图案古拙浑厚，静默无声，这个看似冰冷的铁器究竟传递了怎样的文化信息？他会把赵本夫的思绪引向何方？对这些旧物的痴迷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收藏的雅好，这不也正说明赵本夫依旧是作家本色吗？据说，在刚刚结束的作代会的选举中，赵本夫是唯一的全票当选者。

告别赵本夫，已经暮云四合，倦鸟归巢。汪曾祺老先生说得没错，相逢屠狗毋相讶，依旧当年赵本夫！

此身只合江南老

《宋词诗词集》这本宋词先生用心血写就的诗词集放在我的书架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应该是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宋词先生送给我的，我早就想为这本书写点什么，但是每每读来，都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难以以平静的心情来面对这锥心刺血的非同平常的诗词集。

我虽然很早就知道宋词先生的大名，但是并没有把他和中原故土几乎妇孺皆知的《穆桂英挂帅》联系起来。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为一个老乡的琐事，宋词先生表现出来相当的热心和主动，让我这样的后生也深受感染。那件事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虽然没有取得很理想的结局，但是我和这位文坛老前辈的联系却多了起来。

《宋词诗词集》所收集宋词先生的诗词从四九年到九四年，整整四十五个春秋，共分为《粉黛集》、《风雨集》和《余情集》。在这样的岁月变迁中，宋词从一个翩翩锦瑟华年的少年消磨中成为一个花甲老人，多少青春年少的浪漫多情，多少在大时代面前的热血沸腾和青春狂想，舞榭歌台，寻常巷陌，粉黛中的真情寻觅，现实中的反躬自省。诗词是历史的见证，心血的苦吟，注释更是沧桑的写照，心底的咏叹。对严凤英的痴情，为马金凤写《穆桂英挂帅》的豪情，还有结识王兰英乃至最后结为夫妻的定情，真是花样年华的真实写照。但是，这样的少年情怀伴随着

政治风雨的突如其来都变得晦暗不明了。最为哀痛的可能就是《风雨集》中的词作了，拿宋词先生的话来说，“血泪之作，或吟于蒙罪毁家身败途穷生离诀别之时，或吟于严冬酷暑雨打风吹劳苦耕作之际；或吟于荒野茅屋冷窗昏灯凄绝断肠之夕，或吟于鞭抽笞责抚伤抹血囹圄严禁之境；或吟于湖山漫野酒楼买醉寻踪忆旧之地，或吟于沉冤难辨抛妇离雏困居囚室之中”。十六年的风风雨雨中令人感慨的是从七七年到八四的八年间，按说这八年间的宋词日子应该好过一点，但是没有，当时有些人仍在一手遮天地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人进行无端压制。

《宋词诗词集》中我最喜欢的是《金缕曲》，还有就是生动传神的每首诗词后边的小注。这些注解坦荡真诚，直抒胸臆。有些看似简约的文字后边有着相当丰富的内容。有人说，宋词先生的诗词集可以看作是江苏文坛的一种简史，我想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吧。很可惜，由于宋词先生一生坎坷，他的诗词应该由懂行的人制作成线装书来细细品味，但是这个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诗词集装帧设计很糟糕，最为莫名其妙的是不伦不类的总序和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差错。但愿将来这个诗词集有重版的机会。

好在岁月有情，宋词先生的晚年虽然经历过两次大病但都是苍天有眼有惊无险，现在的日子还算清静安闲。宋词先生健谈好客，乡情浓烈。他经常自称是寒士生涯，非常达观。有一次，白桦先生到他家做客，宋词先生约我去见面，在两位久历沧桑的老人面前，我诚惶诚恐地听他们畅谈对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回忆，对沧桑人生的感悟，对自己命运沉浮种种细节的回味，对度尽劫波后的释然，对经过岁月洗礼后的友情珍重，没有颓唐，没有世故，没有怨天尤人，仍旧是心雄万夫的壮怀。他们谈论胡耀邦作为党的领袖的种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感人细节，动情处，两人泪眼朦胧，情难自禁。白桦白发满头，但是身体硬朗，面色红润，豪情不减当年；宋词声音朗朗，字字珠玑，快意恩仇仍见铮铮血气。愿他老人家在安享余年的同时，力所能及地留下风骨凛凛、洗尽铅华的性情之文。

北方的老槐树

又是一年春草绿。窗外的桃花开得正灿烂热闹，枯荣似乎无关人们的心境。想起张中行先生这样一个淡泊的文化学者，一个默默的文化人就这样悄悄地去了，虽然走得安详自然，但还是有人生无常的惆怅萦绕心头。

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的西郊，似乎很突然地纷纷扬扬地下起大雪来，雪花飞舞，铺天盖地。令人奇怪的是，太阳还挂在空中，似乎在看雪花的狂舞飞扬。在北京植物园内，有据说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几排类似四合院的平房，灰瓦青砖，非常的平民化，只是门前的古槐向今天的人们显示着岁月的流逝，还有沧桑。图片很多，描述很多，后人的附会也很多，不是许多所谓的红学家正在热火朝天地为一个江郎才尽的小说家难耐寂寞地杜撰所谓秦学而正在摇唇鼓舌争得面红耳赤吗？在这里看到的东西，似乎还是周汝昌多年以前的发现，在一堵墙上，居然还有邓云乡的诗句。残雪在墙上显示着自己的存在。门前有一丛翠竹，翠竹之上是刚刚积下的瑞雪。在这样寒冷的早春时节，当年穷愁潦倒的曹雪芹写作之余如何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京华遥遥，不要说喝茶饮酒，和附近的村民们能够有多少可以共同诉说的话题？敦诚敦敏兄弟也不会经常来光顾吧？寂寞的曹先生四十多岁就撒手人

寰,留下残编却让后人至今仍旧争论不休。这样的争论还会很热烈地争论下去吧?曹先生生前不谙生计,身后却让这么多人有了饭碗,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离开曹雪芹的纪念馆,信步走来,风雪更下得紧。在阔大空旷的园子里,居然有类似烽火台的建筑,不知道是过去原有建筑的遗存还是现在重新构建的伪古董,不管怎样还是散发出一种悠远岁月的况味,让我们的思绪很自然地想到多灾多难的京华旧事。黄仲则当年在北京不也是彷徨无助最后客死三晋吗?龚自珍在北京最后急急忙忙落荒而逃,现在还是一个谜,北京为什么会让他这样走得落魄而仓皇?翁同龢告别北京的时候,一定想到了自己父子几人惨淡经营茹苦含辛的不易,但是自己现在就这样告别紫禁城实在是有满腹的无奈和委屈,翁家何时才能东山再起?

在从南京来北京的飞机上得知张中行先生去世的消息。张中行先生看上去就是一个有点木讷的厚道人,这样的老先生不是才气横溢张扬狂放类似于郭沫若的人物,不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很会来事的文坛混混,也不是剑拔弩张刻薄尖酸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目中无人者,但是他的沉默他的寡言他的在学问之途上厚积薄发的实在功夫,却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看北京的媒体都在津津乐道他的淡泊他的婚姻还有所谓的"未名四老",许多话听起来实在是不舒服。杨沫曾经是她所挚爱的女人,但是后来的分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知道《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这样的形象虽然仅仅是有张先生的影子,但也似乎是一个包袱。有人说,张先生一直采取了沉默的态度。但是羊急了也会咬人,据说张先生生前曾经有过很长的访谈来为自己辩诬,这样的长篇文章据说还给张先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张先生决不屈服,也不愿意就此事违心地一笑泯恩仇。但是有一点还是很明白的,那就是在杨沫背运的时候,张先生并没有恶语相向,落井下石。倒是杨沫的儿子老鬼最近写了一本畅销书,尽述自己母亲的种种,甚至把自己母亲和其秘书私通的事情也都抖落出来了。张先生和杨沫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张中行,好事的记者采访这位女士,她实际上和张先生的感情已经很淡漠了。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

有人说,张先生像北方平原上耐旱而又顽强的老槐树上的槐花,朴素,平淡,但是细细品味,香远益清,沁人心脾。据说,张中行先生也曾

经有过在故乡香河盖几间瓦房的愿望，自己百年之后可以捐出去，当地的文联似乎也很热心，但是一些狂妄无知的主事者觉得没有多少招商引资的价值，也就冷冷地赴宴，不置可否，张先生只能作罢。我想，多年之后，大家还会提到张中行这个文化老人，虽然他成大器也实在是太晚了一点。但是他的“负暄三话”、《顺生论》、《流年碎影》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益显现他们的文献价值和文字魅力，也许不亚于明清之际一些坚守节操的读书人的笔记小品。

到成都访流沙河

虽然多次念叨过成都，也在流沙河还有《三国演义》的文字中亲近过成都，但是真的到了成都，还是有点恍若做梦之感。这就是我脑海中的成都吗？这就是成就了许多英雄旧事的天府之国吗？峨眉山的雄奇神秘，都江堰的巧夺天工，三星堆的深邃悠远，和这座城市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当年的民国时代，以成都为舞台上演了多少鸿门宴又有多少风流人物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刘文辉、刘湘叔侄不去说了，还有什么杨森、王陵基、邓锡侯等，真是"英雄"辈出的乱世纷纷。但就是在这样的所谓军阀当权的时候，成都这样的城市不还是养育了许多颇有风骨的文人吗？比如刘师亮等。

也许是来去匆匆的缘故，很遗憾没有看到太多的茶馆，没有听到太多的字正腔圆的川语。一样的车流滚滚，一样的千篇一律毫无特色更谈不上个性的建筑，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的名气固然很大，但在蒙蒙细雨中的走马观花，还是感到沧海桑田的不可抗拒。我们所纪念缅怀的人物当然自有道理，但是又有多少历史存留挡住了人为的破坏和岁月的风蚀？夜宿金河酒店，也是急如星火地去了三星堆。三星堆真是很值得流连忘返的所在，面对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种种神奇造化，我们在表示惊叹和仰慕的同时唯有无言的沉默，面对祖先的如此灵秀卓越大气

磅礴，我们能够说什么？

但我惦记的还是能否见到流沙河先生，能否得到流沙河先生的墨宝，这样的文化老人毕竟是见一次少一次了。与龚明德先生联系，龚先生非常热情，也很热心地为我张罗着联系。是在锦里西路的一个茶社边上吧，龚明德先生带着自己的马上要读高中的侄子，还有傅天斌先生，付刚先生，都是成都很热心读书的朋友。尤其是付刚先生，据龚明德先生介绍，是一个“裁缝”，但对读书很有心得，也很执着。傅天斌先生在经营“毛边书局”，他还带了我的几本小书让我签名，真是愧不敢当。大家喝着茶，漫无边际地聊着，不知不觉已是凌晨时分了，龚先生说明天还要去拜访流沙河先生，我们就散了吧。

次日，和龚明德先生会合，就直奔大慈悲路。流沙河先生在家等候，还是那样的清瘦硬朗，还是那样的神采奕奕。稍作寒暄之后，我细心打量流沙河先生的家，真是清洁雅致，书香怡人。虽然没有很大的阳台，但是女主人吴茂华女士却精心养了不少的花草，青翠恬淡，不事张扬，一如主人那样淡泊随和，独立傲然。墙壁上有流沙河先生的墨宝，好像是赠给自己妻子的，可以感受到流沙河先生不服老的青春活力。流沙河先生兴致很高地谈到佛教也许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传到中国了，而不是传统说法的在汉明帝的时候。他让龚明德先生帮他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刚刚重印的一位研究西周史学者的书，自己印象中在乡下作木匠的时候读过这本书，想看个究竟。流沙河先生说自己最近看书太多，眼睛有点吃不消，有点发红。流沙河先生对南京的读书人群体印象深刻，一一提到这些人的名字，还提到《开卷》的品位和未来的命运。告别流沙河先生的时候，流沙河先生在他新出版的《老成都》上为我题字签名“振羽发声清亮可听”，吴茂华女士主编的《流沙河短文》，流沙河先生也给我签了字。面对流沙河先生这样的鼓励和馈赠，我唯有连连道谢了。告别流沙河夫妇后，龚明德先生说，有一次他陪同一个宣传部官员来拜见流沙河先生。谁知不到五分钟，流沙河先生已经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弄得大家都很尴尬。流沙河已是近八十岁的人了，但在《文汇报》上开的专栏还是那样的辛辣幽默，入木三分，处处闪现着青春的活力。

下了楼，正在兴奋地议论着这次拜访的收获，却见一个留着小平头满身穿着黑衣服的汉子走来，龚明德说“巧了，雷雨，这就是冉云飞”。稍作介绍，冉云飞手上拿着一本江苏南通的作者刚刚给他寄来的关于

陈独秀的书。下着小雨，正是午饭的时候，大家便到附近的小饭馆去吃饭。冉云飞很健谈，也很有个性，论到成都文人，谈起当下思潮，颇显成都文人的豪迈和生气。他谈到一个唤作王怡的学者，认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黑马”。

有人说，成都文人中有“四怪”，即流沙河、魏明伦、龚明德、冉云飞是也。这次到成都，“四怪”见了“三怪”，虽然没有去峨眉山，没有看都江堰，没有上九寨沟，但我还是觉得收获不小，不虚此行。很遗憾的是，在飞机上看《流沙河短文》，也许是过于兴奋了，看书中关于龚明德、冉云飞的描述，看流沙河先生那些隽永耐读的文字，真是感慨多多，浮想联翩，谁知道，竟然把书丢在了飞机座位上，是南方航空空司的飞机。那可是流沙河先生的签名本呀，真让人心痛。

读《后读书杂志》兼怀徐复先生

得知徐复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在很偶然也很突然的情况之下。当时，我在石子岗殡仪馆，正在向一个很年轻的生命作最后的告别。这个女孩子，是我的中学校友也是同乡，事业刚刚起步，还有很多梦想等待实现，来南京看病也是充满信心，情绪不错，也很乐观。谁料想，半月之后，却阴阳两隔。由于她的居住地离南京路途遥远，办理后事，诸多不便，我当然义不容辞要多做些细微之事，虽然这样的忙碌对女孩子来讲都没有意义了。在这样的场合，知道了徐复先生去世的消息。我非常希望能够见到徐启平先生，表达自己作为晚辈后学的一点缅怀之情，可又觉得自己毫无准备，这样实在唐突先生。追悼会上，徐先生弟子众多，全家人一定也心情沉痛，再去叨扰，于心何忍，只有在心里默默地对一代学术大师的离去送上自己的尊崇和钦敬。

我实在没有资格来谈论徐复先生。还是在六朝松下读书的时候，经常听郑云波老师谈到唐圭璋先生、徐复先生、孙望先生、吴调公先生，对那一代学人产生一种由衷的尊敬和仰慕。也是在只言片语当中，知道徐复老先生是知名的训诂学家、古文献学家，曾经参编过《辞海》、《汉语大词典》，还曾经是中国训诂学会的会长。知道他老人家的女儿主持过当年还算很有读者的《服务导报》的“随园”副刊，办得很有生气和活

力。有时候想，民国时代许多大学教授不都是投身报业主持副刊的吗？这样的家学渊源，办出来的副刊果然不同凡响，徐复先生在随园待了几乎一辈子，这样的“随园”似乎天经地义的应该好读耐看。徐复先生的公子徐启平先生是我母校的老师，后来到母校的出版社任总编辑，虽然交谈不多，但是在有限的接触当中，总觉得他的谦和低调与他有这样的父亲难以分开。在南京的媒体上，看到吴金华教授的祭文，切实地感受到在这样的曾经的古都南京，在号称有一百多所高校的江苏，这样的一位老先生，生前在学术上有着那样的勋业，但是我们似乎轻慢了先生对中华学术的卓越贡献，“胸如海阔兮兼容九派，身比岳高兮自张一旗”，“千秋事业，历千劫而无恙；百年风雨，著百卷而不朽”。对徐复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无从置喙，只是在上海古籍书店淘得的老先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后读书杂志》，让我从很小的角度知道先生的学问功夫，真是“精研要籍，博览群书，以阙疑为乐；其作文也，眼高于顶，笔大如椽，以解惑为准”。

《汉书》中有“襄城无噍类”，颜师古解释说，“噍，无复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无孑遗为无噍类”。徐复先生则说：“说噍为噍食，系望文生训，噍当借为畴。古焦声、寿声字通用。无畴类，言殃及子孙也。子孙相继称畴人、畴官。”徐复先生还说明这是章太炎先生的见解。《汉书》陈胜传中有“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涉之为王沈沈者！’”前人解释说，沈沈是指宫室深邃之貌，徐复先生进一步解释发挥说，沈沈也借用为潭潭，韩愈《符读书城南》诗中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潭潭亦谓宫室深邃也。可见一阔脸就变，地位变了，级别变了，也就可以住很“沈沈”的“宫室”了，怪不得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如此强烈。《汉书》的苏武传中有“武引刀自刺，卫律惊，自保持武，驰召医，……置文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著名学者杨树达先生解释说，背不可蹈，况在刺伤时耶？蹈当读为掏，并且进行了认真的推理和论证，认为是“轻叩其背使出血者，虑血淤滞体中为害也”。而徐复先生则认为，杨树达先生不了解边地风俗习尚，也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这样的解释未免牵强。徐复老先生从《多桑蒙古史》中的记载“铁木真遇泰亦赤兀十二骑，铁木真独与战，敌骑十二矢并发，伤其口喉，痛甚，昏坠马。不儿古勒燃火热石，投雪于石上，引铁木真口，以蒸气熏之，及凝血出，呼息遂通”。徐复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边疆学校讲授《苏武传》时，联想到这一情况，认为“蹈其背”应该是“焰其背”，焰

在此为动词，正好与上文"置文火"的意思相承接。徐复先生很为自己的发现高兴。我们从这一生动有趣的事例中，既可以看出先生求知的认真，又可以凸现先生作学问视野的开阔。这样的思接千载融会贯通，实在是后辈学人应该牢牢记取的。《汉书》的霍光传中"黄肠题凑"语，古人的解释是，"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所谓黄肠题凑，是指用黄心柏木方材，一端向着墓室中心，平垒起来的一圈木墙，共用木方五千多根，这种结构，是汉代帝王死后的一种殊荣"。这样的规制，我在扬州的汉代墓葬中曾经亲眼见过，徐复先生认为应该是"累致棺外"。

从先生的《后读书杂志》中，可以约略知道他读书的广泛，从《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南史》、《史通》以及《老子》、《晏子》、《荀子》、《新书》、《盐铁论》、《论衡》、《潜夫论》到《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楚辞》、《陶渊明集》、《文选》、《文心雕龙》、《诗品》、《韩昌黎集》、《孙可之文集》，琳琅满目，令人兴叹。老先生在这些典籍中，考雅训，明代语，通假借，证实物，纵横捭阖，议论风生，没有冬烘气，倒有几分天真烂漫的让人亲近。

"名家易遇，纯儒难值。先生一去，仪型顿失。"真不知道，先生身后还会有如此学人来如此虔敬地守护我们的经典，解读我们的经典吗？

曲终人仍见

前几天有人从天津来，闲谈间问及天津卫的文化人，他们知道蒋子龙、冯骥才、马三立、范曾。也说起孙犁，他们则感到比较陌生：此人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忽然从传媒上得到消息，孙犁这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的文化老人在这样闷热烦躁的盛夏悄然辞世。媒体上自然还会有一番不大不小的热闹，但这样的热闹与孙犁先生已经没有关系了。记得当初南京的凤凰台饭店酝酿开个书吧的时候，蔡玉洗博士提出用几个有个性的文化人的书斋名为书吧的小房间命名，大家就提到了耕堂，耕堂就是孙犁先生。

平心而论，孙犁的创作实在算不上高产，不像当下的一些所谓小说家，一年一部长篇，文集的规模也很可观。孙犁与这些文坛的弄潮儿相比则落伍多了，也寒酸多了。但是孙犁的小说非常的精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如《荷花淀》、《山地回忆》，应该算是短篇小说中的极品。孙犁非常自负的是自己的《风云初记》和《芸斋小说》。记得当年上中学的时候，父亲给我们讲孙犁的《荷花淀》，白洋淀的旖旎风光，芦苇荡的神秘幽深，雁翎队的潇洒飘逸很让我们神往。印象最深的是冀中平原的农家女，在白洋淀中去探望自己丈夫的羞怯以及与日本鬼子周旋过程中起初忙乱最终镇定的心理变化，孙犁先生是通过划船时不同的水声来

体现的，这样的妙笔也唯有孙犁先生能想得出来吧。

孙犁影响的深远似乎更在于他在散文创作上的贡献。实际上他的一些小说也有很浓厚的散文味道，清新淡雅，质朴无华。但是我留意孙犁是因为他这样背景出身的作家却是那样的爱书成痴，嗜书如命，谈书如醉。孙犁进城之后似乎就不怎样张扬，低调待人，如老僧入定。他在天津卫更像一个闭门不出的隐者，自号耕堂或者芸斋，让人很容易想起写《聊斋》的蒲松龄，有点潜身民间、淡泊自守的味道。但是我们在他不算太多的读书札记、友人书简中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人对事的见解。身边有孙犁这样两本小书《书林秋草》和《曲终集》，前者是三联书店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与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陈原先生的《书林漫步》，黄裳先生的《榆下说书》，郑振铎先生的《西谛书话》，杜渐先生的《书海夜航》比肩而立，崖岸自见，摇曳于书林，非常让人羡慕。尤其是孙犁先生在该书中的"耕堂读书记"，涉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能静居士日记》、《缘督庐日记钞》、《西征随笔》、《太平广记》，还有《翁文恭公日记》。因为我曾经写过《江南彩衣堂》，对耕堂先生关于翁同龢日记的意见就特别留心。耕堂先生静守书斋能够耐得住寂寞读这样的书，真是了不起的另类书生，考虑到耕堂先生建国之前的经历，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更不容易了。

《曲终集》这样的书名很容易让人产生不祥的联想。"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耕堂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这样为自己的书命名，在悲观中让人感到耕堂先生的睿智和清醒。在这样的小书中，有小说、散文和杂文，而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耕堂读书随笔"、"耕堂题跋"和"芸斋短简"。在这样简约甚至是近乎散漫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孙犁先生在晚年还是那样认真的读《汉书》，作笔记，关于朱买臣、司马相如、班固、马援，耕堂先生都有自己的理解；《船山全书》、《清代文字狱档》这样比较冷僻的书，孙犁先生读起来却兴致盎然；《胡适的日记》、《高长虹传略》、《刘半农研究》这些书中所透出的可贵信息，孙犁先生都敏锐地给予评点；对自己的晚年婚姻，对自己善意批评别人之后所遭受的肆意辱骂，对贾平凹的《废都》，对铁凝的小说，耕堂先生都有平静从容的回应，虽然是寥寥数语，但往往一语中的，很见分量。

人总是要死的。孙犁作为上个世纪具有浓厚士大夫气息的从解放区走出来的作家，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旅程。不敢说作为小说家的孙犁有多么了不起，能够在文坛上处于什么位次，但作为散文家和读书人的孙犁肯定会屡屡被后人所提及所缅怀。

巴金留下的真空

得知巴金去世的消息，是在行色匆匆的旅途上。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回到房间，想到这位世纪老人波澜壮阔的一生，想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想到他当年承受的种种非人的屈辱，想到他晚年不遗余力地对文革的控诉，想到他的种种梦想和真诚，还是有一种大树倾倒的悲凉意绪满满地弥漫上来。

是在乡下读书的时候，虽然条件艰苦，但是父母还是想尽办法给我们兄弟几个找书来读。在漫长的暑假里，忙完必要的农活之后，硬着头皮演算完“鸡兔同笼”之类的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数学习题之后，最为快乐的时光莫过于读小说了。就是利用这样的时间，我几乎读遍了能够找到的小说、剧本，其中就有巴金先生的小说，感受着觉新、觉慧、觉民弟兄的命运起伏，震颤于高老太爷的权威，懵懵懂懂的会产生出诸多自己也难以言说的一个乡村少年郎的惆怅来。再后来，听到关于巴金的种种传言，而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语文报》上，刊载了几个迷茫的中学生给巴金的信。巴金这个一辈子追求光明和自由的人，面对中学生的困惑和求救，并没有摆出大师的模样唱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调，而是以一颗滚烫的心，来诉说自己的烦恼自己的矛盾自己的忧伤自己的坚持。这样洋洋洒洒的长篇回信，让我们这些挣扎在乡村偏僻学校的中学

生们，感到无比的温暖亲切，感到一种难以遏止的热流在胸间涌动。

到南京读大学以后，得知巴金曾经在南京读过书，而且读书的学校居然是东南大学附中。一想到鲁迅先生也曾经在南京读过几年书，而且还在读书期间不断地给自己的弟弟写信鼓励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鲁迅的弟弟后来服刑的所在就在我的母校边上，想到这些人物和自己生活的环境有着如此的一种关联，似乎有了某种可以向人炫耀的资本似的。也曾经想再认真地看看巴金的作品，比如《随想录》，还有《寒夜》，但是也许已经没有这样的心境了，总是读不了多少就放下了。几次去上海出差，也曾经起过拜见巴金先生的念头，甚至还想通过陈子善先生帮忙，但毕竟不是读大学时候的血气方刚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

有人说，巴金的东西文学成就不高，模仿的痕迹很重，这样的看法未免过于偏激了。巴金一生坚持写作，应该说还是无愧于他那个时代的。文革中的巴金受尽凌辱，但是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改掉，虽然他的名字是那样的敏感和令某些人不舒服。张春桥不是说，不杀巴金就是最大的宽容吗？我无意也无力在这样的小文章中来论述巴金的文学成就，但是巴金一生如一坚持真诚地面对读者，这样的作家如今恐怕已经不是很多了。也许在巴金以后，还会有人享受到现行体制如此高的礼遇，但是能够达到巴金这样的众望所归几乎是不可能了。

据说，巴金留下的空缺已经引起一些人在动心思了，有人建议让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来担当这一荣誉性的职务。这样的议论倒让我想起《南方周末》上对季先生的批评，说季先生是学者，是学术泰斗，但不是国学大师，他的主要成就不在国学研究上。但是又有一则新闻说，季先生成了“桂冠诗人”，这也真是很有意思的巧合。而曾经担任过文化部长的王蒙先生似乎也年龄不小了，但是否真的能够众望所归似乎还有疑问。几年前，刘心武说，王蒙就是当今的鲁迅，引起许多人的冷笑。哎，巴金走后留下的巨大精神真空填补起来恐怕还是需要时间的，巴金虽然不管《收获》的事情，但是他挂着这个名字，会让我们觉得心里踏实，文学还有一点点干净在。但是他不在了，《收获》会往何处去？

不管怎样，巴金的名字，也许还会被后人屡屡提起，巴枯宁的“巴”，克鲁泡特金的“金”，巴金，这样的极具个性的名字，还有他的作品和人格。

走坏了多少鞋子

听说赵本夫写了一个小说《鞋匠与市长》，心里还有点担心：会不会也是反腐败的题材？这样的一对人物，小说情节怎样展开？弄不好可能会戏剧化地失真，更何况又是短篇小说？哪有空间来从容展示娓娓道来？细细读来，这样的担心是多余了。小说不是丰盛的金陵饭店的豪华美餐，没有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热闹，没有故作热情的虚与委蛇，真是如同一壶陈年老酒，余香满口；又如一杯清茶，醇厚悠长。

小说所反映的内容似乎不是什么新鲜怪异的拍案惊奇，关于反腐败的小说也真是汗牛充栋了。这种小说的盛行让人在觉得理所当然的同时也总有一种瘪怪的感觉：腐败和罪恶是不是成了我们的消费品？耳熟能详的所谓反腐小说似乎都陷入了众口一词的模式之中，二把手在背后兴风作浪，经过有关方面的不懈努力，终于大功告成，腐败分子锒铛入狱。这样的作品，场面非常宏大，人物非常众多，似乎在追求一种所谓史诗式的传世名作。也有人写一些灰色的在官场中身不由己的小人物，由于这样那样的考虑，表现得要么失真，要么过于低俗，正面典型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反面的形象倒是血肉丰满。这样的效果也许有违创作者的初衷了。

《鞋匠与市长》和这些宏大的小说比起来就显得太小了，没有凶杀，

没有妖艳的女人，也看不到惊心动魄的黑幕。处于社会最底层边缘的鞋匠，用他的视角和眼睛来观察这越来越令人浮躁的滚滚红尘。鞋匠与市长地位悬殊，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会怎样产生联系？原来他们是小时候在一起下河捉鱼村边放牛的朋友。缘于命运的安排，在成人后的大千世界里，一个作了威风八面的市长，一个是似乎非常低贱的鞋匠。这样的反差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是不奇怪的事情，尤其在我们的吏制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小说没有在这方面做文章，大量的篇幅是在演说鞋匠的踏实本分和在冗常日子里的默默无闻，没有宏伟的抱负没有勃勃的雄心，就这样在一条小巷凭着自己的一双手虽然清贫但却舒心地过着平淡的日子。小小的纸片，听起来怪怪的三口井一号这样的名字，在赵本夫缓缓叙述中渐渐浮出水面来，几乎在小说结尾处才让人恍然大悟。小得不能再小的视角，普通得几乎不能再普通的人物却反映出如此沉重的主题，没有长久的涵咏静思，怎会有这样的匠心独运！赵本夫是因为《卖驴》而成为全国知名作家的，那虽然也是一个写于八十年代的短篇小说，但是在今天还是屡屡被人提及。《鞋匠与市长》中的老鞋匠，这样的人物已经很难成为当下小说家所关注的对象，但是在赵本夫笔下是那样的可亲可敬，更重要的是可信！

值得提及的是小说的语言，非常简约精当。不是绵密粗砺的狂放，不是晓风残月的婉约，而是平实质朴，澄明通达，尤其是小说结尾的那句话“他们的鞋子都走坏了”，看似通俗晓畅的大白话，但结合小说所营造的氛围和如今令人焦虑的现实中的种种，我们就会体味到这样含蓄的提醒含义深远。我们要问，有多少走坏的鞋子需要忠厚老实的老鞋匠来补啊？老鞋匠补得及吗？

石榴树上结樱桃

《石榴树上结樱桃》是一部小说的名字。小说的作者李洱和我的朋友孔庆茂是同乡而且同学。这个李洱，曾经出版过一部小说《花腔》，获得很高的评价，认为写得很智慧而且态度郑重。但是这部小说摆在身边多时，还是没有读完，不敢妄言。而《石榴树上结樱桃》则是很认真地读了一遍。

小说是直面现在的农村现实的。在传媒上看到好像是在华西，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门召开农村小说创作会议。对这样的会议，我们当然不能抱过高的期望。但它究竟能够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启示？难道还让作家等同于一些新闻记者、报告文学写手？似乎是今年的《随笔》第六期上有一篇鄢烈山的文章《西风残照说大寨》，虽然是一种走马观花的漫游性质，但是提出的问题思考的深邃却在在让人难忘。今年读这样的文章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石榴树上结樱桃》作为小说的名字，看上去很富有诗意，或者说很有乡土气息，田园风光，实际上却是小说家在向我们讲述着当下中国农村至少是中国中部农村部分地区所发生的微妙的缓慢的变化。变化自然会带来这样那样的许多问题，甚至是人们心理上的阵痛和折磨。但

也只能这样走下去,它也许是我们的本土化民主建设的别无选择的唯一出路。在李洱笔下,乡村政治家孔繁花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不要小看小小村庄的政治舞台,在这里边的刀光剑影静水深流远不是一些躲在大城市茶馆里喝着上等好茶的大师们所能够感知的。李洱把这样一位不同于李准的李双双也不同于山药蛋们的妇女形象,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农村女干部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这样的乡村女政治家面对计划生育、土地再分配尤其是围绕村子里的直接选举等等棘手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练达甚或有点狡黠,真让我们很开眼界。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机器内部有多少孔繁花这样的厉害角色啊!谁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孔繁花一手栽培之下的孟小红,也不显山不露水地终于把孔繁花这个女支书给"选"下了台,就像当年孔繁花把自己的前任孟庆茂"选"下台一样。

石榴树上结樱桃,有点出乎意外,有点让人没有思想准备,这样的变异也许太出格了,但我们是不是就因此而怪罪石榴树,把石榴树一砍了之?看来不行,虽然没有结出我们所期望的石榴,但是樱桃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甚至很有可能会因这样的变异,而创出新的物种来。我们还是要多研究为什么石榴树会结樱桃,不要怪罪石榴树。结了果子毕竟是好的,虽然这果子不是我们生活常识中所习惯的那种物种。

小说的语言轻松俏皮,非常贴切当下农村的实际。不要轻视农民的能力,他们的智慧,也不能浪漫地期待我们的乡土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够依靠"孟小红"的上台而一片光明。路还是漫长的,虽然我们已经慢慢缓过神来,方向和途径也模模糊糊地有点明晰了。

又是俗套的戏说

在媒体上看到朱苏进先生又有新的作品问世，感到很高兴。朱苏进算是在江南一带很有影响的作家了，不仅仅在军旅。他的小说以其独特的阳刚之美和少见的深邃大气打动了不少读者。他的《醉太平》算是直面军界高层矛盾的少见力作，这样的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骂大帮忙，也不是故弄玄虚的制造什么矛盾。他深刻地深入当代军人的内心世界，揭示种种错综复杂的心灵纠缠，不仅凸现功力的厚重，也有一种凄美的悲壮回荡其间。这样令人怀念的作品在朱苏进倾力涉身影视创作后就很少见到了。虽然朱苏进非常不屑地嘲讽和挖苦二月河先生，但是不管怎样说，在我看过他和子川先生合著的《江山风雨情》之后，一般常识提醒我，不要说二月河他难以望其项背，就是和许多人很不以为然的姚雪垠先生的《李自成》比起来，也是差之千里，不可同日而语。

有人说，《江山风雨情》是另一种文本的解读，是对历史的颠覆，是一种全新视角的观照。是这样吗？《江山风雨情》中的主要人物是太监王承恩，当然还有那个为后人所特别感兴趣的陈圆圆，反复无常的吴三桂。其他人物基本上都是陪衬。但是在我们的小说家笔下，陈圆圆摇身一变从秦淮八艳之一而成为扬州八艳。更离奇的是，陈圆圆的母亲

也曾是见过大世面的宫廷女人，陈圆圆的妈妈刚刚生下小孩由于没有满足大人物的愿望被一怒之下赶出宫廷。陈妈可能坐的是磁悬浮火车，很快就能够在被逐出宫廷之后带着孩子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烟花扬州。陈圆圆这样的高贵血统最终注定又回到了紫禁城内。虽是亡国之君但毕竟也主政十七年的崇祯皇帝总还有一朝天子的威严吧，而地位卑微的吴三桂竟然敢向崇祯皇帝索要这样的女人？崇祯在答应吴三桂之后居然又强奸了陈圆圆？王承恩可能是很厉害的角色，但魏忠贤的前鉴不远，猜忌多疑的崇祯皇帝能够容忍王承恩那样在洪承畴、杨嗣昌中间长袖善舞、位高权重吗？李自成这样的农民英雄现在对他更多的是一种负面的评价，但是不管怎样评判，能够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有些感叹并不是一味迎合，无病呻吟。但是，在《江山风雨情》中，李自成的流寇土匪嘴脸暴露无遗，高迎祥本来是李自成的长辈，在这样的小说中，两人却称兄道弟，如结义兄弟一般。明代藩王驻守何处，都有一定之规。福王却被作者想当然地搬到了凤阳。诛杀福王本是在洛阳，结果也就被我们的小说家理所当然地移植到了安徽的凤阳，和挖崇祯皇帝的祖坟连在一起。这样戏说真的是连起码的历史事实都不顾了。原来聚集在李自成身边的牛金星、李岩、宋献策这些读书人，都被矮化为不值一提的跳梁小丑。

现在翻案和戏说成为一种时尚。许多人都在议论《雍正王朝》和现实的关系，还有《乾隆王朝》不遗余力地为和珅这样的人物涂脂抹粉的深远用心，在《走向共和》中，光绪皇帝可以大骂翁同龢是老混蛋，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复杂背景。……但是不管怎样说，大多还有一定的依据，恪守一定的底线。我不明白《江山风雨情》这样的描写依据何在？

据说小说是根据电视剧本改编而成。我不清楚电视剧本的运作过程，但是作为小说来阅读，《江山风雨情》实在是相当糟糕与蹩脚的不入流作品。

『聊斋』现代版

很偶然的机会，看到荆歌新出版的小说《十夜谈》。这《十夜谈》和《十日谈》有没有关系？荆歌究竟要谈什么？

刚好在吴江宾馆内闲得无聊，就拿来乱翻起来。看过几篇之后，竟然不愿意丢下。这些离奇的甚至是残酷的故事冲击着我们，甚至有西方鬼怪恐怖电影的功效。但细细想来，我们的大千世界不是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故事吗？婚外情的扑朔迷离，冤冤相报的惊心动魄，"小姐"们令人心惊胆颤的对尊严的守护，还有作家寻求刺激东窗事发后的尴尬。凡此种种，简直就是现在的拍案惊奇。

现在的传媒实在是太发达了。发达的传媒为了吸引眼球，便不断地开设很吸引人的栏目，诸如"情感访谈"、"心灵热线"、第三者、一夜情是时髦的话题，也是最有情节的故事。这样的题目居然还催生了不少畅销书、畅销作家，不是有什么《天亮就分手》、《天不亮就分手》等很热销的书吗？但是这些东西，往往以纪实文字的面目出现，看多了，也就那么回事。不好说，荆歌是受这样的传播方式的启发，但是作为有一定思考能力也有一定的文字水平的小说家，继承中国笔记小说的传统，很有耐心很有眼光地讲好一个故事，应该算是一种文本的回归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谣。国家在如此强烈地推动着社会变迁

的过程中，对众多的小人物来讲，会有多少悲欢离合的创伤屈辱卑微的叹息椎心泣血的哀怨？这些可能是离奇的匪夷所思的故事背后也许隐含着我们难以体会的悲剧意味。在这个意义上说，荆歌所讲述的故事并不是纯粹地猎奇无聊地刺激，而是客观地记述，站在人性的立场之上所做出的时代纪录。

有一段时间，荆歌和我同在一个处所为稻粱谋。环境不是很熟，人与人之间也就很少言谈，荆歌就显得很落寞甚至心事重重的样子，常常是一个人默默地走路。喜欢胡乱读书的我，就经常和荆歌聊天。成长在苏州吴江的荆歌，似乎没有恬淡闲雅的兴趣，讲起话来似乎并不流畅，甚至还有些轻微的口吃，但总是很有激情的样子，声音很激扬，偶尔还有手势不停地挥来挥去。当时谈论最多的无非是文坛上的一些琐碎事情，看得出来，荆歌有很清醒的见解。当时，他的小说在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上不停地刊发出来，稿费单也就不停地寄来。当时荆歌的《画皮记》在《收获》上登出来了，很有点影响。

姑苏文风很盛，久负清名。不说明清，就是现代史上的一些人物，如柳亚子、周瘦鹃、叶圣陶、范烟桥、程小青等人，每每提及，往往有高山仰止的感慨。在郑逸梅、邓云乡等人的笔下，这些标准的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审美境界似乎都像一段传奇。不知道这些并不久远的文化存在对荆歌的写作有无影响，也许影响是遥看草色近却无的一种并非刻意的若隐若现吧。后来，荆歌告别了吴江的文化馆，成为专业作家了，我们的联系也就很少了，不过偶尔在某一家书店里，还会看到荆歌的小说《枪毙》之类的。听说，荆歌还在南京的《青春》杂志主持一个什么栏目，好像是聊天之类的，不会是讲《十夜谈》那样的故事吧？我想。

没有脂粉气的歌谣

我没有问张尔客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新作命名为《听老鼠唱歌》。但就我不算太落伍的阅读经验来看，读完《听老鼠唱歌》，我想起了孙甘露的《访问梦境》，想起了莫言当年的《透明的红萝卜》，甚至想起了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在面对黄香久的戏弄挖苦之后和一匹老马的漫长对话。这是一部完全超越我们的现实体验的充满神秘和苍凉，虽有红尘滚滚但是没有脂粉气的不无怪诞和异秉的歌谣。

老鼠这样的动物也许只有在东方这样的世界里才会被赋予如此丰富复杂的内涵和指向繁乱的象征？加缪的《鼠疫》传递给我们的是恐惧和厌恶，但是美国的娱乐大王们却把鸭子和老鼠如此风马牛不相及的生灵搅合在一起给世界人民尤其是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这样的快乐可能还会不断地延续下去。现在的大街小巷上不是在莫名其妙地流行着"老鼠爱大米"的吟唱吗？又有谁能够想到"五鼠"闹东京的侠义故事竟然会被改写成令人啼笑皆非的"爱情"闹剧？

但是我们听着张尔客笔下的老鼠给我们唱的歌谣，没有任何机智灵敏善解人意的乖巧，没有任何莺歌燕舞风和日丽的甜蜜，更没有老少咸宜其乐融融的和谐。充满沧桑饱经忧患的苦难土地，缺少的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缺少的是春风和煦歌声悠扬，不缺的就是诸如老鼠这样

的被我们诗意化的动物的大量繁殖蔓延。在中国北方的极为广阔的地域内，有一段时间，老鼠这一物种简直是疯狂地滋生，民间也因此愚昧地流传这是因为一个历史巨人亡故的结果。再苦难再贫穷似乎也抵挡不住老鼠旺盛的生命力和他们顽强的生存智慧。我们似乎看着一个敏感的神经质的甚至是病态的"我"，在情与欲的沼泽地里无望挣扎，在灵与肉的冲突中绝望彷徨。桑梓故园并不全是乡愁缕缕牵动情丝的思恋，并不全是相濡以沫共度艰危的心心相印，冒犯世俗的危险的难以启齿的乱伦情感，局限于小小县城乡镇甚至是偏僻乡村的种种风物，写尽的是龌龊肮脏苦难，还有冒险算计阴暗，更多的是寒风嗖嗖脊背发麻的苍凉。所谓故土的炊烟家乡的小河因老鼠的"歌唱"，则处处散发着令人绝望甚至是垂死的气息，这样令人窒息的压抑氛围唯一还算明智的选择就是逃离。逃离之后的生活并没有片刻的光明和辉煌，仍旧是陷入欲望之海的迷狂甚至是放纵。我们知道李斯的故事，这个来自上蔡的政治家在自己穷途末路的时候，最大的渴望就是做一只仓库里的小老鼠。到了这个时候，李斯哪还有做硕鼠的胆气？哪里还有当年捉弄韩非的得意？哪里还有陪伴秦始皇气吞山河的傲慢？当然，我们在《听老鼠唱歌》当中虽没有看到对政治的直接解读，但是对诗歌现状的愤怒嘲弄，对商业狂潮的深入骨髓的奚落，对纯真不再的深埋心底的伤怀，却四处弥漫洋溢。这样的在带着神秘和怪诞的气息中生长的也许只能是阴谋和诡计吧？

伴随着"老鼠"的歌唱，"我"来到了城市。如果说熟悉的故乡变成了陌生的面孔，河畔的杨柳低矮的茅屋成了水泥森林构筑的高楼大厦，但是怀旧和惆怅不需要挂在嘴边，环境的改变带来的是心理的更加成熟甚至是可怕的堕落。不要说什么城市精神的崇高圣洁，也不要玩什么后现代的虚伪和所谓的深刻。在听过老鼠唱歌的人看来，一切都是伪装，一切都是你知我知的自欺欺人而已。在这样的更加物欲横流的城市里，不再是小县城书店里和老板娘的旖旎风情，在这样的更加浮躁浮华的大都市里，爱情不过是遥远的童话，真诚和信任不过是弱智的喃喃自语，到处充斥的是交换互易和彼此心知肚明的狼狈为奸，除了男人的目光像筷子一样伸进女人的胸脯之外，我们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纯净圣洁的东西。歌厅里的迷狂酒吧里的轻浪男女相处时的打情骂俏，这样的醉生梦死最终还是让"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故乡的已经有点神情恍惚的姐姐，还有已经沉睡在九泉之下的父母爷爷。但是这样的对

故乡如果也算是精神故园的回望还能拯救听着“老鼠”唱歌长大的“我”吗？没有答案。作者虽然让“我”离开了这座城市继续流浪，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我”会是怎样的结局?!

读着《听老鼠唱歌》，我的脑海中思绪纷乱，亢奋异常。现实世界的苍白理性和秩序，精神世界的繁杂狂乱和多情，《听老鼠唱歌》虽然只有不足十二万的文字，却有着如此汪洋恣肆狂放不羁的精神放逐，如此激情充沛难以遏止的语言风暴，如此充满想象力的诗性语言的喷薄而出，如此可以超越世俗世界的侵蚀甚至是淹没而抱有对虚构世界的迷醉和神往，不能不使我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诉说神秘家族史时的聪颖和娴熟。我们知道描画眼下是容易的，报告现实是聪明的，困难的是我们能够怎样超越现实，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自己构筑的想象空间里自由翱翔，那是属于自己所纪实和虚构的世界。如果我们想到作者在现实中所承担的世俗责任和生活中至少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随意恬淡气定神闲，我们一定会深深地疑惑：文本中的“我”怎会保持如此的愤世嫉俗冲动叛逆？文本中的“我”怎会如此对生活一直坚持着冷峻的批判和独立的认知？文本中的“我”怎会如此地葆有倾诉的激越，还有就是我们早已久违的敏感多情？

我很少读诗歌，但是看到小说中充满着“春天已经近了树已经开始说话”、“姐姐的头发缕缕散漫如乱针般扎在空气里”、人在书店“在书的海洋里像两个表演直立的海豚”这样的句子，会让我们原谅也许是作者这样刻意为之：不在乎情节的逻辑展开，只需要自己情绪和意志的完整宣泄和流露。当然，小说中也有不少很有动感但也不无粗俗的比喻，这样狂放的带有愤青的语汇，我们在塞林格《麦田的守望者》甚至是方方的《风景》里也多少领略过。但是，走过《非鸟》，走过《听老鼠唱歌》之后，我们还是希望作者能够写出一些平和纯净优美的作品，来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多样性。

无节制的放纵

不知道这是在网上随意下载的文字，还是作者故意施放的烟幕弹？翻看着称之为《男人》的小说，虽然编者认为“这个虚拟故事好像不拿它当小说读更有趣些”，但我还是很疑惑：真的很有趣吗？

《男人》这本书的文字应该说还是很老到的，叙述的技巧，语言的风致，都具备了相当的水准。在小说节奏的把握上，看得出来，也不像是刚出茅庐的写作者所为。但是叙述这样的故事，展示这样的生活，津津乐道这样的所谓风花雪月，究竟有什么意义？在目前这样开放的急剧变迁的时代，我们当然不再是蒙昧主义者或者禁欲主义者，并不是像鲁迅所讥讽的那样，一看见女人的胳膊就怎样怎样，但是作为写作者可能是一种宣泄，可能是一种孤芳自赏，作为面向公众的出版物，这样渲染性爱的毫无节制，肉欲追逐的无所顾忌，请问：社会责任何在？

《男人》没有王跃文的《国画》那样深刻地揭示眼下小公务员的苦闷和浮躁，也没有阎真的《沧浪之水》那样宏观写实地表现在体制内挣扎的公务员的灵与肉的激烈冲突。这些小说，还或多或少有对社会的关注，对丑恶现象的鞭挞，对改变现状的热切，而《男人》则纯粹是一种放浪形骸，一种依红偎翠，一种在病态的自我想象中的自我意淫，就像韩少功所批评的那样，“这些写作者已经纯粹堕落为仅仅为金钱和自己的

感官刺激而不知廉耻的暴露狂和下三烂”。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叫张楚的“男人”，在自己的妻子生小孩的时候，和自己的小姨子私通。这样的私通，我们姑且不问其如此频繁的私下幽会的可能性如何，这样的明显带有自恋狂的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霸权，不仅让张楚和小姨子“如火如荼”，而且还有张楚的女同事“陈女士”、“小许”等。张楚的性能力真是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这个当今的“西门庆”，虽然没有贾平凹《废都》中的庄之蝶那样颓废，带有几分病态文人的放浪，但是周旋于这些女人之间，不仅游刃有余，而且兴致盎然，虽然有时候也多少有一点点自责，也不过是脑海里昙花一现的文过饰非罢了。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全部是围绕床笫之间来展开，除非是纳博科夫那样的高手，有很高的驾驭能力，否则很难避免不堕入自然主义的展示和低级趣味的把玩。小说完全靠这些东西来支撑能有多大的出息？小说最后不得不让张楚这样的“男人”出车祸而一了百了。莫名其妙的是，张楚这样的男人在自己的岳父、岳母还有妻子和情人（小姨子）跟前说黄段子的坦然和“风趣”，也许有一部分人群真的已经开放到如此地步？不是说有些城市已经有“换妻”俱乐部在悄然流行？张楚这个在机关里供职的公务员听说组织上让他写入党申请书，周围人的议论颇可玩味，什么“革命情书”，什么乱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这种拿严肃的政治话题乱开玩笑，让人觉得不是作者的“智慧和幽默”，而是层次很低的黔驴技穷的卖弄。有意思的是，小说的封面上说，“有些事情对有些男人，不存在不会发生，而是他在什么时候将发生，或者有没有条件发生”；而编者也不无暧昧地说，“你知我知，我有你也有，大家不说罢了”。原来张楚这样的“男人”还真是很有代表性的呀？

这样的小说，也许很有卖点，也许会有不太错的码洋销售。但这样的格调，这样的在华丽词藻和似乎很有品位包装之下的面对公众，这样的毫无任何责任感可言的满纸荒唐，这样的在商业利诱下的放纵，乃至放荡，会对我们的世道人心有何助益？

小艾和她的表哥

在七八十年代，可能很少人没听说过《金陵春梦》。正是由于这本书，我们才知道，蒋介石有可能是“郑三发子”，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许昌这样一座城市的郊区，居然还生活着一位蒋介石的“同胞兄弟”。这些话题的提出甚至广为流传，大概都是缘于这部小说。时至今日，这样的说法还有一定的市场，不久前，大象出版社居然为此还出版了一本貌似学术研究的图书，来研究“郑三发子”的真伪，似乎成为一门显学了。这些话题的产生，始作俑者，是不是《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先生，我们不敢妄言，但是关于蒋介石出身的沸沸扬扬，与唐人先生有关则是毋庸置疑的。

唐人的身世，我们无从了解，大概的印象，这是生活在香港的思想比较左倾的一个文人。在书摊上闲逛，看到别人乱扔的一本书《天涯沦落人》，署名“阮朗”。也许是出于推销图书的需要，出版者特意说明，“阮朗”就是“唐人”，可见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唐人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号召力的。应该说，书写得还是不错的，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女儿，在上海即将被解放的时候，和自己的母亲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还是去了香港。在那样的风雨飘摇兵荒马乱的背景之下，母女俩人到了香港先是寻找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屋漏偏逢连阴雨，她们的唯一指望

已经魂归西天。无奈之下，她们只得寄人篱下，苟延残喘。偶然的机会，这个唤作“小艾”的女孩靠着自己的天资和相貌作了电影演员。随后的故事我们大概都能想象得到，无非是被人包养身价百倍，无非是一举成名纸醉金迷，无非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小艾在这样的氛围中，还算是如鱼得水，但是她也目睹了所谓演艺圈的种种血腥黑暗，蓝蕉雨的自杀惨死，赵导演不同流俗的四处碰壁，黑社会的猖獗，情感的随便，艺人之间的相互倾轧，表面的风光背后的阴暗，小艾虽然好像还进入了国际影坛，但这样成功背后的酸楚似乎无人知晓。小说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形象即小艾的“表哥”，这样的“表哥”似乎很有点工人阶级的味道，也许是当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时髦。但是经过岁月的流逝，沧海桑田的巨变，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表哥”，能够给“小艾”安稳和妥帖吗？这样的“表哥”能够给予小艾在香港所得到的一切吗？小艾在香港的遭遇和经历好像充满了屈辱和辛酸，小艾的妈妈可能是最为势利和无耻的典型，为了荣华富贵，安乐享受，这个曾经受到过伤害的女人，只能把自己的女儿当作筹码来交易。唐人的初衷也许是揭露西方社会的黑暗，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之下，这样的揭露似乎显得苍白和无力。成龙也在外边有女人，但是我们似乎原谅了他，央视不是还把他选为感动中国的十大杰出人物吗？

我们现在不关心小说的质量高低，我们通过这样的小说来回味演艺圈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张艺谋、巩俐的婚变，林青霞嫁做商人妇的悲凉，张国荣的自杀，刘嘉玲的受辱，当然还有这样那样的绯闻，让人厌烦的八卦新闻满天飞，最为极端的莫过于张钰和黄健中之间的狗肉帐。据说，有一个省的电视台对这样的事情还兴趣很大，不惜出高价让这位很有心计的女子来现身说法。演艺圈真是进步了，当年小艾们的辛酸算不了什么，真是想不开！现如今制造绯闻已经成为扩大知名度必不可少的手段了。面对《手机》，崔永元的愤怒显得滑稽，崔永元当然缺少唐·吉诃德那样的悲剧意味，但是整个社会的沉默和对冯小刚一言不发的宽容，至少说明，演艺圈的堕落和传媒之间的勾勾搭搭已经到了让人无话可说的地步，小艾落伍了。

我们还想说的是，小艾如果和“表哥”在一起生活又会怎样？我们可以想得到的是，十年文革的疯狂，家庭出身的重压，还是走了的好，否则小艾的命运未必会像在香港那样，至少还有“成名”的机会。我相信抱有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张爱玲还是最终离开了上海，亡命海外。

苏雪林如果留在大陆，她的命运能比胡风好到哪里去？天涯游子的漂泊虽然免不了乡愁，但是和生存比较起来，还是做沦落天涯的游子吧。

有意思的是，张爱玲也有一个小说，名字就叫《小艾》。这个小说，叶兆言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曾经编辑过这部小说集，但是研究张爱玲的人似乎不大提这篇小说，不知是什么原因。

有多少记忆有多少文学

在媒体上已经看到了太多关于《借我一生》的议论，但大家的兴趣似乎还是聚焦在余秋雨当年在文革中的经历，还有就是他与一些人的笔墨官司，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文人的敏感、思考却似乎没有人去理会了。不知道这是作者的悲哀？还是媒体的势利？兼或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不幸？

应该承认，余秋雨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江南才子，在拥有上海人的精明的同时，以自己所拥有的生命体验和学术训练，也的确为新时期的散文写作带来了新鲜的东西。不承认这一点，不管不顾地揪住余秋雨文章中的诸如娥皇、女英究竟是舜的女儿还是尧的女儿，范仲淹是否到过岳阳楼等等这些枝节，大加挞伐，无限上纲，以显示自己的博学和高人一等，不仅有失厚道，而且也让人齿冷。

余秋雨能够在一个高校负责人的位置上急流勇退，义无反顾地投身对文化的考察，并且接连写出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化散文，就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确实技高一筹，不同凡响。盛名之下，众人吹捧，各种名缰利锁纷至沓来。余秋雨告别权力，行走在废墟荒垒旷野平川，其初衷本是为了摆脱所谓文化圈和权力场的干扰，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现在的大背景不仅不是当年李白、杜甫的山

河破碎，也不是梁启超、陈寅恪时代的内忧外患，更有别于梭罗那样的优雅清闲，我们已经进人了商业渗透无孔不人媒体疯狂铺天盖地的时代。余秋雨也许有点飘飘然了，也许有点过于自信或者自负了，这也是中国文人的一贯作派，在媒体上的频频露面好为人师被认为是目空一切的显摆，不乏真诚的反对盗版却被认为是斤斤计较的作秀，而面对一些血气方刚者或者动机不纯者的质疑和批评，余秋雨远没有当年在上海滩上鲁迅那样轻蔑的智慧和直面的勇气，拖泥带水的纠缠，含含糊糊的回避，结果造成谬种流传，越描越黑。在这样的悖论当中，就像当年的贾平凹被四周的一帮朋友所包围一样，余秋雨越来越显得焦躁愤激。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文明的碎片》招致了非议，这些非议应该说完全是出于善意，余秋雨也承认这本书的粗糙和不慎重。如果说读者对这本书的不满意在于他的重复，而《霜冷长河》就显得更失水准了。在这个时候，余秋雨更像是一个媒体明星文化商人，关于他的种种负面批评也就多了起来。撇开瞎起哄不论，这些批评难道没有半点可取之处？我们听到的是余秋雨一味地拒绝。

余秋雨不可能按照别人的意图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更不可能退回书斋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虽然有着无形的压力，但是应该说他的《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还是很值得一看，虽然远没有写作《山居笔记》时那样的从容大气了。但是让人感到惋惜的是余秋雨心境的变化和思考能力的退化，虽然文字更加娴熟，技巧更加高明，但是我们所渴望所期盼的思考的深度和高度却渐行渐远。也许真如媒体所言，《借我一生》是余秋雨总结性的封笔之作。对此，我抱有深深的怀疑，很难想象一个以文字为依托的人会这样决绝地割舍文字。但是从《借我一生》的字里行间，我们当然可以感受到余秋雨生活的家庭氛围，他的精神背景，父亲的冤屈和早逝，祖母的坚韧和博大，母亲带领自己在浙江乡下的经历，自杀的叔叔和表弟，自己所受到的高等教育，文革期间诸多细节的记述，凡此种种，让人大致了解了余秋雨的成长历程。洋洋洒洒四十多万字的记忆性文字，行文谨慎，真情弥漫。但是，对于自己的婚姻变故，对于自己的文革经历，总让人感到有点多余地闪避，不像周国平叙述自己的文革生活那样坦率质朴，这也许是性格所致，也许是余秋雨太在乎他口口声声的“金牙齿”们的阴冷？让人不舒服的还有他提到的一些在大上海的一些炙手可热、身居要津者对他的劝告，余秋雨以此想说明什么？

胡兰成的今世今生

伴随着宋美龄的别离人间，民国这个概念似乎真的开始要离我们远去了。但是民国人物，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还是会不断地被我们所提及。张爱玲的小说，多年之后，如此大红大紫，估计，连张爱玲本人也不会想到吧？谁又知道，在张爱玲身后，有一个唤作胡兰成的人？我们关于胡兰成的印象，完全来之于在大陆流行的关于张爱玲的传记。这些记述，实际上也多是根据胡兰成的片断文字敷衍成文的。但是，胡兰成文字的全貌，我们很难看得明白真切，除非是专门的研究者，谁有这样的功夫去图书馆费劲地查找胡兰成的东西？更何况，胡兰成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在历史上有污点的文人、不折不扣的汉奸。但是，胡兰成作为一个当年的汪精卫伪政府中的一个不算太小的人物，那样的职业怎会让他对张爱玲发生莫大的兴趣？而张爱玲如此孤高自许的人物，怎会看上甚至是膜拜胡兰成？

不断地在传媒上看到宣传胡兰成《今生今世》的文字，我原来以为又是一些无聊的所谓张爱玲的研究专家们胡乱编撰来赚钱的东西，根本没有太在意。听得多了，便耐不住好奇，还是买了一本来看。平心而论，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检验，民国的往事好像真的成了遥远的梦。作为局中人的胡兰成回忆自己的不算平凡的经历，虽然难以掩盖那种为自

己开脱的种种心机，虽然不无得意的细细讲述自己与那么多的女人之间的恩怨纠葛，虽然许多文字和用典我们感到生疏和别扭，虽然胡兰成的文字有过于甜腻妩媚的嫌疑，我们还是觉得单就《今生今世》来看，胡兰成还算坦率诚恳，没有概不认账的狡辩抵赖。假如没有胡兰成的所谓“民国女子”这样的文字，而张爱玲到了海外之后对这一段生活又是那样的讳莫如深，我们怎能了解张的另一个侧面？想来胡兰成当年的潇洒倜傥非同一般，儒雅风致也鹤立鸡群。否则，何以让诸多女人难以自拔，投怀送抱？我们无从知道与胡兰成有关系的那些女人的后来命运，当然，张爱玲是一个例外。张爱玲是因为自己特殊的作家身份以大量的作品而受公众的关注，所以，张爱玲之死很是热闹了一阵，这样的待遇可能还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觉得传媒给予张爱玲的待遇太高了，高的有些离谱了。张爱玲离开大陆的时候，也不过三十刚出头的年龄吧。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张爱玲去国之后，沉寂一段便嫁了一个比自己大许多的一个德国人赖雅，这个人据说还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士。张爱玲原来嫁了一个胡兰成，乱世奸雄，精明政客，现在又找了一个这样年迈的外国人，其特立独行真让我们看不明白。张爱玲死前有一张专门拿着金日成的画像拍的照片，她想说明什么？想表达什么？胡兰成认为张爱玲自私，但是胡兰成在武汉与一个小护士周训德热火朝天的时候，而张爱玲却被蒙在鼓里。后来，胡兰成亡命潜逃，避匿在浙江乡下，有情有义的张爱玲冒着危险去浙江看望胡兰成。这个时候，胡兰成已经和自己有点亲戚关系的范秀美同居了。胡兰成居然很气愤张爱玲的远道而来，据说还动手打了张爱玲。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张爱玲还是很认真地希望胡兰成在自己和那个小护士之间有一个明确的选择。张爱玲哪里想到，胡兰成在浙江用张嘉仪这样的名字已经蠢蠢欲动，正在和梁漱溟等人联系准备伺机复出了。张爱玲最后还是给胡兰成寄钱来，算是彻底下定决心了断这场孽情。胡兰成记述自己早年的生活充满真情实感，即使在广西的教书生涯也让人感受到当年知识分子生存的艰难，胡兰成坦言也曾经有过去当红军的念头。对自己的结发妻子玉凤，浪荡风流的胡兰成充满了真挚和眷恋。亡命日本之后，胡兰成仍旧絮絮叨叨自己和一日本的有夫之妇的勾勾搭搭，文字中间闪烁其辞，充满着虚伪和矫情。至于和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的沆瀣一气，则更是没有什么意思了。张爱玲向他借《战难和亦不易》和《文明的传统》等书，胡兰成表现得很暧昧也很放浪，但是张爱玲是再也不会理睬他了。

从胡兰成的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自己虽然对于女人如此随便胡来，但是胡兰成都表现出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坦率，没有当下一些无耻文人的虚伪。胡兰成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死于日本，我们无从知道那些留在大陆的曾经和胡兰成在一起生活过的女人们后来的命运遭际。张爱玲因为是名女人，所以她死在上个世纪的 1995 年，我们知道。胡兰成对自己的《武汉记》和《山河岁月》很是得意。在那样的乱世，胡兰成作为一个苦出身的乡下孩子，对自己后来的风云际会也很自负。觉得自己如果机会好或者运气好，会有一番更大的作为。这个人的聪明是可以肯定的。他到了日本之后，可能还写了《禅是一朵花》、《中国礼乐》、《中国文学史话》等书。胡兰成对自己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比较满意，尤其是《山河岁月》，胡兰成非常看重。但是《山河岁月》究竟说了什么？听止水先生讲，沪上的陈子善先生处有这本书，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够看到？

雅好古书李一氓

看到《一氓题跋》,忍不住地喜欢。李一氓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但是这样的背景却挡不住他对旧版图书的喜爱甚至是痴迷。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喜欢读书,写点小文章,再进而搞点收藏,玩点篆刻、金石,好像就是玩物丧志了。不说田家英的死于非命,陶铸的凄惨结局,也不说康生的是是非非,就是夏衍、胡乔木等人不是也招致这样那样的议论吗?

李一氓先生的《一氓题跋》最有意思的是他关于一些明清版本的题跋。这些文字,一针见血,干脆爽利,根本没有躲躲闪闪,欲言又止,褒扬真挚诚恳,批评鞭辟入里。如对《清康熙本黄山志略》的评价:"此本显系匆促编成,殊乏康熙刻本之规模,目次尤乏体系,编者自署'纸费居士',盖俨然为一书铺掌柜,意在牟利,聊充导游之需耳。"李一氓在《清同治本使蜀日记》的题跋中,对作者四川学政郭尚先忠于职守给予充分肯定。但是这样一个教育官员,却"所记简略,如考试,只记某县文风好,某县次之,而未记所出考题及有关考生考场等,以一四川提督学政大员,而不及四川政情及成都同官情况;对经济,则偶记一处物产、物价,而无较详之风俗民情"。这位学政大人的诗"率浅淡不可卒读,全无诗意。只过邛州时记文君井一则尚可一提:'文君井为前刺史蔡天藻堰

之，天下有如此杀风景事。'"实际上当今主政者如蔡天藻一样的官员真是多如牛毛，不可胜数。不知一氓老人如果健在，对这样的官员，又该如何借他人酒杯给以抨击？

题跋文字，看似简略，寥寥数语，实际上感情之充沛不亚于长篇大论的抒情挥洒，甚至更胜一筹。一氓老人代表国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布拉格肩负使命，异域他乡，百无聊赖，把玩《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阴云密布，时值圣诞节，甚寂，因记"。李一氓从郭沫若处借来的《孙膑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之二)，看过之后，题诗一首："兰台著录已茫然，断简重寻银雀山；幸有奇书能借读，老兵兴致跃当年。"郭沫若和李一氓都是四川老乡，地位也相当，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文革背景之下这种交往还是很有意味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郭沫若虽然极力紧跟毛泽东，但是他自己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不仅是自己的名节，还有儿子的生命。

李一氓专门提到《巴尔底山》杂志(旬刊)。这个杂志是在鲁迅的支持之下创办的，报头是鲁迅先生题写，也没有组织什么编委会，也没有明确是左联刊物，由李一氓负责责编。李一氓借此说明鲁迅和左联的关系并不是像所谓鲁迅研究专家们说的那样糟糕，"那种关系闹得僵的不能再僵的说法，恐未必然"。李一氓在《石涛设色山水轴》的题跋中引用吕半隐的诗："云气遥从泰岱来，大江南北接风雷。荀星夜傍江天炯，赵日冬临海甸开。笙吹缤纷扬州岸，铎车缥缈凤凰台。冰心漫道清如水，收得骅骝亦壮哉。"这里的凤凰台应该就是南京的凤凰台吧。

《西泠印社木活字本东海渔歌》是李一氓收藏的西泠印社一九一四的版本。曾经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先生藏有一九四零年的铅印本。《东海渔歌》是清代大词人顾春的诗词集，在李一氓的提议下，齐燕铭先生撰写了长跋，并对顾春和纳兰容若的词进行了相当内行的比较："容若词自秀雅，而太清之真淳本色，则非容若所及。况蕙风云，以格调论，似容若不及太清，可称说论。"顾太清为贝勒奕绘侧室，生于清嘉庆四年己未(一七八九)，卒年不详，估计在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之后。根据齐燕铭的考证，顾太春应该有在江南生活的经历。奕绘号长素，是乾隆皇帝第五子永祺的孙子，与太清同岁，卒于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府邸在太平湖，今中央音乐学院即其旧址。奕绘正室妙华夫人在一八二九年卒。奕绘死后，顾太春被谴出府，"七月七日先夫子弃世，十月二十八日奉堂上命，携钊、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

无所栖迟。卖金凤钗，购得住宅一区。赋诗记之”。诗中有“亡肉含冤谁代雪”句，亡肉含冤典出《汉书·蒯通传》，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以后邻母代雪，遂呼妇还。世传龚定庵事，涉及太清。这桩公案，我在拙著《龚自珍传》中已经说明。这种流言，实际上毫无根据，只是附会猜测而已。

李一氓先生还对《清乾隆本弹指词》，明万历、天启、清初活字本的《花间集》进行认真比较校点，这种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实在令人感动。李一氓收集有马克思、列宁的手迹，对朱德、陈毅的诗词，李一氓的评价都很有分寸，既不无端阿谀，又能视角独到；对阿英、邓拓、丁聪等人的序文，真挚感人，朴实无华，颇为老辣，处处洋溢着大气和洒脱。这样的文字之美来自于李一氓的阅历，也来自于他多年侵淫于旧版书所熏陶得来的心胸和境界。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西五台的阎锡山故居，看到李一氓的题字，在太仓张溥故居也看到过李一氓的题字。这些字放在那里，显得庄重贴切，并不是随便的附庸风雅，胡涂乱抹。

『书前书后』总关情

湖南出版界往往让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他们的一些书，不仅用脑子，而且用心，在读书界有着非常不错的口碑。已经故去的萧乾先生，曾经有一篇文章《湖南出版业三骑士》，那样的肯定和称誉令人感动，也令人嫉妒。在萧乾先生的这篇文章中，似乎就提到了钟叔河先生。钟先生的这本不到十五万字的小书《书前书后》，则是我在厦门的一家小书店里买来的。书是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小三十二开本，非常的素朴雅致，所收的都是短文章，读起来不费劲，从中可以看出湖南出版界在新时期以来不懈努力的一个侧面。

因为参与中国第十一届书市的有关工作，得以有机会去湖南学习其举办第十届全国书市的经验。流连在三湘的山水间，听着别有韵味的湖湘口音，关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还有胡耀邦、王震等政治家的种种趣闻轶事，让人产生诸多联想。写《庐山会议实录》的李锐不也是湖南人吗？大家也会提到曾国藩弟兄的功业，谭嗣同的悲壮，沈从文作为文人的幸与不幸。本以为熊希龄仅仅是一个匆匆忙忙的北洋时期的过客，让吴宓先生魂牵梦绕的毛彦文女士就是嫁给了这位熊大总理。原来他也是湘西凤凰县的，与沈从文还是亲戚，黄永玉与沈从文也有亲戚关系。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丁玲与沈从文的纠葛，当年是沈从文陪同

丁玲把胡也频的尸骨运回三湘的，这样的情义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最后弄得彼此不仅关系疏远，而且讲出来的话非常伤感情。两人都已作古，而两个人之间的是非可能还会被议论下去。在长沙，与王跃文闲聊，知道他压力很大，这种压力是一种无形的精神上的令人疲惫和难以言传的冷落。他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要比《国画》温和，还是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梅次故事》。这两本书的影响都不小，也备受争议。唐浩明作为湖南人，应该说对湖南的近代名人的广为人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曾国藩》这个三卷本长篇小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出版，不仅让人们全面真实地走进了这个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而且纠正了许多人先入为主的历史偏见。唐浩明后来又写了《杨度》，这个所谓的旷代逸才的人生遭遇非常令人感慨万千，但是经过唐浩明的精心塑造，杨度的形象开始明晰起来，处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还有才智勇气和勇于承担的气概，也被唐浩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湖南的岳麓书社，以非常公允的价格出版了那么多的古典文献，是普及传统文化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他们的《书屋》、《芙蓉》、《视觉 21》、《母语》这些杂志，也许没有非常可观的发行量，但是其在知识界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忽视的。

扯得远了，还是回到钟叔河的《书前书后》上来。在这本书中，可以发现一个出版人的责任感和学识眼光，《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曾国藩家书》，还有钟叔河先生非常看重的《走向世界丛书》的策划，这些书经自己的努力而能够流布于世，的确非常令人羡慕。在这本小书中，还有一篇关于潘汉年的文章，很有意思。潘汉年是江苏宜兴人，在党的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影响和地位，建国之后，由于他所从事工作的特殊性，有些事情很难说清楚，结果蒙冤多年，含恨而死。但是潘汉年的晚年真正了解的人很少，他被长期监禁的日子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想到，钟叔河与他的交往虽远没有吴敬琏之于顾准那样深厚，但是寥寥数语却让人感到那个时候政治气氛的令人窒息。钟叔和给潘汉年讲自己的遭遇，潘汉年非常含蓄地讲到“相信人民”；当钟叔和给潘汉年讲自己正在申诉的时候，潘汉年说了一句“你还年轻”。这些可以做多种理解的充满着玄机的言简意赅的话，非常耐人寻味。我手上钟叔河的这本《书前书后》，是在一九九六年再版的，书前有黄裳和张中行两个老前辈的序。

陪老人聊天

刚刚从老家过年回来，在小区里闲逛，看到收书报刊的师傅已经在那里忙活了。师傅知道我喜欢买书，每次，收到了旧书，都让我随便来挑拣，别人扔掉的东西，我再捡回来。妻子对我这样的习惯很不以为然，为此还经常抱怨：家里都快成书库了！我唯有一笑置之，她哪里知道爱书人的乐趣呢？

在这样的看似很破旧的旧书中，我却发现了一本"新书"，这就是李辉的《人生扫描》。李辉的这本书是作为上海远东出版社"火凤凰文库"的一种，于1995年3月份出版的，我见到的这本是第二次印刷，印了15000册，应该是不小的数字了。李辉是复旦出身，和陈思和等人是大学同学，这个湖北人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先是供职在《北京晚报》，据说后来经过有头脸的人物推荐，得以进入《人民日报》。李辉的兴趣主要在现当代的文坛人物，他自称是传记作家，可能和自己的老师贾植芳先生有关。李辉最先关注的人物是胡风先生，众所周知，贾植芳先生也是很有名气的"胡风分子"。李辉经过认真的准备，对胡风冤案的始末进行了客观的扫描。也因此，李辉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利用身在媒体的便利，关于胡风和沈从文、萧乾、巴金、冰心等人，李辉可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关于沈从文，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李辉不仅

仅是鞍前马后的热心，更多的是一种面对这些沧桑老人的深入思考，反复揣摩之后，形诸文字的就不是轻飘飘的感叹和廉价的吹捧。在这些文章当中，关于沈从文的文字尤显作者的功夫。通过这些沉实的不乏创见的文字展示，我们得以明白沈从文所经历的种种是与非荣与辱爱与恨，沈从文就这样得以立体丰满地站立在我们面前。虽然是道听途说，但是对于周扬的评说，由于借助许多当事人的纷纷议论，好像也不显得轻率和武断。沈从文和丁玲的遗憾结局，也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李辉好像并没有一味地指责丁玲的盛气凌人、居高临下，这些事情的发生原来也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啊。

除了一些人物的扫描之外，这本书中还收录了李辉的一些演讲录、读书札记和一些杂文。杂文涉及的话题还算广泛，不过，李辉虽然很自负地认为自己的文字算是学术随笔，但和当年曹聚仁先生的文字比较起来，可能就有了不小的距离。李辉的文字，引起关注，和《收获》杂志上的专栏有关，对吴晗、冯雪峰，甚至还有姚文元，李辉的见解都很值得注意。

李辉还有一本《萧乾传》。关于萧乾的传记，他的婚姻也许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听说，李辉的妻子在《文艺报》上班，也有一本书《我眼中的风景》，可能是缘于自己妻子的原因，文字表现得很节制，也很有分寸，不像李银河面对自己早逝的丈夫，说起话来，一点谱都没有了。

原以为李辉还很年轻，但是现在想来，也快五十岁了吧，真是似水流年哟！

有趣的《笑我贩书》

非常散乱而不经常地看到嘉兴秀州书局的“简讯”，当初并没有太在意，这样的流水账有多大意思？但是如果有比较从容的心情，细细品味看似凌乱实际上还是有线索可寻的种种信息，“简讯”独特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诸如对朱生豪的妻子宋清如这样的人物备考，应该说“简讯”是颇有心计的，也让人们管窥到上个世纪文人间的种种细节。还有关于秦德君这位毕业于东南大学的奇女子与茅盾的关系，种种细节也许被茅盾研究专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简讯”以自己的方式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这种对所谓宏大叙事的反动虽然微弱，但是表现得非常顽强和坚毅。于是就有热心人来张罗，最好把这些“简讯”整理一下，以书的形式出版。经过执著的努力，《笑我贩书》这本洋洋达四十万言的别致的由现代人创造的“笔记体”图书终于在2002年的春天来到了爱书人手中。赵本夫先生说，这样的信息丰富的书胜过许多蹩脚小说家的长篇巨制；叶兆言先生说，这是有“毛病的人”才看的书。

是在2001年的中秋吧，去嘉兴。行前告诉秋禾先生，秋禾先生说，我给笑我先生打个电话，你最好抽空去秀州书局看看，也许能淘到什么好书。到了嘉兴，去了南湖，在烟雨楼上转了一圈，似乎明白张岱所谓“天下笑之”的意思了。禁不住对乌镇的好奇，到乌镇盘桓流连之后，回

到嘉兴已经是夜半时分。便匆匆忙忙地向秀州书局赶去，人生地疏，在小城里遍寻不着时，心里很是着急，想已经这么晚了，也许已经关门了。又与范笑我联系，范称，他还在书局里候着。经常听南京一帮朋友提及的秀州书局，原来藏在小巷里，冰心先生的题字被生长得很茂盛的芭蕉叶遮盖得严严实实，很难被人发现。

笑我迎出来，没有客套，就直接进了书库。书库的灯光灰暗，笑我说，有一个灯坏了，还没有修。书架上落满了灰尘，翻翻拣拣，找了几本书，印象中有《纳兰容若评传》、《南北朝史散论》之类。出了书库，到范笑我的办公室里闲坐，这样的办公室，非常有特色，墙壁斑驳，墙角里还有蜘蛛网在旁若无人地悠然自得。笑我指着墙上的痕迹问我，墙上的"画像"像不像鲁迅？仔细一看，还真有几分像的味道。散漫地闲扯嘉兴的一些人物，如丰子恺、茅盾、章克标等，似乎这些人离我们非常近，萧乾、冰心、张中行、柯灵、施蛰存、钱仲联这样的名流或远在京华，或高卧沪上，或避居姑苏，因这小小的书店，尤其是书店编印的毫不起眼的"简讯"把他们与爱书人联系起来，社会百态，文人性情，在这小小的"简讯"里都有体现。蔡玉洗博士说范笑我这样的有心人在不经意间创造了一种文体。编年的体例，简洁的文字，有乡邦的典故，有好像被历史尘封的人物，还有对各种书刊要言不烦的评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一针见血，开门见山，褒贬分明，胸臆直抒，大家看厌了洋洋洒洒千真万确的废话套话，领略感受这种文风，实在让人喜出望外。

记得范笑我在自己狭小的办公室里拿出章克标的结婚照给我看，鹤发童颜的新郎官真是神采奕奕。这样的与鲁迅同时代的人物穿越历史的烟尘，在新的世纪还是这样的达观风趣，对生活充满信心，也真让人感慨生命力的顽强。因地理之便，"简讯"关于章克标的信息比较真实可信，也相对集中，这也许是将来文学史家寻寻觅觅的珍贵资料。《笑我贩书》把这些很容易散失的东西集中起来，也许今天看来没有什么，但它的价值随着岁月的流逝将会逐步凸现出来。

为一座城市留影

看《南京历代风华》，心中涌起的是一种感动与钦佩。

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当然有许多文人骚客描述过。她的悠久历史，她的风土人情，她的山川形胜，她的是是非非，她的自豪与伤痛，她的繁华与落寞，她的所谓六朝烟水，晚明旧事，还有太平的劫难，两江的复兴，民国的探索，至今除了东方近邻给我们造成的压抑，仍然在纠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外，我们还会在城南小火瓦巷的紫金剧院里看着现代人演唱的《桃花扇》，追忆着一段沧桑岁月的苦痛和缠绵。

但是为一座城市立传，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它需要勇气，需要见识，需要必需的种种支持，更需要不急功近利的耐心。洋洋洒洒近 100 万字，图片达 3600 幅，从远古一直到鸦片战争之前，这样漫长的岁月，能够按照编年体的要求，既做到文字简略精当，又要兼顾图文并茂，还不能遗漏在南京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事件、人物、典籍，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南京历代风华》的编写者们基本上做到了兼顾各方，彰显个性，图文并茂，资料宏富。这也再次显示了南京这片天空下的一部分人尽心竭力地在为这座城市守灵，为这座城市不计名利地默默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心血和热情。

随便翻开《南京历代风华》，就能感受到该书扑面而来的书卷气和

精深讲究的整理资料的功夫。比如自永乐皇帝以后，南京作为陪都有着后人难以体会的尴尬和无奈，还有别扭。该书从甲申事变之后开始，叙述南明王朝的短命和当时面对破碎山河的一些读书人的种种选择，所谓桃花扇底送南朝。黄道周、钱谦益、史可法、顾炎武、吴梅村等人在南京所留下的足迹，当时南京的一些基本情况，这些读书人所留下的一些精神遗产，如余怀的《板桥杂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吴梅村的《南湖春雨图》、钱谦益的《牧斋有学集》，这些书影、书画都尽可能地收罗其中，甚至龚鼎孳、顾媚的重游故地也在书中得到体现。至于李渔的手迹、金圣叹在南京三山街的被杀，凡此种种，让人感到读这样的书，很有韵味，也很受教益。

说一本书厚重博大，气势恢宏，所谓的科学性、趣味性、可读性、知识性云云，似乎是一句套话。而这本书，应该说还是能够承受起这样的似乎很高大的评价。我们知道，《南京历代风华》是《南京百年风云》的姊妹篇，这样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很让人欣慰。在中国的出版史上，往往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些很有价值的选题往往会半途而废，不了了之。而《南京历代风华》与《南京百年风云》终于可以比肩而立，奉献在世人面前，也显示出这一土地上的人至少在出版地方文献方面有始有终，而不是轰轰烈烈开场，潦草凌乱收尾。

这本书，让家居南京的人感到了自豪和责任；让希望了解南京的人体会到了南京古城的岁月悠悠，江水汤汤，物华天宝，地灵人杰。

深邃夜空下的激越

许久没有读到如此酣畅淋漓大气恢宏的散文了，许久没有安定自己的思绪忘记俗务的牵累抛却案牍的烦扰，伴随着至情至性的文字徜徉在历史的长河山水的苍茫文思的激情飞扬了，许久没有亲近如此能引起读书人内心深处强烈共鸣深深认同和感同身受的心灵独白肝胆文章了。我说的是刚刚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汉俊的散文集《午夜的阳光》。

看上去典雅别致甚至透出一些娟秀的装帧设计，实际上多少减弱了刘汉俊文字的滚烫和炽热激情的恣肆和漫溢。透过当前整合了所有强势媒体的集中宣传，我们知道了 2004 年度感动中国的十大新闻人物之一的牛玉儒，但是我们借助于推动这个典型人物走向全国的具体策划者的饱蘸真情的有别于新闻报道式的文字，知道了牛玉儒的父亲，知道了这个养育了草原之子的"草原父亲"的别样情怀。面对这样的已经弱不禁风苍然白发的老者，置身在苍茫甚至是苍凉的内蒙古大草原，刘汉俊遏制不住自己的绵绵情思，由衷地写下了《草原之子》这首令人动容的从心中流淌出来的歌谣。能够突破官样文字的束缚，突破别人想当然有时候自己也下意识作茧自缚的画地为牢，让自己的真实情感坦荡流露，本属再平常不过的情感表达，但是有时候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

率真的性情。杨利伟的名字几乎注定要和历史要和神舟六号一起走向永恒，杨利伟在自己承载着那么多的渴望和梦想与我们挥手走向火箭发射架的时候，身在现场的刘汉俊比起新闻记者来更多了一份思考的深邃和绵长。《沙场秋点兵》以磅礴的气势回顾中国人千年梦想的孜孜以求，瞩目那些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而奉献了青春和热血的英雄群体。当然还有《经典中国》、《中国人》、《底色》、《永恒的回声》这些文章，涉及的都是非常宏大的主题，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不是千篇一律、陈陈相因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心得，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勇气和毅力。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政治性很强的篇什之外，我们在感受刘汉俊《晋商天下》、《两个人的风景》、《玛雅悲歌》和《读读点点〈红楼梦〉》的时候，却发现了另外的风景。关于晋商，我所看到的最为系统的文字是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此后，黄土高原的本乡本土的写作者也许觉得阎锡山、孔祥熙这些民国人物也并非都是狗屁不通的酒囊饭袋，而在明清时期的一些精明厚道的商人所成就的事业所践行的观念更不是今天的所谓金融巨子们所能够轻易鄙夷不屑的。面对历史的厚重和神秘，经历了狂热和浮躁，我们多了几分理性和尊重。在刘汉俊笔下，我们的目光追随着这片在今天看来弥漫着荒凉和贫瘠的土地，他们的经营理念，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走西口的豪迈闯天下的坚韧，还有他们留下的如今已是布满青苔的大院，更有他们面对国家山河破碎、分崩离析时的承担和牺牲。这样的商人让我们多了几分尊重和敬意，更使我们对当下生活中的商人们增添了期待和渴望。温总理不是说也需要知道穷人的经济学吗？

《两个人的风景》和《读读点点〈红楼梦〉》应该算是很专业也不乏柔情和见识的好文章。梁思成和林徽因实际上应该算是上个世纪的一段传奇。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人格他们的见解更有他们的贡献，无需我们多言，我们感兴趣的是围绕着这两个人所散发出来的让我们的后人感到自豪和仰视的在他们身上所洋溢流淌的人性的辉煌和靓丽。不是三姑六婆风花雪月，不是飞短流长花边新闻，更不是恶俗文人所解读的“人间四月天”的三角恋爱同床异梦。看过刘汉俊的解读，我们感受到的是弥漫着真情和牺牲荡漾着尊贵和典雅的一种人生境界，我们祈愿也许以后轻薄梁、林还有金岳霖、徐志摩的文字垃圾会少一点吧。《红楼梦》是“显学”也是“险学”，说显，是因为似乎没有哪个本土的经典小说像《红楼梦》这样引来如此众多的人来解读来研究甚至还闹出这样那

样的莫名其妙的官司；说险，是因为政治的原因，研究《红楼梦》还引发了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当然现在毕竟是时代不同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所谓的“红学”似乎被搞得有点声名狼藉，这样那样的新发现，这样那样的版本争议，还有这样那样的充满着宗派情绪的几乎是胡搅蛮缠的彼此攻讦，使许多人远离了“红学”，更远离了《红楼梦》，但是刘汉俊却是以淡定的性情毫无功利的诉求表达着对《红楼梦》的喜爱。有了这样的前提，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就不是故作惊人之语的猎奇，更不是无视前人成果的夜郎自大，通过对小说的人物、结构、种种情节的设计，尤其是小说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种种玄妙安排和良苦用心的精心体味，我们对《红楼梦》更增添了阅读的兴趣和亲近的冲动。

认识刘汉俊是多年前在湖南的一次会上。面对三湘的山水和人文，虽然在领导身边，但是他在照顾好老板的同时却不停地记下诸如岳麓书院的楹联，衡山脚下寺庙里道士和尚和谐相处的缘由，还有陈诚在抗战时期留下的文字，这样的处处留心很让人敬佩。前一段时间，由于组织宣传张云泉，已经在新的责任更为重大的岗位上的刘汉俊增添了岁月的历练和处世的沉稳，虽然鲁迅早就说过“在中国，‘宣传’这个词早已经被糟蹋得不像个样子了”，但是刘汉俊对新闻宣传的思考和见地，对工作指导的深入和专业，对当下媒体所面临的众多问题的深邃思考，对改进我们习惯的宣传模式的努力，还是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刘汉俊仍旧保留着自己的激情和思考，自己的勤奋和亲和，仍旧难以忘情对历史的阅读和求索，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他关于组织宣传张云泉的种种感受？会看到他在施耐庵墓前的思索？会听到他在郑板桥故居“聊避风雨”斋前的吟唱？

会议还可以这样开

把全国县级以上的主政者集中到首都北京召开超大规模、旷日持久的会议，可能只能发生在过去的中国。所谓超大规模，是指正式会议代表有七千人，如果算上各种各样的为会议服务的人员，超过万人；所谓旷日持久，是指会议一再延期，竟然开了28天，近一个月的时间，而且还是在春节前后，所谓中国农历的腊月正月。这次大会，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还是经常被人们所提及。它的重要性，它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影响，远远超过一些《人民日报》社论中经常讲的所谓“里程碑式”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44年前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可能是得近水楼台之便，在今年六月份出版了《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这样一本近四十万字的研究专著。

对一次会议的专题研究，能够做到如此条分缕析，旁征博引，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政治生活的真实面貌，现在看来，的确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次会议，远承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被打倒的庐山会议的余韵，近涉“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所遭遇的极端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全国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一严酷的事实，促使主政者不得不以中国现实政治的特有方式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采取对策。究竟让谁来承担责任？毛泽东

在文革当中回忆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发现修正主义要推翻自己。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讲了什么？刘少奇究竟有无逼宫、迫不及待的企图？他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所谓西楼会议的讲话，如此尖锐、大胆，难道他与毛泽东共事多年，还不了解毛泽东的政治斗争艺术？刘少奇真的有所仗恃吗？毛泽东让刘少奇放开来讲，是充分信任还是欲擒故纵？毛泽东让每个常委都要在会议上讲一讲，但是每个常委的讲话实在是各有玄机，颇堪玩味。

即使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毕竟是时过境迁，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也很难说就是客观公正的。细读当时这些中共中央最高层领导人的讲话，反复斟酌，细心揣摩，还是能够发现不少新鲜东西。

刘少奇的讲话，泼辣大胆，直言七分人祸，三分天灾。邓小平的讲话务实冷静，避免正面交锋，不在大的政治口号上纠缠，但是抽象肯定，具体纠正。周恩来的讲话，不偏不倚，不露锋芒，恪尽职守，不越雷池半步，只就国务院的工作谈具体的事情。而陈云干脆一言不发，虽经毛泽东反复动员，只是咬定问题还没有吃透，还要再观察、再思考。而义无反顾的是林彪的旗帜鲜明。林彪说，在当时的中国，得一人即得天下。这一人就是毛泽东。林彪的讲话，巧妙而又直率，绵里藏针而又含沙射影，谈党的问题高屋建瓴，避实就虚；谈军事工作，驾轻就熟，目无余子。但围绕的中心很明确，那就是迎合毛泽东，以毛泽东的喜怒哀乐为原则，工作取得成就进展顺利，是因为贯彻了毛泽东思想；工作出现曲折或者失误，都是没有很好地贯彻、领会毛泽东思想。这样的逻辑，和后来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毛泽东是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林彪还高度敏感地提到了党的团结问题，杀气腾腾，似乎有挟重兵为毛泽东解围的味道。林彪的讲话不多，但是响鼓重槌，令毛泽东非常欣赏，带头鼓掌。事后毛泽东问罗瑞卿：这样的讲话，你讲得出来吗？最让人痛惜的是朱老总的讲话。据张素华的研究，朱德的讲话，变化了三次，大会上讲的，和小组发言的内容也差别很大。莫非朱老总也在吸取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教训，也在顺着毛泽东的思路一味评功摆好？几位常委的讲话，唯独朱老总的没有下发，毛泽东是否觉得朱老总已经"廉颇老矣"？

李井泉、曾希圣、邓子恢等各方大员，在会议上也都有很有意思的举动。杜润生在接受作者采访的时候，说林彪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取刘少奇而代之，是康生的意思，而非毛泽东的本意。有的研

究者认为，林彪虽然其接班人地位被写入了党章，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给予他相当于刘少奇的权力，只是让他在军队里折腾。即使在军队，调动一个排的兵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才行。我们现在的政治运作毕竟在逐步地进入规范化、程序化，七千人大会这样的工作会议，恐怕不仅空前，也会绝后的。我们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五年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在按照程序运行着，这样的会议，我们似乎也习惯了原则的、正式的、充分酝酿的模式。但是，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拿一张纸条，洋洋洒洒，侃侃而谈，往往达三四个小时，这样的领袖风采，这样的举重若轻，可能也只有经过战争洗礼的政治领袖方能够具备？我们看台湾乱相纷纷，在议会里揪头发、打耳光，不成体统，但是行政官员面对李敖、邱毅这些议员的质询，甚至是开涮，他们还是要强颜欢笑、毕恭毕敬、洗耳恭听。过去我们说这样的议会政治是虚伪的，是金融寡头们操纵的政治游戏，但是，我们越来越发现，政治运作尤其是权力运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衡和监督，是很难靠得住的。这样的政治场，实际上既造就了一批政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公众比较透明地了解了政治运作的基本底线。

乔姆斯基在《宣传和公共意识》一书中说，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愚蠢到打社保基金的主意。但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的最高领导人却我行我素，肆无忌惮，自作聪明，只要把财政局长等强力部门的领导人理顺关系，通过秘书、办公厅主任就能任意胡为，把社保基金随意支配。上海还算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地方，在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的上海滩，出现这样的事情，似乎让人很没有面子。我们需要冷静思考的是：一个领导人的权力边界究竟在哪里？有哪些是可以干的？又有哪些是绝对不能碰的？怎样才能把道德上的教化和灌输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制衡，而不是形同摆设，甚至成为共同操作、利益均沾的同流合污？

回顾四十多年前的一次特殊的会议，我们需要总结的东西果然很多。我们说，把这么多人集中在京华，开这么长时间的会，真的发扬民主了吗？

记者眼中的社会『变化』

现在的图书市场在表面的喧哗背后是思想的苍白和泡沫化的严重蔓延，所谓的畅销和热点，很多是媒体和出版商操作的结果，这些浮泛的热闹也仅仅是一阵热闹而已。但是置身在北京春节书市林林总总的图书海洋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变化》一书，装帧虽然比较粗俗，用纸也很一般，但是其内容还是如此烫手地牵引着人们热切的目光。这本书也许会是今年最早热销的一本书吧。

刚过完春节，到书店闲逛，听书商们说，《变化》这本书进货几百本一星期内就全部脱销了。一本通俗的时政类图书能够这样畅销很让人意外。该书计有四十万字的篇幅，共分“谷底”、“风云际会”、“潜流激荡”、“新的梦想在召唤”四个部分。拿作者的话讲，它不是政治，却具有政治的震撼力；它不是历史，却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它展示伟人风范，却让普通人的悲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它针砭世情时弊，却让我们看到了进步看到了希望。在这个充满强烈嬗变的时代，在社会的转型期，回首刚刚走过的并不遥远的岁月，在我们感受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的时候，在我们不愿意接受千篇一律的鹦鹉学舌的时候，这本也许有很多毛病和不准确的更带有平民色彩的普通读物向我们走来。

这本书的热销可能还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该书的内容让人关

注。在这本书中，最为敏感也最为读者所关注的是一些政治内容：苏东巨变的一些细节，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复杂背景，邓小平在医院中的最后岁月，"毛泽东热"中有高干子弟背景的权延赤的一些纪实性作品的得到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鼓励和支持，第三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些逸闻趣事，诸如此类的内容在国内正式出版物中很少见到，即使有也往往遮遮掩掩，这也许是吸引读者的最大"卖点"。二是该书的信息量巨大。这本书不仅涉及敏感的政治内容，还以一个历史过来人的身份对社会变迁中种种社会现象、文化思潮进行自己的解读和诠释。书中几乎涉及了十三年来所有的牵动人们神经的事件，从官员腐败、农民负担、股市风波到社会风尚、流行文化，作者都根据自己新闻记者的独特条件和敏锐观察，对十三年来的历史变迁进行了极具个性化的处理和解读。

书的内容极为繁杂，基本上是按照编年体的形式，选取一些和普通人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事件，根据自己的解读，试图从个人的角度反映十三年来中国历史变迁中的种种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行文风格的"刺激大胆"。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也许私下朋友聚会或者家里人的饭桌上，人们的议论会非常直白和坦率，因为毕竟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但是在公开场合尤其是比较严肃的空间内，我们往往会非常谨慎小心，我们可能还不习惯比较直接地议论政治上的敏感话题。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议论党的领导人的言谈举止时带有更多的个人感受和情绪化语言，甚至党的领袖的一些生活细节也能行诸笔端。这样的解读带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行文也不同于常见于传媒的语言风格，轻松随意，语带调侃，甚至还有一些刻薄和嘲讽。

《变化》作者的身份也比较有意思。凌志军是《人民日报》的主任记者，曾经出版过《交锋》、《呼喊》、《沉浮》等时政类图书，引起争议，也大多成为本年度的畅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人民日报》社前负责人的揭露批评更是大胆直露，议论风生。还有对《中流》、《当代思潮》等杂志的政治倾向进行直言不讳的嬉笑怒骂，对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嘲讽，认为他们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基本没有起什么好作用。这些话题在国家的正规出版物中出现，也反映出社会的宽容度的确今非昔比了。

苏共亡党十年祭

说实在话，当时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确感到非常意外。这样的话题太敏感了，如果稍有不慎，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在恶毒攻击或者影射什么，尤其是在目下的语境中。涉足这样的话题还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人物来就这个话题说事，弄不好就会庸人自扰，造成里外不是人的尴尬。想来，也许还是一些聪明书商的主意，这个有着红旗出版社背景的黄苇町先生把自己的一篇文章进行了再加工，终于弄出来了一部近十五万字的《苏共亡党十年祭》，出版社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出版社：江西高校出版社。

《苏共亡党十年祭》似乎给人一种注水的感觉。全书共分四个部分，“苏共亡党十年祭”、“谁是苏共的掘墓人”、“反思俄罗斯改革”、“历史在这里沉思”，还有几篇附录，是作者在不同场合的一些演讲，内容大同小异，不断重复，让人觉得很是别扭。应该承认，黄苇町主要是选取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来切入这个相当沉重的话题，研究问题的深度姑且不论，这样的勇气却很值得称道。也许这样大的题目，许多人不敢谈论，钱其琛刚刚出版的《外交十记》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更多涉及，钱外长只是觉得戈尔巴乔夫至少在中苏关系上是富有远见的。应该承认，黄苇町关于前苏联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深入的，但是这样

的分析和归纳也许带有更多东方人的思维习惯，往往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苏联共产党最终蜕变为一种特殊的利益群体，最终成为一种精英集团对广大民众的无耻公开地掠夺，这样的历史演变，肯定有许多惊心动魄的血泪故事，可惜黄苇町没有在这方面进行更有深度的挖掘。拥有1500万党员的大党朝夕之间灰飞烟灭，不仅民众对之麻木漠然，而作为既得利益者集团也是推波助澜，乐观其成，这样的心态倒是非常发人深思。

中国人看待俄罗斯这片土地上的潮涨潮落，可能带有过多复杂的情感因素。前一阶段，我去俄罗斯的远东，到了哈巴罗夫斯克和比罗比詹，就特别关注他们意识形态的变化。我发现，他们的英雄广场仍旧肃穆，列宁的铜像还是那样的昂首挺胸，直视远方。俄罗斯的小孩很友好地向中国游客打着招呼。他们的生活显得平静而又安详，并不像国内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一片愁云惨雾，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经过一段冷静的思考，我们再回头认真拜读黄苇町的文章，虽然逻辑性更强了，行文更加严密了，作为一本书的体系框架也显得更加庄严肃穆了，书中也穿插了大量的图片，但是现在读来已经没有当初那种醍醐灌顶的酣畅淋漓了。指望一本书始终保持一种高度与鲜活，也许是一种苛求？也许作为一种正式的出版物，我们的阅读期待已经不同于欣赏一篇文章？总觉得，作者喋喋不休地和中国的现实相比照，显得过于功利和不够沉着，也似乎丧失了学人应有的立场、品位和风度。

听昂格尔说法律

应该承认，这是一本非常刺激非常晦涩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书。带在旅途上，放在床头边，不时地翻阅，反复的体味，还是觉得难解其中的奥妙。有时候，在很严肃的会场，听一些人在那里喋喋不休就一些在正常人看来早已水落石出的问题，自我感觉超级良好地大放厥词，我就想，所谓的这些政治和法律的纠葛，他们如果能够多少知道一些昂格尔的思想，还会不会如此气壮如牛？我说的是昂格尔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几乎每行话，仔细琢磨，都大有深意，给人启迪。“伟大的人物让后继者背上包袱是常有的事。每当政治、艺术或思想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就时，随之而来并从中受益的一代人，可能会有一种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值得再去做的无所作为的感觉。他们可能觉得最宝贵的机会已经为前人所把握并转化为成功的契机。因此，后来者总像是处于困境之中：或者仅仅是伟人们留下的遗产的看管人；或者虽希望独立，但由于对成功缺乏信心，只能将抱负大大压缩，并开始以技术上的熟练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耕耘。”这是该书中的第一段话。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品读这样的文字，会让我们的思绪飞到三十年前的非常岁月，所谓的两个“凡是”，所谓的艰难徘徊，机会在一些平庸

的政治家手中成为使之手足无措的烫手山芋，结果以很不体面的方式黯然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甚至单位、家庭，又何尝不是如此？据说，每年秋末，鲁迅的儿子都要到鲁迅故居的枣树上收红枣。这样的儿子也许只能修修收音机、写写骂周作人的毫无新意的文章、收获自己父亲留下的红枣了。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共有四个章节，分别为社会理论的困境、法律与社会形态、法律与现代性、再谈社会理论的困境等。有意思的是，昂格尔这位22岁就当了哈佛大学教授的年轻才俊，居然在法律与社会形态的研究中，把中国作为一种问题与西方进行比较，并就中国经验的局限性进行了颇有见地的探讨。对于儒家学说的“礼”，昂格尔认为，礼是等级性的行为准则，他们根据个人相对的社会地位而支配人们之间的关系，礼是内在于特定的社会状况和地位的习惯性的行为方式，礼不是实在的规则，也不是公共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国度，昂格尔认为，礼是主导性的并且几乎是唯一的正当行为的标准。这样的研究再次让我们感受到西方学者研究问题视野的开阔，见解的深刻。

昂格尔提出的三种法律概念，如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官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秩序或法律制度，虽然这样的概括给人以不太明晰的累赘和拖沓之感，但是昂格尔的分析却不能不让人信服。昂格尔甚至说，真正的法治的概念也许建立在一种误解之上，它同时也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我们习惯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的分类方法，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昂格尔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了这样的三个社会形态，即部落社会、自由主义社会、贵族社会。昂格尔就部落社会中的法律形态提出了内部人和陌生人的概念，只要了解到中国目前的法律状况，我们就不能说昂格尔的说法没有道理。今年的1月6日，中国甘肃的民乐县，有一个中国农民认为，自己的儿子在法律判决其离婚过程中的自杀身亡，自己原来儿媳妇的弃家而去财产被强制执行后的最终结果，都是被法院这帮与他对立的“内部人”所造成的。这位中国农民以“陌生人”的角色采取了被一些主流声音认定为“恐怖主义”的自杀性的行为方式，结果导致一个正在法院领导大家进行考核总结的县委副书记等四人当场死亡。这位中国大西北的农民当然也同归于尽。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现代社会”中，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似乎已经麻木了。昂格尔认为自由主义社会的法律操作是一种利益联盟，而贵族社会的秩序结合在一起的主导原则既不是公社式协作也不是利益联盟，而是名誉。

所谓名誉，就是其他人依据某等级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而承认某人特别适合于其所属等级的品质。每个人都永远受到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圈子的制约，后者限制着他的行为、知识和情感。这些论点，乍看起来，不伦不类，仔细一想，就觉得昂格尔的见解独到、深刻。

昂格尔在书中还就他眼中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社会”表达了他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种社会具有两种法律，既存在一种官僚命令的法律，又存在一种自治的自我调节的法律。每一种法律都代表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和组织方面的两个特点中的一个。在官僚命令的法律领域内，对法律普遍性和自治性的关注绝对要服从在特定环境中取得所希望的政治和经济成就的要求。去年四月中旬，臭名昭著也曾经风云一时的张春桥死了，去年年底，曾经炙手可热红得发紫的姚文元也死了，张春桥死的时候是 88 岁，而姚文元死的时候是 74 岁。提及这两个人物，是因为当年他们提出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们所秉承最高指示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破产。恍然如梦，文革爆发已经四十年了，文革结束也已经三十年了，在这样的日子里，重温昂格尔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也许不算多余：无论何时，只要共识分解，或失去要人们效忠的能力，社会秩序的危机就会成为人们自觉关心的问题。全部历史变革的最深刻的基础就是对理想的认识和现实的经验之间的或隐或显的冲突。

重温没有法律尊严的年代

三十年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纷纷去世。在那个年代，领袖人物的突然离去给我们这个悠久的国度还不到而立之年的共和国带来了一派迷茫和惊慌失措。当时的历史情境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也许聪明的出版商又会策划出名目繁多的文革图书来，但到目前为止，《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也许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种。

中国人似乎有纪念重大事件的“传统”，如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规格之高历时之久令人感慨。其他诸如一些重要人物的诞辰也都是很重要的纪念时机，据说因为规格高低、官方评价用语还经常争论不休，讨价还价。但是关于文革，却很少有正面的反省性的回应，虽然出版了不少涉及文革的图书，但大都不过是旁敲侧击，鸡零狗碎，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现出原来许多看法的幼稚和荒唐。已经故去的巴金先生呼吁多年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也很少听到有什么建设性回应。在这样的氛围中，没有建立文革学的条件，没有全面深入地研究文革的气候，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资深的媒体工作者的纪希晨先生的《史无前例的年代》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这本被称为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笔记的图

书，不同于叶永烈先生关于文革风云人物的传记，也不是李锐先生关于庐山会议那样的记录，而是从一位新闻工作者或者说是"新闻宣传干事"的角度记录了自己在那个年代的所见所闻。在我看来，至少勾勒出了十年文革的大致轮廓，并且提供了不少颇可玩味的历史细节。

全书六十多万字，几乎涉及文革期间的所有重大事件，虽然这些事件我们大多也知道一些，但往往是很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很细微的视角，缺乏记者眼光的理性和客观，也缺乏资深记者的观察和批判，诸如点点的《红色家族档案》、聂尔的《风云九一三》等。金冲及先生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文革部分也是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方法，对许多事情避重就轻，不愿也不宜多言。既然研究文革的大环境还不具备，时机还不成熟，而尽可能的留存一些当事人或者说知情人的文字就显得急迫而且必须。去年年初，张春桥辞世，活了八十多岁，去年年底，姚文元死亡，至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离开了这个世界。据说，徐景贤对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文革的回忆文字很感遗憾，而姚文元则写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王力也有自己的回忆录在坊间流传，汪东兴、吴德、纪登奎等人也都有一些文字被披露，北京的《百年潮》、《炎黄春秋》等杂志为文革史的研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而新闻记者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似乎被逐步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记录应该也算是一种声音。据说，原来的《解放军报》有一位先生，写了一本《军报内部消息》，也是对一些在文革当中呼风唤雨的"秀才群体"进行研究，而文革期间甚为流行的写作班子的研究也被人们屡屡提及。

在纪希晨先生的笔下，海瑞罢官事件、罗瑞卿的被打倒、震惊全国的武汉武斗事件、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的惊心动魄、所谓的"二月逆流"、"九一三事件"，尤其是"571 工程纪要"大致内容的全面披露，林彪、江青集团的狼狈为奸，分分合合。在这样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博弈中，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万里江山一片红、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等等极端的政治狂热是如何发生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历史人物是如何表演的，大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尤其是一些细节，很有意思，如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之前，康生对毛泽东的建议；康生指责江青"欺负"陈伯达，使陈伯达几乎要自杀的飞扬跋扈；王洪文顶撞江青"不要乱扣帽子"；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四人帮的勾结；康生在所谓的"伍豪事件"中证明周恩来的清白，认为周恩来是受人诬陷和污

蔑;舒同作为曾经的省委书记在 1976 年到当时的中组部反映自己的问题,不仅横遭训斥,自己的行李也被扔到门外,连一条丧家犬都不如,舒同感叹,我们还不如战犯;林彪这个在建国之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面对自己的老婆、儿子,竟然是那样的优柔寡断、纵容迁就,竟然说自己的儿子是“天才”,为证明自己的老婆和自己结婚前是处女,还为中央政治局写出书面证明;林彪和陆定一关于严慰冰揭发叶群信件的对话也很绝妙,林彪说,你自己的老婆写信,你怎会不知道?陆定一说,老婆的事情,丈夫不知道的还少吗?林彪说,我恨不得毙了你!高层的某些政治斗争,堪比侯宝林、马三立的相声。

重提往事不是要牢记仇恨,也不是要算历史旧账。但一味地回避那个没有人格尊严没有法律保障的史无前例的年代,总不是正确的选择。

《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封面设计是纯红色,还衬以红卫兵们意气风发的宣传画,给人以既遥远又熟悉的强烈印象。

历史备忘录

听朋友说，有一本《特别辩护》的书，可能有点意思。找来翻翻，一看副标题，有点失望，"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这样的东西，坊间实在是多得倒人胃口，而大多都是道听途说，一叶障目，内容雷同，资料堆砌。但是认真读来，却发现，这本书的严肃、认真、审慎、庄重却是同类图书所难以企及的，原因在于提供文字记录的人都是有一定专业训练和职业操守的法律界人士，避免了许多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和主观臆测，这样的编写应该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吧。

《特别辩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挂一漏万的交代，虽然不过才三十几年的事情，对现在年轻的读者可能已经相当隔膜了。有一位正在读五年级的小学生说，他们又不是一把手，让他们辞职不就得了？话说得轻巧，但我们要把当时的语境说清楚，的确已经不是很容易了。也许是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或者是缺失，难怪有些眼下的年轻人，很神往当年文革期间的大串连大游行大批斗，觉得那样的人生经历实在刺激。但是在政治斗争告一段落之后，如何在法律已经被践踏得毫无尊严的国度，在极短的时间内按照人类文明的方式来处理政治角斗场上的失败者，实在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好在经过多年政治上极端荒唐的岁月之后的一批法律界的知识分子，对林

彪、江青这些政治上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的起诉、庭审、辩护到最终审判，还是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翻读这些也许已经泛黄的卷宗，没有留下太明显的硬伤和笑柄，虽然也不无遗憾，但是对当年的一页，这些人以自己的职业良知没有使时代愧疚，没有让文明蒙羞。如果觉得我说这些话有点言过其实，不妨把《特别法庭》拿出来翻翻。

书中有几个细节，颇值得玩味。江青并不像朱仲丽、叶永烈等人生花妙笔下的竭斯底里神经质，而是在多年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历练得应对裕如，不可一世，与法律专家的交流，也是胸有城府，反复试探。她执意要让史良这位曾经是“七君子”之一的大人物做自己的辩护律师，当然还有周建人、刘大杰等。我们在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中，多少了解了史良的遭遇，但她如此得江青的信任，真是很有意思。陈伯达毕竟是大秀才，避重就轻，文过饰非，但是仔细想想，这个人也算是政治上的倒霉蛋而已。李作鹏关于九一三事件前夜飞机起飞命令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百般辩解并提出档案封存五百年让后人评说的话，听来惊心动魄。李作鹏缝在自己衣服内的《赠律师诗》，至今读来，还是意味深长：尊敬公证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但是在关于李作鹏迫害南京海军指挥学院雷永通等三人被致死一事，李作鹏坚决否认，并详细申辩了事情经过，被法庭采信。

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时候，我和哥哥在父亲的带领下，还在镇子上读书。虽然不是太明白这些复杂的政治案件的来龙去脉，但是每天还是兴致勃勃地看报上的消息，还有就是很不清楚的十八吋的黑白电视的审判画面，新华社记者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法庭上表情丰富的描述让人印象深刻。

时间流逝，岁月无情，但是这段历史还是应该完整地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告诉你另一面的李敖

李敖是海峡两岸的风云人物，这位年届七旬的特立独行的多种色彩的“怪杰”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李敖为大陆所知是因为其《独白下的传统》一书的风行，更因为媒体的不断炒作其个性鲜明的言人所不能言的诸多惊世骇俗的论点。对鲁迅，他敢于说三道四；对在大陆知名度很高的余光中，他不屑一顾；对蒋氏父子，他嬉笑怒骂；对陈水扁，他毫无顾忌，一再对其挞伐；甚至对李昌钰，他也是放言无忌，怀疑其动机。近日，李敖的大陆之行，更使其独特的风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尤其是中国大陆人的面前。

但是，在博学、睿智、好斗、善辩、狂傲、放荡的李敖背后，在承受当时威权体制的打压之下不屈不挠备受同情的李敖是否还有他另外的侧影？江苏文艺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与李敖打官司》一书告诉我们一个立体的复杂的甚至是睚眦必报工于心计的极具经济和经营头脑的李敖。实际上，李敖成就今日的影响，固然与他自身的才华自己的奋斗有关，但是，时代的际遇，他人的帮助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凤凰卫视中文台提供“李敖有话说”这样的信息传播平台，李敖的影响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大。李敖的影响力与当年的《文星》杂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李敖与《文星》的恩怨是非，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其间的是是

非非的确已经很难说清楚了。这桩公案实际上海峡对岸的人们也许都比较熟悉，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更由于两岸的长期阻隔，使我们较少听到关于李敖的负面的评说。萧孟能由于自己的家世背景和自己的文化理念，为李敖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这一点，李敖也从不讳言，两个人合作近二十年之后由于财务纠葛分道扬镳而对簿公堂。根据《与李敖打官司》一书所提供的大量资讯，尤其是非常具体的一些影印资料，试图说明李敖是怎样的背信弃义，忘恩负义，是怎样的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是怎样的无所不用其极报复他人，李敖似乎浑身充满了疯狂和歇斯底里。对朋友、对友情甚至对婚姻，李敖完全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这些说法仅仅是一种说法或者说是一部分说法而已，但它至少让我们明白，任何光环笼罩之下的人物，我们都要多一份冷静和清醒，多一份警觉和怀疑，多一点兼听和观察。

与李敖恩怨纠葛大半生的萧孟能在去年已经在大陆上海去世。而胡茵梦似乎也已经淡出公众的视线，该书做为立此存照而留存下来当年沸沸扬扬的一桩公案的一种说法，也算是为后人提供一个借鉴，这也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有点遗憾的是，《与李敖打官司》一书基本上是依据萧孟能提供的资料以及当时的台港媒体的新闻报道，引用资料不少，似乎缺少必要的分析和阐述，有堆砌之感；而对台湾的文化和政治、社会生态的必要说明也较缺乏。作者范泓据说曾供职于《南京日报》，采访过萧孟能本人，也曾经出版过关于雷震的传记。

郑逸梅的《味灯漫笔》

去苏州也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一到苏州，就想起郑逸梅先生。郑逸梅先生早已魂归道山，我当然没有亲聆请教的机会，但是喜欢看郑逸梅老先生的文章，却是发自肺腑，痴心不改。看这位老先生的文字，不费劲，有情趣，可以随便翻翻，也可以很认真地赏玩。更为重要的是，郑老先生的文字，谈往忆旧，可亲可信，不像有些人的回忆，实际上是借机夸耀自己，自高身份而已。

《味灯漫笔》是王稼句先生主编的《忆江南丛书》中的一本。郑逸梅先生娓娓道来自己对苏州的情感，特别是追忆故人的文字，如周瘦鹃、程小青、包天笑、范烟桥、柳亚子、费公直、俞曲园等，这些飘逸的富有诗意的名字，简直和姑苏的烟水，姑苏的园林，姑苏的风情融为一体了。有了这些千姿百态各呈异彩的文人的存在，苏州似乎也多了几分灵气和底气。这样的江南古城想当年真是一派意气风发的景象。

郑逸梅先生也提到一些人物，如潘景郑、徐孝穆、黄怀觉、陆澹安、颜文墚等人，这些人物虽然不像周瘦鹃等人有那样大的名气，但是他们在当时还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的。郑逸梅提到蒋吟秋曾经为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塔撰写过碑文，我曾经去过淮海战役纪念塔，可惜没有见到。书中也谈到吴友如和《点石斋画报》的关系，还有张鸿续写《续孽海

花》的一段往事。据说，张鸿的妻子是翁同龢的侄孙女，不知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

《味灯漫笔》的设计很有味道。横跨书脊的印花布，占全书封面封底的三分之一，很是古朴雅致，透出江南的万种风情。王稼句真是一个交游广泛的人，在这套书中，除了郑逸梅先生，他还联系到了周劭、周瘦鹃、冯英子、黄裳、邓云乡等人的书稿，这些人有的早已作古，有的虽还健在，但是联系起来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了。这件事情玉成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现在只有冯英子和黄裳先生还在写东西吧？

搅动书评江湖的一缕清风

在重庆书市上看到《读品》这本小书，禁不住一阵欣喜。江苏人民出版社向以出版引进版图书享誉中国出版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译精品有口皆碑，至今为人称道。但是对书评、书话一类的图书似乎很不屑的样子，较少瞩目这类出版物的开拓，而《读品》则是一本新潮的标新立异的有别于传统路数的书评集，较少暮气和酸腐气，透出一种踔厉风发的反潮流和目无余子的气概。在《读品》的编选者看来，所谓的书评江湖不过是一帮遗老遗少的死水一潭，所谓的书评人则拾人牙慧毫无思想毫无创建毫无心得只不过是内容简介加肉麻吹捧廉价吆喝而已，何足道哉？能够入眼的不过“周作人、梁遇春、沈从文、黄裳甚至鲁迅”，至多算上“包天笑、范烟桥乃至郑逸梅”等，真有一股横空出世舍我其谁的英风豪气。

《读品》涉及的图书大都是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如米兰·昆德拉的《帷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本雅明的《摄影小史》，罗森鲍姆的《岁月与海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彼德沃森的《西方现代思想史》，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加尔布雷思的《加尔布雷斯文集》，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伊格尔斯的《德国的历史观》，齐泽克

的《幻想的瘟疫》，孔飞力的《叫魂》，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苏珊·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等等。这些作者的名字，这些图书，也许很难进入一些所谓徒有虚名的书评家的阅读范围，他们也很难进入这些写作者所构建的文本世界。但是在这些年轻气盛的后生小子看来，这些书读起来才有意味，这些书才不枉担书的本意，这些书才叫做思想的传播，智慧的交锋，愚昧的启蒙。他们才不管你是否指摘崇洋媚外或者食洋不化。在他们眼中，那些大量摘引本土的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文字，那些津津乐道一些过气文人的无聊琐事，那些不厌其烦深文周纳一些信息极端不对称的途说道听，在这些新锐的书评者看来，不过是一种孤芳自赏的文字游戏而已。

《读品》除了大量涉及关于引进版权图书的评说议论之外，似乎为了某种平衡，还是兼顾到一些本土的图书，或者称之为华人的图书。如虽是华裔，但在美国的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不很知名的也许是台湾的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大汉奸风流才子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吴宓的《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何兆武的《上学记》，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登琨艳的《失忆的城市》，甚至还有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等，虽然还只言片语提到茅海建的《苦命天子》，熊十力的《读经示要》，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至1999）》，朱大可的《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但是谈论本土的图书，似乎总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漫不经心的随意和隔靴搔痒的不得要领。也许外国的书看多了，本土的书读起来，可能已经有点隔膜了？反倒有点水土不服了？

《读品》据说是"毒品"的谐音，是自认为酷爱阅读的人集合起来的一种宣示，一种标本。批判的火力虽然猛烈，还是有不少值得圈点之处。有些文章费了不少口舌，但还是让人不知所云，不得要领；有些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似乎与书评或者书话无关，或者说过于另类。如评价胡兰成《今生今世》的《梧桐树下拾翠羽》，应该算是一篇美文了，但归于书评或者书话，都很勉强。《读品》的编写者对有的图书选入两篇，也许是过于垂青和偏爱？对有的作者选入三篇或者两篇文章，如章可、李业业、杨不风等，这当然也是一种编选风格吧？

《旁观者的〈上学记〉》一文，语言朴实无华，行文自然流畅，把何兆

武先生的基本情况挂一漏万地勾勒出来，尤其提到了何先生对一位明史专家的个人好恶，至少让我们知道了一位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样的笔法也许才是唐弢先生几个“一点”的最好注脚吧？《读品》贵在清新犀利，立场透彻，旗帜鲜明，较少商业气息，较少囿于人情或者顾虑重重的欲言又止，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放言高论。一位书店老板期望《读品》能够在这样的乱世“建立标准，树立权威，确立传统”，这样的要求可能太高了，也有点强人所难了。客观地讲，《读品》应该算是给所谓的“书评江湖”带来了一阵清风，至少是些许涟漪吧？

有意思的『访谈录』

春天的阳光照在南窗,给人带来暖意和生机。宋人有一首诗,很契合现在的心境: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妻子和女儿都去上课了,一个人坐在家里,漫不经心地回想起自己在春节期间读过的闲书,有几丝困惑,有几丝安慰,也有几丝茫然和自感充实的心安理得。

似乎是一种很值得注意,也很令人振奋的现象:一些高层人士在正常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后,以极大的热情撰写回忆文章,追思往事,总结得失,贡献社会,鉴往知来。目前进入我们视野的就有《杨尚昆日记》、《李鹏三峡日记》、《李岚清教育访谈录》、钱其琛《外交十记》。据说,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也出版了《张震回忆录》,当然还有薄一波的《关于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的回顾》等,这些图书因为其独特的社会影响力,刚一出版,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许是一种职业上的无意识,也许是急于寻求一种来自各个方面信息需求的迫切,对这些图书,我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找来解读。即使从最为功利的角度来看,这些书至少为我们研究现当代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我们不怕局限性,我们不用担心众说纷纭。历史最终会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说法,包括中央文献出版社在去年底刚刚出版的《毛泽东传》,我们也

应该持这样的平和心态。我们最反对的是一言不发，守口如瓶，这不是对历史对自己对民族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

在我们拥有这样悠久历史的国度里，我们的教育史很自然也是源远流长，孔夫子最为令人可亲可敬的身份也许就是教育家。李岚清作为主管过教育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在其主政的十年间，对教育的感受当然不同于身处西南边陲苗家山寨的民办教师，也不同于黄河边上守着简陋校舍默默无闻几十个春秋的乡村小学校长。我的父亲在自己从教四十二年的今年暑假将要离开自己的三尺讲台，准备退休了。在一个埋首于莽莽苍苍大平原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县城中学的老教师看来，回首自己的职业生涯，虽然有栽桃植李的满足，但是他们的牺牲和奉献他们的无助和辛酸他们的遗憾和弥漫在内心深处的苍凉，我们又究竟知道多少？体味多少？看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我们知道，李岚清是怎样推动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刘醒龙的《凤凰琴》，但是这样的事情在辽阔的生息着九亿多农民的中国大地上何止千千万万？已经是 1994 年了，在江西吉安，李岚清在一所农村小学得知一位已经从教 17 年的五十多岁的老教师一个月只有 56 元工资的时候，李岚清说"我顿时感到一阵心酸，强忍住盈眶泪水离开了那间小屋"。十年艰辛不寻常，在这样的社会变迁如此急剧的年代，我们看到即使共和国的常务副总理也有许多无奈和困惑，也许还有委屈。为给教育上的有突出贡献的院士、教授们建房而涉及到拆迁问题，一些拆迁户中的"钉子户"举着横幅"副总理大笔一挥，老百姓无家可归"进行抗议，李岚清并没有勃然大怒，责令有关方面立即怎样怎样，而是心平气和问明原委实事求是地给予妥善处理。在高校合并的过程中，关于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究竟选择怎样的办学模式，李岚清也是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对于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后的校名，李岚清明确了自己的态度，但是也并没有一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虽然几年之后，"四川联大"还是改为"四川大学"，但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我们推动一项改革是多么的困难重重。李岚清对高校扩招加剧了社会就业矛盾的指责很不以为然，并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辨析。高校科技的转化，高校之间实现联合的推动，批评教材的偏、旧、繁、难、错，关注网络的问题，对农村教育的关注，特别是李岚清对贵州织金县少普乡政府责令教师全部停课督促农民种烤烟，这样的事情极端地说明在社会基层教育环境的险恶。李岚清对此事没有简单地批示之后就万事大吉，而是一再督察，反复过

问，这样求真务实的态度实在让人感动。李岚清提到他在南京金陵中学视察的时候，接受一个中学生的采访。这样的事情，让我们感受到了领导人平易近人的风范，哪像一些人谱摆得那么大，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拒人于千里之外？

儒雅随和的李岚清博学多才，在这本看上去似乎显得有点生硬的很厚很大的书里，寄托了这位领导人对祖国教育事业太多的深情和心血。十年岁月，我们原来经常是在媒体上看到他忙忙碌碌地考察乡村小学，高校的筒子楼改造，召集座谈会倾听社会各界对中国这样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办最大规模的教育献计献策，尽瘁国事，勤政谦和。李岚清谦称自己要做教育的“后勤处长”，这样的看似玩笑的说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自己很清醒的定位。邓小平生前曾说自己要做好教育科技的“后勤部长”，朱镕基说自己没有资格做“部长”，就只好当“处长”了。有意思的是，一些很有气魄的地方官员却经常在自己所掌控的媒体上宣称要当好什么“后勤司令”。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装帧设计很是朴素大方，图片选择也很精美，访谈形式也很别致，更为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的重大决策过程的信息。言为心声，许多随意的谈吐也透露出作者的学养和胆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形式还是有点生硬了，同时许多语言也应该更为随意闲适活泼一些为好，给人感觉公文语言还是多了一些。这当然是一种个人感觉，但愿作者今后的作品会更加精彩。

堪为经典的教育常识

《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这本不足十万字的小书,在我身边已经很久了。说它小,不仅是文字的简约精当,难以和动辄洋洋洒洒几十万上百万言的"教育专著"相提并论,而且开本也小得不能再小,算是三十二开本中更为瘦小的一种。但就是这样的瘦小简约,淡黄色的封面,却让我对她反复咀嚼反复沉思:这样以书信体的形式关于教育问题的探讨文本,实在是久违了!

保罗·弗雷勒这个巴西人据说是世界教育史上很重要的教育家,十年前已经去世了。这个巴西人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理念,曾经坐了十六载的牢。但是保罗·弗雷勒没有妥协退缩,没有委曲求全,最终坚持下来,据说其一生坚持的教育理念全在这本小册子里了。大道至简,保罗说,没有爱的勇气,没有不轻言放弃的勇气,就不可能有教育。这些看似朴素的道理,看似和孔子的《论语》一脉相承的教育思想,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本土,似乎遇到了麻烦和困扰。保罗把自己一生的思考和实践浓缩在看似简单的十封信中,娓娓道来的论述不是高头讲章的艰涩难懂,而是通俗明白耐人寻味的思想结晶。保罗的书信涉及到教育的诸多方面,诸如识世与识字、别让畏难吓倒、我参加师资培训、进步教师胜出的必备品质等。在谈到教师怎样才能出类拔萃的时候,保罗

列举了几个要素：谦卑、爱心、勇气、宽容、能力、果断、耐心和耐烦、惜字如金等。我们知道大教育家陶行知的谦卑，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们知道武训的谦卑，行乞兴学，终身不渝，可惜这样的人也会在多年之后被莫名其妙地拉出来鞭尸，这实在也是很让后人难堪的事情。但是在知名的南师附中的特级教师吴非先生看来，在中国当下的教育怪圈中，成为优秀教师，保罗的忠告未免太书生气了。如今在教育界呼风唤雨的所谓特级教师有多少是凭借自己的教学实践脱颖而出的？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讲教育已经黑社会化、江湖化、官场化，虽言辞激烈，但也未必是空穴来风吧。保罗还就初登课堂、教学关系、由讲述到双向交流、由倾听到被倾听、文化身份与教育、具体环境与理论环境、纪律问题等陈述自己的真知灼见。纪律问题，我们似乎也很强调，但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这样的问题似乎还很难说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当年邓小平先生说要讲理想讲道德守纪律，后来也有很多内容丰富的学习教育活动，兴师动众，规模空前，但是嘴上讲的心里想的实际做的却还是大相径庭。保罗说，呼唤道德，我们就该逃离清教主义的丑陋，致力于创造纯洁的美景。但是要舍弃已经习惯的陈词滥调、不合时宜的清规戒律，似乎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鲁迅不是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吗？

《十封信》的开篇是教育的陷阱，结束语是“认识与成长：有待发现的一切”。有意思的是，书中每封信的开始都有简短精到的提要，起到了片言居要的醒目作用。有几句话，抄下来，读给女儿听，拿洋人来教训她一番，不知道是否有效果。保罗·弗雷勒说：当我们学习时，无论是作为学生还是教师，可能犯下的最可怕的错误之一，就是在遇到第一个障碍时打退堂鼓。这种退缩使我们拒绝承担因学习任务和其他因素而产生的、归于必须完成任务者的责任。学习是需要耐心的活动，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将会体验到痛苦、乐趣、胜利、失败、怀疑和快乐。因此，学习需要确立严格的纪律，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加以遵守。要么是我们快乐地坚持学习或把学习当做必需与乐趣，要么让学习成为纯粹的包袱，一遇困难，马上放弃。

简单的《十封信》，让许多自命非凡的大陆“教育家”黯然失色。

夜读《文丛》意怅然

那天，在凤凰台参加《开卷文丛》第二辑的座谈会，这套丛书是《开卷》杂志在凤凰出版社推出《开卷文丛》第一辑之后，移师湖南与知名的岳麓书社合作的又一次惨淡经营甘苦自知的行动。在这一辑文丛中，有高卧江海门户南通的辛丰年先生与他的脸上长着麻点的在复旦教书的博士儿子的《和而不同》，有久仰其名但是无缘谋面的谷林、彭燕郊、魏荒弩等先生的新著，当然还有不很熟悉的吕剑、李君维先生的大作。章品镇先生是江苏文坛的老前辈，几年前，他的《花木丛中人长在》在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中推出，读书也是读人，引起读书界的广泛瞩目，他所交往的人物不仅令人神往，也令当下的人们感慨。他在自己的新著《自己的嫁衣》中历说沧桑往事，文字已臻化境，读来令人回味无穷。龚明德先生虽是鄂人，但在天府之国的蓉城冷眼看天下，耐心做学问，不断有新作问世，看他在《我的书房》中的文字，我们会为这样的读书人而行注目礼。他的《书生清趣》当然会很有趣，他带我去见流沙河先生的热心，在楼下巧遇冉云飞的引见，至今想来，历历如在目前。与龚明德先生虽然只见过两次，却有书友之间一见如故的天然缘分。

当时文丛的样书很少，大多被媒体的记者拿去做宣传了。由于偏爱黄裳先生的文章，也知道他对金陵当然是古金陵的难舍情怀，我便从

子聪兄处取了黄裳先生的《梦雨斋读书记》。黄裳先生想来已经是八十六岁的高龄了,前一段时间看到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龚自珍的文章,不仅思路之清晰令人惊叹,文字之长也很让人称奇,这样的文章绝对不是一些人散漫的忆旧文章所能望其项背的。在雨声淅沥的灯下读《梦雨斋读书记》这样简约清雅的小书,弥漫心间的是一种惭愧和惶恐。黄裳先生不愧是大家,他的文字自然有多人追捧和痴迷,而他所涉及的那么多的明清时期的古文献刻本,我必须坦率地承认面对这些文化典籍,我几乎是一片茫然。这些或者是在下雨天或者是在更深人静的午夜时分的读书琐记,没有任何虚饰和浮夸,没有任何被时代所左右的语言污染,只是含蓄曲折地表达着一个读书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守护和挚爱,虽然文字显得苦涩甚至难懂,远不是《金陵五记》中那样的明丽晓畅中透出的书卷气,但我们还是喜欢这样的冲淡平和。黄裳先生对南京真是熟透了,仅举《阮怀宁集》为例就可窥见一斑。我们知道阮怀宁就是阮大铖,黄裳先生对晚明下的工夫非常人能比,他居然找到了阮大铖的故居,并且得到了阮怀宁诗三集八册,诗集中"颇存写景篇什,瑶草遗篇亦赖此序仅存"。对于阮大铖,黄裳先生"小人无不多才"的评论真是力透纸背,令人回味无穷。瑶草就是马士英,在这篇已经算是不太短的文章中,黄裳先生转述了一些人对马士英肯定的评论,认为他没有降清算是晚节清白。"毒如孔雀有文章,遗集徒存阮籍狂。一马同翻江左局,千秋齿冷咏怀堂。""倚楼红袖桃花扇,入院朱丝燕子笺。都是江南亡国事,秦淮水遏散灯船。"这些简单明了诗句的引用,可以让我们反复咀嚼晚明教训的悠长。

黄裳先生在《书缘》一文中,详述藏书的种种机缘,对刻书家、藏书家许自昌的记述,尤为令人怅然书籍的风流云散。《玉诠词》是黄裳于民国三十五年在山西路的旧书店中购得的,如今的山西路哪里还有旧书店?黄裳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到的城北图书馆,如今安在哉?黄裳为姜德明收藏的《东山酬和集》以及为李一氓珍藏的《宋元词三十一家》所作的跋,仔细品读,都很有意思,凸现爱书人的情怀。《梦雨斋读书记》中最长的文字是《天一阁被劫书目》前记。这篇写于文革前夕的文字,记述了天一阁被劫书目的详细情况,读来令人叹息无言。而在浩繁的附录《天一阁被劫书目》中,我居然发现我的家乡的县志"《叶县志》(四卷,邵铋纂修,嘉靖刻)",也在被劫之列。这个刻本有一个按语:"此本北平图书馆一九三〇年图书展览会目录著录。"也就是说,这个明代嘉

靖年间纂修的县志如今不知道流落何方了。我在河南叶县的家中有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县志，如果能够把明代的县志和清代的县志进行比较研究，也许会发现许多我那充满动荡和灾难的故土所曾遭遇和经历的嬗变信息？也许会避免许多不应该有的错讹和猜测？想到这些，心中的遗憾久久挥之不去。

还想说的是，我们每天都在制造大量的文字垃圾，每天都在出版马上就可以回收到造纸厂的所谓的大部头的文集、长篇小说，每天都有一些浪费纳税人血汗钱的浩大的所谓规划的科研项目在立项。与它们相比，这些看似很不起眼的文丛中的小书，虽然不是鸿篇巨制，也不太可能有什么资金支持，但这些散淡随意充满性情的文字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显现出它们的分量。

征帆去棹残阳里

在溪口蒋母墓道山脚下对面是百货小店，商贩们很起劲地叫卖着万年青之类的山货。在这样的货物之间，居然还有一些关于蒋氏父子的图书混杂其间，而熊向晖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虽然看上去近乎盗版书，但是一想到熊向晖的传奇经历，想到当年蒋经国曾经当过他的证婚人，还是购买回来，细细品味。

书中文章，收录的大多是熊向晖的回忆文章，不是完整的体系，而是就某件史实的回应甚或辩驳。熊向晖参与了中美建交的全过程，殚精竭虑，心细如发，紧跟周恩来落实贯彻毛泽东的一系列决策不遗余力。在英国担任代办的时候，关于孙中山蒙难场所及其蒙难过程的描述，应该算是比较权威的言说，尤其是周恩来关于妥善保护囚禁孙中山建筑物的一系列要求，显现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眼光。熊向晖关于毛泽东向他了解林彪手下几员大将有关传达庐山会议的情况，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暗藏玄机，许多媒体都作了转载，虽然有人提出质疑，但熊向晖的说法至少算是一家之言吧。看得出来，熊向晖对毛、周怀有很深的阶级感情，对有关政治性纪录片将毛泽东自称是手执雨伞云游四方无法无天的孤僧进行辩驳，对周恩来重视环保工作进行深情回忆。而关于在非洲参加一次会议的召开过程的一波三折，为什么中国在主办国

发生政变以后还要一意孤行力主召开？种种细节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忍耐和宽厚、担当和坦荡，更重要的是对毛泽东的维护，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军队传达这一惊天事变的居然是即将成为阶下囚的黄永胜。当周恩来提出要销毁《五七一工程纪要》时，毛泽东说要发给最基层的党支部，在现在的语境下再来阅读这份莫名其妙的所谓文件，会让人徒生诸多感慨。熊向晖对在郑州参与毛泽东会见亚非拉国家人员的种种细节披露，现在看来，还是感叹一个大国领袖的器具和胸襟。熊向晖认为四位老帅的疏散离京，不是林彪的阴谋，而是毛泽东的一种战略部署，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对九大之后国际局势的判断，实际上对毛泽东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也多少透露出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不太放心。

熊向晖在回忆中，提到江青非常喜欢的六首词，诸如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萨都剌的《百字令·登石头城》、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岳飞的《满江红·写怀》，倒比较出人意外。至于说江青借这些词来抒发自己的伤心、怨心，还有雄心和野心，似乎有点牵强，但由此说明江青也不全是歇斯底里的神经质，应该算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吧？

熊向晖的回忆文字，对胡宗南较少露骨的贬低。胡宗南占领延安，带着《三国演义》、《水浒传》，想表现自己的大将风度，包括胡宗南对蒋介石的阳奉阴违，在蒋介石派系当中的独树一帜，实际上也是在耍小聪明。周恩来把自己与熊向晖的联系本子无意中丢在马歇尔的轿车上以后，所采取的种种应对措施，虽然是虚惊一场，但也反映出当时两党斗争的紧张、刺激。熊向晖结婚的时候，蒋经国主婚，婚礼就在励志社，也就是如今南京的会议中心，这样的场面，也算是很排场了吧？虽然没有喝一点酒，纯粹是以水代酒，这样标新立异的结婚盛典，也算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当时官场作派。几年前，江苏举办城市运动会的时候，邀请新华社记者熊蕾来给新闻记者讲解采访技巧的时候，地点就在广电总台的演播厅。她对央视、《人民日报》等新闻报导进行了很辛辣的嘲讽。事后才知道她就是熊向晖的女儿，很为没有向她详细了解熊向晖的情况而遗憾。

最是读书滋味长

面对秋禾先生的《中国旧书业百年》，心中涌起许多感慨和联想。记得十多年前，我在一个小报社为稻粱谋，生存环境极端压抑和困顿，刚刚离开大学校门的盲目天真和单纯，面对流氓无赖的手足无措，压抑氛围的无奈无助，真的不知道怎样来面对离开校园以后的日子。虽然也可以随波逐流，虽然在学校的时候有些真性情的老师曾不断地提醒社会上的一些潜规则，我还是要承认，大学的先生们还是高估了我们的文明水准，还是高估了消耗纳税人血汗钱者的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怎么办？往何处去？我在这样的迷茫和困惑中，见到了《中国读书大辞典》，也因此结识了秋禾先生。生活从此展开了另外的一种天地，原来生活本可以认定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目标舍弃一切烦恼和羁绊；原来还有这样的我们可以安托自己灵魂的所在；原来我们本可以一册在手沉醉书海而蔑视一切猥琐狭隘阴暗无聊；原来我们可以使自己与那些蝇营狗苟飞短流长锱铢必较攀附谄媚区别开来。因为与书的亲近，而使自己轩昂起来明朗起来。

自此，追随秋禾先生读书、买书、访书，进而写书、编书。虽然岁月的流逝是那样的匆迫，虽然时代潮流的变换是那样的一日千里，但是我们认定书有不朽的性质，我们不管风吹浪打，我们不计风雨兼程，北京

的琉璃厂、潘家园，浙江的清河路华宝斋，姑苏城内的古旧书店，虞山脚下常熟古城内长满青苔的弯弯小巷，扬州瘦西湖畔的旧书摊，都有我们的身影和足迹。当然更多的是南京的夫子庙、朝天宫，南大思想家评传中心的安静小楼，这些在过去很难进入我的生活的所在，由于秋禾先生的引领而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和色彩。也由于秋禾先生，我得以结识不少生活得真实和坦率的令人尊敬的师长前辈，如周勋初先生、董健先生、蒋广学先生、卞孝萱先生，更有遍布全国各地的书友朋友。这样的交往没有功利，没有等级，没有负担，有的只是面对垂之久远的美文典籍的感慨，面对情辞并茂披肝沥胆的警世雄文的激赏，面对种种读书感悟的会心一笑。我们经营《开卷》，我们策划《读书台》，我们仰望《六朝松》，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知道，“我们不必羡慕别人的聪明，如果也要像别人那样聪明，那就是读书”。匆匆的十年岁月走过，秋禾先生虽然从出版社到思想家评传中心到如今的编辑出版专业当教授带学生，但是他对治学路径的明晰和静守书业的坚守也开始进入金灿灿的收获季节，而《中国旧书业百年》则是他继《中国读书大辞典》之后在出版了十几种随笔书话之后的又一次令人欣喜和振奋的填补空白的书。

面对这样浩繁的洋洋洒洒一百多万言的鸿篇巨制，我要说，根据我的有限的阅读经验，它是厚重的下了真功夫的浸透着自己的辛勤和寄托的书。说厚重，不仅仅是字数多，更重要的是他把中国近百年旧书业的点点滴滴兴衰荣辱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以概括和梳理。说功夫，我们可以看到秋禾先生根据自己的治学特点和阅读视野，把大量的文献索引完备地罗列书中。这些注解本身就让我们感受到做学问的扎实和严谨。由于秋禾先生多年的随笔、书话文字的历练，他的研究文字就避免了或者说大大地消解了晦涩刻板的学术语言，清新可读，娓娓道来。正如毛姆所说，这样的读书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者硬着头皮办差。只可惜这样的书太少了，中国能写这样书的人就更少了。

最是读书滋味长。在纷纷扰扰的滚滚红尘中，在老鼠爱大米的喧嚣和浮躁迷茫的放纵当中，已经很难找到西窗高卧的闲暇。但无论我们怎样忙碌，无论我们如何疲惫，无论我们何等烦躁，我们如果能够抽出一点时间，专注而安静地读上几页书，读一读秋禾先生的《中国旧书业百年》，可以使我们知晓中国书业的近百年沧桑，可以使中国的书文化薪火相传，可以使我们显得有涵养，而文化的涵养会使我们的思想保持鲜活的亮色。

立传树碑说民国

看到期待已久的《中华民国史》终于出版，感到很高兴。关于民国史的研究，由于种种我们知道的或者说不太清楚的原因，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甚至是很不景气的状态之中。随着近三十年来时代的进步，观念的变化，意识形态的情绪化的东西逐步为理性和实事求是所取代，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的档案、回忆录、私人笔记和日记的涌现，而国外学术界对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也是一个巨大的参照系。凡此种种，为大陆民国史研究带来了机遇，当然也伴随着很严峻的挑战。

南京曾经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首都，似乎对民国史的研究承担着更为直接的责任。以张宪文先生为首的民国史研究的一批学者，聚集在南京大学这一百年老校，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为全国学术界也为民国史学的爱好者贡献出这一达一百五十余万字的四卷本《中华民国史》来。

粗略读来，《中华民国史》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给人留下了至深的印象。

首先是该书的视野宏阔，持论公允。民国史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不仅仅在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更在于长期的阻隔，造成话语体系上沟通的困难，地域上的限制阻隔形成资源共享的不易。南京到底能否成

为民国史的学术研究中心？占尽了地利之变未必就有了得天独厚的天时和人和条件。在许多人眼中，外国人或者身处海外的人怎么会懂得中国历史？但是黄仁宇、魏菲德、史景迁等人的史学著作让我们大跌眼镜。好在现在毕竟是国门大开了，所以《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北京、天津、上海等本土的研究机构及其成果，更看到了来自海峡对岸以及海外学人的研究成果，当然还有理念。说持论公允，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就能窥斑知豹。我们讲抗日战争，不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争论你高我低，而是分出阶段，根据史料，解读当时的情景，细述历史的局限。甚至是一些后来做了汉奸的民国时期的军人，在当初的抗战中有英雄的壮举，我们也不应抹煞其对民族的贡献，如孙殿英、庞炳勋等，虽然着墨不多，却是为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万富麟的通敌，万国宾的临阵脱逃，汤玉麟的不抵抗，也都一一点到，反映了史学研究者的胆识。

《中华民国史》带给我们的理性客观，以史代论，要言不烦，也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民国时期的蒙古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史料众多，歧见纷出。还有开罗会议的详情，雅尔塔密约的内幕，我们过去对这些敏感的重大历史的沿革讳莫如深。但是《中华民国史》本着理性客观的精神，不惮烦难，在要言不烦的叙事中，不仅清晰地勾勒出复杂历史事件的大致轮廓，而且把各种意见都兼顾包容。这不仅是史学工作者的勇气，也是一种驾驭复杂史料的功夫。该书不再沿袭以往对袁世凯"窃国大盗"的成说，而是客观描述袁世凯是怎样对孙中山、黄兴等人玩弄政治手腕最终达到个人目的的。唐绍仪的被杀，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在二战即将结束时，蒋介石对日本问题的矛盾态度，国民党内诸多派系之间的潮起潮落，尽量做到了理性客观，不说过头话，更不说违背常识的话。对"四大家族"和"义和团运动"、冯玉祥的热河抗战、西安事变后的国内舆论等，也都提出了或者说兼顾到了多种看法，话虽不多，但很有分量。

史学著作，重在结构得当。框架合理，会使诸多史料灵动活跃起来，否则就是史料的堆砌，云山雾罩，让人不明就里。《中华民国史》一改过去许多历史著作重政治轻经济重军事轻社会的倾向，把当时的经济状况、政治结构、社会形态都能够做到有所兼顾，力求还原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全貌。这样的结构均衡，详略得当，不纠缠于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战争情节，不纠缠于党史上的琐碎是非。但对历史关节点上的

纵横捭阖决不放过。如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甚至还有桂系的关系，不深入了解，就很难读懂他们为什么会朝云暮雨反复无常七分吵闹三分合作。诸如此类的精彩叙述不胜枚举，这就会让人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概貌。

毕竟是一百五十多万字的历史学术著作，在我们为之感到欢欣鼓舞的时候，还是觉得民国史的研究还有很广阔的空间很急迫的压力和挑战。就《中华民国史》而言，有些事件的涉及，似乎还是要兼顾到一些新的历史发现，如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晚年明确表示过是自己对形势的判断，没有接到所谓的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纸条”。还有延安整风应该是我党历史上的非常重大的事件，但书中仅仅在说到“七大”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提了一下，似嫌单薄。书中涉及到孤岛文学、沦陷区文学，只字不提沈从文、张爱玲等，但对《差半车麦秸》却反复提及，不知为何？既然是“中华民国史”，当然应该到一九四九年为止，但是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似乎也应该多少做一些交待，才显得比较完整，也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某些人割断历史叫嚣“台独”的一种回应。书中还应该有一些说明，如讲到罗迈的时候可否说明此人就是李维汉？白朗是河南宝丰大刘庄人，书中似乎有误。有些叙述中还出现了“笔者认为”的字眼，给人以别扭累赘不严肃之感。在附录中，《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一书的作者是台湾人秦风，不是“秦雨”。书中可能还有一些错讹之处，只有等待修订的时候来补救了。但是瑕不掩瑜，《中华民国史》的出版应该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项重大的新收获。

站在近代史的起点沉思

我们习惯于把晚清的时间限定在鸦片战争之后。

鸦片战争，已经被中国人赋予了非常丰富的含义。但是中国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中被西方人主要是英国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向称天朝大国的清王朝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为什么会一败涂地？以往的史学研究往往受宏大叙事的束缚，在意识形态的遮蔽之下，粗枝大叶地把复杂的历史原因简单化、表面化。而林则徐这样的封疆大吏晚清重臣也被想当然地涂抹上过于浓厚的神话色彩，把中国的战败仅仅归因于忠奸之争、主和主战之争，甚至是皇帝的刚愎自用、优柔寡断。而实际上最大的原因，在于长期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中国人昧于世界大势，没有自知之明，对自己身外的世界一无所知。

我们不想纠缠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我们不是在做发难翻案文章，我们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尘埃中，理出这样的一条相对比较明晰的路径来：以晚清文人的觉醒为线索，来探究中国思想界，换言之，即中国的文化精英们是如何逐步艰难地摆脱愚昧，接受新知而走向世界学习西方的。他们的起步蹒跚缓慢，充满着痛苦和挣扎。走出天朝上国的虚幻美梦，面对残酷复杂的反差巨大的西方挑战，既不能使自身陷于彻底的崩溃，又要以现实的态度理性的从容在屈辱中引领中国航船艰辛起

航。在这样的漫长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界的精英们承担着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压力和重负。我们不要抱怨他们的肤浅和缓慢，他们的学习确实相当的真诚和执着。在这样的似乎不能沉静于书斋的跋涉中，一些与传统的科举之途大相径庭的文人群体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和林则徐发生激烈冲突的徐继畬。

以往的汗牛充栋的各种文章中，诸如胡绳先生主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所谓的权威表述，已经把林则徐神话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这样的称谓非常模糊而不准确。林则徐是一个非常练达敬业、忠于职守的大清官僚。他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给人以勇敢果断、不畏强权的强烈印象，他的最后遭遇也深深地引起后人的同情和敬仰。但是，即使如林则徐这样的大人物，对西方的认识也愚昧到让今天的我们惊讶的地步。他认为英国人的膝盖不会弯曲，英国人不擅长陆战，英国人不可能和中国开战。正是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和判断，他到广州之后，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可以重新检讨的必要。林则徐虽然也注重了解西方，让手下人翻译西方的报刊文章，但是这样的学习非常急功近利，这些资料对他改变固有的观念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从林则徐留下来的大量奏折、日记中，很难看得出来林则徐这样位高权重的民族英雄对自身的失败有什么反省之处，他仍旧是一个不愿醒来的拒绝现代化的人物。

有一件小事，似乎可以看出林则徐的思想观念仍旧是冥顽不化。林则徐遭贬之后，东山再起，迭经反复。他在福州闲居的时候，根据有关条约，英国人可以入住福州城。当时的福建巡抚是徐继畬。经过鸦片战争惨痛失败这样的重大事变，林则徐并没有彻底反省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仍旧相当意气用事地一味排外，情绪化地号召当地士绅拒绝英国人进入福州城。这种不顾大局不计后果毫无意义的近乎捣乱的行为，让徐继畬这个山西人非常为难。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也反映出林则徐的目光仍旧没有投向更遥远的地方，自己的思维仍旧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天朝心理。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现在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了。实际上，这本书中所透露出的信息，所表达的见解，尤其是对世界大势的认识，要远远高于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不要说林则徐的思想认识水平了。

我们也许会惊讶于道光皇帝何以如此死要面子活受罪，坚决不愿意接见英国的使节，不愿意接受英国的所谓“国书”。现在做事后诸葛

亮，进行评头论足似乎显得有点苛责古人，但是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是说几句怪话，发几句牢骚，讲几句俏皮话图嘴上痛快，而是真真切切地得出教训，不再重复昨天的错误。因为，在许多理性的人看来，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大格局，世界大走向，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根本性的改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就不是多余的炒剩饭，而是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茅海建先生非常详细地研究了清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诸如武器装备、兵力和编制、士兵与军官等，具体详实，没有大而化之，而是客观陈述，持之有据。对鸦片战争中的诸多人物，林则徐、琦善、杨芳、奕山、奕经、伊里布、耆英、刘韵珂、余步云、牛鉴等当年在鸦片战争中载沉载浮的各色人等，作者都本着客观真实的态度，尽力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既不溢美，也不随意贬斥。虚幻的光环尽量剥离，诬蔑之词力求昭雪，不因为是林则徐就文过饰非，遮遮掩掩；也不因为是所谓的奸臣，就无限上纲，乱泼脏水。

我很想知道当时的知识阶层是如何应对和反省这场不同于以往的战争的。林则徐虽然编译了《四国志》，但浅尝辄止，虎头蛇尾，他心中还是梦想着何日起复，再上庙堂。龚自珍，多伤时之语，愤世之言，但较少建设性。魏源的《海国图志》算是不错的成果，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徐继畲，他的《瀛寰志略》，代表了当时较高的认识水准。舍此，似乎再无任何东西可供借鉴了。

茅海建征引资料丰富、缜密，这样的案头功夫，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亲力亲为了。实际上，如果我们的研究建立在大量的掌握资料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结论、甚至我们的见识，很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的水平了。

彭城淘书记

秋意已经越来越浓了，在愁闷烦躁的压抑中，偶然的机会有彭城之行。

还是难以改变的老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喜欢去逛书摊。好像是在快哉亭公园附近，在午后暖洋洋的秋阳下，有几个书摊安详寂寞地静卧在那里，等待着爱书人的光顾。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淘旧书了，朝天宫那万仞宫墙之下的旧书摊被一些城市管理者追赶得抱头鼠窜，没有立锥之地，据说已经逃遁到合肥去了。

不去管这些烦恼的事情吧，且看书摊。曾经看过契诃夫写过关于远东的日记，涉及到库页岛、海参崴，当然还有黑龙江，在徐州这样的地方，看到了商务印书馆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黑龙江旅行记》，作者是俄国人，被我们的出版者称作“老沙皇侵华分子”，但这样的书总是让中国人汗颜。前几天在新疆，能够阅读的还是外国人写的关于新疆的文字，虽然也有周涛的《山河判断》，但是总有文字清浅境界不够的感觉。《黑龙江旅行记》的作者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许文笔会很拘谨吧？另有《论平等》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两本书，均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论平等》的作者皮埃尔·勒鲁是法国空想主义者，《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作者是德国人魏廉·魏特林，这个人的名字经常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提

及。《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这样的近三十五万字的书，是由三联书店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这样的选题反映了中国知识界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急切心情，书中关于哲学界的风云人物按照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英国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语义哲学、法兰克福批判哲学、结构主义、过程哲学、弗洛伊德主义、自然科学哲学等来分类。《唐诗三百首新注》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金性尧做注解，这样的本子已经很多，之所以买来，算是一种参考吧。

据说在南京有五元书店，弟弟曾经买过《北京乎》，不知是一本十元，还是两本十元。在彭城有几家三元书店，只是环境太差，淘来拣去，购得《柳如是新传》、《联想与印证》、《历代王氏王族》、《美国官僚政治》，还有一本是董桥的《文字是肉做的》。在另一家三元书店，买了《史记选》、《董仲舒》、《韩愈选集》，《古文观止》是上下两册，有趣的是，这书配了不少的图，也许有一点价值。见到孙犁的《曲终集》，只是品相太差，没有买，不过买了一本孙犁的《书衣文录》，算是对这位刚刚去世的文化老人的一种缅怀。胡风这样的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也许会慢慢地被人们所淡忘，之所以买了一本《胡风传》，是因为想起当年父亲讲过，他在浦楼中学上学的时候，有一位女教师被打成胡风分子，被剃阴阳头的事情。因为一个无辜的人而使如此多的无辜生命遭受那样的摧残，这应该是整个时代的耻辱。《淡写流年》是唤做王充闾者的散文集，此人曾经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过集子，好像也是大散文的路子。淡写流年，这样的名称似乎反映了一种非功利的平和心态，让人产生莫名的好感。

广州散记

先不要着急，让我想一想关于广州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我们都知道些什么？这是林则徐焚烧鸦片的决策地吗？这是康梁孕育新思想的温床吗？这是当年和北方分庭抗礼不屈不挠的带着浓厚的反叛色彩的孙中山的城市吗？黄花岗前的青草是否依旧碧绿青翠生气盎然？黄埔军校的旧址可否依旧朝气蓬勃生龙活虎？这是国民党最后退出大陆的行政首脑的所在吗？这是四顾茫然静卧岭南的陈寅恪心忧天下精研历史的城市吗？这是秦牧笔下的花城？是那个年代我们高度紧张的“羊城暗哨”？这是久负盛名的广州报业的集散地？风格独特令人耳目一新的《南方周末》、《南风窗》、《21 世纪经济报道》、《随笔》还有《足球报》就从这里辐射到北方辐射到全国各地？是在这里聚居着性格鲜明说不上大气但是绝对特立独行敢为人先的一批操笔弄文的新型文人，诸如张欣、鄢烈山、林贤治、单士联？把这些风格迥异甚至大相径庭的人士罗列在一起很可能显得不伦不类，但是他们毕竟是在同一座城市的星空下思考写作，面对着同样的红尘纷扰。

那天是从成都飞抵广州的。新启用的飞机场仍然叫做白云机场，但是飞机场规模的恢弘气魄的雄伟真是让人眼界大开。夜宿珠岛饭店，据说当年邓小平南巡也曾在这里歇脚。饭店很大，绿树成荫，散发

着古朴典雅华贵从容的气定神闲。去拜访《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掌门人范以锦先生，这样大的家业，这样大的影响，但是它们的掌门人却是那样的瘦小单薄，待人谦和。那天的范以锦可能感冒了，但浓重的鼻炎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兴致，面对从南京来的客人侃侃而谈，全盘托出，没有外交辞令，没有闪烁其辞，没有虚泛的客套。对于自己的子报子刊，他们的运作方式他们的经营理念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职业操守，范以锦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对于不拘一格大胆启用年轻人，南方报业不是停留在口号上的欺世盗名，不是应付舆论的敷衍了事，而是源于他们自己生存战略的考量。众所周知，广州这座城市，就有三家名副其实的报业集团在上演着真真切切的“三国演义”，这种经营策略、发行方式更重要的是内容高低的争夺已经成为广州传媒人每天都必须认真面对的严峻考验，来不得半点的含糊和大意，因为每天都有重新洗牌的可能性。更何况，深圳还有一家报业集团在虎视眈眈，而近在咫尺的佛山也成立了珠江传媒集团，准备打造珠江报刊系列来参与竞争。

很遗憾，没有去黄埔军校的旧址，只有临风想望这所很难说是本科还是大专的院校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发挥的巨大历史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也很难说他的影响已经完全消失。也没有去中山大学，只有翻翻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来想象这所学校当年的风采和今天的气象了。在主人的一再推荐之下，我去了南越王墓还有就是陈家书院。据说这也是广州城比较知名的旅游胜地了。南越王墓据考古专家认定是秦汉之际秦朝大将赵陀孙子的墓地，墓地在一个小山丘上。这个割据王朝存在了不到一百年，墓葬虽然不能和徐州的汉墓相提并论，但还是颇有气象，更何况那是在几千年前的岭南地区。但是赵陀的墓地在哪里？至今没有任何线索，根据常理推断，赵陀的墓葬应该比他的孙子更加气魄也更加丰富，但是他如今还沉睡在南粤大地的某个角落，不希望我们来打扰。广州人在这个墓地上建立了很别致的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对南越的这段历史很有研究，还有专门的研究专著送给我们。而给我们讲解的林冠男小姐是刚从南开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研究生，讲解生动幽默，殊为难得。

所谓陈家书院，实际上是陈家祠堂。据说，清王朝虽然昏聩，但是对于南方的名门大族还是恩威并重多有防范的。清末的陈家在两广在南洋实力雄厚，富可敌国，但是建立祠堂未免树大招风，南方人就是会变通，他们觉得建一个书院总不会招致当局的猜忌和阻挠，于是明为书

院实为祠堂的浩大建筑就这样诞生了。这样巧妙的处世秘诀似乎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二十六年前在广东轰轰烈烈上演的改革开放。我在广州的时候，正是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的高潮，南方的传媒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广东人如何缅怀这一对广东的今天起过决定作用的伟人。他们的语言诉说风格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都显得那样坦率真诚，发自肺腑。书院很大，处处透露出南方建筑的风格，也反映着自从门户开放以来南方所经历的风雨沧桑。我问当地的主人，当年李鸿章、张之洞在这里主政的时候可有遗迹存留？大家茫然，也许早已经灰飞烟灭了吧？

离广州很近的佛山无佛无山，但是他们的陶瓷却很有名。烧制陶器的古窑仍在，只是更具有观赏价值罢了。有意思的是，他们烧制的器皿都称作“公仔”。在一座古窑的边上居然有一棵颇为茂盛的大榕树，据说有好几百年了。古窑边的温度可想而知，但是这棵树怎么会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如此浓阴如盖，树大根深？佛山有一个祖庙，供奉的是镇水的北方的神仙玄武，本土的神仙在这样的南国却有了自己的庙宇，这也许算是大一统中国的一个佐证吧。黄飞鸿、成龙都是佛山人，代表香港队在雅典和大陆争夺男子双打冠军的一位年轻人也是佛山人。他们说，都是中国人，谁赢都值得祝贺，都值得鼓掌，这样的境界真让人感到心情舒畅。

天山访书录

今年六月份，到新疆参加全国书市，把每天琐事记录下来，或可谓之天山访书录。

六月十六日自南京飞抵乌鲁木齐，虽是下午，依然艳阳高照。到大巴扎闲逛，在一维吾尔族书店盘桓，见到几本旧书，心中甚喜。在玉门关外的天山脚下，见到这些书，似乎有一种异样的亲切。宝文堂书店在一九八四年八月印刷的《飞龙全传》，据说建国以后从没有正式出版过，翻看这本书，让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旧戏和民间艺人的坠子书。中原地带尤其流行宋代的故事，盖因大宋王朝能让这些黄河流域的子民找回一些自信和荣耀吧。《飞龙全传》实际上是赵匡胤的故事演义，这些演义故事的编撰者，可能比易中天严谨多了。陈桥兵变、千里送京娘、怒打陶三春、雪夜访普，诸多传奇故事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本土的经典文本。《飞龙全传》书后附录了许多关于赵匡胤的正史记载以及一些文人的笔记，可以和民间的演义相互补正。书中还提到在一九五九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的张家驹的《赵匡胤传》。《飞龙全传》署名由东隅隐士整理，据说此人名吴璿，“屡困场屋，终不得志”，不得已，弃名就利，“时或与贾竖辈逐锱铢之利”。后来，可能是当私塾先生了，闲暇之时，对《飞龙全传》进行编纂，“自抒其穷愁闲放之思”。

这个吴先生生活的年代是乾隆三十三年。

《柳河东集》上下两册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华书局的版本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份印刷出版的，大概印了九万册。这套书是从乌鲁木齐市第十八中学流散出来的，书中有刘禹锡的序文。中华书局是根据宋代世彩堂本校点印刷的。《河东集叙说》写得很有意思，把韩愈和柳宗元相比较，引经据典，从苏东坡到什么吕居仁、浮休先生、陈长方等，不一而足，喋喋不休。《邵氏闻见录》说，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而金华的程子山则说，前辈谓退之、子厚皆于迁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这些话，听起来很舒服。

《拉封丹寓言诗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译者远方，很可能是化名，就像陈毅的夫人张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翻译俄国作品，用的名字叫耿星。那个时候的领导人夫人，也不全是江青、叶群之流啊。拉封丹这个法国人在中国的知名度相当高，因为他的许多作品被改编后成为小学课本中的经典课文。据说，拉封丹早期和底层民众接触比较多，作品也带有强烈的民间气息，他到巴黎后依附于贵夫人生活，思想也有所转变。在从乌鲁木齐去哈纳斯湖的漫漫长途中，远望着逶迤起伏的山脉，读着拉封丹的《山的分娩》，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味道："一座山感到了产前的阵痛，她的叫喊是这样强烈，大家闻声都向她那里奔去，以为她一定会生出一座比巴黎还要大的城市，但到头来她却只生下一只小小的耗子。"这篇寓言情节是虚构的，但却有它真实的一面，当我想到它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位作家，他曾这样说过："我要歌颂提坦人和雷霆之主的战斗，人们许下很多诺言，但结果经常又怎么样？只不过一阵风而已。"

《读通鉴论》共十册，是中华书局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半期，也就是所谓的文革期间出版发行的。这样的书能够在那样年代获此殊荣顺利出版，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不可能的。船山先生被认为是湖湘学派的祖师爷，他的见解影响了许多人。一代报人张季鸾说自己写政论文章，就是模仿王夫之《宋论》的笔法。古人读史，不会像如今的易中天那样口若悬河但实际内容很少。如此好书，能够在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得之，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书缘。

晚上在大巴扎附近一餐厅用餐，饭菜一般，惟跳舞的维族姑娘美丽异常，让人难忘。

六月十七日。上午乘公交车到昆仑饭店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主持，中宣部副部长李东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讲话。在会上见到我的《江南彩衣堂》的责任编辑周百义。周百义满脸愁容，原来《文汇读书周报》昨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讲一家面临倒闭的出版社，实际上是指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原来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现在是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周百义为此事告诉了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领导。出版界出现如此事情，说明人员的浮躁内讧和体制的种种弊端。但也有人说，这是和地域、习性有关的一种窝里斗。会议结束已经十二点半，新疆自治区委宣传部宴请大家，在坐多为各省宣传部人员。饭后到书市，见到一些相识的人，淘到几本书，如《剑桥插图本战争史》、《史学九章》等。另在江苏人民出版社书摊见到其副总编辑余江涛，送我几本新出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了书市，与大家会合，认识一女孩子潘莹，告诉她我的《梅村遗恨》和《诗人帝王》在书市上，其实也是一种虚荣心在作怪。女孩子很机灵，现在新华社新疆分社供职。晚上在一葡萄园就餐，气氛热烈，同行者都很友善，喝了不少酒。

六月十八日。早起乘车，一路跋涉，途经一自然保护区，有野马，引颈遥望，似乎戒心很重，很是有趣。中途就餐时得知老板为江苏人。夜宿布尔津。布尔津是一座很不错的小城，街道干净，树木森然。晚上散步，仍然是余晖耀眼。布尔津河是额尔齐斯河的支流，水流湍急，一直向西。河边游人如织，而虫子甚多，扑面而来，目不暇接。河边有烤鱼肉的夜市，生意红火。沿街而行，回到酒店，看《一个神经衰弱者的二十一天》。

六月十九日。早起，赶往哈纳斯湖。中午在风景区外围就餐后，进入风景区。果然名不虚传，神秘荒凉，苍翠满山，水清澈得让人痴迷。看到不少民族风情的小木屋，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需要习惯、需要耐心，据说这里人大多短命而且酗酒。湖水湛蓝，如藏在深山中的少女，只是显得有点寂寞和单调。遇到两个刚参加过高考的中学生，是阿勒泰的，她们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多设计，也有很多梦想。我和她们交谈，谈做导演应该具备的素质。两位学生提出和我合影，天真浪漫，仿佛让我回到当年的岁月。夜宿哈纳斯湖山脚下，山风呼啸，冷气逼人，与同宿舍者漫游四周，看山高月小，听万籁有声。

六月二十日。早起，告别哈纳斯湖，心中似有一种依依不舍的牵

挂。告别那些各具个性的山川、树木，觉得此生再见到它们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不觉闷闷不乐。中午仍在布尔津就餐，然后去看所谓的魔鬼城，实际上是风化而成的土围子，感叹造化神奇的同时，也有点担心，这样的日削月割，它们能够存在多久？途经克拉玛依市郊，见到许多打油机，可惜司机急着赶路，没有到克拉玛依市区走马观花。据说，克拉玛依是个很不错的石油城，但是她的闻名全国，除了石油，还有就是当年的大火，使许多家庭失去了孩子。这个事件，影响很大，也很坏。晚上住奎屯市。托人购买的去伊犁的车票已经拿到。奎屯虽然看上去不大，但是很别致。道路宽阔，植被茂密，据说这里的普通话是河南话，当年，父亲大学毕业，曾经有过到奎屯的设想，后来因故没有实现。因为这一层的缘故，对奎屯，似乎更多了一份亲近。

六月二十一日。早起，去奎屯汽车站乘车，车票是2号座。上车后遇到一经常旅行的人。看其行囊，知道是一个浪迹天涯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坐这样的车，听司机一路神侃，听着很经典很传统的老歌，看着窗外忽而绿洲一片忽而满目荒凉的巨大反差，想起自己当年差一点随着父母来到奎屯，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情绪。好像是电视剧《咱爸咱妈》的主题歌，听起来让人潸然泪下。车到五台，下车吃饭。饭店里放着少数民族风情的歌舞，让人有置身异域的感觉。同车的有一家人，哈萨克族，他们要去哈萨克斯坦探亲。在五台，车坏了。闷热难当，汗流浃背，好在时间不长，车修好了。听司机说，这个唤作五台的地方，在历史上大大的有名，是翻越天山的必由之路。远望天山，浩淼绵绵，想着自己马上就要跨越天山，不禁一阵兴奋——我能够看到碧野所见到的天山吗？

汽车蜿蜒盘旋，终于到了天山之巅。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在山这边看天山，灰蒙蒙一片，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生气，只是死气沉沉地横亘在那里，默默无语。到了山顶，似乎刚下过小雨，但是生态完全大变：草场、牛羊，开始多了起来，尤其是天山的天空，澄明蔚蓝得让人心醉。司机说，马上就要到塞里木湖了，准备好相机。浩淼的湖水终于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是真的吗？虽然刚刚拜访过哈纳斯湖，但是见到塞里木湖，还是忍不住地致敬、膜拜，简直就是静卧在天山之巅的一位深宅大院里的少女，温婉、含蓄，静如处子。如果说哈纳斯湖美在神秘、幽深，赛里木湖则是爽朗、坦荡，更有一番风韵。我下车来到湖边，清澈得有点寒意的湖水，波光点点，真像散碎的金子。蓝天白云映衬着湖面，微

风吹来，水波不兴，简直就是人间仙境。不远处的湖岸边，就是浓郁的各种林带，苍翠欲滴，美不胜收。山顶上是残存的积雪，提醒着人们人间还有冬季。我坐在湖边，闭上眼睛，久久不愿离去。

告别塞里木湖，仿佛进入了色彩斑斓的动植物园。司机说，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栗子沟。我想，碧野的《天山景物记》也就是这样吧？山虽然险峻，但是草场的碧绿，树木的清脆，不知名的各种花花草草的缤纷五彩，让人置身其间，真有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就在这样的美不胜收的旅途中，我来到了久仰的伊犁州的所在地伊宁。朋友在那里早已经等着我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时间紧迫，朋友说去尼勒克吧。

这就是伊犁河谷吗？王蒙当年所在的伊宁二中如今是怎样的境况？当年到这里的林则徐戍边三年，他的纪念馆里可有什么丰富的文物？林则徐这个晚清重臣，似乎已经被我们崇高化了。最近有人骂他是民族罪人，而又有人把他称之为民族英雄，实际上，任何人都不能神化。据说，锡伯族的一个部落，曾经不远万里，从东北来到这里戍守边关，创造了历史上的长征传奇。扬州在汉代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刘细君远嫁伊犁吗？她的子孙都生活得好吗？玉米、高粱、大豆、棉花这些农作物在伊犁河谷利生活得似乎特别安逸，透出勃勃的生机。不断擦肩而过的民族弟兄们，友善、勤快，在各自忙着自己的生计。我们的越野吉普车一路走来，不断地把茂密的柳树林、路两旁挺拔的白杨撇在后边，我多么想走进一个农家小院，了解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生活状态啊？但目的地还很远，容不得我们耽搁。车行处，景致不断变换，我发现我们在沿着河谷行驶，而浑浊的河水不是在内地常见的污染之后的混浊，而是一种携带泥沙浩浩汤汤的豪迈、洁净。这样的河流，粗旷、奔放，是大手笔的泼墨，酣畅淋漓。新疆的周涛写过一篇《关于伊犁秋天的札记》，有对伊犁人的感受，有对自己在伊犁生活的回忆，更有对边地风情的大彻大悟，是收在《兀立荒原》一书中吗？

山不是很陡峭，但是漫山坡的草场实在令人感叹，我们这些在内地生活的人，对草原的理解，不过是一望无际的平坦浩瀚，哪里知道，这些崇山峻岭也会是茫茫草原！散漫自由的牛羊，远远望着我们，安详从容，无忧无虑。晚上，住在唐布拉宾馆。宾馆附近就是一个广场，许多人在这里跳舞、闲逛，一派平和景象。广场中心，有一纪念碑，虽然不太讲究，但似乎是反映当年这里的武装斗争的。一些文字不是太清楚，我想不会是关于马仲英的吧？闲逛之后，回到宾馆，和朋友聊天，到早上

五点钟左右方睡，话题散漫无边，许多事情，恍然如梦。

六月二十二日。早上起来，已是日上三竿。匆匆吃过早饭，就往唐布拉大草原赶去。晚上睡得太迟，在车上不停犯困。山路颠簸，但路两边的景致实在奇绝，看那些赶着成群的牛羊正在转场的牧民，好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他们有烦恼吗？他们需要接受种种莫名其妙的思想吗？烂漫的山花，点缀在绿油油的大草原上，透着俏丽和风情。所谓的大草原，似乎在两座山谷之间，山谷不是很狭窄，一面的山崖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灌木，而青草却是从上到下，直挂下来。另一面的山，绵延起伏，草原、林带错落有致，山脚下的河流，湍急恣肆。我们沿着一座简易的吊桥，过河来到半山坡的哈萨克人的毡房里。毡房一字儿排开，大约有四五个。毡房周围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虽然没有什么栅栏、围墙，但是却自成一方天地。主人很热情，捧出奶茶让我们喝。看到一个小男孩，白白净净，双目有神，很是喜人，我原来以为是哈萨克主人的孙子或外甥，结果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小儿子。这个主人还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在家，另外一个女儿，也就是三女儿在北京学习舞蹈。大女儿穿着牛仔裤，文静害羞，刚刚从伊宁民族中学毕业，高考成绩不错，西安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但是，据这个女孩子讲，家里没有钱供养，就没有去，西安古城对这个哈萨克少女来讲可能成了永远的梦想之地。我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很震惊：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吗？难道就这样把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女孩子说自己绝食了半个月，然后出去打工几个月，想来想去，还是回来了。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不是什么古丽。女孩子说着这些事情，显得很平静，虽然眼泪在不停地从面颊上滑落下来。她二妹妹今年就没有参加高考，我问她有何打算，她说，准备到哈萨克斯坦去打工，攒点钱，开个发廊。朋友想给这两位哈萨克姊妹拍个照片，但是她们拒绝了。再美丽的景色，再壮阔的草原，实际上，还是有普通人的眼泪！回来的路上，一路沉默，我在想着这个女孩子的命运。她也许嫁给一个哈萨克小伙子，在草原上生孩子，牧牛羊，但是她为什么就不能有另外的人生选择？

下午，赶回伊宁。就在伊犁州委大院的招待所里住下，朋友约请了几个援疆干部，在一起聚会。朋友盛情，歌声悠扬，觥筹交错。酩酊大醉之后，回到宾馆，再无睡意，翻看着随身带的几本闲书。盛世才主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和共产党合作，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还有陈潭秋等就在新疆，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似乎就出生在新疆，毛泽民的夫人朱

旦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方志纯是毛泽民的部下。据说,毛泽民的被杀是由于一个叫徐梦秋的叛变所致。徐梦秋是安徽寿县人,在上海大学教过书,资格很老,由彭述之介绍入党,北伐战争时担任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军长是何应钦。徐梦秋很有学问,和毛泽东很谈得来,到苏区后担任过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和林彪、聂荣臻、刘伯承共事。经过长征之后,这个左腿被截肢的被斯诺称之为红色历史学家的徐梦秋到新疆担任教育厅长,从事地下活动。随着盛世才的大开杀戒,徐梦秋的命运发生转折,据说徐梦秋 1976 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前几天,坐在车上,和我同游哈纳斯湖的一位朋友就是徐梦秋的孙子。想着这些事情,还有当年邓力群在新疆的许多文电稿的思维缜密、见识高远,心中一团乱麻,久久难以安寝。

六月二十三日。早饭后,朋友送我到机场,机场离市区很近,也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到了。机场不大,很方便,坐上飞机,返回乌鲁木齐,当天晚上,回到了扬子江边的南京,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云南访书记

很偶然的机会，2005年的11月8日至13日，到云南待了几天，根据一些散漫的回忆，记下在云南访书、淘书的点滴，也记下到一些所谓的景点看到的和书有关的琐事，算是一篇流水账吧。

是第二次来云南了。上次来云南，在昆明中转，去了大理和版纳，还从西双版纳的边境上到缅甸转了一下，满足一回虚荣心，也算是出过国了。那次去云南，似乎是在世博会之前，所谓的世博园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些建设工程。这次从南京飞到昆明的时候，由于飞机晚点，到达时已经是下午了，匆匆忙忙去了大观楼，看了很著名的由一个落魄秀才孙髯翁撰写的长联。此联甚得毛泽东的赏识，据说康生对此联倒背如流，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经跟他学过怎样背诵如此长的对子的秘诀。

离开大观楼，去滇池。滇池的水虽然有所改观，但仍不能使人满意，尤其是临近西山附近，湖水深蓝如墨，溅起的水花丝毫没有一点白色的影子。尤为可叹的是，滇池边上还在兴建别墅群，有一架桥的高速公路放肆张狂地沿着西山和滇池扬长而过，好不威风！告别昆明，在华灯初上时分来到慕名已久的丽江，看了玉龙雪山，游了丽江古城，晚上看过《丽水金沙》之后，重游丽江古城。在丽江中心街附近的五华书店

逗留很久，购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版书系，计有艾芜的《南行记》、李广田的《西行记》、爱德加·斯诺的《马帮旅行》，另有《中国远征军在缅北》、《雪山碧湖喇嘛寺》。得到一本《梦断黄沙之平遥》，今年九月份曾经去过平遥，对这一古城的县衙印象深刻。

在丽江住了两个晚上后赴大理。晚上住在大理的下关，在蝴蝶泉附近购大理石两块，在被导游带到的一个大理石厂购大理石笔筒一个，买了一本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云南风物志》。这本书据出版者说，已经重版九次了。在大理古城的步行街上，清澈见底的溪水缓缓流淌，两边的店铺熙熙攘攘，到一树人书店，想买于坚的《云南这边》，但是书店里的女孩子忙碌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找到。大理和几年前相比，已经很有"旅游城市"的味道了。崇圣寺三塔简直不敢认了，的确有点洱海边上的古塔风姿了。乘索道到苍山看洱海、大理。到一个大宅院去看茶艺表演，这些表演重复雷同，意思不大，而这个宅院中的几个对联倒很有意思，如"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无须花"，"玉带横峰北走飞龙瞻素雪，瑶池澄碧东来紫气蕴书香"，"忙里且偷闲品茗谈文观书画，苦中还作乐访古论道听雨声"。在一个照壁上，还有一首打油诗："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帽上有青天。男儿志在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好像抗日联军的名将周保中的故居就在附近。而这个宅院，据说是当地喜州一姓严的，称作"宝成府"，虽然已经很破败了，但仍然可以大致看出当年的威仪，"将王谢旧宅略作修葺挂几幅名人字画，倩南北高士暂停跋涉品一杯滇云新茶"。在这里看到一本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大理历代名碑》，可惜书太贵了！

离开大理，长途跋涉，去腾冲。路过保山市，见怒江大桥。中午在大桥边上就餐，青山隐隐，碧水悠悠，仿佛世外桃源。到腾冲，去热海泡温泉，夜宿一航空宾馆，看到李根源故居。有李根源题写的"国殇墓园"，葬有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八千多名。墓园肃穆庄严，但稍显寂寥。墓园有图片展，详细记述这个边陲小城曾经有过的峥嵘岁月。腾冲被日本人侵占了两年多，也是被中国全部光复的第一个县城。李根源在民国初年的北洋时期，代理过国务总理，此人在苏州也有自己的园林。边陲小城，清幽整洁，生机勃勃，到一热海去看温泉，吃大滚锅的地方特产"腾冲饵丝"，大汗淋漓。看了一个火山喷发后的遗迹以及柱状节理的壮观场面，很有趣。山间还有菜花金黄，逗人喜爱。

自腾冲去和顺古镇。和顺是边城侨乡，有七千多人在海外谋生。

古镇最有特色的是一个民国初年就有的图书馆，馆名是胡适先生的墨宝，数学家熊庆来，民国名人李石曾，还有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等人，对图书馆都有题字。这个图书馆据说藏书有七万多册，图书馆长叫寸广远。沿着古镇的青石小路，向左边西北角走去，有艾思奇故居。艾思奇故居地势较高，艾思奇故居匾额是当时的云南省委副书记王天玺题写，此人后来任《求是》杂志的总编辑。故居为两层小楼，所谓串楼回栏，还有西式阳台，中间的天井颇大，故居内陈列着艾思奇的生平照片，也有康生等人的照片。艾思奇的父亲李曰垓曾经是蔡锷护国军的风云人物，据说一些有名的文稿都出自他的手笔，章太炎称他是天南一支笔。也许现在的人们不太知道艾思奇了，但是当年他的《大众哲学》和《哲学与生活》确实影响很大，艾思奇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扬和周立波。我在其故居内买了一本 2002 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艾思奇传》，作者是云南的作协主席，叫杨苏。从艾思奇故居下来，路经水塘边的一个亭子，叫洗衣亭。这是和顺在外边奔波的男人们怜惜常年在家的女人们的辛苦，专门在水塘边建了这样的亭子，让他们在洗衣、淘米的时候，可以遮蔽风雨，也因为这个缘故，亭子也叫爱妻亭。

匆匆离开和顺古镇，向瑞丽走来。山路弯弯，行车不易，在晚上十点左右终于赶到瑞丽。瑞丽是一座美丽的边疆小城，人口不到二十万。晚上在街道上闲逛，寒气袭人，见许多人围着铁锅吃狗肉，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小书店购《寂静的春天》，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美国人写的科普名著。买百花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红杏出墙记》，另有莫泊桑的一本小说集。书店内有一人闲坐，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说来自南京。这个人说，他在南京当兵十年，先在尧化门，后来住雨花台。在瑞丽次日，到边境购物，到一个江心洲上吃饭，江心洲是一个民营老板在经营，胡锦涛曾经来过，江心洲的另一半即为缅甸所有。在边境上和一个来自四川的女武警合影，女兵的名字叫戴丽。离开边境，去一个热带雨林公园，还看了一些寺庙、金塔，金塔的名字叫“广姆贺卯”，我们称之为瑞丽姐勒金塔。这座塔，据说很负盛名，至今每逢傣族的盛大节日，还有缅甸、泰国的僧侣跋山涉水而来。金光闪闪的金塔，洁白如玉的塔身，掩映在绿树丛中，庄严肃穆。有一个僧侣，很虔诚地在不同方位进行着自己的朝拜。然后到畹町，在这个口岸小镇上隔河眺望对岸，据说缅甸现在政局动荡，也有人说是禽流感的缘故，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出境了。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畹町的铁桥上看到了几幅历史照片，有周恩来的，

有美国盟军高级将领的，还有胡耀邦的照片，那天是 11 月 8 日，再过两个星期就是胡耀邦的九十诞辰了，据说中央会有很隆重的仪式来纪念这位曾经担任过党的总书记的历史人物。从畹町，来到芒市，在一个小学校园内，有一个塔包树的奇观。看到一个带小孩的年轻少妇，用小推车推着自己的小孩。她的丈夫是这个学校的体育老师，一个月千元左右的收入。在一个陈列硅化木的园子内用一百元买了一块硅化木，晚上乘飞机回昆明。

到昆明的次日去看世博园。现在看来，昆明建了一个世博园，虽然增加了一个景点，但是人造的痕迹太重，还是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外国园子，很煞风景，比如日本，也就几个很简易的房子，不仅滑稽荒唐，还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如果美国举行这样的活动，日本也会这样敷衍了事吗？门口有江泽民的题字。

下午去看鸣凤山上的金殿。整座山上，古木森森，幽径蜿蜒，石阶次第而上。金殿据说初建于明万历年间，后来吴三桂重建。还与吴三桂有关的是陈列了一把大刀，说是吴三桂的，也不知真假。记得上一次来云南，曾经来过这里，但是印象已经不深了。在这里看到王稼句编写的在百花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昆明的书。离开金殿，来到西山，已是夕阳西下时分。站在山上，看滇池烟波浩淼，颇为壮观，整个昆明城也尽收眼底。据说西山最为险峻的栈道是一个贫穷的小道士开凿出来的。下山的途中，看到聂耳墓的标示，便跑上去匆匆看了一眼，整个墓地是一架琴的结构，二十四级台阶隐含着聂耳的二十四岁生命。这个人民的音乐家，据说出身于昆明清寒医家，在日本溺水而死，他的《前进歌》、《毕业歌》、《大路歌》脍炙人口，而最为著名的是《义勇军进行曲》，“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歌并寿而永垂不朽”。郭沫若的碑文，不愧是大家手笔。郭沫若在云南的题词特别多，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种文化的存留吧！

在昆明的最后一个晚上，心中最为牵挂的还是西南联大旧址。我住的酒店在北京路上，晚饭后步行去找西南联大旧址，路途虽远，也可以打的，但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到云南大学附近的一条巷子，几个云大的学生说已经不远了，在云南师大校园内。终于来到了云南师大门口，门口有朱光亚先生题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的大字。进到校园，还能看到保留着的当年的平房教室。教室边上有当时北大、清

华、南开这三所大学校长的塑像,分别是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我在“一二一”烈士墓还有李公朴、闻一多的墓前台基上坐下来,仰望着无垠的夜空,心中奔涌着惆怅的潮水。冯友兰先生撰文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就在西侧,可惜天太黑了,碑文看不清楚。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人在这里寻寻觅觅,凭吊先贤,他极其认真地辨认着哪个是蒋校长,哪个是梅校长。相互交谈,得知此人名叫郑志瑛,是河北邯郸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正在筹办邯郸的商业银行,他也是乘来云南开会的机会,白天没有时间,只有晚上来看这些在旁人看来没什么看头的东西。郑志瑛兴致很高,我们便相约又去云南大学的校园去看至公堂和会泽楼。我们从云南师大校园出来,跨过一座过街天桥,进入云南大学的东陆院校区,看到一座貌似钟楼的建筑,可能是和天文学有关。继续往右走,找到了会泽楼。会泽楼现在仍然是云南大学的行政楼,有一个小伙子在值班,对我们非常客气,大厅内有会泽楼记。会泽可能是唐继尧的字,也有人说,唐是云南会泽人。会泽楼后边不远就是至公堂,借助微弱的灯光,我们知道这座建筑曾经是云南的贡院。当年,李公朴的追悼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而闻一多也是在这里发表了让人热血沸腾的《最后一次演讲》之后,在回到宿舍门口的时候,被枪杀!

离开至公堂,我们走到了云南大学的正门口。熊庆来、李广田都曾经担任过云南大学的校长,而周恩来的第一个女朋友后来从法国回来,据说也是安排在云南大学教书。轰动全国的马加爵是云南大学生物系的学生,这个可怜可悲又可恨的来自贵州农村的苦孩子虽然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育又从中得到了什么?郑志瑛提议说,我们去看云南讲武学堂旧址。

云南讲武学堂似乎在翠湖公园的边上,大门紧锁,我们不能入内,但是在门口有碑文。据说这一带现在是云南省农展馆和图书馆。更远一点说,可能当年吴三桂的王府也在这里,很是遗憾,吴三桂的孙子称帝了吗?据《吴梅村年谱》讲,吴三桂曾经派人找到吴梅村,希望梅村能够把《圆圆曲》中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删掉,但是梅村先生严词拒绝。这种事情,不知到底是真是假,我也无从知道这个曾经为共和国贡献过两个元帅的学堂现在在派什么用场。离开云南讲武学堂旧址,经过翠湖公园的正门口,到了云贵总督府旧址,现在是云南省人大的会堂。会堂前面的广场上有一座很雄伟的纪念碑,会堂的墙壁上有关于云贵总督府的简略介绍。离开云贵总督府旧址,我们来到金马碧鸡坊。所谓

金马碧鸡，都是一种附会与传说，但是这种传说，都与昆明周围的地理环境有关。自明代开始在昆明城内建金马碧鸡坊，坊为木结构，高大挺拔，雕檐彩绘，金碧辉煌，雄浑壮丽。原来的大路绕道而行，金马碧鸡坊现在似乎是一个市民休闲的广场了。告别金马碧鸡坊，郑志瑛把我送到宾馆后也回住地了。他明天去云南保山，我也要回离开了一个多星期的南京了。

南行记

到北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饥肠辘辘到饭馆吃饭，等了近一个小时，想要的面条仍旧没有来，只好去泡方便面了。次日醒来，便去北海的海边，沙滩、树木、建筑都透出新鲜的模样，只是一片萧索，毫无人气。许多海边别墅空空荡荡，寂无人声。想起朱镕基总理说过，这些别墅都用来养猪了，不觉哑然。稍事盘桓，便往边境城市东兴赶去。

东兴是一座充满生机但又相当凌乱噪杂的边疆小城。许多店铺相当破旧，吃饭的地方又很喧嚣。导游要大家重新照相办护照，很是忙乱，实际上是为了让大家再掏一次腰包。总算忙过之后，是无聊的等待，在街上闲逛，与当地人聊天，大家都很和善，很好奇的看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人。导游提醒说，千万不要帮别人带东西，防止夹带毒品，说不清楚，自找麻烦。要出境了，排长长的队伍，缓缓而行。边境哨卡有一株很茂盛的树木，不知是木棉还是香樟，生机勃勃。出关卡就是一座桥，很有沧桑的样子。过桥，到对岸，就是越南了。越南的导游阿峰在那里等着，是一个很精干皮肤微黑个头不高标准的越南小伙子。阿峰清点人数，然后带大家去坐船。河滩很大，要走很远的路程才能到船上。到了船上，小商贩不停地兜售东西，这些人，看上去都是很凄苦的

样子。阿峰说,可以不买,但是不要还价。上岸坐车去海防,海防似乎是很不小的城市,高大建筑不多,道路还算宽敞。下榻的宾馆虽然不大,但是很别致,有点庭院深深的样子。看当地的报纸,应该是《海防日报》吧,似乎是胡志明的什么纪念日,当地的机关、学校都挂着横幅。晚上沿着街道漫步,有很大的广场,树木森森,凉风习习。夜市也很热闹,店铺里的电视放着中国的电视剧,吃宵夜,人民币也可以流通,很便宜。大家都很和善,当地人都会简单的汉语,其中一个摆地摊的人称自己是华侨,爷爷是广东佛山人。

次日早起,早餐是米线一类的东西。在海防的市区转悠,有特色的建筑似乎都是法国人留下的。导游想带我们去赌场,大家拒绝了。于是就往河内去。路途遥遥,稻田里有越南妇女在忙碌。骑摩托车的越南男子疾驰而过,大都带着绿头盔,女人们头戴斗笠,身着长裙,挑着担子,急匆匆地奔波着,会唤起我们复杂的记忆。成年的越南男子看我们这些外国人,也是一付冷冰冰的样子。沿途除了一马平川的稻田,安详恬静的村落,清澈潺潺的流水,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相当密集的纪念碑!纪念碑的造型大致相当,高低不等。我们不太明白碑文上都记述着什么,但它一定是在记述着某起事件,警醒活着的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到河内,已经是中午了。急匆匆去看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很平常的院落,门前的大树已经很有些年头了。

河内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风景是大街上汹涌的摩托车流,排空而来,速度极快,令人胆颤心惊,但是却很少发现碰撞事故,倒很令人纳闷。去看一个很大的湖泊,就在市区之内。导游说,湖被称作剑湖,是希望像一把利剑刺向入侵者。晚上住在一个靠近郊外的地方。附近有大学,不知道是不是河内大学?细雨绵绵,到处散发出一种潮湿忧伤的异国氛围。我想,当年的郁达夫万里投荒,只身就道,到南洋去谋生,想起孩子,想起王映霞,会是怎样的心境?“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但是王映霞最终还是投向别人的怀抱了。与同行者沿街而行,茶馆、酒馆、网吧等一字儿排开,但是似乎生意不佳。有一家茶馆是很幽深的庭院,垂地的竹帘,矮矮的茶几,就像电影里的画面,越南姑娘都是很温顺羞怯的样子。紧邻着茶馆的是一个烈士陵园,我们走进去,黑压压的全是墓碑,倾诉着一个民族曾经的抗争和牺牲。我到网吧里去,看自己的邮箱,很方便,登陆新浪、搜狐等网站,没有任何障碍,甚至上阿拉丁也行。网吧里全是年轻人,打游戏,看电视剧,网上聊天,与中国

的大学生没什么两样。

次日醒来，匆匆忙忙到国会广场。人山人海，秩序井然。原来全是来瞻仰胡志明遗容的人众。我们很肃穆严肃地排队，所有排队的人都很安静，向这位越南民族的伟人致敬。终于到了灵堂的门口，有很威严的士兵站岗护卫，有维护秩序的人强调每人停留不准超过五分钟，实际上就是缓步绕水晶棺一周。胡志明的遗容安详自然，和我们看到的遗像几乎一样。走出灵堂，来到广场上，回头看仍然是人流如织，队伍漫长。阿峰说，广场边上就是他们的大会堂，看上去不是很大，一字排开是国防部、总理府、国会主席府等，还有胡志明故居，很著名的吊脚楼，在向游人开放。而越南总理府、国会主席府则由士兵护卫，游客不得走近。随着人流去瞻仰胡志明故居，比较简单的园林，没有繁复的假山怪石，亭台楼榭。胡志明的故居内陈列也很简单，就像这位伟人生前一样的简朴、自然，卧室里放着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不见《毛主席语录》。

离开这里，来到一个类似中国古窑的地方。据导游说，是越南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城堡，城堡上还有中国的汉字。城堡下面则是一个关于越南抗击美国的战争纪念馆，有一架飞机残骸，是越南当年用机关枪打下来的。在图片展览中，看到越南的领导人杜梅与越南全国牺牲两个儿子以上的母亲合影的照片。许多越南游人在与这张照片合影，表达着一种敬意。其中一位一身戎装的越南军官，搀扶着一位老妈妈颤颤巍巍地看着这幅照片，眼含泪花，久久不愿离去。不知道这位老妈妈是在寻觅什么？是自己在照片上的位置？还是自己亲人的容颜？身边的军官是她的儿子还是她的女婿？或者是她儿子的战友？看关于奠边府大捷的纪录片，屡屡提及武元甲大将，但是丝毫不提中国的支持与援助。这就像当年的朝鲜板门店谈判，本来是彭德怀与李克农在谈，可现在供人参观的现场，根本没有彭总和李克农的任何资料，似乎如此重大的事件与中国人毫无关系一样。

出了纪念馆，有一个小广场，有越南人在打羽毛球。看我们在边上围观，很大方的邀请我们参与。我上去打了有十分钟左右，大家都很友好，没有任何隔膜。河内街头的女孩子大都很漂亮，远不是美国的关于越战电影中的样子，瘦小、黝黑、凄苦、自卑，而是皮肤白皙，身材亭亭玉立，身着一袭长裙，更显得自信阳光，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导游来催，只得依依离开。又要长途跋涉，告别河内，往回走，去下龙湾。

夜宿的宾馆，在一个半山坡上，可以俯瞰整个小城，在阳台上可以

看到碧蓝浩淼的海。饭后到街上闲逛，在一个小店，看中两个根雕，是达摩渡江的味道，反复讨价还价，小女孩就是不肯让步。小女孩会很流利的汉语，正在读大学，最后只得忍痛买来。又在一个小店，买了一尊大象的木雕，很笨重的样子。

次日一大早，阿峰带我们去下龙湾。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海上桂林，青山妖娆，碧水悠悠。遥遥望去，各种奇特的造型近乎黄山的景致。有趣的是穿过一些矮矮的几乎只能让小船通过的罅隙，会看到四围的山围着一泓碧水，碧水中仍有长满绿树的小岛，真是别有洞天，世外桃源。在这样幽静得近乎荒凉的地方，有欧美的游客在这里戏水，无忧无虑，透出一种天真烂漫。他们很热情地邀请我们下水，我忍耐不住，也跳下水去。水还是很凉的。突然想起妈妈说过，远处怕水，近处怕鬼，还是匆匆地上船了。在又一座小岛上，有一个很大的溶洞，里边的造型千姿百态，巧夺天工，引人入胜。阿峰解说这些附会的故事，几乎全是中国本土的，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里的人物，还有牛郎织女、八仙过海之类，让人觉得和中国内地没有什么两样。

中午就在船上用餐，全是河鲜。喝一种当地的酒，很烈，但是味道很好。在我们乘船来下龙湾的时候，有一只机动的渔船，不知何故撞上了另一家正在停泊的船，把他们的渔网也撞破了，双方产生了纠纷，但是导游阿峰上去调解，大家又握手言欢了。中午这两家人请帮忙的人喝酒，阿峰拉着我参加。阿峰向他们介绍我是他大哥，大家碰杯的时候一起把酒杯聚在一起喊一声“撮”的声音，很悠长，也很提气。阿峰说，这是一种驱散鬼神祝福吉祥的意思。阿峰是个很机灵的小伙子，在河内有一个妻子，在下龙湾也有一个妻子，越南人用所谓大米饭、小米饭来称呼。据说，在越南，男女比例大概是1:5的样子。阿峰在下龙湾的妻子开了一个水果店，生意还不错，我们喝的矿泉水都是从那里进的。

下午匆匆忙忙，我们告别了越南。到了国内，乘车奔南宁而去。南宁晚上的街市，烦乱中透出一种蓬蓬勃勃的样子。买了几本闲书，看广场上休闲的人，载歌载舞，很满意目前的生活。到桂林，已经很疲惫了。印象很深的是看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刘三姐》，的确很有创意，很大气磅礴，出人意外。看刚出浴的女子，根本没有小报记者所谓的挑逗淫秽的意思。整个意境的烘托，气氛的渲染，结合周围的环境，完全是挂在众人面前的一幅内涵丰富引人遐思的山水画。桂林山水，也许说得太多了，真有看景不如听景的感觉。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阳朔的一条老街。

晚上十点钟以后，有很多游客，尤其以外国人居多，在这里喝啤酒，聊天。沿街有很多很有个性的店铺，陈设也很别致，古色古香的模样。店里的女子许多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学外语的大学生，在这里实习。坐在这里，悠闲地翻翻书，聊聊天，喝着冰镇的啤酒，看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别有一番情调。

次日，到桂林机场，回到南京，结束了自己的匆匆南行。

欧行鸿爪

5日。到法兰克福的时候，已是晚上七点多钟。经过繁琐的检查，终于离开了飞机场。乘坐大巴车，急急忙忙地赶往住宿的地方。在车上，我给卡尔斯鲁厄的老乡打电话，很遗憾，他去新加坡了。住宿的小镇，非常清幽寂静，据说是富人区。我们夜宿的所在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中国人买下的房子，虽然房间显得很狭窄，但出门在外，大家能够将就就将就了，没有什么太多的讲究。晚上夜很长，次日醒来，便急忙去坐地铁。

6日。清晨的地铁小站冷冷清清，早起的人们匆匆赶来，也许是乘地铁去市区上班吧。我心中疑惑，地铁怎么不在地下？与我们的东张西望相比，其他人都显得似乎很从容和悠闲，根本没有我们在有关西方的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忧郁、冷漠和极端。坐在车上，没有吵吵嚷嚷，没有挤挤抗抗，年轻人在看书，不分男女，静悄悄的。也有早起的少年，忙着去上学。坐在我对面的三个学生，两个男孩，一个黑人女孩，我看他们的书包很重，就作出不堪重负的样子逗他们。小孩笑了，打开书包让我看，原来书包里装着滑板车。不一会，就到了该下车的地方，随着人流，沿着宽宽的电梯，我们来到了书展中心。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来到中国的展台。中国的展台，在一楼的边上，亚洲国家基本上都在这里，

我们挂着孔子的画像,展台的面积还是不小的,关键是我们的书少,而且关于书的介绍资料不仅显得很寒酸,而且也很不成样子。在这里,看到了刘士林的《苦难美学》,还有邵丽的《我的生活质量》,梁衡的《走近政治》。可笑的是,我们的一些出版社,居然带来了一些小学课本,好在科技出版社的丁鹏带来几本《中国民族建筑》,还像个样子。虽然语言不通,还是兴致很高地到各个展台去见识见识。置身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最大的感受是我们再也不要不自量力地胡吹什么中国文化在海外怎样的盛况空前引来四面八方的一致喝彩了。

7日。继续到书市去,主要看德国的展区,实在是眼界大开。原来以为德国人严肃,擅长哲学思辨,但是置身他们琳琅满目的艺术图书当中,才知道什么叫天马行空,汪洋恣肆。收集了许多他们的图书介绍资料,精美大方,很吸引人的眼球。中午,回到中国展区吃午饭,居然发现我的《诗人帝王》也在济南出版社的展台上,很高兴地让同行者给我拍了照片,算是一种纪念。碰到一个德国人,汉语说得非常地道,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他说我们国内的图书现在有一点买椟还珠的味道,令我大吃一惊。这样的成语,不要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也不太常用。就像台湾的陈水扁,称赞别人的工作做得罄竹难书,引来一片哗然,台湾的"教育部长"还为他辩解。这个德国人有一个同居女友,是黑龙江人,看上去很瘦小,在德国留学。他们希望翻译《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也真是奇怪。这个德国人是专门从柏林赶过来的,他刚出版了一本关于梦露的图书,名字叫《谁杀了梦露》。亚洲一些国家,最为阔气的是日本和韩国,弄了许多美女,在那里散发自己的相关资料,还有如越南、印度等,虽然摊位不大,但是很精致,把自己传统的出版工艺搬来在那里很认真地展示。好像本年度的主题国家是阿拉伯世界,据说他们邀请了阿拉伯世界一流的作家、学者来这里演讲,宣扬自己的文化。

8日。今天在展馆碰到钟效雯,穿一袭旗袍,很有点大家贵妇人的味道。她说欧美国家的展馆好看,于是我们就去了。真是别有洞天,这些发达的国家让我们一看就不同凡响,不是那么豪华,也不是那么急切,但是在从容和淡定中透露出泱泱大国的风范,不仅书好,更为重要的是那种氛围和情调。我们这些从第三世界过来的观光客忙不迭地看、拿,眼手似乎都不够用了。走出展馆,我们去歌德故居,还有欧盟的金融总部,法兰克福的市政广场等。漫步这个欧洲城市,似乎看不出二

战带来的创伤和痛苦。在一个小广场上，好像是印度人在那里表演，有不少人在围观。我们在地铁的一个中国东北人开的餐馆吃了盒饭，然后去商店买所谓的瑞士军刀。我去看了几家小书店，有的在地下，有的是个小店铺，有的在大商场里，但是都布置得井井有条，朴素淡雅。一些成人书刊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并没有什么限制，也没有看到有多少未成年人去光顾，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平静、安详。在乘车回驻地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在站台上遇到一位中国人，他来自四川，在银行上班。

9日。早上匆匆起来，乘坐大巴车。告别这座小镇，还真有点淡淡的依恋。小镇看不出有多少居民，但是有他们自己的报纸，叫《骚根日报》。所有的建筑都不会超过四层，依着地形而建。这些民居各有千秋，家家花草树木，怡然自得，尤其是墙壁，露出许多木材的本色，显现出一种别致的审美趣味。草坪修剪保护得无可挑剔。去看小镇上的图书馆，是一个古城堡，墙壁上爬满了爬墙虎，蓊郁青翠，让人不忍离去。镇上有许多古树，参天而立，仿佛诉说着这座小镇悠久的历史。坐上大巴车，离开法兰克福。听导游讲，马上经过的城市叫梅茵茨，是德国前总理科尔的故乡。莱茵河水清澈见底，整个城市的外观看上去没有法兰克福繁华。大巴车行驶在公路上，德国的公路似乎没有中国东部地区的好，他们的司机都很遵守职业道德，到一定时间都要主动休息，绝对不会疲劳驾驶。途经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没有时间停留。中午时分，到达卢森堡，是个很小的国家。狼吞虎咽地吃过饭，就去看所谓的景点，是一个大峡谷，很有气势，站在炮台上俯瞰，还真有点一夫当关万夫难开的味道。紧接着就是去荷兰的鹿特丹，就餐的店很大，是中国人开的，里边有很多华人报纸，各种消息都有。有人议论着晚上去看所谓的"花街"，但是导游说，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远，关键是这里很不安全，已经发生多起中国游人被抢劫的事情。这样一来，大家都不好多说什么了，毕竟安全第一。

10日。清晨起来，开始去鹿特丹市区。看大家好奇，导游还是带大家去了所谓的"花街"。也就是几条很普通的小巷子，逼仄，潮湿，似乎还有点破旧。我们离开后又开始长途跋涉，去阿姆斯特丹，看风车、填海造田之类的景点，自己带了一本《欧洲史》，大致了解荷兰人开国的艰辛。真是走马观花，还要赶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又遇到堵车，好像是在举行马拉松长跑比赛，有不少市民站在路边给选手加油。市政广场

似乎很小，很著名的是那个撒尿的小孩，有意思的是有一些艺术家，在街边上摆出种种造型。人很多，似乎显得噪杂。

紧接着开始往法国进军，要到巴黎了，心情竟然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

11日至12日。昨晚在灯火通明中进入巴黎，我们走的路线也就是当年德国进入法国的大致路线。导游指给我们看的所谓马奇诺防线的遗址，也只是一种很粗略的印象了。进入市区，去卢浮宫，人如潮涌，在门口居然碰到了江苏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高顺青。卢浮宫这样的艺术殿堂更像是一个大集市，蒙娜丽莎画像前人潮汹涌，摩肩接踵，让人不胜其烦。看到一个法国小女孩在那里看书，文静安详，想到自己的女儿潇潇，有点想念她们了。和小女孩合影，她很高兴也很落落大方。离开卢浮宫，去看一个大广场，据说是见证巴黎诸多重大事件的地方，有十三个塑像，代表着法国的十三个省。然后去巴黎圣母院，和雨果的小说相比，虽然还是庄严肃穆，气魄雄伟，毕竟不如当年自己看小说时感受到的那种神秘。巴黎圣母院门前显得很凌乱，感觉巴黎的管理员没有德国人那样有条不紊。吃中饭的餐馆就在艾菲尔铁塔下面，在餐馆里遇到一个很热情的服务员，一问竟然是平顶山人，名字好像叫王爽，在巴黎学习财务会计，她还很大方地给我留了联系方式，让我回国后给她的父母打电话。很遗憾，我居然把电话号码给弄丢了。上艾菲尔铁塔需要排很长的队，在埃菲尔铁塔上看巴黎，仿佛是在欣赏一幅壮观的油画。晚上游览塞纳河，细雨霏霏，在河上看河两岸的景致，心中涌起万千的感慨。近现代以来有多少中国人到巴黎来，说大一点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富强，说小一点是为了开阔眼界，学习西方。游船上，有几个日本女孩子，显出一种单纯和善良。为什么一看到日本男人就有一种警惕心理，我们虽然是邻居，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两国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糟糕了。

13日。离开巴黎，往南行驶，去斯特拉斯堡。途中吃饭，我没有去，自己在路边的小树林看书，然后分别给父母、妻女打电话，他们也很牵挂我。哎，人海茫茫，还是真情难舍！我们知道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是发生在这座城市。斯特拉斯堡就像是一幅画，一个世外桃源，城市干净得让人不能不小心翼翼，几乎每个房屋的窗户下面都有鲜花，穿城而过的河水纯净得让我这个中国人不太敢相信。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样的阳光灿烂，高大轩昂的教堂里空空的，偶尔有人进来，就随便找一个

角落静静地坐着，安详、知足、谦和。天空是纯净的，树是翠绿的，房舍栉比鳞次，规矩而不单调。欧盟总部就设在这里。在城市的近郊有吉普赛人的敞篷，炊烟袅袅，虽然不乏田园牧歌的浪漫，但是这样的漂泊无根，毕竟会有许多辛酸，我们很难知道这样的部落还能持续多久。

14 日。昨天傍晚，离开斯特拉斯堡，进入德国境内，然后还穿越一段瑞士边境，进入奥地利。应该是阿尔卑斯山的边缘，树林浩淼幽深，人烟稀少，晚上住在一个唤作“黑森林”的地方。有一个湖，叫什么“滴滴湖”，这样的名称，估计都是恶俗的旅游公司所为。然后去“白天鹅堡”，建在一个半山腰上，不仅是富丽堂皇，工程浩大，整个古堡内部的壁画非常地讲究奢华，主人好像是普鲁士的什么大人物，也是像中国李煜、赵佶一样的活宝。导游喋喋不休地讲着这位大玩家和知名的电影《茜茜公主》中女主人公的关系，我已经昏昏欲睡了。晚上到达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莫扎特的故乡。

15 日。萨尔茨堡据说是奥地利的第二大城市，也许是迎合旅游的需要，也许是出于城市的自然需要，尤其是商铺林立的街道，非常的洁净清爽。去看莫扎特的纪念馆，还有莫扎特的故居，商店里有许多根据莫扎特开发的产品。看了一些教堂、宅院。一些很古老的故事毕竟离中国人太遥远了，很难唤起我们的共鸣。翻开余秋雨的《人在欧洲》，许多叙述也是泛泛而谈，了无新意。晚上住维也纳。奥地利的一位女作家刚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加州的州长施瓦辛格也是奥地利人，其家乡就在奥地利和意大利相近的一座小城市。

16 日。维也纳毕竟是首都，建筑气派而又古朴，似乎每一座建筑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去看施特劳斯的塑像，公园里人并不是很多。公园附近有一座建筑，国旗无精打采地挂着，四门紧闭，黑灯瞎火。导游说，这是伊拉克的大使馆。当年，这里高朋满座，经常举行各种酒会、舞会。如今，国家倒霉了，不仅门可罗雀，而且已经关门了。当年的中国在外国人眼中可能也是这样的形象吧。很难有悠闲的心情漫步街头，细细品味异国的风情，没有办法，随着如此庞大的团队，只能这样了。晚上，在房间里继续看《欧洲史》。

17 日。早上起来，去看维也纳所谓的夏宫，是在山坡下半圆形的一排建筑，森然排列，很有气势。缓步走上山坡，草坪并不是很好，枯黄、干燥，似乎很少有人来，树林间有不少松树和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山顶上的建筑是残破的遗址，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似乎在诉说着它往昔的

繁华和尊贵。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维也纳的全貌，雾气蒙蒙，不甚清晰。匆匆下山，去看多瑙河，多瑙河不是蓝色的，似乎是黑色的，风很大，遥遥望去，是欧佩克总部的大楼，楼很低调，并不是很张扬的样子。突然想起来，《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哈耶克是奥地利人。就这样，告别奥地利，去欧洲之旅的最后一站意大利。

18 日。从奥地利到意大利可能要翻越阿尔卑斯山，穿过一个隧道，又是一个隧道。我们总是说自己的成渝铁路、成昆铁路如何艰难如何了不起，也没有听说欧洲人怎样张扬自己，但是开凿这些隧道看得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夕阳西下，赶到了比萨，也就为了看那座斜塔。天色已晚，但是没有办法，总算赶上了末班车，公园没有关门。近看的确倾斜得厉害，据说为了控制斜塔继续倾斜，曾经向世界征集答案，一个南京人提供的方案被采纳了。我不太相信，如果是真的，我们国内的媒体还不炒翻天？晚上就住在这里，明天去威尼斯和热那亚。

19 日。先去热那亚，去看一座古堡，还有很古老的建筑，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灿若星辰的人物。导游说，那个房子是当年但丁住过的，我们也无从考证。到处是大理石建筑，到处是个性张扬的雕塑壁画。游客很多，尤其是亚洲人多，据说原来都是日本、韩国人，现在中国人也多起来了。去威尼斯要坐船，天下起了不小的雨，风浪很大，一到威尼斯才知道所有的比喻都是蹩脚的。不是说中国的什么城市是东方的威尼斯吗？简直是亵渎。威尼斯才是真正的水城。看了奈何桥，或者称之为叹息桥，由于刚下过雨，游人又多，走路颇不容易，大街小巷，像迷宫一样，也只能转个大概，算是到此一游。

20 日。离开威尼斯，直奔罗马。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上了解了太多的罗马，但是百闻不如一见。余秋雨说了那么多废话，但是他对罗马的概括却是很准确的，他认为这样的城市才配得上“伟大”这两个字！罗马充满了遗迹旧址，似乎给人以破败之感，但这也许正是罗马的魅力所在。住宿的附近离火车站似乎不远，聚集着很多的人。导游说，这些人大多是从亚洲和非洲偷渡而来，聚集在这里，进行一些沟通、交易，当然也有许多犯罪活动。看他们穿着褴褛，面容憔悴，生活得很不轻松，也似乎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着某种很不和谐的气氛。街道是石板铺的，也许这些石头是当年从西亚、北非弄来的也未可知。去看角斗场的遗址，去看屋大维被刺杀的旧址，去西班牙广场静坐，罗马显得零乱而不失大家气度。去梵蒂冈，再小也是一个国家。据说，梵蒂冈的卫兵都

是瑞士人。教堂广场正在维修，教皇身体不好，但是我们徘徊在教堂里，感受到的是庄严和肃穆，还有在内心深处唤起的一种虔诚和敬畏。想起自己的舅舅们对基督是那样的执著，但是他们何曾有这样的机会来梵蒂冈？有意思的是，在西班牙广场，看到圣雄甘地很大的画像，有英文题写着甘地的主张：我所传递的都是关于爱的消息。离开广场，马不停蹄地赶往飞机场，是达芬奇国际机场。从这里，我们飞回了祖国的首都北京。

倚树沉眠日已斜
——代后记

名字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符号。马三立说过一个相声段子，讲名字的种种趣闻轶事，令人捧腹。现在网络发达，短信盛行，拿名字开玩笑包括政治玩笑的短信不仅显示出民间智慧，也往往让人印象至深。但人在一生中如果只用一个名字，似乎又很单调，虽然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小时候的名字很有可能是那样的简单通俗，洋溢着乡土气息，甚至于往往只有姓氏排行。字号、表字、别名往往是读书人或者是官宦之人的专利，所谓的堂号、书斋名称更是上等人的风雅之举，与普通人似乎无缘。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笔名这个听起来有点别扭甚至酸腐的称呼开始在告别科举制度的读书人中和追求新潮、投身变革的人当中流行起来，我们后来才知道，博古、洛甫、彭真、康生这些名字都是他们的化名，邓小平原来的名字叫邓希贤，朱德的名字叫朱玉阶。至于文革期间，一些流行天下的“名字”，则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虽然不是笔名，但又的确是由一部分御用秀才组成，如“梁效”、“罗思鼎”、“丁学雷”之类。

扯得远了，说文人的笔名。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经常要了解一些所谓的文学常识，这些提供文章让我们阅读的大家的名字往往让人产生遐想，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几乎都是笔名。

我的家乡的一些文人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姚雪垠原来叫姚冠三。徐玉诺是一个很潦倒的文人，曾在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诗集《雪朝》、《将来之花园》，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一只破鞋》，解放前夕沦落到逃荒要饭的地步。他的原名叫徐言信，笔名红蠖，听起来很怪异。有一个女作家，叫刘东兰，笔名白朗，很让人想起我家乡伏牛山中的一个大土匪。算是南京籍作家的叶灵凤，原名为叶韫璞，笔名有佐木华、亚灵、叶林丰等，但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还是叶灵凤这个名字。有意思的是，曹聚仁认为写长篇小说的水平要远远超过茅盾和巴金的李劼人，好像没有听说有什么笔名。

说了这么多，开始说自己的名字，还有笔名。我在家里排行老二，哥哥的名字叫孟雷，我的名字应该叫仲什么的。鲁迅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我的名字就叫作仲宇。但是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可能是和父亲的老同学的什么长辈的名字重复了，这在古风淳朴的中原还是很不礼貌的事情，所以我的名字又改为震宇，但是爷爷、姑姑们还是习惯叫我的小名毛雨。读过小学以后，我的名字改为振宇，自此一直到中学毕业。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班主任说，叫振羽好，希望你在历史学方面有点出息，像吕振羽一样，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班主任的意见得到了父亲的同意，这样，上大学以后，我就叫王振羽了。

在大学读书，主要是打基础，开阔视野，但是急于发表文章的愿望非常强烈。记得听成中英教授的一次讲座，我整理了一篇东西，现在看来至多算是一种访问记，需要署名，就想起来用一个笔名，同宿舍的人七嘴八舌，最后还是我说叫雷雨。其实用这样的笔名，和曹禺的剧本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我哥哥叫雷，我的小名曾唤做“雨”，如此而已，是对手足之情的一种缅怀吧。那个时候，哥哥在一个矿区的学校当老师，生活得很不容易，但还是时常记挂着远在南京读书的弟弟。从此以后，写文章基本上都是署名雷雨，如我写《中原奇侠樊钟秀》等都是用雷雨的名字。

参加工作以后，主要是写枯燥无味的新闻稿、公文之类的东西，但在业余时间，我醉心于写新闻评论、散文、书评等，陆续用的笔名有习辰，是自己名字的一半。孤客一身千里外，未知归日是何年。也许是出于故土难舍、乡情浓重的缘故，我用过较多的笔名是汝水、汝河、湛河等，因为我的家乡的小村庄边上有两条河，他们是北汝河和湛河，都是

沙河的支流。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我的家乡平顶山是故应国，这个很小的诸侯国是商周时代就有的，很是古老了，我曾经用过“应厚仁”这样的笔名。我外公姓张，哥哥对外婆有点印象，但我对外婆没有丝毫印象。我的舅舅们大都是基督徒，对我们这些没有入教的人似乎比较冷漠，但我们从鲁迅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外婆家的温暖和慈祥。我偶尔用过张稼甥的笔名，也就是张家的外甥的意思。我自己的祖母不要说我没有见过，我的母亲好像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婆婆。听妈妈说，祖母姓杨，是漯河临颍人，我为了纪念自己苦命的奶奶，曾经用过杨之水、杨之荪这样的笔名。我在团结出版社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箫心剑态：龚自珍传》的时候，署名用的就是笔名雷雨。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江南彩衣堂：常熟翁氏文化家族传》的时候，出版社社长，也是该书的责任编辑周百义说，出版图书还是用本名好。我后来陆续出版了一些书，又牵涉到如何署名的问题。上海的陈子善先生说，写文章用雷雨，出书用本名，各得其所，所以后来出版的《漫卷诗书》、《书卷故人》、《诗人帝王》、《吴梅村传》等都用本名。

从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名字，包括笔名，不过是一种感情的表达和寄托，一种读书写作的小小游戏而已。不是说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到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随着岁月的嬗变，我当然还会使用一些新的笔名，只要手中的笔不停歇。

人书俱谐

——跋振羽《江南读书记》

蔡玉洗

我有很多朋友，分布在各个领域。这么多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是哪个领域里，都与读书、编书、写书有关系。与振羽兄的认识也是由书结缘的。

振羽兄的爱书、痴书在朋友中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年龄比我小一截，但他读的书、写的书却比我高一截。他的勤奋、聪明弥补了机关工作时间不足的弱点。每次朋友聚会，无论是闲聊还是开会，他都能说出一大批新书或好书的趣闻轶事。有些书的名字我们也曾听说过或者见诸报刊，但内容并不详细知晓，振羽兄就与我们不同，他不但知道某书的内容，而且还能说出此书创作的背景，作者的有关情况，与同类作品相比的不同特点，常使我们感到汗颜和惊讶：他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看这么多的书籍？有这么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记忆力？

季羡林先生曾归纳过一个人成功的条件：天资加机遇加勤奋等于成功。在振羽兄的成功中，我说，天资和勤奋是主要的。我的朋友中有振羽同样机遇的人很多，甚至有人比他机遇更好，但读的书、写的文章要比振羽少得多。振羽兄在一本又一本、大的小的书出版的现象背后，该付出多少辛苦！我自己也算一个读书人，深知一个人要认真地写出一本书是多么的不易！

在振羽的众多著述中，有两类创作倾向：一类是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文学传记，龚自珍、翁同龢、吴梅村，这些多姿多彩、可歌可泣的风云人物，他们在历史上的表现足以改变一个时代或代表某一类历史人物的命运。振羽兄选取这些人物作为他的传主是具有长远历史眼光的，这些著名人物的传记跟一般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区别，他要在创作前查阅、甄别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其他人的著述，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要有哲人眼光的审视和把握。如果振羽兄有较多时间在这方面认真地钻研下去，他会在历史著名人物传记创作上做出更为显著的成绩。在我和振羽的交往过程中，发现他有多方面的兴趣和追求，除了撰写长篇历史人物文学传记之外，近几年他还撰写了《漫卷诗书》、《书卷故人》等读书随笔、书评书话方面的多种作品。这些读书随笔，轻松活泼，挥洒自如，笔端常带感情和针砭，构成了振羽兄创作生涯中的另一种倾向。

对于这后一种倾向，我觉得更见振羽兄的性情。振羽在新闻出版部门的机关工作，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岗位上总要看一些非自己愿意看的书，说一些非自己愿意说的话，写自己非愿意写的文章，完成一些领导和朋友交办的任务。我觉得振羽的可贵在于做这些事也很投入，也很认真，写出的文章也有一定的质量和深度。这类文章多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工作忙，时间少了，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作深一点的研究，只能挤出一些“三余”时间，见缝插针地写些随笔和短评。看振羽的这些文章，也很有启迪，他涉及的面很宽，眼界也很开阔，充分展示了振羽兄的杂家面目。

振羽在两种倾向下都写出了优秀作品，令人感佩。但我也有某种担心：要工作要生活，两者兼顾，左右开弓，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长期这样下去，身心俱疲，会很累的。作为朋友和兄长，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孰重孰轻，何去何从，愿振羽兄深长思之。

丁亥岁秋于耕趣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江南读书记
作者=王振羽著
页数=272
SS号=12024263
DX号=
出版日期=2008.1
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小艾和她的表哥
有多少记忆有多少文学
胡兰成的今世今生
雅好古书李一氓
“ 书前书后 ”总关情
陪老人聊天
有趣的《笑我贩书》
为一座城市留影
深邃夜空下的激越
会议还可以这样开
记者眼中的社会“ 变化 ”
苏共亡党十年祭
听昂格尔说法律
重温没有法律尊严的年代
历史备忘录
告诉你另一面的李敖
郑逸梅的《味灯漫笔》
搅动书评江湖的一缕清风
有意思的“ 访谈录 ”
堪为经典的教育常识
夜读《文丛》意怅然
征帆去棹残阳里
最是读书滋味长
立传树碑说民国
站在近代史的起点沉思
南京五记
彭城淘书记
广州散记
天山访书录
云南访书记
南行记
欧行鸿爪
倚树沉眠日已斜——代后记
人书俱谐——跋振羽《江南读书记》&蔡玉洗